

# 再版序

《历史不再徘徊》、《沉浮》和《变化》都已有过多种版本。现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希望把它们合为《改革史系列》再行出版，因为这三本书的内容在时间上前后相续，大致覆盖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我们国家的改革历程。这理由似乎可以成立，但并不意味真的可以把这几本书当作“史”来读。实则就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来说，我的记录仍有不少空白，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几年就很少涉及。即使我所描述过的那些年，也只是一些片断，不是全部。更何况作者的写作只是出于一己之眼光、胸怀和成见，无论怎样豁达通透，也不能做到周全无误。所以，把这些文字看作这段历史的一个补充或者参考，可能更符合实际。我一直把自己当作记者，没有治史的理想，其中缘由，我在过去几次的序言中已经提到，不再赘述。

此外还有几句话，需向读者交待。

《历史不再徘徊》这本书此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发行过几种版本。这次新版增加了一段文字，也即“序幕”，此外全部如旧。这篇“序幕”是原稿的一部分，并非后来的补充。当时是作为全书点睛之笔的，所以尽力言无不尽。可惜这种“言无不尽”在当时情势里有可能成为公开出版的一个障碍，乃至编者不得不把整篇“序幕”全部舍弃。这种大胆而又不能无畏、百转千回才能到达目标的情形，正是那种历史环境中文人论政的写照。现在这个新版终于把“序幕”依原作收录，这在我和原版编者都是弥补了一桩遗憾。

《沉浮》曾在1998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现在这一本是根据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重排的，内容没有增删。它从来都不是一本影响很广的书，但我却对它最为珍惜。它容纳了我对自己职业的理解和信念，所以，从“基因”上来说，它最像是我的“儿子”。它出版前后的命运最为坎坷，甚至连累它的编者也改变了命运。多年以来我在内心深处对他们，以及所有为了出版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我的书而承担压力的编者和出版者，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歉意。我想，他们如果能够看到这几本书的新版，一定也会发出同样的感叹。历史毕竟是前行了——无论它要经历多少坎坷多少曲折多少磨难。

《变化》不像《历史不再徘徊》那样命运多舛，也不像《沉浮》那样否极泰来，它基本上是个大团圆的结局。尽管它的编辑过程也是如履薄冰、出版前后也有一些“不得不”的情节，其实也不过是有惊无险。一度盛行的它已遭“封杀”的传言，不是事实。而我所以能够在那一年的媒体评选中获得“年度人物”奖项，好像也和这本书有关。尤其让我意外的是，台湾读书界同时给予这本书高度评价，越过海峡的屏障为它颁发“开卷好书奖”。在经历了无数磨砺之后，这些都超过了我的期待。我曾经表示，《变化》这本书代表了我在写作上的追求。这是指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记者这个行当的约束，所以思想更舒展，立场更从容，感情更真切，下笔更自由。我后来的写作，也是沿着这条路走的。老实说，如果上帝给我更多时间，我可能会在这条路上走得再长一些。

作者

2011年3月

## 再版前言

本书的写作始于1989年夏，用了7年才算完成，初版和二版的印行也都是10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引起一些争论，有人持有尖锐的批评态度，结果被当作“问题图书”暂停发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几位专家受邀审读，给予正面评价，所以才有二版的重印和发行。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竟又获得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优秀图书奖项。这一过程也许反映了那时候社会思想的莫衷一是和蹒跚前行。

在关于这本书的种种褒贬中，万里说过的几句话叫我难忘。他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也是本书所叙述的诸多事件的亲历者。1978年他是安徽省省委书记，后来进入中南海，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的最后职务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97年2月，他听到了关于这本书的争论。他说他已经看过这本书，接着又说：“这本书写得好。写的是历史，材料真实充实，从中可以看到农村一系列‘左’的政策及其严重恶果。‘左’的危害对社会主义革命、对共产党太严重了。这样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共产党’，人民怎能真正拥护？照此下去不亡党亡国才怪呢！”他还说：“人民公社的书，好像过去还没有看到谁写。这本书实际上写的就是人民公社的兴起与失败。有人说‘失败’二字不好，不赞成用‘失败’。我看‘失败’这两个字用得好，这是事实，而且是历史的结论。”<sup>①</sup>

现在时过境迁，很多人不太知道这本书了。但总有些朋友对我提起它。有人说它是我写得最好的一本。我不敢说“最好”，但它的确是我写得最痛快的一本书。我特别怀念写这本书的那些日日夜夜。不仅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全身心地投入一件自己想要做的事，更因为当时心境特别纯粹，一心一意秉笔

---

<sup>①</sup> 本书初版、二版书名为：“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直书，没有保留，不像后来写作时总要瞻前顾后。2008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周年。可以说，今天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所有故事，都是从1978年开始的。若要了解更多的来龙去脉，则须追寻到70年代、60年代和50年代。所以1978年在我看来是承前启后的一年，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一年。也许正因此，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对于重新出版这本书表示浓厚兴趣，这当然也是我很乐意的事。

就让我把这本书献给那些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们，作为我的一点敬意吧。

作者

2008年3月30日

# 目录

## 序幕 千年一梦 / 1

## 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 / 9

小岗寒夜——20位农民的契约文书是否赝品——中南海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争论——农村两亿人食不果腹——无力回天的陈庭元终于大彻大悟

## 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 / 33

合作化中的“大同梦”——邓子恢被批判，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包产到户”的首次出现——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诞生——“六十条”：人民公社第一个成熟的制度——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包产到户”使400万人受牵连

## 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 / 81

5万个人民公社为城里人提供了多少食物——几百万农民乞讨为生——“三年决战”与安徽“六条”——“真理标准”讨论对人民公社的影响——“责任制”：一个持续时间最长含义变化最多的概念——凤阳的“四级所有”

## 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 / 105

1978年12月1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通过——省委书记的迂回战术——中国的改革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 第五章 从昔阳到凤阳 / 127

“张浩事件”——陈永贵的辉煌与黯淡——“要吃米，找万里”——“包产到组”：向人民公社制度的挑战——尊重农民的选择

## 第六章 相持不下的日子里 / 165

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三个不怕死的县委书记——张世贤和迟世光为何未能成为英雄——人民公社最后的意识形态屏障——人民公社在九个贫困省区开始瓦解

## 第七章 公社精神的破产 / 199

昔阳的欺世盗名昭揭于众——经济问题缘何演变成政治问题——“文化大革命”与人民公社制度——“学大寨”：号令6亿农民的政治旗帜黯然失色——公社精神永远不会再放光彩

## 第八章 余韵缭绕 / 235

“切三刀”：关于“包产到户”的折中方案——秋后算账：人民公社不如“包产到组”，“包产到组”不如“包产到户”——1982年第一天，中共中央再次颁布关于农村的新文件——人民公社失败原因的种种分析——人民公社最后的解体

后 记 / 271

主要参考书目 / 273

再版后记 / 276

## 序幕 千年一梦

我们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世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乃由一个最庞大的政党所创造。它包含了有史以来最为美好的理想，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至少 3000 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和饥饿所造成的各种疾病，另外 3000 万人则由于父母的营养不良未能诞生。它是 20 世纪我们国家战胜饥荒的最重要的史篇，其兴起至结束的全部过程为 27 年，也即 1958—1984 年，但它的序幕已经持续了 2800 年。

这是一个“大同王国”的总失败的记录。

人民公社的全部历史与“大同”概念联系在一起，这在它的诞生之际已有明显征兆。1958 年盛夏，我们的国家就好像是一座深陷理想狂热之中的圣地，这种狂热气氛的中心则为河北省徐水县。8 月 4 日，毛泽东的专列开进这个地方，万民景仰，遂将梦想当作事实。第二天徐水即宣布了向共产主义的“进军”。248 个农业合作社合并而为一个人民公社，自耕农民立即成为公社社员。这一情节后来被载入史册，作为人民公社历史的开端，广为转述。但是，其中一个细节却为大多数史家忽视：当日由京城赴徐水主持人民公社的开创者们，有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若干官员，他们奉命在身边携有《大同书》一卷，用做公社思想的指导。

这一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背后有着大历史的逻辑。

“大同”这一概念的最早出现，大约是在《礼记》中。后来则有儒家标榜“天下为公”，也是继承这一典型表述、与“天下为家”的“小康”境界相对照。这样看来，这一思想的渊源，在我们的国家中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不过，以“大同”为宗旨全面设计未来社会，当以这本《大同书》为代表。

此书系近代思想家康有为所作。他在 1884 年执笔，1902 年杀青，成书十部。各部名录如下：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甲部：入世界观众苦  
乙部：去国界合大地  
丙部：去级界平民族  
丁部：去种界同人类  
戊部：去形界保独立  
己部：去家界为天民  
庚部：去产界公生业  
辛部：去乱界治太平  
壬部：去类界爱众生  
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我们由这里可对作者的思想轮廓以及用心良苦有一个大体印象。如此彻底的革旧鼎新之论，在当日实为惊世骇俗。书成之后，作者十年秘不示众，生前只将其中甲乙两部公开印行，时为1913年。全书直到1935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时作者已经去世八年。又23年以后共产党的官员们携带在身边的，也是这一版本。

在党的领袖毛泽东心中，《大同书》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也有着事实方面的根据。毛泽东之阅读康有为的《大同书》，至少可以追溯到1917年他在24岁的时候。这一年他有一信寄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黎锦熙，其中即热烈地响应“大同”。他说到孔子以“太平世”为其所望，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还说“大同”之世，也是我辈所望。这种将历史的进步分为三世的方法，正是康有为《大同书》所依据的基本逻辑。然而更加要紧的事实在于，毛泽东的心中自此便时时萦绕着对于新社会的期望。所以他先是策划“工读同志会”，邀几朋友于岳麓山中从事半耕半读，继之又希望能够在山中建立一个功能及制度更加齐备的“新村”。他写道：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他的这一“新村”计划，发表在1919年第12期《湖南教育月刊》，题为《学生之工作》。毛泽东时为26岁。将这一计划与《大同书》加以对照，可知两者的关联至为清晰。比如康有为称其“大同”乃是无邦国，毛泽东则说国家与教会、资本家、君主一样，“为天下之恶魔”。康有为指斥家庭有不可避免之公害，必去之方可入“大同”，毛泽东的“新社会”则以“合并若干家庭”为前提。康有为又主张无产界、均贫富。贫者可得公政府恤养，病者可在公医院就医，农家居有公室，食有公厨，好学问者有公共图书可读，欲成才者有公共学校可进，想休闲娱乐者则有公园可去。毛泽东的计划是公共银行、公共消费社、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场、公共图书馆、公共剧院和公园。这种对照固然失之机械，但对于一个20多岁的青年来说，并非不可理解。

我们不能同意一种说法，即认为20多岁的毛泽东尚处不成熟的阶段，所以他在那个时候的想法不能代表日后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作为。实际上，所有历史伟人虽然具有不同特征，早熟却是他们共同的情形。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一个29岁，一个27岁，但是这一部书对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犹如《圣经》对于基督教徒。无数人为之奋斗，直至耄耋老矣，依然信守不渝。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共产主义伟人身上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毕生的思想轨迹，几乎全部可以在他30岁以前的生活中找到渊源。比如他认定自己在1920年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他在那一年里所阅读过的全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其实只有三部，即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以三本书即能决定一个人毕生的世界观，已经令人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事：他从这三本书中所领会到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只有四个字，即“阶级斗争”。他此时不过27岁，可是，就是这四个字成为他毕生所求，至死不曾改变，甚至可以凭此使我们的国家在以后60年里地覆天翻。

毛泽东在他去世的前夕曾说自己只不过做了两件事情，其一是打垮了蒋介石和建立了新中国，其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可以看作是他给自己毕生所为的一个总结。将这两件事情合起来看，其实就只有阶级斗争一个要旨。但是，我们也不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毛泽东穷其毕生精力仅搞了阶级斗争。实际上，他确曾对于“大同世界”寄予无限期望，并且以自己的热情、胆魄和权力将这个期望付诸实施。这在1949年他建立政权之时，便已留下明确迹象。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到达大同的道路。”这表明他并不否认将“大同”作为理想的目标，只是认为共产党较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之康有为的高明处，在于可以开辟到达目标的道路。这道路便是他在27岁时即已认定的“阶级斗争”。此后若干年间，毛泽东已60多岁，自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对于康有为的著作仍是“经常要看”。到了1958年他在发动人民公社的时候，又宣布“前人乌托邦的理想，将在我们的手中实现”。同样的意思康有为在60年前说“孔子之太平世，佛之莲花世界，达尔文之乌托邦，实境而非空想焉”的时候，即已有过清晰的表述。

正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民公社的故事虽然发生在50—8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它的序幕其实在康有为写作《大同书》的时候就已经拉开。当然，《大同书》给予我们民族优秀分子的影响并不仅止于毛泽东一人。当日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无不为之感动，这些人甚至还能组成一个17人的“工读互助团”来加以实际体验，只是实行三月，即告解散。

然而康有为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个“乌托邦”的思想家。比如“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创造者——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就早于康有为400年来到这个世界。《乌托邦》正是他的成名之作，他在那里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完美的共产主义国家，其想象是如此丰富大胆，叙述又是如此娓娓动听，以致这一概念就永久地成为后人心中理想王国的代名词。作者也就在当时以及后来的伟大学者中间占有了无可争议的崇高位置。

在幻想他的“乌托邦”的时候，莫尔充满了严肃的时代精神。他刻薄地指责教士的腐败、贵族的淫逸、穷人的悲惨处境以及世间种种不平事，其激烈甚至达到为罪犯开脱的程度。他指出个人的犯罪行为大多是由于整个社会安排不当。接着，莫尔开始描述一个理想国家。他的“乌托邦”在地理上有着具体位置，坐落在旅行家韦斯普奇可能达到而其他从未见过的某个地方。首都的名字叫做“阿马罗特”。这座城市没有狭窄坑洼不平坦的街道，也无低矮肮脏的建筑。人民讲究卫生，厌恶战争，全都希望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统治他们的国家。其治理国家的首要原则乃是废除财产私有和建立公有制度，这是实现平等和消灭犯罪的最有效的办法。利益的分配也要遵循平等原则，这不仅包括物质的方面，还有科学和艺术。在这个美好的国度中，人民的道德水准已经十分崇高，不是以欲望而是以蔑视欲望为基本的动力。在一个没有个人财产的地方，每一个人便都热心于公共利益。所有的人都明白，只要努力使公家仓库里面装满财富，个人也就什么都不会缺少。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贫穷，根本不使用金钱，宁愿要铁也不会要金银，只有愚蠢顽固之徒才会

颂扬金钱的价值。金钱乃是“万恶之源”，最彻底地使其名誉扫地，便会使人民摆脱畏惧、焦虑、劳累和日夜戒备。所以“乌托邦”的人民只是把金银用来制作最低级的器皿，或者做成罪犯的镣铐以象征丑恶和耻辱。服装的特征是俭朴而经久耐穿，因为奇装异服乃是在人民中引起分裂的根源。当然任何装饰也会遭到蔑视，假如有一位远方的使者来到这个国家，居然身着华丽的礼服并且饰以宝石金链，人们就会将其看作奴隶、小丑、傻瓜或者挂着一串玩具的孩子，因为在这里只有这些人才会具有这样的装扮。每一个人都在公共食堂里面吃饭。女人坐在一侧而男人坐在另外一侧。午餐丰盛鲜美，耳畔音乐荡漾，不过，这一切要在老人们做过一番道德的训示之后，才能开始。当然，这里没有光吃不干的人，男女各自从事适宜的工作，没有乞丐，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人们各尽所能，国家有足够物质来满足民众需求。国家运行的要旨乃是中央集权，而中央的政治权力又都集中于一人之手。此人大权在握，纲常独断，但他拥有崇高的道德准则，可以把专制精神与完美制度融为一体。这个国家的美好和具有理性，还在于它应当控制和监督家庭。婚姻应受理智的支配，并需有元老院的准许，不须凭借感情或者金钱势力的依托。乌托邦人民的普遍的价值标准，是认为将公众利益置于个人私事之上乃是一种爱国表现。所以，一个人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就是获得了最高形式的快乐。国家将公开授予这样的人崇高荣誉。他们的雕像将竖立在广场中心永资纪念，其他人连同他们的后代则努力向英雄学习。

在我们了解了人民公社的故事之后，就会发现莫尔超越他的同时代人好几个世纪。他所描述过的许多原则竟然真的会在20世纪的一个国家中出现。他的《乌托邦》以拉丁文写就，三次译成英文，还译成其他多种文字，成为世人共知的话题。现在看来这的确是一个预测未来的典范。

但是，莫尔虽然创造了“乌托邦”的概念，却仍然不是阐述“乌托邦”思想的第一个人。在他之前，“乌托邦”思想的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古代希伯来的先知者们。有阿莫斯，这个草原上的牧人和无花果树的修剪者，同时又是一个严峻的道德家，他宣告人民有罪，热切呼唤着一个充满公平和秩序井然的社会。这个社会对个人和国家施以全面改造，以重建集体道德。有霍齐亚，他是一个教士，却热衷于预言人世，时刻想象着人类精神上的净化会呈现一幅新的画卷：正直与公道，爱情与忠诚是新时代的福音。战争将告结束，弓箭束之高阁，大地奉献着丰硕的果实。有艾赛亚，他出身低微，可能是一个山野之民。所以他的理想王国充满了大自然的阳光：沙漠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将欢呼，像玫瑰一样怒放，干裂的土地变成了池塘，豺狼与山羊同居，牛犊和小熊共眠，狮子和牛一样地吃草。有杰里迈亚，他相信由于个人和社会的革新，理想的国家定会实现。这是因为，每一个人为了参加一项伟大的共同事业而慷慨激奋的时候，全社会也必形成一致行动。有伊齐基尔，他注意到在一切伟大事业中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所以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是教育国人像社团成员那样生活在一起。有艾赛亚第二，他的预言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他认为“为人民服务”乃是耶和華向各民族发出的最高号召。这些思想者的预言虽然还未提供鲜明的社会轮廓，我们却已经可以看到其中“乌托邦”思想的渊源。

在此之后，“乌托邦”思想家的力量开始体现在他们所创造的国家中，比如耶稣的“天国”，奥古斯丁的“上帝城”，柏拉图的“理想国”。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5世纪之前。然后“乌托邦”的思想脉络间断了大约1000年。直到1516年莫尔的“乌托邦”诞生，历史又顽强地延续下来。莫尔的思想明显地具有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精神，后来者又无不深受莫尔的影响。这些人当中，在17世纪有培根的“新大西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哈林顿的“大洋国”，18世纪有一大群空想社会主义者，19世纪有赫茨卡的“自由之乡”，20世纪有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这样，到了康有为撰写《大同书》的时候，人类的“大同”之梦已经持续了至少2800年。

“乌托邦”的思想家们有着各自独特的想象力，尽管如此，在某些关乎宏旨的重要方面，我们总是可以看到惊人的一致，而且居然能够延续2800年之久而无明显变化。我们必须将它们概括地加以叙述，因为它们在我们将要讲述的人民公社的故事当中，几乎全部再现：

一、废除私有制，实行财产公有，消灭贫富差别，实行财产均衡。

二、道德至上。精神为施政的基础。只要社会具有坚强的意志，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三、金钱和私欲一样，都是万恶之源。

四、社会之繁荣在于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而不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

五、除培根外，所有人都认为家庭是人类通向“大同”的障碍，所以应当被废除或者受到控制。

六、公民应为国家的利益牺牲个人。

七、除傅立叶外，所有人都主张抑制人的天性。不认为社会的变革须从个人开始，更不认为由个人本性发展而成的社会力量的巨大，只设想人应当是什么样子。更将个人的特性与团体的特性看作是一回事。

八、由社会最优秀的分子治理国家而百姓各司其职。

九、社会应对精神环境负责。教育是对社会进行控制和管理的有效手段。其首要的目标是向公民灌输纯洁的精神。

十、社会的进步乃是人的意志和计划的结果。可以预先精确地制定出一套具有完整秩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方案，由同时代的人民去付诸实现。

对于这些杰出的思想家们来说，1835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个英国人，罗伯特·欧文，在这一年里开始把这个持续了2000多年的梦想称为“社会主义”。这一名称也就成了未来一个世纪一场世界性运动的标志。当然，所有社会主义者都把欧文看作是一个“空想家”，以与他们自己的言行作出区别。然而他们又全都不会否认这些“空想”乃是他们思想的渊源。其中以考茨基的表述最为直截了当。他说：“现代社会主义始于《乌托邦》。”

凭情来论，在所有“乌托邦”思想家中，对于我们国家精神最具影响力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预言。这一预言家的阵营里面，几乎全是法国人，而且全都诞生在18世纪。包括摩莱里、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和卡贝。不过，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最具震撼力量的却是欧文。此人出身于手工业工人的家庭，天赋和不懈的进取精神使他成为一个厂长，并拥有工厂的部分股权，也即成为一个共产党所说的资本家。然而他却热衷于技术改造和为他的工人建造优良宿舍。他还是工团主义的倡导者，并且推动英国创立了第一个《工厂法》。他谋求人类的“最大幸福”，其思想核心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是在最大的实际可行的范围里，为每一个人创造幸福，而个人的幸福与全体人民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这些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一个务实的改良主义者和一个“乌托邦”思想家。但是最重要的，他是第一个试图将“乌托邦”的种种幻想付诸行动的人。他的“乌托邦”被命名为“团结合作村”，建立在苏格兰的奥比斯敦和北美的印第安那州。村宅呈四方形状，里面公共宿舍、公共食堂、公立学校、公共图书馆一应俱全，还有花园、马厩和洗衣房。人们生活其中，亦农亦工，像兄弟一样团结合作。这位伟大的幻想者天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天想着将他的“四方形”的典范延伸开来，组成一个拥有千万“四方形”的大联合体，以此取代旧式国家。他的“合作村”很快便告失败，但是这一“合作村”的精神却成为19世纪某些重大变革的促进因素。

另外一位“乌托邦”的思想家，培根，把他的信念寄托在一艘乘风破浪的船上。他说他的船正在驶向未知的大海，越过世界的尽头，船桅悬挂着“超越极限”的铭言。这大体包含了所有这些思想家的精神状态。他们都是伟大的鼓动者和推进者，所叙述的一切乃是为了防止人类的停滞和促进社会进步。事实上，他们的许多思想，诸如普遍的义务教育、宗教自由、限制雇主盘剥工人、缩短工作日、优生优生、男女平等、体育和社会福利，在今天已经成为事实。“乌托邦”的思想也已走出思想家的头脑，同社会上流行的思想融为一体，成为当代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够受到某些杰出人物的影响，乃是因为杰出人物的背后隐藏着广泛的社会情绪。对于现实的批判、对于未来的憧憬以及种种道德哲学，足以唤醒穷人心中不满，进而导致他们参与政治革命。它在破坏旧的世界秩序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只不过，却没有成为建设一个新社会的持续的力量。文明的发展乃是生生不息的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物质的力量正日益清晰可辨。培根的信念之船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超越“极限”。

如前所述，人民公社的制度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2800年来的思想家们所不曾说起过的。我们的创造性在于，能够在如此庞大的人民中间和如此庞大的地域上实际地推动这些思想，并且以专政的和行政的手段来取代文人的循循善诱。这样看来，人民公社对于历史的价值就不是在于它的美好初衷，而是在于它的悲壮结局。

所以，我们的故事就从它的结局开始。

## 第一章

# 风起青萍末

小岗寒夜——20位农民的契约文书是否赝品——中南海关于  
人民公社制度的争论——农村两亿人食不果腹——无力回天的陈  
庭元终于大彻大悟





公元1978年12月，中国旧历为戊午年冬月，也是北风南云犬牙交错的时节。北京城内，气候有些反常，风云雪雾间，忽冷忽暖。败叶枯枝，寒霜相逼，落满街头。

但是，这一点冷暖对于北京人来说，却是无关痛痒。京城一向为政治的中心，虽普通百姓也已惯睹政坛风云。当月国事频频，早把人们的心绪吸引去了多半。略去街头巷尾里种种耸人听闻的流言蜚语不论，只就官方发布的消息，也足令举国震动。12月16日，中国总理与美国总统于各自的首都宣布中美建交，语惊世界。两天以后，中国共产党169名中央委员和112名候补中央委员聚会于人民大会堂中，这便是后来被全中国认定为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前后不过旬时间，震撼人心的事件重重叠叠，接踵而来：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凡是派”的退却告一段落。所谓“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昭雪，在一轮激烈的争论之后，终于达成一致，这消息由本次事件的落难者邓小平出面宣布，更使全部经过极富戏剧色彩。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和陶铸召开追悼会，以示平反。随后，广播里面宣布以薄一波为首的61个叛徒不再是叛徒。然而还有更为惊人的消息从中南海里传出来，十年前沦为中国最大的坏蛋、被开除出共产党又死于非命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沉冤将洗，其魂灵也将重回共产党人的行列中。

至此，“文化大革命”的赫赫战果已去大半，而官方的报纸在12月一连四次刊出毛泽东的书信文稿，其频繁的程度，即使在几年前以最高指示定天下的时候也不多见。这可能是借其八十五周年诞辰之机昭告世人，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在今天依然如故，以求得在继承与纠正之间的某种平衡。

总之，在史学家眼里，即使没有忽晴忽阴的气候，1978年12月也实在是风起云涌的一个月。

大事不暇应接，小事便为人们忽视。这些小事发生在远离京城的地方，又是由若干小人物一手造成，表面上看来系一时一地的末枝细节，不足为史家赘述，但是我们叙述的这一段历史，不妨由这里开始。因为这在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当中，乃是要点所在。它是过去30年间中国所发生的若干大事的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结局，也是今后十几年中国掀起的更大波澜的源头。承前启后，因果相连，其对当代历史的影响，决不在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之下。

这一月某日，北方的冷风和乌云席卷南下，笼罩了江淮腹地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当地人把它叫做小岗。

天气虽还不算酷寒，农事却早已停止。照老辈的习俗，此时乡下该是闭户居家的时节，只待来年冰融雪化，方能开始新一轮耕作。然而当日傍晚时分，小村忽然蠢蠢而动，男女老少，三两相继，分赴村西。这些人多为严姓，具有血缘与亲缘的双重关联，依中国人的传统，既属一脉同宗，平日相逢便总会问寒问饥，说些家长里短。可是今日相顾却都无言，只默默并肩而去。

小岗处皖东淮水南岸，在地域上属凤阳县，距首都北京 2000 多华里，距安徽省的省城合肥也有数百里。中国从古到今历代的版图之上，从未有过它的名字。在以交通为纽带连接起来的汉文化的历史中，它的被冷落并不奇怪。小岗实在太小，在 1978 年 12 月，只有 18 户农家，110 口人。然而它被遗忘的原因，除了因地域的遥远和褊狭所造成的文化上的隔离，更由于在我们庞大的乡土社会里，像这样的村庄至少有 500 万之众，倘若中枢政要一一给予关注，在技术上实在难以操作，何况以政治家高瞻远瞩的眼光看来，这也确实是大可忽略的区区小节。

但是，对于小岗的农民来说，其利害关系全然是另一回事。北京发生的变故他们根本不曾与闻，即使知道了又能怎样？种种荣辱沉浮，地覆天翻，毕竟都是上面的事，离他们的饥寒是那么地遥远。眼前这个小村里的酝酿，才是事关自己生死命运的大计。

18 户人家的主持者悄然聚于一间茅屋里面。在这个时候，他们是人民公社制度中最基层的一个集体，叫做生产队，共同拥有 517 亩耕地和 10 头牛。队长严俊昌在当村严姓居民中有着类于家长的位置，又具有秉公处置家族冲突和邻里纠纷的品质，虽不识字，却有相当的威严。另一个名叫严宏昌的年轻人，为严俊昌的堂弟，也是村民中唯一读过中学、识得几个字的人，所以在几天前被众人推举为副队长。此人大耳大嘴，高颧高鼻，其面相与他的那位同乡，也即 600 多年前横扫天下开创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很有相似之处。眼下，严氏兄弟望着治下这一群贫下中农，破衣烂袄，饥肠辘辘，一个个全是穷途末路的模样，凭着一点点的知识和直觉，他们对这个集体已经信

心全无。20多年前，也即50年代初期，这个集体尚未成立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孩子，那时小村也穷，但还不至穷到用勒紧裤腰带的办法来忍饥挨饿。严氏兄弟永远记得，那是他们的村子最兴旺的时候。此后，由公社化而为“大跃进”，由学大寨而为大批判，小村风风火火，惨惨凄凄，尤以“大跃进”以后那三年的惨淡刻骨铭心。全村数月无粮，父老百姓食尽糠麸、树皮、草根、棉籽，最后竟是无可果腹。175条人命，十死其三，侥幸活着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满村残垣断壁，蒿棘丛生，39个人和1头牛。严宏昌劫后余生，竟然还能读几年书，只不过，惊魂依旧难定，而且越读越惊。这个农民用他所学到的最简单的加减法即可计算出，20年人民公社，他的小岗减少了半数人口、半数耕地以及2/3的牲口，每一个人每年产出的粮食则由500公斤减至50公斤。

即使凭着简单的直觉，严氏兄弟也可以对党的干部们把饥荒归咎于自然灾害表示怀疑：就算“老天爷”连年地故意刁难，何以自从人民公社的大旗在小岗招展起来，这块土地上长出的东西就从没有让人吃饱过肚子？！

政府每年尽其行政的手段赈济饥民，力使“三年悲剧”不至再现。但逢救济粮到，干部三吆四喝，社员端盆举碗，一致地翘首引颈，其情景犹如旧时豪门的开仓放粮，令他们经久不会忘记。所不同者，豪门放赈在于市恩养威，所以总归大喊大叫。今天党的干部则口口声声带领农民走过“社会主义桥梁”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天堂”里面食不果腹不能算做光彩。因之，无论运来多少粮款，总是不肯声张。直到1979年年底，也即对于人民公社的失望情绪已在中国大部地区公开弥漫起来的时候，小岗的上级凤阳县委才敢于公布这本账目：1966—1978年，总计156个月里，这个小小的村庄有87个月靠救济度过。总计吃去救济粮11.4万公斤，比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出1/3；花去救济款1.5万元，比他们自己挣的钱多出1/10。

即使如此，仍是不足为济。

每临秋冬时节，小村家家闭门堵户，老幼相携，往他乡乞讨。农家人沦为乞丐，在讲究名节的汉民族中，原是羞于见人的事，无奈生活所迫，且年复一年，人们渐以为常，凡能行走者大半离家行乞，竟至成群结队，步履遍及淮北江南。

到了1978年的12月，在外人眼里，他们仍然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员。一位女高音在村子边上高高挑起的大喇叭里，用轻快的调子唱道：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公社是棵常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

姑娘不知疲倦地唱了十几年，严氏兄弟及其家乡父老最初听到这首歌时的激动却早已荡然无存。他们即使再愚昧也会发现，说公社是一根把大家连在一起的“藤”，倒不是骗人的，可是，作为公社的社员，他们似乎永远也不会成为甜蜜的“瓜”，而只不过是一个乞丐。以今日衡当初，究竟是公社养活了小岗，还是公社剥夺了小岗？

实际上，对于这群叫花子来说，诸如此类的疑问还过于深奥难测，这要留待他们吃饱肚子之后才有余力来回答。在当日他们所想的至为简单，那便是不再做一个叫花子而能自己养活自己。

既然求生的本能在公社的制度里面已经无法实现，严宏昌他们便转而想到“分田到户”，也即把集体的土地分给各家各户去耕种，其收获的多寡全由自家承担。在他们会聚于严氏家族那一间委委琐琐的茅草屋里之前，这办法已经了然于各自胸中，彼此心照。唯因这四个字在社会主义中国已被归入“另册”。16年前，也就是1962年，毛泽东宣布这是导致中国分化为贫富两极，以至最终必会资本主义复辟的行为，并且由此演绎出那个著名的论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今天若再打开这本“另册”，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举。

所以，在这一夜的小村陋室，大家面对“包产到户”这几个字，只是在“敢”与“不敢”之间徘徊斟酌，直到天明，终于痛下决心，行此近乎叛逆之事。这时严氏兄弟已义无反顾，只是他们的身份和经验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更多的盘算。以其浅薄的政治经历，他们已经懂得在中国处世的第一精义。一个人的行为无论具有怎样的个人动机，总要身着大义凛然的服饰，且将利益的动机翻译为意识形态的豪言，诸如“为党”、“为国”、“为民族”、“为集体”、“为主义”云云，方能过关斩将，逢凶化吉。更何况若干年来与分田包产有关的人非身亡即名败，总数可以百万计，其下场

的悲惨，严氏兄弟虽然不能尽知，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三自一包”的罪名以及他的死于非命，这二人是一清二楚的。一旦事发，种种阶级斗争的手段即使不会酷烈到诛灭九族，他们和他们未成年的儿女也是断断脱不了干系的。

考虑到这许多复杂的因果关系，严宏昌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以他的拙朴的笔法写道：

1978年12月 地点 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 如此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 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 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干部肯以性命相搏来为百姓出头，这在当时的中国也可算是难得的勇气。今天我们看上去，严氏兄弟在这里无疑已经集中了他们全部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但是，这几行字里面还是透着一种天真的悲壮。就其形式而言，它显然并不如后来舆论的评说是一份合同，至多只能算做一份农民的简单的契约，也不具有任何法律的效用和政治的保障。假如事情真的走到了坐牢杀头的一步，纵使严宏昌真的能够慨然赴死，其手下这些既无政治权力又无生活保障的人们，难道就真有力量把他们的后代庇护下来并且抚养成人吗？

乞丐只求眼前一条活路，并不细想以后的事。所以“严宏昌”们一一具名，庄严承诺。这些人当然想不到，这一刻，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生存，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农村都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影响，甚而成为人民公社大厦的最后瓦解、国家由下而上的权力结构加速分化的催化剂。

今天，当我们准备描述这一切的时候，必须不厌其烦地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依照本来的顺序，这些名字如下：

关廷珠、关友德、严立苻、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申。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每个姓名之上，均覆有一片血红，其中17个指印，3方图章。<sup>①</sup>

大局既定，木已成舟，20个人郑重其事，相约守密，绝不让外人知晓此事，其情景犹如旧时走投无路的饥民揭竿而起前的歃血为盟。

直到六年以后，也即1983年，人们才第一次见到这纸文书。它最先出现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这时包产到户已势如破竹地横扫全国，史家理所当然地发掘着它的源头，于是纷纷地奔赴小岗。在一番煞费苦心的追逐中，北京一位名叫张新文的文物收藏者终于发现，小岗的文书已被电影制片厂一个叫王影东的人带回北京。再经一年的辗转曲折，张终于无偿地把文书搞到手中，遂送至中国革命博物馆，为官方收藏。叫这家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大为惊讶的是，在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文物中间，这竟是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一件。“嗨！放着那么多的好东西不看，偏偏都来找这张纸。”在博物馆工作的一位姑娘抱怨道。那一个上午，她为了来访者已三次入库开柜取出那张纸。

无数人登门争相一睹的只是几行稚拙的方块字、一串叫花子的姓名，以及片片血红色的手印。这一切似乎成了小岗革命的物证。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发生了问题。很多熟知小岗事变过程的政府官员和记者声称，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纸文书。当日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作为小岗的上级领导，无疑是决定小岗命运的关键人物。自1978年之后，陈多次往返于小岗，自以为深知这个小村的一切秘密，但在那纸“合同”于电影上出现之前，他对此事竟一无所知。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怀疑：或许当初的小岗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合同”，而现在的文书只是后来某一时间的补充。这种假设甚至暗示着另外一种可能，即小岗在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所出现的种种情节，只不过是某位一心邀功请爵的地方官员，或是哗众取宠的文人墨客杜撰出来的。中国人经过了20多年的起落变幻，对于政治风云中的种种微妙多已了然于胸，对无中生有或者蓄意升华的榜样与英雄也习以

---

<sup>①</sup> 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物都认定，此合同书上有18个人的签名和18个指印。但是依据原件，签名者为20人，另有17个指印和3方印章。此件现存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号为GB54563。1993年12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大写意》一书中提到小岗这一晚签署的“保证书”。作者李超贵亦说此件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但他的关于几个细节表述，与博物馆所存实物有出入。其一是时间，李超贵认定为1978年11月24日。其二为签章，李超贵列举人名为18个，并且认定为18个手印。

为常，所以，倘若今天有人真的出来检举小岗作弊，外人决不至于感到奇怪。

世人的争论在于，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遗物是否为伪作？如系伪作，则是否有过真品？

此物今天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藏品号为 GB54563。其文拙字稚，不通顺，有错字，无标点，既无官方文件的味道，也不循一般文书的书写之规，系出农民之手无疑。所可疑者有二，其一是在“合同”的抬头处即注明日期为“1978年12月”，既然这个日子在书写者的心里如此重要，何以只有年月而无日？其二是所有签名均为一人所具，笔迹与文书书写者为同一人，这也不合法定之规。但是，考虑到中国农家向无恪守阳历日月的习惯，且这样一群人大都不识文墨而需由人代笔，所以，这两处的疑点仍不足成为此件系伪作的证据，只要指印和图章为各人所具，仍可信其为真。

最大的疑点发生在人们并不注意的地方。“合同”用纸大小相当16开，全白，四围无缺无絮，整版无一丝皱折。依据博物馆文物登记卡的记载，征得此物的时间为1984年。假如此录无误，则这张纸在一群叫花子的手里长达六年之久。中国农家的生活习性一向散漫无矩，尤对文字本章之事极不经心。这张纸在这群农民手里历六年而能平整如初，实令人难以置信。

当日小岗所属之直接领导为凤阳县，凤阳之上又为滁县地区，其最高领导是地区党的委员会书记。此人名王郁昭，是小岗“包产到户”极力的庇护者，数年后升任安徽省省长，到了1990年，这个浑身上下都充满自信的人已是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政治生涯由中国的最底层开始，以功晋升，又由远吏而为近臣，如今，是党的高层领导里面最熟悉农村的人之一，亦对自己曾经庇护的小岗知之甚多。然而谈及那一张“合同”，他满脸的疑惑。“小岗那时户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饭碗瓷边还会缺一块，”他说道，“根本没有可能拿出那么大的一张白纸来。假如他们真要立下字据，更可能是把它写在一张烟盒纸上。”

这是后来人们对这纸“合同”提出的全部疑点，但这些疑点并没有人去加以追究，这导致人们的认识趋向并不一致的两极。一方面，在所有谈及小岗的公开出版物中，人们照例认定这“合同”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改革的开端。即使了解真相者如王郁昭也会在他撰写的涉及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本书中，以“18个鲜红的手印”做题，用作全书引言。他用一种随它去吧的口吻说道：“既然当地党的领导正式地承认这合同是真，我也没有理由否定它。”另一方面，许多人在私下已经认定“GB54563”为伪作，由此而及其他，任何提及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小岗的文章书籍都蒙上了一层虚假的色彩。

但是，新华社记者张万舒断言，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小岗确曾产生过一个类似的契约。张在当时为新华社驻安徽的记者。小岗的那个夜晚之后，他是第一个到那里去的外人，时为1979年年初，小岗的“分田到户”仍在保密之中，但张终于听说公社社员私下里按手印背叛了公社的事。尽管他对这个举动抱以同情之心，这消息在当时还是令他极为吃惊，以至13年后仍记忆犹新。他坚称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合同”为后来的补充，在当时肯定也有过一份类似的契约，因为他在1979年年初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听说了此事。可惜他不曾真的看到他认为肯定有的那一份契约。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重名而轻实，形式的价值常常重于内容的价值。这一点总是使人忽视了对实质的分析。事实上，不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纸契约是否为当时所出，既然能够断定小岗在1978年12月的这个晚上确实采取了如契约内容的行动，便已经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小岗。到目前为止，所有去过小岗的官员、学者、记者、作家，都对此坚信不疑。根据他们提出的理由，假如小岗事件只是后来人杜撰出来，以满足某种需要，它又怎能在当时即掀起轩然大波，而这些人虽然没有在那个夜晚涉足严家，却十之八九都经历了由此引发出来并且势震全国的种种变故。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小岗的那个夜晚中来，看看这里发生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事情的要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分田到户”。所谓“分田”，并非中国历史上一般意义的平均地权，实际上它只是分配土地的使用权利，即田主只拥有种什么和怎么种的权利，而无出租、出卖和转让土地之权。很显然，社员所得到的只是一种有限的地权，然而这中间的要点是如何占有土地上的收获。按照契约上并未写明但却实际潜在着的逻辑，田主只要交足国家征购和统购的粮食，即政府之所谓“公粮”亦即老百姓之所谓“皇粮”，所余无论多少，均归自己所有。这样一来，农家从掌握自己的劳动到占有劳动的收获，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界限也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这中间的无穷奥妙，小村百姓自然无从全部洞悉，但他们的直觉之敏锐令人惊叹，一出手竟触及当日中国农村制度的关键。人民公社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土地的公有，这一点保障了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威。凭此，公社可以支配其成员的劳动，以至劳动的收获，直到支配人的本身。但是，在这个体制里



支配力量的实际运行尚有很多技术性的环节，这些环节自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初渐渐成熟起来，并且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毛泽东当年将其概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一个农民必须先成为社员，被编入生产队中，又由若干生产队合为一个大队，再由若干大队合为一个公社。这样，在每一个农民的头上都重叠着三层组织，均对土地拥有权力。归结到实际的操作程序，生产队是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作为社员，农民们集合起来，在生产队的指令下从事劳动，全部劳动的成果均属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的领导者则在这些成果中作出划分，一部分交给国家，另一部分留归自己支配，其余则按人口的多寡和劳动的支出，大致平均地分配给社员，以维持其生活的延续。由于生产队在行政上垂直地隶属于公社，所以它其实只是体现了公社的意志。这种隶属关系的上延，在这里才刚刚开始。再向上，社及县，县及市，市及省，省及中央。在这庞大的权力结构中，中央政权对于乡下农家的事大可无须一一染指，且不至于因此大权旁落。50 年代中期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以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痴烈的狂热建造了这样一套制度，最终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也实现了对农产品的控制，而这正是我们的权力机构得以生存和运转的最重要的基础。

现在，小岗出于纯粹功利的动机，将土地分给农民，虽然它还无权宣布土地为私有，但是，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土地上的劳动的控制，以及失去了对土地上的产品的控制。生产队的大权已然旁落，建立在生产队之上的公社亦成为空中楼阁，整个权力的基础恐将因此而解体。在小岗的农民们看来，这基础原本就不存在，从来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虽然政府的官员们总是炫耀这是他们改造农村的丰功伟绩。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情形就完全不同，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国家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公然背叛，其恶毒在 4 个月后的一场大争论中由一位党的中级官员一语道出：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1978 年 12 月小岗“蠢蠢欲动”之时，华国锋在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上已有两年零两个月，与此同时，他还是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忠诚的确不负毛泽东的期望。他在取得权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人民展示了一张纸条，上面是毛泽东用歪歪斜斜的笔画写的 6 个字：“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显然是以此证明他是毛泽东的合法继承人，同时也意味着他将坚持毛主席过去的方针，决不允许有任何背叛行动。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此刻，中国的党政要员全在他的眼皮底下。在70年代后期的时候，这些人可不像今天这样——心里想的全是圈地办工厂，与左邻右舍比规模、争速度。那时候，党的高层领导中的首要话题，仍然是重新估计党的农村方针。小岗的事变尚未传到北京，但很难说华国锋对农村中日益增长起来的消极情绪不曾与闻。他出身乡下，如今即使为党中央主席，仍能忙里抽闲地走东访西。北京的上流社会里流传的一则消息说，华国锋在一次乡间走访中偶遇一老农。那老农正在插秧，却又只顾与人说笑，一副爱干不干的樣子。主席问他何以不肯认真地干活。老头儿说出一番峭刻尖酸的话来：

插秧插秧，为谁插秧——

第一砣秧，插给大队书记；

第二砣秧，插给公社书记；

第三砣秧，插给县委书记；

第四砣秧，插给地委书记；

第五砣秧，插给省委书记；

第六砣秧，插给工人老大哥；

第七砣秧，插给亲人解放军；

……

第十三砣秧，这才是给我自己插的。

老头儿当然不知道面前这位憨态可掬的人竟是党中央的新任主席，否则他决不可能将心中之怨如此赤裸裸地和盘托出。事实上，华国锋的视察大半被一群报喜不报忧的地方官员所包围，对真正的民情则无从洞悉。但据说这个“十三砣秧”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曾经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屡屡提及此事，这证明他已经看到农村中弥漫着的消极气氛。

省委书记万里进京与他面见的种种情节，也必定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华国锋还记得万里当时痛陈农民的贫困与绝望，并且认定非把土地划给农民建立“责任田”不可，否则无法扭转危局。万里的为民请命，乃是基于这样一个潜在的理由：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失去农民的信任，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也无法重建农民的热情和农业的前途。事实上华国锋所见到的事实，与万里所见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华国锋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他认定人民公社的精神必须彻底地灌入农民心中，方能振兴农村。

这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党的高级领导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时为1978年秋季。冲突之一方为安徽省的省委第一书记，另一方是党中央的主席。根据万里后来对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回忆，他并不是势孤力单的，在党的最上层里有着一种力量在支持他。当华、万二人发生明显的分歧时，在场者至少还有邓小平和叶剑英二人。邓小平重申了他的曾被毛泽东批判过的观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叶剑英则较为和缓地站在了邓小平的一边。这等于是合二人之力，含蓄地支持万里向人民公社发起挑战。当时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严责万里约束治下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举动。但他并不知道万里所辖的土地上，正在出现一个兴风作浪的小岗。

1976年12月，也即“小岗事件”之夜的两年前，华国锋着手为中国农村谱写优美而又豪迈的主旋律，他的舞台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会议。其序曲是按照20多年屡试不爽的办法——意识形态之战——展开的。

会议在1976年12月召开。会址仍然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那颗世界上最大的红五星在目睹了一系列权力的更迭之后，现在仍然高悬在所有人头顶之上。我们国家的中枢，在经过了1976年10月的激烈震荡之后，开始了第一次聚会，最有权力的人们齐集一堂，重新笑脸相迎。

华国锋指定他的农业方面的主要助手陈永贵在作主题报告，他本人则在适当的时机出面肯定报告的内容。这不仅因为今天他已位及至尊，照传统的为政之道当超然于第一线的角逐，而且更由于有关华国锋的种种颂扬与溢美，以及他与江青的种种仇隙与争执，如果由其本人亲口陈述，显然还有若干技术上的细节难以处理。从华国锋的心理上来说，他召到北京来的这5000位代表，包括了29个省、市、区的党委书记、500多个地委书记，以及2000多个县委书记。这些人构成了8亿农民之上几乎全部的领导力量，足可左右农村之局面。而他在刚刚完成权力的转换之后，对于自己驾驭局势的威信显然还不具有充分的信心，因之更需有人为他代言，以试群情。

陈永贵是大寨经验的创造者，中国农民心目中的英雄，又是国务院掌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充当这样一个角色，自是名正言顺。他的报告旨在发动亿万农民开展一场大批判运动，其基本的精神是打击“四人帮”。陈永贵用一种地道的大寨口音加上他的特有的高腔调，对听众说道：

“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sup>①</sup>

他巧妙地将大寨红旗与捍卫党的权力，以及确保中国不会复辟资本主义连接在一起，其突破口虽然狭窄，却颇具煽动的力量。大寨是在山西省中部群山包围着的一个小村，僻壤穷乡，不过百余户人家，然而，关于它的故事，在当代中国农村历史上，差不多是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主旋律。其间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我们后面还要更多地涉及。现在，会议大厅之中，陈永贵的听众几乎全部是在学大寨的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且由此获得权力与利益。如果没有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可以肯定他们之中大部分人根本不会有现在的地位，甚至没有资格进入这座辉煌显赫的殿堂。仅仅这一点也足以激起他们对“三反一砍”的“四人帮”的深仇大恨，完全顾不上扪心自问，一个小小的村庄是否具有拯救全国全党的神通？

陈永贵肯定相信他的大寨具有这样的神通，他不正是从这个小村走出来的吗？他的报告洋洋数万言，其间意识形态色彩仍具有独特的主导地位。但这场大批判并不仅仅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而设计，计划搞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批判“四人帮”，倒不如说是在农村中造成一种心理气氛，以便把已经形成的一切继续下去。陈以云、贵、川、闽、浙、赣六省为例，述说那里由于“四人帮”的阻止而令学大寨的运动夭折，以致贫下中农受气，阶级敌人高兴。这六省在中国由东南到西南占据了1/5的版图，如此广大的地区发生了问题，可见事关重大。所以，陈便以一敌一地提出“三大一高”来对付“三反一砍”，也即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五天之后，华国锋接着陈的话头说：“这是关系全局的大事，它将极大地促进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

这等于是为今后的农村工作方针定下了主调。

按照华国锋对8亿农民的要求，在即将到来的1977年，他们并不是要筹划“包产到户”，甚至没有必要顾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而是要将精力集中于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他借用毛泽东对付日本人和蒋介石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4日。



石的一句名言，说这是“大打一场人民战争”。

华国锋把他的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民战争”细致地分为四个战役，并且计划至少用一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胜利。<sup>①</sup>不过，他此时没有想到，随着江青和她的同党的失败，意识形态的争斗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经黯然失色，在普通人中间也只剩下一种厌恶，不会再有崇高的激情。他更不会料到，两个月后他发明的“两个凡是”，在新一代领导中间引起第一次重大分裂，使眼前这场意识形态运动的实际进程与设计之间，形成极大差异。这是后话。现在，华国锋的动员立竿见影，5000名代表连夜学习，连夜批判，把北京大大小小的宾馆里糊满了大字报。中共最有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在它的版面上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的气象：

怒火，在代表们心里熊熊燃烧！  
仇恨，在代表们胸中翻滚激荡！  
来自祖国各地的五千名代表，  
同仇敌忾上战场，  
万炮齐轰“四人帮”。

这种充满感情色彩的指斥与声讨，至多只能造成一种心理上的气氛，而于理性的判断则要大打折扣。但对华国锋来说，仅仅有这些也就够了。不过，事情还是出了一点麻烦。经过20年政治上的划线站队，中国人的心态已如条件反射，每有风吹草动，先自分开阵营。这时候也就有人提出“四人帮”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出现过一次，那是1971年9月林彪垮台之后，由毛泽东率领的对林彪的批判。当日对于林彪是“左派”还是右派的问题，曾经议论纷纷了好大一阵，不得不由毛泽东出面作出最后的裁决。毛泽东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说道，林彪形“左”而实右，是极右。仅仅这一句话便将“左派”林彪赶出了“左派”的阵营。现在，同样的命运落在另一群“左派”身上，而毛泽东逝世已有三个月，事情只能由华国锋来作了结。这一来，便诱使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华说道：

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sup>①</sup>

看得出来，华国锋对江青的判断是继承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判断，但他的表述显然不具有毛泽东那样的简洁与自信。为了支持他的结论，他提出的证据冗长而笼统。他实际上是在述说中国若干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遭受“四人帮”的迫害。包括周恩来这一代开国元勋；包括依然权力在握的和失去权力的各级党的领导人；包括工人和农民；包括青年；包括军队；包括汉族和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华国锋希望中国所有的人，都能和他站在一起痛恨“四人帮”，这无论从心态还是从策略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所描述的这样一幅图画之黑暗，与过去几十年党在人民中间极力渲染的光明成了鲜明的对照。党中央主席有勇气承认这样的事实，令人惊讶。华国锋的错误不在这里，可是他把这一切归咎于“四人帮”，并且作出“右得不能再右”的结论，则令人生疑。他把毛泽东列入受迫害者的队伍，显然是想把毛泽东的夫人排除出毛泽东的体系之外。既然毛泽东是“左派”，江青们是一定要成为右派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敌人。这样的推理固然可以成立，但它在日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则又出乎“英明领袖”的意料之外。

现在，面对5000领导者和他们背后的亿万农民，陈永贵尽其所能为华国锋的逻辑提供注释，不过，显然并不成功。他对着听众陈述了“四人帮”反对大寨，反对华主席，也反对毛主席的罪行。所列虽然详尽，却有些琐碎。平心而论，江青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后确已势同水火，但是若说江青一贯反对大寨，实难令人信服。凡对中国农事稍有注意的人都会知道，“四人帮”是如何鼓动“学大寨”的风潮，大寨的男女老少又是怎样感极而泣地迎接江青的到来，而且，人们也很难看清大寨的经验与“四人帮”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何区别。所以，将“四人帮”归入“极右派”，就连华国锋在政治局里的同事是否完全同意，都很值得怀疑。这一点在两年之后终于得到证实。而现在，他们中的大部分还不能意识到，在他们的“万炮齐轰”之下，不仅“四人帮”的理论将在中国破产，而且人民公社的理论也会遇到麻烦。对人民公社的理论进行修正是必要的，而学大寨运动的继续推进，无疑是在强化这种理论。在把有害的大寨经验作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东西加以巩固的时候，又怎能在7亿农民中间清除“四人帮”留下的遗产？

但是，按照华国锋的做法，当日农村中弥漫着的对于大寨和对于公社的种种不满和失望，便成了“四人帮”的罪孽。陈永贵在他的报告里面，即用很大的精力来指责“四人帮”到处破坏学习大寨，“闹得很多地方分田单干，两极分化，黑市买卖猖獗，集体经济瓦解”。陈还把一个叫做温州的褊狭的地方作为攻击的目标，毫不含糊地说，那里的分田单干是“四人帮”纵容的结果。这位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宣布，“包产到户”是“四人帮”向学大寨的运动发起的政治挑衅，因之，与“四人帮”的分道扬镳，也就是“对少数地方的‘三自一包’，分田单干，要坚决纠正”<sup>①</sup>。很明显，这样的方针如果得以延续，将给中国农村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

陈永贵的讲话令满场掌声经久不绝。这些鼓掌的人里面，显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正是由于与“四人帮”奉行的理论的决裂，导致了两年之后的中国出来一个“分田单干”的小岗，且从此一发难收。

华国锋取得了胜利。他打倒了“四人帮”，但却留下了中国农民已经厌恶的一种制度。他的胜利最辉煌的时刻是在1977年，而人民公社终于日暮途穷以至败象毕露，亦出现在这一年。

1977年是人民公社这个幽灵在中国农民心中日益可怕起来的一年，但是，在整个中国，大多数像小岗一样的村庄，仍然没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那时候，中国人还未从大同社会的梦呓里醒来，邓小平还在京城北面一个无人注意的四合院里养精蓄锐，他在日后发动改革所倚重的左右将帅还毫无影响。华国锋此时看来是势不可当，如日中天，并且可以很容易地将自己的第一炮打响。首都和地方的报纸一律以通栏大字标题连篇发表着鼓舞士气的文章，农村中两亿多个有线广播喇叭一齐呐喊，告诉乡下的农民，北京召开了一个决定他们命运的会议。在中国，这往往是一个运动高潮涌来之前的序曲。官方还精心地组织起成千上万的社员聚集在田野之上，挥镐推车，抬筐背篓，以证明华国锋的号召迅速地在农村中鼓舞起雄壮的场面。

京城的信号传到江淮丘陵的时候，已是1977年年初。隆冬时节，日短夜长，凌晨，星光未退，凤阳一觉醒来，发现城中古老的钟楼再度成为革命的心脏。那上面的高音喇叭不断地重复着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其主旨在于动员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8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农民行动起来，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横七竖八的广播网络则把那钟楼的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这样，华国锋充满激情的声音，便控制了整个凤阳县的村村户户。

凤阳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祖居之地，时称濠州。他在天历元年，即公元1328年生于一个佃户家中。佃户没有耕地，靠租种他人土地为生，在乡下是最贫穷的一类。朱元璋17岁为行童，游方化缘于淮西，也就是出家到寺庙里做了一个小和尚，云游四方乞讨度日，25岁投郭子兴麾下为卒，离凤阳平天下，直至41岁称帝，是为明太祖，次年下诏于凤阳营建中都。所以，这里至今仍然留着诸多关于朱元璋的遗迹，其中最为隆重的一处，是古城中心的钟楼。楼高数丈，由小块望砖所筑，色青。到了公元1977年，已经数百年风雨剥蚀，斑斑裂裂。城头间有野树杂草，淡妆浓抹，如一条恍恍惚惚的龙蜿蜒在空中。当日统辖太祖中都的地方官吏主持修筑这个建筑，乃是为了永久地悬挂一口铁钟，钟脊铸有“皇图巩固”、“帝道遐长”八字。中都城门之上，镌有“万世根本”四字，字体楷书，雄浑庄严。这些一厢情愿的箴语，价值并不在于实际的效用，而是具有某种象征。在我们这个国家漫长的历史里，为人君者数以百计，无不希望家传万世，却没有一个可以如愿，朱元璋亦不能例外。但他毕竟生长于乡间贫户，深知物力艰辛以及土地之于农家的珍贵，他之所以沦为行童游走四方，说来就是因为没有土地！在他看来，土地乃是万世之根本，其所具有的意义可以成为大明王朝的基础。他正是从这里出发去平均地权，建立了一个自耕农的社会。而在共产党看来，乡村土地的私有恰为王朝倾覆的原因，所以党在土地改革之后采取的第一个大规模行动，就是把自耕农的地权收归集体。

在1977年年初这个寒冷的早晨，大明皇室的子孙们由自耕农而为公社社员已有近20年，政府的官员们不断地告诉他们，只有人民公社才是他们真正的“万世根本”。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有两个人一前一后，由“万世根本”的城门之下蹒跚东去。一人名徐桂仁，一人名范云珍。徐为生产队长，范为妇女队长。二人同在一个生产队，同是共产党员，其职务在旧时相当于村长，现在分别管理着全村的男女。依照党的纪律，此时他们应当在自己的家里召集党的会议，来动员农民紧跟华主席的部署，鼓起学习大寨的高潮。但现在他们径自离去，甚至对那象征着主义与权力的高音喇叭望也不望一眼。寒风之中，衣衫褴褛，饥肠辘辘。他们将沿街乞讨，最终到达几百公里外的上海，那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他们就在那里浪迹街头，靠城里人的施舍度过寒冷的



冬天。

人民公社社员沦为乞丐，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期。尽管政府在公开的场合屡屡宣布乞丐为非法，但诸如此类的行为仍然在社会底层蔓延开来。党的干部从来未对公众承认过这个事实，私下里也只是把乞丐叫做“外流人员”。每年第一季度，均为农民外流的高潮。此时为农闲，可有充足的时间，在城里则有元旦和春节相接续，食物的储备及冷菜剩饭也较一年中其他时间为多，因此被乞丐们视为黄金时节。除去旧时留下的为数极少的地主富农，乞丐均具有社员的身份。他们一半是生产者，一半是叫花子，其总数并不稳定，可因年成的好坏或多或少，但总的趋势是生产者渐少而叫花子渐多。此种情节，凤阳党的领导每年数次报告给他们的上级，其用意在于申请救济粮款，或者表白流民的嚣张和自己制止流民的成效，这些报告所列情况，较之当日一切报纸的宣传更为可信，故择要记录：

1967年1月至2月22日，凤阳人口外流9900人，至3月18日，达到1.8万人之多，大部去南京及苏北。

1969年3月，37%的农户以及23%的人口外流他乡，流动范围所及包括皖苏浙三省。

1970年春节，全县4000余人外流。

旧历新年本为乡下最隆重的节日，而农家仍不能回归乡里，可见其谋生手段除行乞外已别无他途。到了1974年年初，形势的发展已非政府力量所能控制，某大队全部1119人中，外流者竟有900余人，其中行乞者十有其八，这等于是除了老弱病残不便行动的人，余者全部背井离乡，其乞食要物的范围已扩大至13个省市。

对于人民公社来说，诸如此类的情节实在是一些不光彩的剪影，或者如政府官员所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然而事情还不仅于此。按照当日中国政治的要旨，凡事必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透视，于是出现了1973年9月2日凤阳党的领导的一句著名的断语：农民的外流行乞，“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而煽动外流要饭的显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其罪恶用心是煽动群众对党的不满，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压力之下，共产党员和干部不是出于极严重的客观原因，绝不敢妄自菲薄，卷入乞丐行列。所以，直到1976年春季，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凤阳县的共产党员行乞，均采取一种隐蔽或曲折的方式。比如某大队党支部书记薛其让，一边在党的会议上振振有词地讲解华国锋的“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一边却不得不因家计的艰难而在心里作出更切实际的盘算：去年秋季的收成只给他这个书记的全家分得 150 公斤粮食，凭此，他一家 4 口人将何以度过大约半年的严冬和春荒？看来，沦为季节性乞丐是他唯一的活路，而作为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他又不得不在社员们面前保有他的形象。他身不由己地扮演着双重角色：党的书记与乞丐，阳与阴，崇高与低贱。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薛其让的办法精巧而又简单，他让妻子携两个孩子外出乞讨，而他本人则坐食全家的粮食，同时也可以身作则地动员他的社员坚守乡里。这样也就勉强地把他领导的 130 人中的 95 人留在村中。

到了 1977 年年初，徐、范二人走出古城的时候，事态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基层干部撕去最后一层遮羞布，不仅公然加入了乞丐的行列，而且率众出游。既然党员干部可以去做叫花子，普通百姓的仿效当在情理之中。依中国农村党政合一的权力体系，其一呼百应的效果还在其次，他们更可以用自己的权力为叫花子们的乞讨出具“证明”。在这些证明上，要饭的理由颇能动人恻隐，或者说是偶遇天灾，收不抵食；或者说是缺少劳力，家境维艰。种种理由加上党组织的红色印章，也就使原来非法的乞丐具有了合法色彩。

从客观条件上看，党的基层领导者率队行乞实在是无法避免的。以当日农村的贫苦，农民对生产又极少诚意，任何通达富有的政府，也不能对各种底层的问题都有周密了解和实际解救办法。凤阳县的领导者也曾一意改弦更张，制止社员外流。他们与不断扩大的乞丐队伍历十几年斗争而不懈，处事认真，一丝不苟，却始终未有所得。直到 1977 年 2 月，一些精明能干且讲究实际的官员终于懂得了，依靠伟大的精神和严厉的批判，解决不了世俗的问题。他们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来到当时乞丐最多的庄许生产队，这显然是下层官员为响应党的号召而采取的主动行动。但是这个工作队本次下乡终于还是收起了大批判面孔，而以发放粮食的办法来阻止农民外流行乞，一度竟有奇效。可是在 2 月 25 日，工作队员们放假回城这一天，便又有 19 个社员扬长而去。工作队未能制止这里农民的行乞，却终于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个村的 16 户人家 91 口人，当日存粮共计 933 公斤，平均每人大约 10 公斤，而且包括了大约一半的山芋干。以农村人口的粮食结构，纵使山芋可以十足地代粮食用，也只有半月口粮，而农家则需等到 6 月夏粮收获之时方有新的

进账。即使能够按照他们的周密设计，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又焉能以半月口粮度过四个月的时光？

这些情节可以证明，社员的冬闲外出和春忙回归，乃是不得不为之的谋生方式。为了自己以及后代生命的延续，农家作了另外的一种设计：吃外面的，省家里的，回来还能带回一点。这种惨痛的生活经验后来被党的官员判为“反革命谬论”，对之大动干戈。1977年5月，凤阳把具有这种经验的全体社员集合起来交代问题，总计861人。所有人等不许交头接耳互相包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对付政治上的敌人的办法，中国人有一个生动的说法来描述它，叫做“背靠背”。但是在凤阳的这个学习班上，“背靠背”的结果证明，农民的设计更为精当有效。从1976年12月下旬，也即党中央号召再掀农业学大寨新高潮的那个月，这些人出游行乞，至1977年4月被强迫送返乡里，共讨得22049.09元现金和8822.5公斤粮食，其收入大大超过他们过去一年战天斗地学大寨所得。

这一事实显然具有讽刺意味，人民公社给予社员的一切不足以令其维持生计，而社员向往的“分田到户”又为人民公社制度所不容。所以他们宁愿选择流浪行乞的生活。这种弥漫在农村下层中间的失望和悲观情绪，与北京人民大会堂里面的灿烂辉煌和乐观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老百姓公然撕去伪装，将自己的真相显露出来。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面的夸夸其谈，看上去成了掩盖当时痛苦现实的遮羞布。政治口号与下层情绪之间的不相协调，因之更加表面化。我们庞大的国家本以精神力量为施政的基础，依靠万众一心或疾或徐地运转。听任现在这种状况的发展，在中央政府是失控，在地方官员是失职。所以，凤阳在1977年年末将11个乞丐“要犯”提至公堂批判，其后将徐、范等人撤销职务，又在党内给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另外一位会计虽未亲自出走，但他利用职权给乞丐开具证明，有支持纵容之过，也予撤职。另一社员则属屡教不改，罪不容赦，当场由警察拘留收监。所有这些程序均为公开进行，并伴有数千人的批判大会和乡里亲朋瞩目的游街示众。

此种打击的主旨无疑在于杀一儆百。中国向有法不责众的古训，而当日有违党的宗旨的行为又如此普遍，以凤阳的状况而论，有过行乞行为的农家已十有其八，即使用最敏锐的阶级斗争眼光来加以分析，亦不能将这些人统统地等同于想象中的敌人。这一点在当时已经由凤阳县党的委员会所承认。在1977年的夏季，他们将自己属下的乞丐大军加以分类，结果证明那里面有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1.5%是党员；5.2%是团员；5.9%是干部；86.6%是社员；而在每100个叫花子里面，真正可以指为阶级敌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不足1人。党员和干部在乞丐中的比例，大大超过了他们在农村总人口中的比例，党在农村中的中坚力量贫下中农，也愈来愈多地离开了既定的道路，这对我们庞大的人民公社体制和正在掀起的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是一个至为危险的信号。在这种局面下，打击少数人以对千百万人施以严重的警告，乃是一种必然选择。

然则事态已经发展成为全局规模，局部的杀一儆百已不足以达到初衷。所以，到了1977年年末，打击叫花子终于演变为全国范围的联合行动，它包括上至国务院的紧急命令，由省到县大小政府官员的紧急动员，以及数百城市公安警察的一起出动围剿。只不过，公开的舆论对此保持着沉默，所以城里人感觉不到这种弥漫于农民头上的紧张气氛。两年以后，党的公开出版物才把这些事情透露出来。这些调查材料说，中国农村下层百姓中，至少有两亿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他们分布在22个省区，在地域上横跨中国大陆东、中、西三个地带，其中包括山东南部、福建西南与东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山西中部和北部、陕西湖北河南交界区、四川湖南贵州湖北交界区、江西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南部、陕西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北部以及西藏的全部。饥民的队伍庞大无比，以至需要城市和乡村的官员和警察们一起动手，强迫他们还乡。这样，就有数千属于凤阳的叫花子们在这一年冬季被押送回来。他们未能回到家里，便先在干部的监视下走进公社的会议室，接受批评，流着眼泪检讨要饭的可耻，并且把自己伸手要来的财物又伸手交给公社。12月的第一周，一个叫做黄湾的公社，从59个乞丐手中收缴的这类财物，包括841.8元人民币、326斤粮票，以及551斤粮食、212件衣服和20双旧鞋子。

从理论上讲，凤阳县的50万农民都属党的县委员会统辖，因之对县委官员的任何一种指令都必须服从。依照中国的人口管理和户籍制度，作为一个特定的行政区域里的属民，农民也没有离乡背井的权力。有鉴于大批饥民涌入城市，对于城里人的物资供应、生活秩序、街头景象，以至社会主义的形象都有着极大威胁，所以政府上下一致认为，应用强制手段驱赶他们回到自己家里。凤阳有一天被遣送回来的乞丐竟多达5000人，即是基于这种不成文的法定理由。看来，党中央的号召和政府的联合攻势发生了作用。就在1977年农历年末，也即阳历公元1978年1月，凤阳县新任县委书记陈庭元在一个

早晨出县城赶到临淮关。此关倚巫山，临淮河，旧时曾是淮盐集散地，盛名远播，而今却已沦为乞丐集散地。县委书记在这里看到的是刚刚从江浙一带被遣送回来的叫花子，衣衫褴褛，垢面蓬头，寒风中一堆一堆蜷缩在一起。因为冷，更因为自身的犯罪感和这位父母官的到来引起的恐惧，他们瑟瑟颤抖。陈庭元本来是应当长出一口气的，因为终于又有一批他治下的百姓加入他的学大寨的行列，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行政的管制纵使能有效控制农民的躯体，却不能驾驭农民的灵魂。

令他终于大彻大悟的时刻，是在旧历腊月二十七。这一日，他和安徽省省委书记王光宇一道进入前王生产队，偶遇史成德的妻子。史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于50年代初赴朝鲜作战，又作为“最可爱的人”凯旋归国，现在，他正领着孩子浪迹天南海北，据说已行遍大半个中国，所以人称“长脚老史”。“最可爱的人”沦为乞丐，留下自己体弱多病的妻子在滚滚风尘中艰难地翻耕土地，这叫共产党的两位书记顿生恻隐之心，于是找来铁锹相助。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场面。我们的国家一向视官员亲耕为崇高道德的表现，更何况此情此景并不同于种种演戏般的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它确属两位官员发自内心的见义勇为。依照常理，百姓对于这一场面的反应必是纷纷闻讯赶来，或含蓄或热烈地抒发感激之情，甚至应该激动得热泪盈眶。然而这一次陈王二人感觉到的只是一种强烈的冷漠，人们远远地望着他们，满脸的木然，甚至无人上前施以援手。

在我们的国家中，像王光宇这样的省委书记有数十个，像陈庭元这样的县委书记有2000多个，他们或间接或直接地管理着几万万农民。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专靠北京发出的空泛号召是不可能的，其要旨在于通过全体干部集团的和衷共济，以主义和道德的力量去动员各自的属民，行政强制的手段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当一个官员仔细查看他的辖区时，他更可以发现，不论精神的攻势与行政的管理如何无隙可击，农民的世界中有一个领域是官员们永远无法干预的，这就是人心。陈庭元所遭遇的冷漠不消说令人悲观，“主义”与“道德”的力量已难以令农民激动，反而使整个集体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百姓的无动于衷，与其说是对着两位官员的善举，不如说是冲着整个公社。比如陈庭元惊讶地发现，当生产队长吹响上工的哨子时，社员并不开门，他们只把一双眼睛放在自家小小的窗洞后面，静静地张望，有时就这样左顾右盼几个小时不肯出门。另一件事是几乎每个犁地的社员都要躲开土地的边角只在地的当中转圈，其本意在于尽量减少自己的劳动，但这样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一来，就把公社的方块地犁成了圆地，因而使公社实际的土地面积大为减少。更令陈庭元伤感的是，他看到公社的耕牛全都没有了鼻子，只在嘴的上部朝天挺着一个大大的黑洞。因为社员们都是用很粗的铁丝穿过牛鼻恣意拉扯，直扯得可怜的耕牛鼻破嘴豁，脓血一团。细心的陈庭元甚至还看见苍蝇在溃烂的牛鼻子上嗡嗡地生产蛆虫。

党的方针不允许公社社员沦为乞丐，而公社社员对党的方针又是如此缺乏诚意，这使得陈庭元和所有像他一样熟睹下情的地方官员深为不安。他们发奋力挽狂澜，却苦于无力回天，只好自己坚守在公社的营垒之中，静待社员的觉悟。殊不料社员的觉悟竟是以他们无从想象的方式表现出来，时间是在第二年的年末。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公元1978年12月，也即中国旧历戊午年冬月，小岗的事变不过刚刚是一个契机。今后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在更大的范围里发生。在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用自己的生死为赌注，对未来作出抉择的这一个夜晚，他们实际上是不知不觉地为近20年的人民公社画了一个句号。

## 第二章

# 照过去方针办

合作化中的“大同梦”——邓子恢被批判，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包产到户”的首次出现——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诞生——“六十条”：人民公社第一个成熟的制度——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包产到户”使400万人受牵连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生前留给他的接班人一纸手谕：照过去方针办。对于这几个字的可靠性，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并且成为“四人帮”最终覆灭的重大缘由。但是，此后争执非但没有在这里结束，反而由表面的文字向着问题的实质延伸进去。冲突处处可见，且日益强大，到了1978年，居然已经尖锐得无法调和。

治理我们庞大的国家，在毛泽东以往的方针，一向以农村中人民公社的制度为主要的环节。这一环节在50年代初期肇始，60年代最后成熟。其要旨，不是依靠经济的事实来治理天下，而是期望以“理想”主宰经济，主宰行政，主宰法律，主宰人的意识、人的劳动以及人的劳动所得。这一原则，当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sup>①</sup>的时候，就已初露峥嵘，多少年来的一意经营，更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他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笃信不疑，却能达到忘情的程度。比如他在1955年时，就曾沉浸在一大堆讲述农民举办合作社的报告当中，11天闭门不出，夜不成寐，其兴高采烈竟然超过了1949年他本人开进北平城以及全国解放的时候。<sup>②</sup>若干年后，“大跃进”导致了经济崩溃，饥荒在城市和乡村到处蔓延，人民公社也暴露出败象，举国一片混乱，狂澜待挽。毛泽东此时派他手下众官员分管各行各业的重建，薄一波主管工业的恢复，李先念制定财经的方针，陆定一处理文艺问题，彭真掌管教育，并命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大局，他自己则南下广州，一住月余，对京城发生的一切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只一心拟出60条新的方针，来挽救人民公社。

那时候的毛泽东，在满腔的豪情壮志中还充满着兢兢业业的本色。他一方面要把我们的国家化做一张天下最白最大的纸，在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另外一方面也能对属下提出的种种务实建议抱以充分的诚意，还能表现出虚怀纳谏的明君风范。当他开始策划在乡下推进合作化的时候，中央农村

<sup>①</sup>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sup>②</sup> 《求是》1989年第23期。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认为这样的进程应当放慢，已有的合作社中难以维持的那部分应予解散。毛居然能够表示支持，而且还坚决地认为邓的收缩方针应当更加彻底，也就是将合作化的进程“停止一年半”。在由合作化到公社化的整个历史中，这种上下一心的励精图治极为罕有，仅仅出现在1955年的那个早春，即当日储安平所说“一个健全的国家”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一段短暂时间里。<sup>①</sup>

邓子恢在受到鼓励之后，迅速地开始了他称之为“收缩”的行动。这时候乡下已经建立起大约67万个合作社，每7户农民当中就有1户是在合作社中。但是以强迫、威胁和惩罚的办法逼使农民入社的事情广泛存在。新的集体勉强而成，缺少物力的支撑，人心飘摇，已陆续出现退社散伙的风潮。邓深知局面危急，若不加以扭转，则集体化之大政将有流产之虞，甚至共产党在农民中间的信誉也将瓦解。正因为如此，行动也就势如破竹，先由危机最甚的山东、河北、浙江三省展开，又以浙江首当其冲。这是因为，根据中央书记处一位副处长的调查认定，浙江迄今为止的5.095万个合作社中，大部分是“强迫命令”的结果。当地党的最高领导人江华也承认那里迫使农民合作的严重程度为“全国第一”。是年3月25日，邓子恢电令浙江将合作社收缩。其电文说，农村紧张状况仍在延续，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合作社发展过于猛烈，步子过大过急，乃是促成此种紧张的重要因素。所以应主动地有领导地将合作社分散为互助组，或任由农民单干经营，不要勉强维持。

人人皆知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乃是共产党执政后最重要的步骤，其中寄托了无限美好的“大同”理想。邓子恢如此不留情面地指责其偏失，已经埋藏了自己悲剧性的结局，然而他还不适可而止。他刻薄地把蓬勃的合作化说成是“连滚带爬往前进，擦屁股越擦屎越多”，还表现出一副急于要擦屁股的样子。他在电文的最后部分指出，只把合作社保留3万个就已经是极大的收获。这等于明显地暗示，应当解散的合作社至少为2.095万个。

命令既出，也就不能再加回旋。邓派出他的秘书长杜润生前往浙江加以解释和监督。根据杜后来的回忆，他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邓子恢的指示，批评当地党的领导人一味追求农民的合作，而于“战术上缺乏准备”，因之“必须赶快下马”。两个月后，邓子恢对所有的合作社重新加以计算，结果证明他的收缩方针已经促使2.6万个合作社解散，其中杜润生参与的浙江减少了

<sup>①</sup> 储安平：《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载1949年《观察》6卷2期。

1.5607万个，其余1.1万个大致为山东、河北两省所属。

毫无疑问，在邓子恢的眼里，危机终于缓和，乡下这个大屁股上也终于干净了一点。可是，在这种稍稍安定下来的气氛中，毛泽东忽然改变了主意。他不再信任邓子恢的判断，决定亲赴乡村以求得自己的见闻。这时候乡下刚刚迎来春天，麦子郁郁葱葱，农民兴高采烈，干部都说农业社“好得很”，粮食也不像邓子恢说的那样人不敷出，哪里又有什么“合作社办不下去”的事情？这一切均为毛泽东目睹耳闻，看来邓子恢即便不是有意说谎，也是在传播谣言，说他“发谣风”是不会冤枉他的。多年以后，研究农业历史的人们大都把毛邓的这一段纠葛视为一个重大事件，指责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处置不当，最终导致了农村合作化进程不合时宜地加快速度。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情，令毛泽东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彻底改变初衷，竟是因为他本人身体力行了自己“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训诫。他依据常理，以为既是目睹耳闻就一定掌握了事实的真相，殊不知他的属下以及地方的官员，也会用种种虚情伪事欺君媚俗。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用虚假事实欺下瞒上，致使党的方针误入歧途的首次记录。欺下瞒上真伪不辨的先例一开，日后还要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制度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此加以遏制。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即召邓子恢于中南海颐年堂相见。他对自己所谓深入实际的调查结果深信不疑，对邓大批解散合作社的行动发出严厉警告。换了另外一个人，这时候定会颌首接受，至少也要将自己的意见收拾起来韬光养晦。可是邓子恢为人刚烈，不肯妥协。他坚持在1955年剩下的时间里面，只能再增加35万个合作社，而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65万个。这一年的整个夏季，为了“少30万”还是“多30万”这件事情，他与毛泽东争吵不休。他坚持党的最初设想，说用15年的时间来实现合作化已经不错。而毛泽东此时认定，“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的高潮就要到来”，所以对于邓的想法“要用大炮轰”。言语冲突之中，邓再次使用尖刻的口吻说道，“连滚带爬地前进，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屎越多”。毛泽东这时发现不能再用讨论的办法说服他的这位农业助手，于是决定行使他的权威。

7月31日，他把全部省市区的党的书记们集合在一起，将他与邓子恢的争端公之于众。他反唇相讥，说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sup>①</sup>。邓子恢试图作最后挣扎。他争

<sup>①</sup>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辩说合作社的发展必须符合客观条件能够允许的程度，比如规模大小，干部强弱。可是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与他讨论的耐心，他狠狠地教训这位一味追求客观条件的下属，给合作化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迫于此种情势，邓唯有屈服一途。大约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全体中央委员的会议上，宣布他与邓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很大的辩论”。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248位中央委员，包括邓子恢本人，现在全部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义正辞严地历数邓的错误。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中，没有人是胜利者。邓子恢固然落败，从此成了众矢之的，其“小脚女人”的名声也遍于全国，在经历了无数折辱之后默默死去。所有在当初抱有和邓同样倾向的高级官员，诸如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建委主任薄一波、农业部长廖鲁言，均纷纷检讨自己的保守。这件事情还牵涉到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因为邓的“收缩方针”曾经取得他的批准。仅仅这一点也就足够使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承认“没有认真地研究这时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但是他却开创了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先例。27年以后，薄一波还能想起这次批判，说这是导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若将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部考虑在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正是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他失误的历程。

当然毛泽东并不会这样认为。在这一年剩下的几个月里，他处处显示着胜利者的信心。到了年末，已经有6000万农户进入了合作社。在毛泽东看来，这就等于是社会主义大海的怒涛正在咆哮而来。他情不自禁地写道：

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sup>①</sup>

<sup>①</sup>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29页。

现在，政治的局面已经彻底地转为有利的情势，反对派不再置喙，舆论迅速地倒向这一边，合作化高潮也就真的再度兴起。乡下每三家农户中便有两家成为合作社成员，1956年年初，总数多至7000万户。“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sup>①</sup>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毫无保留地看待眼前的状况，比如刘少奇就含蓄机巧地说出了那一年里他的忧虑：“在中国，6亿人中5亿多正处在一种情绪不安的状态中，他们不知道应做什么，感到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sup>②</sup>

1956年1月的一天清晨，毛泽东一觉醒来，就有了一种“换了人间”的兴奋。他的秘书田家英把一篇拟好的新闻稿递给他过目，内容是宣布《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即将出版，他连看也没有看就丢了回来。“没有用了，已经过时了。”他说。那本书的确已经出版，正在迅速地运往各地。全书分列三卷，总计94.3万字，1360页，176篇文章，均经过毛泽东的编改，104条按语亦出自毛的手笔。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本出版物对农民的实际影响超过了这一本书。但是在当时，似乎只有毛泽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那一天说，他的高兴之情甚至超过了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候。田家英跟随这位领袖多年，朝夕相处，还从来没有见过他用如此轻松愉快的口吻对待一件严肃的事情。毫无疑问，在合作化第一回合的战斗中，能够轻而易举地获胜令毛泽东大为兴奋，他本以为改造5亿个体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很多细致的工作。现在，不过开了三个会议和出版了一本书，问题就解决了。

“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他问他的秘书。<sup>③</sup>田家英不明所以，自然无法作答，但是他却意识到，就是从这时起，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开创者，他原本的意图是要率领我们的国家，经过民主主义而后方能进入社会主义，也即在一个时期之内让资本主义有必要的发展。他甚至嘲笑那些想要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主义者，是

①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79页。

② 《光明日报》1967年7月21日。

③ 《人民日报》1990年3月8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sup>①</sup>。他的这个基本的信念在1945年日本人战败之后形成，到了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仍然信守不渝。当日若干新政协的筹备委员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坚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尚不成熟。此事发生在这一年的6月16日，未有正史记载。不过，当日一位筹备委员在40多年后回忆起这件事情，还能感怀毛泽东那时的头脑清醒。他说那一天他本来是坚决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之一，是毛主席和周恩来说服了他和其他人，《共同纲领》之总纲部分，即秉承毛主席的这一意旨，没有写入“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字。国家新生之时，原有法律尽废，所以这一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毛泽东还以超越党派之上的领袖身份，劝说那些急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外知名人士，说大约要二三十年方可过渡到社会主义。即使到了1952年，经济的恢复令举国精神焕发，乐观情绪笼罩四面八方，毛泽东仍坚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取“逐步”的方针，其具体的时间则要“十五年或者更长一点”。但是1955年的胜利，已经预示毛泽东要改弦更张。这种变化当然有着理想的驱使，但是，追究起来，还有着其他一些重大的缘由。

中国共产党1949年立国，至50年代初期，其组织力量已经完整地渗透乡间。党的工作队员无偿地剥夺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土地，在贫穷的农民中重新分配。这件事随着军事力量的推进，由东北、华北展开，而至华东、华南和西南，这时也已大体结束。根据新政府的统计，大约1.1亿农户得到了土地。这样，连同原有的产业，每户即拥有田产10亩以上，同时每两户人家还可共同拥有一头牲畜和一张犁。作家周立波在他的小说里面说，这是席卷农村的暴风骤雨，他的故事如泣如诉，看上去是对这些激动的农民的一首赞美诗，直到几十年后还为人津津乐道。然而在农民的眼里，经济的恢复以及终于不再挨饿，才是一首真正的“赞美诗”。

周恩来一定理解了农民的这种心情，所以他在这个时候警告说，“没有饭吃，其他一切都没有办法”。接下来的情况令党的领袖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少数富家的没落和大多数贫家的拥有土地，是推动乡间劳动热情的重要一环。第二年粮食就获得了丰收。第三年的情况看上去更好，5亿饥肠辘辘的乡下人在这一年里足足多吃掉175亿公斤粮食，某些地方甚至有了存粮。孩子不再号哭，老人不再哀叹，男人的脸上开始有了一点点血色，女人们又开始放

<sup>①</sup>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肚皮，在那两年里生了4254.974万个孩子。穷人们把共产党当作普度众生的活菩萨。数万名工作队员走在乡下的时候，每一个人身后都会有一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跑来跑去，真有一呼百应的力量。你若说地主还想着“变天”，他就恨不得把地主撕成碎片；你若说新的富农已经出现，穷人又要卖房卖地再次成为穷光蛋，他就会气得周身颤抖；你若说大家把土地耕牛犁耙锄头都归到一起，组成互助小组，力量更大，收获更多，他就会激动不已，欣喜若狂，并且相信这是唯一的希望。其意气风发同仇敌忾的精神力量，使耳闻目睹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不过，若单纯以数量来衡量，这时候全国的农业初级合作社仅为300个，半年后约3000个，又一年后也即1953年的冬季，为1.4万个。这种情况可以证明，尽管毛泽东在精神上强硬地坚持以合作化去动摇私有制的基础，但是，迟至1953年冬季，他还没有急于来发动这件事情。依照他的本来计划，社会主义的高潮还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会到来。

但是，计划与实际常常不能相符。这一年的冬季，一个重大事件逼得党的领袖们几乎是一致采取了加快合作化的步骤。新的决议力促农民将原来的互助组合并，以形成更大规模。新组织的要旨，已经不再是亲戚邻里间的换工合作，换句话讲，不是“互助组”，而是要将每家土地作为股份联合在一起，人力亦组成集体，统一耕种，土地上的收获则由农家依据劳动优劣和土地农具的多少来分配，即史家所说“初级社”。党的官员和报纸的编辑喋喋不休地告诉农民，只有这样才能一劳永逸地不再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就一般的逻辑来说，这样的解释并不为错，可是，按照胡绳在36年以后的说法，当时改变中国农村时间进程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在这个地方。他说，“问题是从工业化引起的”。

历史学家常用意识形态的原因来解释乡村公社化的进程，似乎很少注意到利害的机缘。事实上不论多么理想主义的政权，都无法离开物质的基础。这在共产党开国初年、政权尚未稳定的时候，更有其客观的必要。国内万象更新，连续几年没有战事，工业渐渐繁荣，城市人口膨胀，政权机构亦迅速地扩充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将大范围地展开。然而情形并不乐观，因为所有的辉煌都不会离开一个东西，这就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如果没有了粮食，人的生存都会失去根基，政权亦将成为一座空中楼阁。可是现在偏偏就为粮食的匮乏所困扰。

依照乡下收获的时令，城里粮食的收支以夏季为一个周期的起止。眼前这个周期里面，政府从农民手里收进的粮食虽然增长了8.9%，可是城里人的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消耗却增加了 31.6%，这就难免使粮食收支形成巨大的赤字，唯有以库存相抵。到了 1953 年的夏季，国库存粮已所剩无几，即使政府号召厉行节约，也只够城里人维持两个月。田间小麦的收成虽未最后确知，但长江流域洪水之大，为百年来仅见，夏粮的减产已成定局。这情况由粮食部在 6 月 2 日呈递中央，经济专家和各省书记齐集京城会商对策，结果无人不能体恤“形势严峻，难以为继”。

毛泽东传话要他的下级陈云去想办法。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此时正拖着多病之身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休息。于是，事情转由薄一波带着几位管理粮食的官员去完成。就在这些官员煞费苦心想方设法的时候，告急的报告又接二连三地呈来。事情果如粮食部的报告所预料，京津两市原本需要 7.5 亿公斤小麦，可是只能收到 5 亿公斤，城里人在 3 个月内把这些粮食买去一半，却要用另外的一半来维持 8 个月的生计。9 月 4 日，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私商得悉政府的艰难，群聚起来火上浇油，在两个小时里把市场上的粮食统统买去，囤积居奇，接着又蜂拥徐州抢购黄豆。一个叫做王雨农的人，独自买去 25 万公斤。又几天后，江西省面上的稻谷也被一扫而光。情势如箭在弦上，混乱一触即发。北京情急火燎地电告东北，需 21 亿公斤粮食入关。东北三省向有“粮仓”之誉，照理将粮食运抵京城救急不应成为问题，可是现在他们却说只能运来 7 亿公斤，而且不知何时才能起程。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陈云再也没有养病的闲情。他回到北京，对他的同事坦言，他挑了“一担炸药”，前边是黑色的，后边是黄色的，“都是危险家伙”。陈云说，如果他搞不到粮食，城里人要爆炸；如果他强行征粮，乡下人要爆炸。

毛泽东显然被陈云描述的事实所震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看来这是一个英明的预见。即令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城市，他对于自耕农户的增产能力也至为怀疑。10 月 2 日，毛泽东严肃地告诫政治局里的同事，说在共产党的面前岂止是一担炸药，分明是一场战争，“要打一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看来这一仗的艰难不次于与蒋介石 800 万军队的对抗，因为他在二者中间必择其一。

实际上，在这一年的 10 月初政治局会议召开的时候，选择已经作出。前一天晚上本为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上万民同庆，人民朝着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不住地欢呼。这座城楼上并不仅仅只有检阅的站台和雕栏，在纵深一点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殿堂。党的领袖们此时聚集在这里，陈云拟出 8 种办法供大家选择，“统购统销”为其中最严厉的一种。最后大家一致认定，非此



种严厉手段不足以渡过危机。

两周以后，“统购统销”为政治局批准。由政务院也即当日的国务院发布命令，将此方针昭告天下。粮食市场随即一律关闭，而由政府取代其责，只有西藏和台湾不在其中。这一方针的要旨在于，买卖粮食乃是政府专有的权力，其余均为非法。农民必须依照政府所定之数量、品种和价格将自己的收获卖给国家。纵使荒年减收亦不可免，是为征购。假如农家由于荒年或者政府征购过多，而至自家粮食不足食用，则政府在核准之后会酌情提取国库存粮卖给农民。这种做法有一个无论百姓还是官员人人皆懂的说法，叫做“返销”。城里人亦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量、品种和价格购买粮食，其配给之数量，因人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居住地区的差异而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城镇中的大约 5000 万家庭，每家均有一个购粮本，凭借粮本方能取得粮票。本中细细注明家庭所有人员的情况，以备核查。如果不能出示粮票，则无论有多少钱也不能买到一片面包。这种制度在中国奉行 22 年之久，始终颠扑不破，直到 80 年代中期方有人提出疑义。

不过，用这种近于强迫性质的制度将粮食置于政府的掌握之中，是要冒着农民离心离德的危险的，实行起来在技术上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当日乡下的自耕农户多至 1.1 亿，数量庞大而又居住分散，无论多么有效率的行政组织，根本无法知道每一农户的丰歉多寡，即使知道了又如何逐户征取无误？假如农民纷纷隐瞒产量藏匿粮食，政府又能以什么办法加以应对？

我们的政党和政府既以组织见长，当然还要从组织的途径去寻求希望。毛泽东具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来完成这一切。他将“互助合作的粮食征购”并提为改造农村的一翼，即把散乱的自耕农户收拢为若干规模较大的合作社，以此掌管着农民全部的生产活动以及生活消费，由党的坚决信奉者出任合作社领导，其尊严又是以控制乡里农民的意志。对于政府来说，掌握合作社也就掌握了全体农民。1953 年 12 月，几乎是在发布了统购统销命令的同时，共产党又制定了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合作化的进程自此大大提前。这局面被毛泽东形容为“太多的小辫子梳成大辫子”，这样一来，他所主张的“翼”之战略，也就可以畅行。

然而这一战略的真实含义在当时并没有昭告天下。《人民日报》社论说：合作化是“使全体农民走上幸福生活的唯一的道路”，而小农经济正在使一些农民“陷于贫困”。因为，以每个农民只有 3 亩多地的规模来说，既不能利用机械，又不能大修水利，为了自家各种各样的需要，甚至还要在这弹丸之地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种植好几样作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能够增加一些产量，也是很缓慢的。这些都是事实，不过，对于那些刚刚分得土地的兴高采烈的农民来说，简单地这样说说显然不会发生作用，所以社论又发出警告：土地的私有正在农村里重新造成贫与富的分化。比如河南省就有16个村发生了悲剧，那里的3753个农户当中已经有185户在出卖土地。<sup>①</sup>这一下就击中了农民的要害，土地在乡下为农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几乎所有人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感受到出卖土地的辛酸，其惨痛可与卖儿卖女等同。

那时候共产党的威信如日中天，一说起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会在人们的心中引起激动。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条道路上都是些什么东西，可是有几个农民说，他们真正见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什么样子。一个若干农民组成的代表团在这一年去了苏联，一回国便都异口同声地说是“看到了最好的榜样”。这些人都是当日农村中最有号召力的劳动模范，一向以务实为本，现在则像幻想家一样地描述着一个神奇的世界。

这些人中间有河北的耿长锁。他去了乌克兰，看到那里一个集体农庄拥有2万亩土地还要算少的，即使20万亩也算平常。3个洋人开着一辆叫做“斯大林八十号”的拖拉机转来转去，一天居然能耕450亩地，而且深达9寸。耿长锁那双握惯牛犁的手伸在土里久久不忍抽出。“我们想在一天里面耕450亩地，要怎样干呢？”他对自己的乡亲说，“要用150个人、150头牛、150副犁和30副耙，而且只能耕4寸。”

还有吉林的韩恩。他的见闻更加令人神往：妇女劳动也不会觉得累，老太太可以干成年人的活，而且一年得上500多个劳动日的报酬是常事。歹地可以长出好庄稼，狐狸可以养成家畜，农民点灯不用油，只要拉一根线，一个玻璃泡就会发出耀眼的亮光，就是点10盏油灯也赶不上。

还有山西的李顺达。他说，在苏联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根本不像我们这样从天亮干到天黑，人家劳动一点也不累，地里庄稼却长得很多。一到星期天，大家都休息。

还有广东的汪汉国。他说他看到人家穿的、吃的和用的，就连自己村子里的地主也不如人家。老年人可以白吃饭，不干活，病人可以到医院去治疗而不用花钱，孩子们都可以送到托儿所去，做父母的既不用操心又不用花钱。

那时候大多数农民还不懂得什么是工厂，什么是城市，什么是电灯电话，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53年11月26日社论《领导农民走大家富裕的道路》。

什么是西服领带，不懂得拖拉机是什么，坐汽车是什么感觉，他们会用火柴去点电灯泡，会被收音机里的声音吓得逃走，他们几乎不懂得土地以外的一切。现在听说居然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可以想见其如醉如痴的向往之情。合作社看来真是一个好东西。在以后的一年里，农民们把合作社的数量增加了9倍。可是，他们还是不会知道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城里人正在急切地等待着他们的粮食。不到半年，大局即定。粮食的收购计划则不仅完成，而且居然超过30多亿公斤，令城里粮食购销平衡有余，库存也有了增加。不过，农民始终没有看到报纸上面描述的“天堂”。

合作化进程的骤然加快肇始于粮食的匮乏，现在粮食的问题终于解决，而农村里面新的组织在意识形态上也能与共产党的宗旨合拍。在合作化的历史上，经济的目的与政治的动机能够弥合无隙的情况并不多见，1955年和1956年是其中一次。然而若以为从此可以无所不能，那就是既不了解经济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像击垮蒋介石的军队那样，一夜之间摧枯拉朽，也没有认真地调查农村的情形，听取农民的申述以决定符合实际的步骤。倘或在处理具体的争论时又师心自用，但凭一人之判断去裁决异常复杂的经济问题，那么，合作化运动未能把初步成果引向最终成功也就成为必然。

在第一个回合的争论取得胜利之后，我们的国家开始用一种乐观的眼光打量自己，热情一发不能收敛。有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人人相信世界将会给他们10—12年的和平。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中国的农民将会使粮食的年产量达到5000亿公斤，而不是原来所设想的3000亿公斤；棉花的年产量也将达到12000万担，而不是原来计划的5600万担，也就是说，“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100%—200%”<sup>①</sup>。毛泽东把这些数字写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整个权力机器也都围绕着这篇序言旋转起来。国务会议现在把半年以前北戴河会议定下的计划全部推翻，把毛泽东的序言当作了计划指标予以通过。计划的全称叫做《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这时候全世界都在谈论核战争，就连苏联人也不能不感到紧张。美国人格外地傲慢，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说美国人那点东西，不大算数。一亿吨

---

<sup>①</sup> 实际上，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992年所创的纪录为4450亿公斤；棉花在1984年为历史最高纪录，12154万担。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钢，几百个氢弹，中国要超过，这是因为“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跟着添油加醋，说中国人可以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新的计划。<sup>①</sup> 这时候整个中国都被鼓噪起来。

那几个月里，中央政治局里谈论的话题还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非斯大林化”，从波兰到匈牙利的自由化，国内的学生，闹罢工的工人，知识分子是否已经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原子弹，民族隔阂，阶级斗争，双轮双铧犁，妇女是否该穿漂亮的衣服，时装舞会，旱灾，扫盲，美蒋特务，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人要不要避孕……但是，最令大家亢奋不已的事情，是要将13年的计划提前5年完成。很显然，过去几个月来，毛泽东的激情影响了他的同事们按部就班的步调，并且很快传染到全国。薄一波说他觉得整个中国“充满了形势逼人的气息”。就连一向冷静的周恩来这时候也欢欣异常，他说“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晚了”。

但是才过了一个多月，周恩来就意识到领导者们应该用冷水来洗洗，因为他们“头脑发热了”，尽想着“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他的意见得到国务院里他的几位助手的响应。这些人包括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和经委主任薄一波。这几个人在一起召开了两个会议，专门压缩计划中的指标，时为2月，所以周把它称之为“二月促退会议”。他还提醒他的听众“有急躁冒进现象”。刘少奇与周恩来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在这几天中召集了一系列的会议，主张把计划中的指标一压再压。甚至连中宣部也加入了这一行列。陆定一将一篇社论交由刘少奇和胡乔木修改，然后呈送毛泽东的面前，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不料毛泽东却在上面写了三个字：“不看了”，就扔到一边。

机敏而细心的周恩来，不会不知道毛泽东在这三个字里面所流露的不满，然而他和他的支持者依然故我。社论在6月20日发表于《人民日报》，国务院也继续大刀阔斧地执行自己的方针，“小跃进”已然流产，农业的《纲要》事实上也被弃诸一边。这种势头保持了至少一年。

1956年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之所以分外重要，是因为今后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渊源。人民公社的由荣而辱，以及“包产到户”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56年1月1日。

的由辱而荣，实际上也都是从这时开始。

今天重新回忆这一段历史，读者恐怕可以认为，党内高级领导人联合起来抑制毛泽东的独断，并不是不曾有过。1956年为第一次，亦曾有过相当大的成功机会。举一件事情就可以明白，这一年秋季，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人们开始批评个人崇拜，经过修改的党章中也不再提到“毛泽东思想”。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本人曾提出共产党最高级的领导人员可以分成一线和二线，他将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也即退到二线上，而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放在一线掌握实际权力。假如这样的方针能够真正实行，则中国今后的历史和毛泽东本人，一定比实际的情形要好得多。这些人都具有杰出的智力、惊人的判断时局的本领，以及更为冷静的头脑。在1956年以及后来的年代里，他们或公开或私下，几乎是一致地主张用较冷静的态度对待中国的经济，只是毛泽东的威望实在太高。没有毛泽东的英明，即不会有共产党今天的政权和地位。如邓小平在20多年以后所说，“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sup>①</sup>。他们在毛泽东面前时时感觉到领袖的英明不可动摇，以至于亦步亦趋地跟随这位伟大的人物做出许多不自量力的事情来。

但是在居江湖之远的某些奇人异士中间，却发生了敢于特立独行的事情。1956年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中间，而是由两位小人物——李云河和戴洁天发动起来，其影响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绵绵不绝，直到80年代还会成为世人追逐的话题。

李云河1956年始任浙江省永嘉县农业书记，年仅24岁，他的下级戴洁天长他5岁，当日为县委农村工作队队长。这两个人具有超人的胆量、丰富的想象力和足够的务实精神，将这样的人派去推行合作化方针，就注定了悲剧性结局的发生。

是年春季，这两个人到乡下去观察合作社的情况，惊讶地发现邓子恢所说的农民的消极抵抗情绪是如此强烈。干部胡乱派工和农民怠工随处可见。下地时的拖拖拉拉和收工时的一窝蜂，形成鲜明对照。几句雅俗杂交的新谚正在农民中广泛流传，他们饶有兴味地把它带到了县委会议上：

<sup>①</sup>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出工鹭鸶探雪，  
收工流星赶月。  
干农活李逵说苦，  
争工分武松打虎。

以当日共产党对于颠覆力量的警惕之心来衡量，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当作敌对者的阴谋。但是李云河不能同意，他说把全部的农民都作为党的敌人是不可思议的事。然后他就提出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麻烦。他的理由乃是基于当日农村的生产条件以及人之本性。这两者在农业生产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于农民劳作的方式，李云河用了一个刻薄但却相当形象的比喻，说是“一〇〇七部队”。李云河所说“一〇〇七”，是指农民以一条扁担、两只粪桶和一根锄头，来完成全年的劳作。将这样一些人成群结队地赶至一块土地上面去劳动，就难免造成“极为严重的窝工浪费”。至于农民内心的真正愿望，李云河的判断与毛泽东相去更远。毛认为“合作化的高潮”已经到来，李云河则说，个体农民劳动的“主动性”和“细致性”乃是传统农业中的精华所在，而这种情形全靠其本身的利益来支撑。“天天集体，事事集体，把整个时间和整个精力经常‘集体’在一个地方，群众不赞成。”所以，动摇农民个体利益的集体劳动，必会导致农民的缺乏主动精神和粗耕滥作。李、戴二人是期望着用“包产到户”来医治合作化运动的先天不足。

这是中国农村首次采取“包产到户”的行动。时为1956年4月。李云河说服了他的上级允许他们实验。接着就在一个包括1801户人家和4673亩土地的合作社里推行他的设计。当然他们也老实承认这并不是他们自己凭空的创造。在县委会议上反复陈述这个主张的时候，他们不断地扬着手里的一张报纸，那是1956年4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载一文，叫做《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李云河的突发奇想正是源于此文。当然这是党的报纸上第一次刊登主张“包产到户”的文章。整整30年后，也即1986年夏季的一天，李云河终于在电话中找到了文章作者何燕凌。李用颤抖的声音向作者谈起这篇文章：

“它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那是多么难以忍受的千般折磨万般熬煎啊，”何燕凌嗟叹，“如果我当年写那篇短文的时候能够想到它可能造成那么可怕的后果，又该怎么办才好呢？”

李云河的冒险从一个叫做“燎原”的合作社开始，其用意十分明显：要让“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燃烧起来，成燎原之势。李、戴二人精心设计了“包产”的全部规程，其详尽的程度包括了一年24个节气、280种农活、10个等级的劳动，以及土地的厚薄和远近。还在整整一个夏天里食宿于“燎原”，借以体会农民的情绪，检验其试验的成效。农民对于这一制度的反应极为强烈，人们自动地把耕种面积扩大了8%，积肥之多比周围4个合作社的总和还要超过3倍，多年闲置的农业机械现在全部启用，漕运效力提高了10%，还能修缮3处水利，养160头猪，以使来年粪肥更多，地力更壮。前后4个月中，燎原社与周围农村之情景全然像是两个天地。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李、戴二人以胜利者的姿态班师回朝，提出关于“包产到户”的试验报告。李云河乃是由宣传部长升任现职的，他深知舆论的重要，所以动员手下宣传媒介大造声势。县委第一书记李桂茂这时也由犹疑不定转而站在“冒险者”的立场，政府也开始鼎力相助。于是，一个“星火燎原”的场面真的出现了。9月6日，县委召集会议宣布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全部合作社主任均到场聆听，是为永嘉历史上著名的“千人大会”。此后的几个月，永嘉全境大规模地仿效，全部637个合作社中，255个采用了燎原社的办法。“包产到户”之火还超越县界烧向整个温州地区。到这一年冬季，实行此种制度的合作社已逾1000个，大约包括17.8万农户。

这时候京城里面正处在“反对冒进”的高潮，浙南也大有“包产到户”席卷而来的势头。此外，四川江津以及广东和贵州，亦有大体同类的行动，只不过规模极小，又不具有政府的组织色彩和宣传的声势。所以后人均称永嘉为中国农村“包产到户”之发祥地。它与合作化几乎同时出生，其诞生比之后来的人民公社，至少要早两年。

然而这一大规模的行动使永嘉的上级感到恐惧。《浙南大众报》获知乡下在搞“包产到户”后立即发表文章，说这是“一种倒退的做法”，因为它“在生产方式上从集体经营退到分散经营”。作者预言“他们所说的增加生产不仅是微小的，增长的速度比逐步搞好集体经营的合作社相差越来越远，而且不久之后就会停滞不前”<sup>①</sup>。问题的严重性质在于，此种观点不仅仅是某一个人的心血来潮。这张报纸为温州地区党的委员会的机关报，这说明地委已在酝酿扑灭这股火焰。文章未加署名，恐怕也是为了表明一种团体的意志。

<sup>①</sup> 《浙南大众报》1956年11月19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只不过大局尚未明确，所以还没有最后下定决心。

据后来史学家的考证，这是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对于这篇文章，永嘉自李桂茂以下多数官员在心里都不能接受，但是表面上的态度却已经四分五裂，乱作一团。唯李云河一人不肯听之任之。他用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与报纸针锋相对，题目叫做《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但是，他不是不懂，处理这些冲突需要具有“拉大旗做虎皮”的特殊技巧，所以他又在标题的下面注明，这是“学习‘八大’决议深入实践的体会”，以此表明自己正是执行了党的决议而不是背道而驰。

李将自己的文章上呈他的所有领导，包括李铁峰领导的温州地委、林乎加领导的浙江省委、柯庆施领导的上海局、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林乎加很快作出反应。他召集会议，支持李云河，说《浙南大众报》的文章不对，“站不住脚”。接着又颁下命令，要省委机关报全文刊登李的文章。文章发表于1957年1月27日的《浙江日报》，开宗明义，说与地委的机关报“有不同的看法”。如此一来，就发生了周曰礼所说的“‘包产到户’的第一次大争论”。

依照中国政治中的常理，既然省委的权力高于地委，那么省委书记的意志应当可以扫清地委所设的障碍。可是这一次情况大为反常，地委不仅不肯收回成命，而且责令永嘉立即纠正“包产到户”。省委书记林乎加反有退却之意，至少不再置喙。李云河不用费多少力气也就可以明白，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只会是一个，就是林乎加的上级不肯支持他而支持了他的下级。没有人能够对这种猜测提出事实上的根据，但是李云河却听到一个让人心悸的消息：

毛泽东认为，“‘包产到户’是方向的问题”。

毛泽东的确有过类似的表示，而且更加激烈，但这只是在若干年后出现的事。在1956年的那个冬天，这仍然只是传闻而无法证实。问题在于，仅仅传闻也就足以对这些最下层的官员发生重大的影响，而且，此种传闻也必会为县委书记李桂茂所知。这种压力直到30年以后他还能清晰地感觉到：“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作为县委第一书记，怎么能不顾领导意见，不听地委招呼？”僵持的局面拖延至1957年3月7日，李桂茂终于屈服，他做出《坚决彻底纠正“包产到户”的决定》，其中说，除保留“燎原”试点外，其余地方一律纠正。他解释说：“这是我在下有要求、上不支持的情况下对‘包产到户’的复杂心情。”



考虑到李桂茂后来的行为，可以认为他的这一番陈述不无事实上的根据。但是在当时不论他是多么的口是心非，他的决定仅仅在名称上也就表明了一种清晰的立场。更何况它还以3月8日为最后的期限，宣布此后若再有人坚持“包产到户”，则以党纪国法论处之。所以李云河称，这是一条震撼永嘉的“三八线”。

李云河搬出邓子恢来作最后的挣扎。他在县委的会议上说，邓老说过可以“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所以“我的办法还要坚持”。邓子恢的确有过类似的表述，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尖锐批评，这位被叫做“小脚女人”的农业专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当然不能成为李云河的挡箭牌。

可怕的风暴在4月初终于来临。一连串质问抛向李云河：“包产到户”是在鼓励单干，而使合作社完全解体，只是对富裕的农民才有好处，说穿了是资本主义；所谓“邓老指示”，不过是断章取义的诡辩；上拥邓老“指示”，下借群众“要求”，可见他还没有丝毫悔改的愿望。看来李云河已经不能继续工作，因为只要他还有权力，就有可能在宣传中夹带私货。省委工作组也开赴“燎原”，一进村就宣布“包产到户”为“星星鬼火”，要用最迅速的行动来扑灭。工作组提出的报告说，“事实证明只有合作化才能使农民的生活好转”。但是农民已经有点按捺不住。那一天县长带领机关干部来参加劳动，合作社的社员们认为这个机会可以用来表达他们对禁止“包产到户”的不满，于是打着“没有饭吃”的旗帜，群聚起来，将工作队团团围住，从上午直到子夜。激愤的农民将一个姓叶的干部群殴致伤，把另外一个王姓干部的衣服上面捅了一个大洞，仍然不肯甘休，又去抄了几个合作社干部的家，方才觉得出了心中一口恶气。这时已是东方破晓时分。

农民的反抗如此激烈，令党的干部们一时不知所措。假如毛泽东能在这个时候就把五年以后才肯说出的那句话说出来——“中国有五亿农民，如果不团结他们，你有多少工业，鞍钢再大也不行的，也会被推翻的”，事情的结局恐怕又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不过，现在毛泽东正在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他说，要让右派猖狂一个时期，“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表明此时他的心里全是反击右派的念头，其计划犹如一场军事性质的战斗。三周以后，他真的起草了反击右派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说，右派们“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

这种局面使永嘉乡村中那些愁眉不展的工作队员为之一振。因为依照既成的逻辑，百姓的骚乱定是受了坏人的挑唆。这个推理很快又为事实所证明。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右派分子章伯钧就在煞有介事地打击合作化的运动，说“农民在咒骂毛主席”。这样的人在温州也一定会有他的代理。于是，一个名叫诸葛邦寅的农民被指责为“右派首脑”，逮捕归案。此人几年以前即不肯把粮食卖给国家，现在则“借口改进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到处贩卖‘包产到户’”，不仅造谣说已经获得政府批准，而且还打伤乡支部书记谢昌宝，使其吐血成疾。然而最重要的，此人之兄为恶霸地主，于土改当中被工作队处决。所以这一切都有了阶级的色彩，“包产到户”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地方阶级“射向社会主义的一支糖衣毒箭”。

《浙南大众报》从一片慌乱中重新振作。7月的最后一天，充满激情的编辑在自己的报纸上写道：“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并且说“包产到户”有十个“大祸害”，那些热衷此道恋战不去的人，简直是“抱着狐狸精当美女”。温州地区党的领导现在更加理直气壮地采取步骤，约束农民的私有欲望，其具体的部署叫做社会主义“说理大会”。据《浙南大众报》说，20天里召集了上千次“大会”，教育了上百万农民。并且将172个合作社的“包产到户”全部取消。永嘉县的党代表大会似乎觉得这还不够，作出决议说“要把‘包产到户’彻底灭种”。

8月8日，李云河的上级领导召开会议，判定他的“包产到户”是“原则性路线性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李仍然执迷不悟，他说“给我试验到底，不能一棍子打死”。到了10月，李云河终于意识到他已经无力回天。那一天北京出版的《人民日报》把他“一棍子打死”了，那上面印着他的名字，说他制造的“燎原事件”为“右倾”错误。<sup>①</sup>新华社还把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通电全国，说他以邓子恢为后盾从事“断章取义的诡辩”。看来这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邓子恢就在说了“可以‘包产到户’”那句话之后，紧接着又说，“浙江某些县所实行的‘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实际上是退回到单干”。这里所谓“某些县”，不是李云河的永嘉又是谁呢？

若干年以后以喜剧方式在全国上演的“包产到户”，现在则进入了悲剧的高潮。1958年2月21日，永嘉淹没在标语、漫画、口号和大字报的海洋中。“包产到户”和它的倡导者们受到公开的审判。在中国，这是结束其政治生命的最有效的方式。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3日。

李云河是当然的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劳动改造。

戴洁天成了右派和反革命双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举家遣往农村。

李桂茂虽然中途勒马，反戈一击，亦属中右分子，撤销一切职务，降低三级工资。

永嘉县农村工作部支持“燎原”的错误也不容姑息，予以取缔。部长韩洪昌、副部长吕克熙与周祥干、局长胡宣哲，均为右派，秘书潘长平罪行较轻，为坏分子。这些人一律撤职、降薪、劳动教养。

200多农民被当村批判，20多人被判刑收监。其中一人刑期20年，未及期满即死于狱中。他叫徐适存，罪名为“破坏合作化”，其事实的根据是他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呼喊“‘包产到户’就是好”。

“燎原事件”遗留下来的“右派集团”，从此四分五裂，很快便被遗忘，即使今天亦鲜为人知。就数量而言，这些人在当日55万右派中不过是沧海一粟。然而它却包含着与其他千万沉冤不同的意味：合作化在它历程的起点上便埋葬了走向光明的契机，所以它在战胜了它的敌人的同时，也在走向自己的坟墓。

这个事件的结局，还酝酿了中国此后历史的一个基点，即以意识形态的判断来取代经济问题上的不同探索，以专政的高压迫使人们保持思想统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当事人中，并无一人可以自诩当日在沉舟侧畔保持了彻底的高风亮节。他们都多多少少地表现出双重的品格。最坚定者如李云河，也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自我责难的文章。李桂茂其人则更值得心理学者加以考究。对于“燎原”的“包产到户”，他由犹疑不定转为坚决支持，继之又坚决地予以反对和打击，却仍不足以自保。然而他在终于落难之时却把“包产到户”的大批资料卷宗珍藏起来，历经无数抄家游斗颠沛流离仍使之完好无损。有一天，他遇到昔日被他严厉批评过的下级戴洁天在监视和强制之下劳动，遂驻足观看。这一来，一幅令人心酸的场面就永远地印在他的心里，以至30年后他还如泣如诉地加以描述：“我见到他营养不良，劳动过度，面黄肌瘦，双手不能举起，感到他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但我又不能伸出援助之手，内心痛苦使我彻夜难眠。”戴洁天此时却在为了不能向妻子儿女伸出援助之手痛苦难眠。“幼儿四口，嗷嗷待哺，炊烟常断，啼饥号寒，”他悲愤地写道，“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诉邻家饭菜香。”在另一首诗里，戴又表明他的悔过认罪全为被迫之举，在他的心里则仍然保持着昔日的气概：“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有问津。”这表明党的干部们在特殊年代的复杂心态。虽然他们中间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多数人不得不随波逐流以求明哲保身，且即使他们敢于直言犯上也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强制性的手段虽可令人俯首就范，却永远无法征服其内心世界。

我们国家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至今，农民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中国共产党由农民中崛起，但执政后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正是农民。农民们不通文墨，没有政治意识和组织的习惯，易于为人煽动，却又逆来顺受。除非沦落到易子相食的地步，总是惮于表达自己的意志。他们属于简单的劳动力，但是对于自己的利益却有着出奇的敏感，其行动常由利益的动机来驱使。他们支持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是因为相信党能够给他们以利益。奇怪的是，那么多的党的官员出身于农民或熟知农民，竟会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

1958年1月，当毛泽东的火车开进南宁之时，他就感到有必要修改经济指标：“十五年就要超过英国”，钢产量还要增加，这些都必须实现。至于下面这个部署，他认为虽有疑问，却值得一试：一年完成12年的粮食增产计划、11个月消灭文盲、半年实现水利化、麦收以前把全国的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全部杀死。

不管怎样，原拟1960亿公斤粮食和3500万担棉花的产量计划肯定是保守的，就算已经提高的计划——2158亿公斤粮食和4093万担棉花，也不能代表新的形势。农业部的报告已经提出，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达到4000亿公斤，比1957年增长1倍以上，副总理谭震林也出来宣布说，“一万亿斤是可能的”，即使考虑到充分的回旋余地，1958年产出3000亿公斤粮食和6000万担棉花，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大跃进”的方针在1958年的春天确定下来。还有一些叫人振奋的口号，诸如“一天等于二十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真正的‘左’比右好”、“当革命的促进派”……在那几个月里传遍了全中国，其影响直到20年之后，还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

消灭“四害”的运动在那个春天里迅速地发动起来，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奇观。所谓“四害”，原来特指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过了一年，人们发现由于麻雀的减少，农田害虫剧增，方知这小小的鸟儿不仅吃粮食，也吃虫子，所以决定不再消灭它，而以臭虫取而代之。政府将这些东西的灭绝和粮棉的增产一同列入“十二年规划”中，又在1958年1月颁布指令，把这叫做“爱国卫生运动”。号令即出，举国响应。京城里面，片片青灰

色的院落上空，凄厉的呼啸此起彼落，人们在房顶上来回地奔跑，摇晃着形形色色的长竿驱赶麻雀。一个外国人形容那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惊恐万状的麻雀无处可以栖身，力尽气绝，跌落在人们脚下，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提着一串串麻雀彼此炫耀。乡下天地开阔，须有另外的办法。一群解放军官兵仔细地研究了麻雀的生活习性，结果发现夜间以手电筒照射，可使其失去行动能力。新华社发表了这条经验，还说一个副排长使用这种办法，一挥竹竿即打死四只麻雀。打苍蝇的办法是清除垃圾和挖掘蝇蛹。至于正在飞行的苍蝇就只有以人力发奋追击。一个加拿大人在那些日子里驱车经过乡下，看到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子发疯般地狂奔，忽东忽西，挥动着一块布抽打地面，在她的前边，一只苍蝇仓皇逃窜……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场面”。其实这样的场面在那个春天里随处可见。官方的舆论机构迅速地公布各地“战果”。当时有一大批人专司统计之职。这些人老谋深算，决不会像那个小姑娘，为了一只苍蝇精疲力尽，但他们都知道，越是细致入微的统计则越可使上级相信他们的战果不虚。这样，他们呈报的数字就可以精细至个位数。比如135896只老鼠、846294只苍蝇。诸如此类的数字不断地公布，与此同时，一个笑话也在统计人员当中广为流传：

“就算让我统计出苍蝇的公母，我也可以做到——在镜子前打死的一定是母的，在酒杯里打死的一定是公的。”

河南省的省委书记吴芝圃看来绝对信任属下的统计游戏。他向毛泽东保证，河南将在一年中消灭全境的“四害”。毛泽东将信将疑，他禁止公布这个“保证”，但又鼓励吴说，可以实验，如能成功，他将发动各省再来一个大运动。后来的事实证明吴芝圃所谓“灭四害”的计划全部都是吹牛。不过，“除四害”虽然半途夭折，但几个月后，人民公社却真的从这里兴起，开全国风气之先。

事情乃由“并大社”发动。所谓“大社”是将若干较小的合作社农民、土地以及生产工具合并起来统一调动。在制度上则是以更大的行政组织统制小的组织，所以毛泽东形象地将其称为“联邦政府”。1958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并社”指示的时候，农村中每一合作社的规模平均容纳164户。此后两个月，并社的行动看来相当顺利，到春天结束的时候，辽宁、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北京已相继完成。新社的规模已与日后的人民公社相类，只是由于各地官员的倾向不一而有很大区别。河南乃是最激进的地区，故“大社”的规模最大，约有4000农户；辽宁为2000户；北京最小，但也能达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到1600户。

合作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并在一起，显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党的蓝图可不仅仅是将组织的规模扩大，而是建立新的制度。公社将既有支配生产的能力，又具有行政的权力，还是社会性的机构和慈善事业，甚至可以成为道德的王国，所以它在性质上已经是“共产主义的雏形”。毛泽东描述这个“雏形”为“乡社合一”，“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这多少表明毛泽东在1958年的春天里对于他的未来还只有一种模糊的意识。他甚至还没有想到可以使用“公社”这个名称。

“公社”这两个字诞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车上。按照刘少奇的回忆，“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他说道，“我们四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刘少奇对公社的热情看来一点也不亚于毛泽东，以至于火车一到郑州车站，他便要吴芝圃回去实验。据后来薄一波的考证，这一次火车上的海阔天空，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设想用“公社”来取代合作社，时为1958年4月底。当时这一列火车恰恰是开往广州去与毛泽东会合，可以想象这几个人将把这个激动人心的设想向毛泽东转达。对于毛泽东来说，由四位党的领导人共同“吹”出这个词汇的过程，也许比这个创造本身更有意义。这证明政治局里的同事们现在已经全部站在他的一边，全力推动这幅理想的图画成为现实。

两周以后，毛泽东的公社蓝图完成了最后一笔：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sup>①</sup>

由合作社而为公社，其主要的着眼点，可以说是在试图营造未来社会的基本单位，如同水之分子和人之细胞。到了这一年夏季，此种认识在党的领

---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31页。

领导人中间已大致形成。这可以由当时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说来证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这时发现，恩格斯已经把未来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每一句话都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可以想象这一发现的价值。陆定一把它推荐给毛泽东，后者又向政治局里的全体同志一再推荐。这一来，大家都相信，“公社”不仅仅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觉，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导师的结论。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写道，要把合作社变成一个“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文章发表当日，即中国共产党三十七周年诞辰，他又到北京大学去发表演说。他向学生们解释毛泽东的话，说是要把工农商学兵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几天以后，国务院里负责农村事务的副总理谭震林，赴河南去找吴芝圃，看看他的实验是否取得了一些成绩。结果他在遂平县看到了一个名叫“卫星”的合作社，就兴高采烈地告诉农民，他们办的正是“共产主义公社”。当然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农民看不出叫党的官员们如痴如狂的“公社”究竟好在哪里，于是，谭震林便向他们作了一番描述：

第一，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都是按需供给。

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

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空调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

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

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这样一幅图画真是让农民着迷，其中诸如燕窝猴头呢绒空调，又如电话电视航班无线电，在他们是闻所未闻，难以想象。这时候，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编出一句好读又好记的诗来，让不通文字的农民只听一遍就会永世不忘：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共产主义是天堂，  
人民公社是桥梁。

农民被说得如醉如痴，夏季的丰收似乎也在证明，这一切都不是异想天开。但是毛泽东还要亲赴乡间，去体会农民的实际情形。

出行的日子选择在8月4日，时机恰到好处。乡下收获的季节，总是洋溢着欢声笑语。毛泽东这一路全被乐观的气氛包围着。他到了河北省徐水县，那里248个合作社已宣布合并成为一个大公社。两天后他到了河南省七里营，这里已经先他一步挂上了“人民公社”的崭新招牌，他就点着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河南省立刻热闹起来。又三天后，他到了山东省历城县，看到北园乡正在办农场，说了一句“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北园就把农场的牌子摘下来，换成人民公社。然后毛泽东离开乡下，成竹在胸地来到北戴河海滨。

后来的历史学家，大都倾向于认为，是1958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将“大跃进”驱向高潮，这不无事实上的根据。会议开始于8月17日，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均由这个会议发动。这年夏季，国内的问题特别庞杂又特别急迫，都压在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身上。三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看来已有充分把握。十年决于三年，三年决于一年，一年决于春季。然而现在已是盛夏，苏联人正在那里讪笑：“大跃进”的要旨在于发动群众，可是没有成千上万忠实于党的知识分子，则将如何？中国人要有核武器，这看来又是一笔巨额投资；粮食的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工业的速度却不令人满意；土地过于贫瘠，不加以深翻和改良实在不足以完成增产计划；仓库里面丢弃的80万架双轮双铧犁，已经损害机械化的名誉，进一步鼓舞人民的士气实属迫切需要；还有计划问题、领导原则问题、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有商业问题、教育问题、文化问题、消灭“四害”问题，有高积累问题、大集体问题，有农场问题、工厂问题、农具研究所问题，有实验田问题、良种问题、肥料问题、鼓励种植薯类的问题……中国人在这个夏天里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做，以致聚集在北戴河的这些人在两个星期内通过了40项决议。但眼前最急迫的所在，是完成钢铁指标和建立人民公社。应该有两个崭新的、严肃的、富于鼓舞性的文件向全国提出。8月29日，这两个文件就诞生了。



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另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在完成了一系列部署之后，党中央终于信心十足地宣布：

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当然，在当时这些人们的眼里，经济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是一回事。所以虽然事情堆积如山，千头万绪，政治局还是没有忘记通过一个《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号召农民以精神的力量去克服技术上的难题。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

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这一番论述清楚地阐释了将要席卷我国5亿农民的这场运动的特征。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这么多的幻想；也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以为精神的力量真的可以取代物质以及技术的力量。这一代人在他们的1958年里，几乎没有一个不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用《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当中的话来说，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另外一个在乡下广为流传的话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但是，最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的事情，还要算全民炼钢。钢产量的计划指标每个月都在提高，看来就是一个“就怕想不到”的形象描绘。这一年2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举手通过的计划书中，还只有624.8万吨，按照这样的增长，也就可以实现激动人心的“十五年超过英国”了。到4月14日，就成为711万吨，这样，“可以十年赶上英国”。5月最后一周，升为800万—850万吨，于是，赶上英国“只要七年”，15年以后就是赶超美国的问题了。这真是惊心动魄的变化。可是这个数字仅仅保持了两个星期，6月中旬，变成850万—900万吨。这样，赶上英国就“有可能不用三年”。这个“不用三年”的豪迈至多只存在了三天，到6月18日，成为1000万吨。又过了一天，毛泽东说，“去年五百三，今年为什么不能翻一番？”这样，就变成了1070万吨，“两年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委员会了解到一些真实的情况。这一年已经过去了六个月，只生产了310万吨钢。接着7月也过去了，8月又过去两个星期，令人吃惊的是仅仅增加了70万吨。毛泽东开始担心。按照薄一波的回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但是，他仍然要求“一吨也不能少”。换句话说，要在余下的四个月里再炼出700多万吨钢。钢铁工厂的厂长们纷纷来到毛泽东面前，慷慨激昂地保证完成任务，政治局里也没有人提出异议，都在跃跃欲试。不过，大家很快发现，他们手中那些炼钢高炉，就是日夜不停地往外流钢水，也流不出来那么多。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挽回危局的办法只有一个。毛泽东说：“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炼钢铁。”<sup>①</sup>

几个月前聚集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现在开始拥上山头。8月底已经有几百万人，9月份5000万人，到了12月，增至9000多万人。漫山遍野人声鼎沸，狂呼乱叫。到处都是鼓风炉。这些炉子多由砖头和石灰石所筑，奇形怪状。开始的时候有3万多座，一个月后是60多万座，又过了一个月就有了几百万座。这些数字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惊奇，因为根据《北京周报》记者的描述，这样的炉子由兴建到投产，用一天时间即已足够。后来又有消息说，湖北省一个名叫陈祖江的农民，创造了从建设到出铁的最小消耗，只要十个小时、八块青砖、九十块土坯和两块耐火砖。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人的勇气、热情和牺牲精神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新华社的报道说，宋庆龄副委员长虽然喜欢花草，但是也让花匠将院子里的树木花草砍去，砌起一座冶铁炉。只可惜人们不仅没有炼钢的技术，就连足够的原料和燃料也没有。在乡下，农民是从报纸上学习怎样建造高炉和怎样炼钢。赶着牛车运送矿石，用筐抬来煤炭，用肩膀把它们扛上山去。不久，就连矿石和煤炭也难以供足。于是组成了“伐木队”和“收铁队”。“收铁队”走村串寨，号召百姓献出家中铁器。铁门铁锅铁杵铁壶铁勺铁皮铁自来水笔，纷纷扔进炉中。“伐木队”专司砍树，用做燃料，很快就把靠近村庄的树林全部砍光。安徽省有个叫巢湖的地区，这里的树林真是饱经风雨。40年代日本人打过来，国民党的军队藏在树林里躲避日本人的飞机；后来是刘伯承邓小平的大军藏在树林里躲避国民党的飞机。可是这些树林挡得住飞机大炮，却挡不住1958年的“伐木队”，所有的树木都被砍光了。不过，那时候，没有人为这些树感到可惜，党就是要他们献出生命，他们也觉得应该。人们夜以继日，不计酬劳，有年轻人，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04页。

也有老弱妇孺。用竭尽全力来描述这些场面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官员们的口号是“需要干多久，就干多久”。突击队员们真的可以四五天不睡觉。后来《人民日报》觉得有必要发表一篇社论说明休息的必要性。社论要求农民们每日睡眠6个小时，孕妇还可以睡得更多一些，即使突击队员，连续工作也不得超过48个小时。这种关心在今天的年轻人听来多少都会有“残酷”的感觉，但是当时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响应党的号召的。

秋天转瞬即逝。农家都说这是一个丰收的年成，只等开镰。可是山上炼钢正是紧急关头，乡下十人之中即有四人在铁炉子边上，粮食无人收割，就开始变质霉烂。省委书记们纷纷承认，由于没有好好地收割，“浪费了一些粮食”。不过，这是后话，当日人们满眼都是钢铁，哪里还有粮食。有人把一句古老的谚语——“人是铁，饭是钢”稍加修改，就变成了“人是铁，钢是饭”。

令人激动的回报终于到来。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大字标题宣布，《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在经过了那些感天动地的日夜之后，所有的人听到这消息时都会眼眶发热。但是，至少有一个英国旅游者会提出疑问。他在云南省一个村庄里面亲眼看到了炼钢的场面。“在我看来，”他说，“从炉底掏出的成品看上去与炉顶倒进去的原料完全一个样子，没有变化”。此说或者有些夸张，但并非全无事实根据。兴高采烈的中国人在几个月后发现，1958年所生产的1108万吨钢中间，合格的只有800万吨，其余的虽然不是像那位刻薄的英国人所说，和“原料完全一个样子”，也全都是废品。

在当年所有那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有一份计划令毛泽东既疑且喜：《范县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他禁不住在报告第一页的空白处写道：“此件很有意念，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sup>①</sup>毛泽东之所谓“诗”是一种浪漫的遐想，这批示写在1958年11月6日。第二天，也即11月7日，政治局里所有的领导人都会看到毛泽东的这几行字和范县雄心勃勃的计划。比起毛泽东刘少奇曾经去过的河北省徐水县，范县居然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时间一举提前三年。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54页。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但是政治局里所有的领导人都不会对这些表示惊奇。讨论何时才是共产主义的开始之日，多少年来就是共产党政治家们的职业兴趣。38年以前，也就是1920年的时候，列宁说，大约是在1930—1940年的这段时间里，还说他们这一代中十几岁的人们，将要亲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过了18年，也即1938年，他的继任者斯大林保证，整个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日子将是在1943年以前。到了1957年，赫鲁晓夫又说，从1959年算起，到达共产主义还要12年。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苏联前辈可能有着无数的区别，但在计算到达共产主义的时间表时，其紧迫的心情如出一辙。

不过，在农民中间，1958年造成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叫农民刻骨铭心的不是时间表，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一边在山上贡献自己的体力，一边又在家里贡献出自己的财产。

人民公社制度在8月份确立之后，就需要有一种全新的理论来引导5亿农民同心协力。《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解释说，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即将原有的70万个小合作社合并；所谓“公”则是更加集体化。男人可以无牵无挂地任凭调动，女人全部参加劳动，孩子送进托儿所，吃饭在公共食堂里面，衣服由缝纫组来洗补晾晒。“这样，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的成片果林、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等，许多地方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已转化为公有。”<sup>①</sup> 舆论一经鼓噪，加上思想方面的灌输和行政司法方面的强制，就成为党的“人民公社化”的施政核心。

匆匆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到这一年的秋季已经有26576个。生活在乡下的所有官员都知道，他们未来的天堂里不会有足够的财富供人分享，钱只能来自老百姓。可以想象，这些人几乎都会成为“共产风”的煽动者。每一个公社都只是合作社的简单合并，其规模大致相当于28个合作社。平均管理着4797户农民。按照公社的章程，生产收支的核算以及盈亏由公社执掌。所以“共产”的过程也就可以简化为一个会议上的一个决定。公社的成立之日，即等于在法律上宣布，社内之全部合作社和农家的财产转归公社所有。当然“转归”本身还要经过一些技术上的操作。最为常见的办法，是以公社的名义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58年9月3日。

发出建立若干生产基地的指示。征集所属合作社和农家的财产人力，以为公社基地的物质来源。比如河南嵯峨山公社就是用这种办法，制定了建设“牛场”、“万猪场”和“万鸡山”的计划。公社下属各村庄，均须抽出若干人员，携带树木砖瓦之类建筑材料，集合于指定地点，建起305间畜舍，然后又由农民家中牵去192头牛、89头猪和2700多只鸡。诸如此类的建设过程，被当时的报纸称为“白手起家”而广为宣传，公社两手空空的领导者们，也的确是在一夜之间即可拥有财产万贯。农家中之房屋桌椅、刀碗锅筷、鸡鸭猪狗，均为“共产”的对象。按照薄一波的回忆，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薄一波是在30多年以后才敢这样说的，而农民们早就在痛切地抱怨自己的财产被充公。当然这些怨言只是在私下里才能听到。一个农民在给他海外亲戚的信中写道：“所有的房屋和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个人则告诉他的远方亲人，他正在想办法变卖家中财产以躲避公社的征用：“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公用，我已经同五叔爷、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们决定尽快地把缝纫机卖掉，但缝纫机的价格太便宜了，因为卖缝纫机的人太多了。”个人存在银行里的钱财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资”，据一个乡下人的解释：“把钱交给政府就是‘投资’的含义。”甚至连亲友寄来的钱也常常不能如数拿到，一个农民告诉他的海外亲戚：“寄来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给了我们自己，其余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这种情况引起海外华侨的愤怒，以至于政府高级领导人也不能不表示关注。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于是保证，所有银行存款和华侨的汇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谁也没有说过地里长着的粮食不可侵犯。到了秋冬时节，庄稼收回晾干，这是占有农家财产的又一次机会。于是官员们开始征购粮食。老百姓万般无奈之下，或者隐瞒产量，或者坚持不肯出卖，以保卫自己的劳动所得。安徽省城北公社古城大队，以为官员所谓“购粮”就真的是“购”，于是卖出12万公斤，竟然分文未能得到，全部粮款均为公社占有。山西省省委书记陶鲁笱后来惊讶地发现，他领导的这个省，农民在这个秋天里出卖产品所得，竟被公社官员拿走一半，用以“大办钢铁”和“大办水利”。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进一步调查的结果证明，那个冬天全国从老百姓手上收去的钱多至30亿元。“如何还清这笔账是一件大事。”他向毛泽东报告说。事实上，不仅没有还，而且无偿剥夺农民的行动还在继续。到1961年，26576个人民公社欠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下农民的这笔账，就已经不是30亿，而是250亿，平均欠每一个农户250元。

这种充满原始味道的“大同之治”愈演愈烈，促成了乡下农民无数奇妙的幻想。比如有一个跑马乡公社，地属湖北省当阳县。有一天公社党委书记宣布，11月7日，将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和共产主义开始之时。这样算起来，所余时间就不是三年而是三个月。这位书记甚至来不及为他的共产主义作一首诗，只是向他的农民解释说：“共产”就是“不分你我”，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掉；这个队种的菜，那个队可以挖出抬走；连小孩子也不分彼此，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我的女儿你也可以牵走。他这一番话讲得老百姓如痴如狂。会议结束，大家直奔商店，拿完了商店里的东西便直奔当地享有富名的农家。失去控制的乡民接着将眼睛转到别人的老婆身上。不过，党委书记对于“共妻”这一条还不敢即刻乱来。他宣布，老婆还是自己的，但此事关系重大，任何人不能擅自做主，只能暂时保留，以待上级的批准。

老婆仍然“私有”，但是却必须全部离开锅台炕沿，走出家门。此项方针的主旨是解放妇女，以使更多的人到耕地上去劳作。孩子真的进了托儿所，老人也有敬老院可以容身。所有的村子里都有公共食堂。所有的报纸都说这是让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的好办法。《人民日报》还说，河南省办了32万个公共食堂，就解放了600万个妇女。

公社食堂里面正在实行免费吃饭的制度。还有的公社实行了“各取所需”，吃、穿、住、教、医、葬、理发、看戏、取暖、结婚之类，统统免费。当时的舆论一致认定，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党中央在那一年10月发布指示，要农村尽其可能举办公共食堂。这一指示鼓舞了农民不劳而食的心理。在中国传统戒律之中，“食”乃是“天”的象征。如果万民对于吃饭一事能够无忧无虑，在古在今都是为政者值得自豪的业绩。所以，官员和百姓在这里获得了暂时的一致。在中央指示的当月，公共食堂即增至265万个；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已有391万个。每天有至少4亿人在同一时间走进食堂里面去。有人却一边吃着不要钱的饭，一边念着一首顺口溜：

休息钟声响，  
我们进食堂。  
吃了一口饭，  
沙子满牙床。  
品尝蔬菜味，

青草菜里藏。  
放下一双筷，  
又去春耕忙。

“吃饭不要钱”的建议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时为1958年8月。看来这唤醒了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对于率领农民征战南北的辉煌时代的回忆。毛泽东在看到安徽省一个公社的食堂之后，兴高采烈地表示，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既然一个食堂可以这样，那么别的食堂也应当可以这样。差不多同时，刘少奇在江苏省也表示他支持供给制度的重新出现。他幻想着“人们不管报酬多少，不管有没有定额，他们总是做得更多更好”的时代已经到来。报纸的社论以豪迈之情宣布说“公共食堂前途无量”<sup>①</sup>。财政部长李先念向以谨慎著称，到这个时候也认为实行供给制度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件”。

今天稍有常识的人一定会看出这种说法的荒唐可笑。但是在当时，人们却是深信不疑的，这自然是起因于对形势的乐观估计。

不消多说，对于生产“乐观的估计”是人民公社诞生伊始的一大特征。公社的官员们不遗余力地将合作社和农民自己的财物收归己用，但这毕竟不同于强盗的掠夺财物。强盗的掠夺一经得手，即可呼啸而去，人民公社却要将集中起来的财物用来生产更多的财物。当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天堂”里面一个最美好的梦，即使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人也会振振有词地念叨“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这一句话。但是，如若物产没有出人意料地增长，以满足人们膨胀的欲望，又焉能让梦想成真？

在1958年盛夏到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记录都在证明，这种乐观的估计已经从共产主义时间表的设定，转移为农作物的产量。接着就发生了我国历史上一次极为离奇的骗局。

虚假的局面是以现代科学的统计方式来造就的。最初发生在1958年6月，几乎全部围绕着土地上的产出展开。遂平、襄阳、魏县、谷城、临漳、光化、商丘、辉县、安国、徐水、西平、汕头、贵溪、闽侯、麻城、孝感、繁昌、郟县、寿张，诸如此类的小县，都在夸耀自己的高产。高产已经成为

<sup>①</sup> 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9月22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整个农村的特色，粮食亩产纪录每一天都在创新。6月8日这一天，最高纪录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的手中，为1075公斤。三天以后为河北省魏县打破，为1197公斤。此后，纪录又在各个地方的竞争中一路上扬，16日为1332公斤；18日，2206公斤；23日，2344.5公斤；这一个月的一天，为2551.5公斤。到了7月，纪录又连续四次被刷新，亩产高达4400公斤。8月的纪录，由7500公斤增至21537.5公斤。9月1日，《人民日报》说，河北省徐水县的一亩小麦可以收获6万公斤，另外有一亩山药可以收获60万公斤。事情已经离奇到了这个地步，然而却远未登峰造极。最高纪录在两周以后为四川省郫县打破，18日，他们说自己的水稻亩产为412262.5公斤。

这时距人民公社的成立还不过一个月，但是没有人会否认这是党的人民公社方针的成就。几乎所有的人，官员、记者、学者、诗人、政治家，甚至最有名望的科学家，都在推波助澜。国务院某位副总理在报纸上证明说，自己在广东省番禺县，亲眼看到了亩产50万公斤番薯、30万公斤甘蔗、2.5万公斤水稻的事实。诗人们也欣喜若狂，写出无数颂歌，把乡下的土墙贴得花花绿绿，其中一首这样写道：“一棵玉米冲九霄，彩云拴住玉米腰，吓得月亮直弯腰。”另一首是：“稻粒赶黄豆，黄豆赛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比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

不过，看来还是有人在私下里流露出一丝怀疑。他们说，植物不可能无限制地生长。于是广东省省委书记就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驳“粮食增长有限论”。毛泽东开始信以为真，他听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一面之词，就连连感叹“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另一位科学家这时候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虽然没有证明增长可以无限，但却证明，稻子或者麦子都具有亩产2万公斤的潜力，只要让它们把太阳辐射到土地上的光能利用30%，就可以做到。

看了下面这样一些数字，就可以对当时共产党内弥漫着的乐观气氛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粮食的年度产量计划，原来指定为1960亿公斤。夏天，政治局发表的会议公报说，粮食的产量将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而是3000亿—3500亿公斤。秋天的几个月里，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更加热烈的气氛中，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宣布全年的粮食产量将会达到4000亿公斤，甚至5000亿公斤也有可能。不过，如此离奇的数字终于使毛泽东产生疑心：也许粮食的产量中真的包含着虚假的部分？他召开一系列会议指责干部中间的撒谎行为，主张将这些数字经过折扣之后再予公布。但是尽管如此，中央委员会全



体会议仍然相信粮食的产量将是 3750 亿公斤，把这作为本年度的最后统计予以公布，以证明人民公社的一鸣惊人。但是，84 位中央委员、82 位候补中央委员和 30 个省市区的书记们，谁也不会想到，实际的产量只及这个数字的 52%。更不会想到，这里面埋藏着日后农村的可怕的饥荒。

以一倍甚至十倍、百倍的幅度来夸耀农业的增产，表明了那个时候的农业方针乃是一种愚昧与虚伪的混合物。但如果认为党的领袖们只是热衷于虚幻的神话，而对自然界的客观属性一无所知，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况。毛泽东本人出身于农民，对于作物的生长过程并不生疏。他在巡视乡村的时候，就常常说起技术在种田当中的重要性，例如土地应当深翻，种子应当密植，这些话后来被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归纳为“八字宪法”，包括土壤、肥料、水利、种子、密植、管理等等方面。然而终其一生，毛泽东始终认为精神力量之重要远远高于技术的因素。但事实上，任何科学技术一旦陷入愚昧和想入非非，也就如同闹剧。比如，在“深翻土地”的号召之下，基层的官员们就会动员社员将八尺以至一丈二尺以下的土壤挖至地面。又比如“合理密植”的结果，是让土地的每一平方厘米都布满种子，竟在每一亩土地上播种数百公斤，日后种芽发起，重重叠叠，先将整块土地顶起，接着就全部死亡。肥料的重要性更激起了人们许多奇特的想象。通常的做法，是把人畜的粪便加以蒸煮，垒成无数圆锥体或环形、梯形，再以薄土密封于表面，上栽作物后又以纤细竹管插入，顺管孔浇水，催动肥料发酵，以释放种种气体，养育表层土壤和作物。这最为常见的施肥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增产欲望，于是又附之以种种非常措施。比如为每棵庄稼注射若干毫升的营养液体，这种液体可能是葡萄糖、白酒、生长素或者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来的东西。在所有幻想和发明中，以徐水县大田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高玉生的发明最为耸人听闻，他将带血的狗肉煮烂，以肉汤浇灌作物。据说此种肉汤可使玉米每株结穗十棵，使谷子穗长五寸。<sup>①</sup> 所以一时风行乡间，狗迹几绝。但是，为人民公社的种种奇迹作出牺牲的绝非仅是狗，还有其他生物。陕西省蒲城县的一个发明是改变鸡的习性，让公鸡履行母鸡的职责去孵化小鸡，以使母鸡腾出更多的时间来下蛋。在这个实验中公鸡被割去生殖器官，并且被迫像人一样地喝下两杯酒，然后就醉意盎然地去孵化同伴的子女。西北农学院畜牧系的六位学生用大致类似的办法完成了另外一项创造。他们对一头猪施以手术，将其耳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58 年 9 月 1 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朵、尾巴、甲状腺和部分胸腺割去。猪的照片后来挂在北京的农业展览馆中，其秃头秃尾之状惨不忍睹。但是照片说明写道，这种“四割法”使这头猪在一天之内增膘9.5公斤。所以它是学生们向国庆九周年敬献的礼物。这些事实证明，科学与愚昧断然没有可能在同一个殿堂里面共生共息，不是科学改造愚昧，就是愚昧把科学也变成愚昧，二者必居其一。

以我们国家传统中源远流长的积弊衡之，种种愚昧的存在本身并非意外。问题是这些浮躁和残忍的一意孤行，何以会伴随着人民公社的诞生成为无可抗拒的社会力量？史学家们在谈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大都会说到由战争中崛起的国家大政主持者，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这多少有一些道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富于天才的领导者，并不一定就能成为经济的天才。不过，个人的贤愚得失最终能够左右大局，乃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既成制度中缺少遏制个人行为的力量。

无论当事者还是后来者，总是认为1958年的中国非由毛泽东个人的行为铸就，而是一种集体过失的结果。错误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邓小平后来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sup>①</sup>薄一波还令人信服地证明，毛泽东作为个人，在当时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头，并且最迅速地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纠正。的确，毛泽东的洞察力尽人皆知，其感觉的敏锐也总是超越他的同事。那一年冬季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心里升出一股强烈的不祥之兆。他可能有些后悔，至少觉得脑袋昏昏沉沉，以致开始失眠。这种感觉驱使他在10月13日再度出京，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一路奔波而去。直到这年12月的最后一天才回到中南海。他在这一路的表现之低沉，以及对于形势的冷漠，恰如他自己曾经尖锐批评过的保守的右派。他开始描述乡下的“天下大乱”，说共产党正在“无偿地占有劳动人民的成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还从来没有这么的紧张”，农民正在联合起来坚决抵抗党的方针。当他的同事用着一种惊讶的眼光打量他的时候，他就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就是要“当一点右派”。他给那些省委书记如火如荼的“跃进”大泼冷水，说他们是“务虚名而受实祸”，还刻薄地嘲笑他们的经济建设只不过是小孩子的冒失行为。他鼓动下级把上级的命令束之高阁，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因为这些指标不过“吹牛而已”。甚

<sup>①</sup>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至他对一向信任的吴芝圃也开始反感起来，此人这一回没有能够洞悉局面的变化，仍然喋喋不休地大言共产主义就要实现。“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打断了他的狂妄，“你说十年过渡，我就不信。”等到火车开进武汉，他就对湖北省省委书记王任重说，你们当“左派”，我右倾。<sup>①</sup>

那些精明的下级看到他这副大杀大砍的神情，反而觉得如释重负。他们似乎也是从这时起才发现，他们面临的原来竟是一出闹剧。刘少奇慨叹道，“我们受骗了”。省委书记们也纷纷把毛泽东的新指示加以贯彻，他们的报告说，党的基层干部中“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主席看透了农村的情况，看透了农民的心”。薄一波在30多年以后谈到这件事情时说：“他头脑清醒得比我们早。他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决策，工作效率之高，行动之快，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sup>②</sup>

然则这种出自善意的评论只有一部分符合事实。党的方针本来由毛泽东全力推动，其错误的性质虽然在1958年夏季之后才表现出来，并且在日后还将出现惊心动魄的局面，但其实早在1955年就已露端倪。邓子恢是第一个对这种方针表示怀疑的高级领导人，他甚至在饱受批判和侮辱并且被剥夺了领导农业的权力之后，仍然不肯改变初衷。直到1958年的2月，他还坚持说，农业集体的规模过大将不利于生产的展开。还有周恩来和他的四位副总理发动的反对“冒进”，以及陈云对过激的经济指标屡屡提出疑问。应当说这些人的头脑都曾比毛泽东更加清醒。但是同样的认识不是成为“右派言论”，就是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有毛泽东来说的时候才能叫做“站得高”和“看得远”。如果说对于大政方针的掌握需要某种驾驭全局的智慧，那么有些事情即使用简单的常识便可以衡量。比如当日徐水县在毛泽东视察之后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区，一时间大红大紫，引得40多个国家的来访者、国内3000多个单位以及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前来参观。在如此众多的参观者当中，若说没有人发现亩产6万公斤小麦、2500公斤皮棉、60万公斤山药之类的产量乃是一种骗局，实在难以想象。这个假设后来得到薄一波的证实。他在当年也是到徐水的人之一。当他站在一片成熟的棉田当中的时候，很容易地看到，棉桃之上挂满棉花，满眼一片洁白，但是他的同伴拉拉他的衣服，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24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823页。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告诉他那些挂在棉桃上面的棉花全是假的。根据安子文的回忆，当时刘少奇曾步毛泽东的后尘来到徐水，结果也发现这里的所谓高产全都是胡扯。可是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不肯出来揭穿这一明显的骗局。刘少奇把他对于农业产量的常识埋在心里至少三月之久，直到这年秋季毛泽东对粮食产量发生怀疑，才敢于说出。薄一波则是在30多年以后才公开说，他在当时就“看出假来”。

为什么这些最有头脑的人在常识性问题面前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毛泽东可以凌驾于政治局之上，他确实具有充分的政治资源担负这个角色。在1958年冬季，他能够察觉危机的来临并且加以扭转，与其说他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慧，不如说他具有超越常人的行使智慧的权力。当然这一切并没有法律方面的认定，而只是一种传统和既成事实。当毛泽东在那些时候经常以一种“党内通信”的方式来制定或者改变党的方针时，他就已经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通信总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写给他的全体下级或者部分下级，信中的意见常常很快就会作为党的方针加以贯彻。他还可以在巡视京城以外任何一个城市的时候，把他的同事统统召到身边议政。那几年党的重要会议也就随着他的足迹，辗转于郑州、武汉、成都、南宁、广州等地，以致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会议都被冠以当地名称载进史册。当政治局默许他对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批判，以及这些人纷纷把自己的正确指斥为错误的时候，这种制度便已经在无形之中构建起来。所以任何不同意见的表达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深深地威胁到表达者自己的安全。在1958年以前已经有邓子恢，在1959年又有彭德怀元帅。前者在农业方针上与毛泽东不相协调，结果是被免除了主管农业的职务。后者更加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结果是遭到更加严重的迫害。彭德怀被认定是由来已久的反党分子，并且与苏联内外勾结，从此被罢免了所有职务，经历了100多次批斗会，数百次被强迫低头和下跪，数千次遭受拳脚、棍棒、污言秽语，甚至要忍受垃圾和唾沫的袭击。他在受尽屈辱之后，惨死于医院。其情形之惨烈，直到多少年以后人们谈起来，还会胆战心惊。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制度中表达自己的意见，首先要考虑周到的并不是意见本身的是非正误，而是它是否有效以及是否会累及个人的安危进退。

大错已经铸成，挽狂澜于既倒的行动又是如此不能由衷，因之我们国家的历史便翻开了最为悲壮的一章。

食品短缺从1958年12月开始，政治局起初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们虽然对于丰收的统计数字怀有疑虑，但仍然以为，只要把这些数字降低10%，就足以反映实情。但是在1959年的春天，他们接到下级急报，说现在京城里面的居民，每人每日只能供应一两蔬菜。这个消息令他们震惊，看来问题的严重远在估计之上。可惜这一觉悟为时已晚，风雨一旦袭来，便成瓢泼之势。北京以外的地区，纷纷呈递粮食告急的报告，缺粮呼声迅速蔓延，甚至包括河南、山东、安徽、湖南、江苏、河北这些最为著名的粮食产区，粮食的入不敷出也已造成万分危急的情势。到4月初，政府的官员们觉得再也无法隐瞒真情，于是向毛泽东报告，原来粮食的实际产量远远不是公报的数字，也不是低10%，而是低90%。乡下已有2517万人没有饭吃。饥荒已然席卷15省区。接着又有报告说，几个月前党中央公开的许诺——“1959年每人布票二十四尺”，将根本无法兑现，因为那些白花花的高产棉田，全部为道具的演示，实际收获的棉花只及公布数字的56%。据毛泽东身边的人说，66岁的毛泽东在听到了这一切之后，由最初的震惊而终至伤心不已。他向省委书记们承认，我们搞经济“还是小孩子”，我们还不懂得向地球作战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的伤心毫无疑问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反省，而这种反省在他的一生中极为罕见。饥饿正在迅速扩展，农民在饥饿之中纷纷死去的消息和政府官员的告急电报，从豫、皖、鄂、川、冀、鲁、陕、甘、宁、湘、赣、滇、晋诸省区不断地传到中南海里。城市里的粮食再也无法养活这么些人口，这一下普通百姓也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局面。他们正在被说服回到乡下去。“田野里长满了可以吃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这样对他们说。那时候的人真是好说话，政府一个号召，几个月中就有2000万城里人卷起铺盖回归故里，火车上面挤得水泄不通，满眼看去全是举家搬迁的人们。男人把茫然失措的目光投向窗外，孩子凄厉的哭叫令人打颤，母亲却坐在那里发呆，两只乳房像空布袋似地垂在胸前。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乡下那一片广阔的田野。可是他们回到乡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想错了。城里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浮肿，乡下的饥饿已经让人的肌肤失去了浮肿的能力。他们吃完了粮食就吃稻糠麦麸，然后是野菜，然后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完了以后，就一批一批地倒下来，其中很多人再也没有能站起来。

然而更加悲惨的事情还在后头。1959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开始下降，1960年就只剩下1435亿公斤。所有农产品的收获都在大幅度地下降，甚至连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1951年还不如。但是1亿城里人需要粮食的心情却更加迫切。他们拿走了至少1/3的产量，把剩下不足2/3的粮食留给6亿乡下人。可以想象得到，留给农民的是什么。这一年以及未来的一年中，乡下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了，有人说酒糟可以果腹，所有的酒糟就被人抢光了；有人说榆树叶无毒，所有的榆树就都变得光秃秃的。后来人们开始吃土。有些地方，发狂的人们开始肢解吞吃死去的同伴。在安徽省凤阳县，那一年人吃人的事件共有63起。赵夕珍和陈章英夫妇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勒死煮食，那孩子刚好8岁。另一个妇女吃的是已经死去的孩子，工作队将这些人捆送公安局，说他们破坏社会主义。

但是，任何法律和专制手段都无法制止饥饿。农村里面死于饥荒的人越来越多，惨不忍睹。人们私下里的估计是在2000万—3000万人之间。中国科学院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认为，1959—1961年的三年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约一千五百万人”<sup>①</sup>。可是在一篇署名金辉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的结论，竟是“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他的报告于1993年发表。他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凄惨的一幕悲剧”。这位研究者声称，他的结论全部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资料。他的研究至为精细，但是他有可能忽视了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一问题后来由另外一位研究者林毅夫提出。他发表的论文说，在那三年里，农业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3000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大约3300万人。<sup>②</sup>但是，所有的研究者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已经极度衰弱。由于营养不良，疾病在乡下蔓延并通过遗传祸延后代。在一个叫做“武店”的公社，官员们居然有心将这一情况加以统计，结果发现，1034人浮肿、929人子宫下垂、3047人闭经、1016人干瘦，是为“四病”。官员们出于维护人民公社的名誉，决定对“四病”加以治疗，于是找来一个医生，询问何药可治。医生名叫王善身，大约是生具“独善其身”之志，不肯为公社矫饰。他说，只少一味药：粮食。结果官员当场将王逮捕，以攻击人民公社之罪交由群众大会批判。

没有人有余力对全国的情况及时作出考证。统计局的官员也不可能将实情详加禀报。不过毛泽东还是强烈地感觉到弥漫在全中国的饥饿。就连他自己也已经九个月没有吃肉，营养不良已经使双脚浮肿起来，甚至不能穿进鞋

<sup>①</sup>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sup>②</sup> Justin Yifu 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 - 1961*.

子。抚今追昔，毛泽东只好承认失误。1961年9月29日那一天，他出人意料地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政治局的常委，信中说自己和整个中央委员会“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

毛泽东这时所说“六年糊涂”，是指他的人民公社的政策，也即1956年农村高级社的成立至他眼前的1961年，包括曾经势如破竹的人民公社的整个历程；把土地产量夸大几倍甚至几百倍的“浮夸风”；财产的所有制由小集体向大集体、再向全民转移的“强迫命令风”；供给制度和几百人在一个公共食堂里一起吃饭的“共产风”；还有“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周恩来在他起草的一封紧急指示信中，将这五种“糊涂”称为“五风”。事实上，至少在十个月前，毛泽东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糊涂”。如果不是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也不可能写出那样一个“紧急指示”来发给全国。到了1961年11月15日，毛泽东终于说：“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13天后，他又用党中央的名义发出公开批评自己的指示，他写道：“毛泽东同志……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毛泽东把扭转局面的最紧急的任务留给了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自己从激烈的前线退至后方。他离开北京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考虑更加长远的问题。他选的地点是中国最南部的省份广东。在那里，他搞了另一个文件，叫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试图在经历了一番挫折之后重新规划人民公社的道路。由于它的主要内容分为60条。所以，后来全中国的人都叫它“六十条”。文字的修改过程，可以让我们感觉到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万般留恋与欲罢不能之情，这种感情令他在最初的文件里仍然保留了“供给制”、“大食堂”，以及加快向大队所有制过渡之类的内容。这是他自己非常珍贵的创造。不过，后来当他更进一步地意识到自己的“糊涂”之后，便下决心忍痛割爱。6月，他删去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他又承认，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这是一个严重矛盾。为了既能解决眼前的矛盾又能保持长远的道路，毛泽东决定在人民公社中建立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这就是后来大家认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在毛的时代，这是农村里一个根本的制度，毛说，“至少七年不变”。后来又把“不变”周期延长到“三十年”。他是一向喜欢用这种口吻来宣布政策的，比如他还在周恩来写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句话旁边，加了一个批语说：“至少二十年不变。”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六十条”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的成熟制度，这是人民公社理想与务实原则的奇异混合。可是饥饿的农民现在个个有气无力，不要说人民公社，就是望着维系生命的土地，也打不起精神。好大喜功且花样百出的基层干部现在不得不迁就“人要吃饭”的事实。他们将土地分给农民去耕种，讲明收获多少听由自己获得，并且为这种土地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救命田”。对于人民公社来说，这就犹如一块巨石投入死水。数年前李云河之“包产到户”的幽灵再度复活，1961年初春时节起于安徽，接着就在各个省区徘徊荡漾，不久便形成不小的声势。据说安徽全省每十户农民当中即有八户参加“包产到户”。其余如甘肃临夏，以及浙江和四川的局部，十中有七。广西龙胜、福建连城和贵州全省，十中有四。广东、湖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亦有大体同样的规模。到了1962年5月，刘少奇和邓小平都认定，全国“包产到户”者至少已占有总数的20%，也即大约2000万农户和1亿农民。

在五年以前就已经宣布为非法的“包产到户”，居然可以风风火火地畅行，舆论也恢复了对它的同情。这原因需要追溯到上一年，即1961年。这一年春天乃是乡下人饥饿的最高潮和生产的最低潮。毛泽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得知“包产到户”的卷土重来。先是有一封信告诉他安徽有一个叫徐桥的地方“包产到户”，从这里嫁出去的姑娘就全都跑了回来，唯一的原因是想要在娘家吃上一顿饱饭。几天以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面陈这种办法的好处。曾希圣说，毛泽东同意这样的搞法。但是毛身边的人回忆说，毛泽东的同意实际上至为勉强。看来是由于恢复生产的迫切需要不得不暂缓大同理想的实施。如是情状传达到前后左右，权力中心便出现了一个方针含混不清的时期。毛泽东在政治局里的同事们既然担负着拯救危局的直接责任，又不能确知毛的真实用意，所以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加以干预。地方官员们对身边发生的事情都不摸底，也全都闭起一只眼睛装糊涂。这在我们国家的官员中乃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技巧，即所谓“聪明难，糊涂更难”之古训的精义所在。因为这样既不至于延误实际的进程，又可为自己保有进退的余地。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懂得这个规则，不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一些默默无闻却又标新立异之辈做出许多不知轻重的事来。1961年初冬时节就发生了一件少为人知而又意义重大的事情。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接到一封挺奇怪的信件，内容长达一万字，每一句都在述说“包产到户”的必要以及它的好处。



作者请求他把这封信转交给毛主席，还在信的最后写道：“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我不能停止我的战斗。有人讲我这样下去很危险，一斗、二斗把自己的脑袋斗下去。我回答说，这是你们的说法，是你们的观点方法问题。我斗得对，我很站得住脚。”在马寅初看来，这简直就是“包产到户”的宣言书，可是写信人的名字他却从未听说过。他只是从信封上才知道，这个人是浙江省嵊县人，他的同乡。

此人名叫杨木水，乡下年轻的蚕桑技术员。他把他的“宣言”寄给马寅初的唯一动机，是他觉得他这位品学兼修的同乡有着上达民声的热情和威望。他可一点也不知道，这位马老先生在京城里的威望已是强弩之末。因为毛泽东正在指责他的限制人口的理论，质问说这是马克思的还是马尔萨斯的。不过，马寅初所做的事情还是远远超过了杨木水的期待。他居然专程回乡去面晤杨木水。当他把杨木水邀进自己的房间之后，县委的官员们就惊慌不安起来，他们担心这一老一少的密谈会闹出什么事情。于是不断派出政府的代表前去敲门，希望加入进去，以此来阻止这一老一少的推心置腹。这令马老先生极为震怒，他不动声色而又不容分辩地拒绝任何人的参与，直到帮助杨木水把“包产到户”的“宣言书”修改一遍才开门出来。分手之时两位刚刚结成忘年之交的朋友面面相觑，目光里面分明在询问难卜的前途。老的说：“正确的意见不要轻易放弃，真理是批不倒的。”小的动动嘴，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后来他把这句话对女友说出来了：“说不定哪一天我就会被捕判刑，坐牢流放。我们分道扬镳吧。”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一老一少的话都没有说错。

那个冬天的中国饥寒茫茫，乡下大约只剩下三样东西：“共产主义天堂”的梦想、揭不开锅的食堂和饿死路边的农民。毛泽东正在广州加紧搞他的“人民公社六十条”，身边聚集着当日一群最有学问的人，包括陈伯达，他是这一文件的捉刀者之一。可是，还有另外两个不知名的乡村小人物，也坐在自己家中埋头写作。

27岁的冯志来在1962年4月21日完成了他的文章，题为《半社会主义论》。文章劈头就问：

“什么是我们眼前的出路？包产到户！”

他直截了当地承认“这是单干”，他嘲笑那些把“单干等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人”，“难道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这样的讽刺已经足够使人恼怒，然而他还轻蔑地说：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最完备的形式，可以容纳共产主义的生产力，真是荒唐透顶。想将胚胎预先取出当婴儿抚养是不行的，即使给他穿上美丽的衣服，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在写了这些之后，他凑了160块钱，就在那个春天里搭上一列火车去了北京，把他的文章送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又送了两份给《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是党报和党刊，其中任何一家都可以直接上达毛泽东的视听。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引起政治局的注意，可是居然没有人来理睬他。

被轻蔑激怒了的小人物回到家里再接再厉。过了两个月，6月30日，他又写出一篇，叫做《怎么办？》，说是为了补充他的那篇《半社会主义论》。他的新作是一篇讨伐人民公社的檄文。他笔锋犀利地直指农村里的悲惨局面，仰天长问：“错在哪里？”人们都说是天灾造成的，可是“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左’的错误……异想天开、创造狂、虚假浮夸，都得到鼓励，在高速度的口号下，残酷地剥夺农民。‘大跃进’变成大倒退，多快好省变成少慢差费。更不幸的是不承认这些事实”。他那时还没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知道这将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他却懂得自己人微言轻，所以再一次把这些文章投递北京的时候，他自称自己乃是冯雪峰的族侄。果然如他所愿，北京的回信来了，可不是写给他的，是写给当地党的机关，要他们追查信作者的后台是不是冯雪峰。

然而《人民日报》那时接到的信可不仅仅是冯志来一个人写的。另外一个人，陈新宇，写得甚至更多。此人原在城里务商，因为向往人民公社的美好蓝图，高喊着“我爱农村”，就参加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队伍。结果他看到农民对于公社根本没有兴趣，却对“包产到户”一往情深，就一口气写了八封信，全部寄到《人民日报》。他告诉报纸编辑，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现在坚决主张‘包产到户’”。这一回编辑居然大动恻隐之心，将他八封信中的六封刊登在一个叫做《读者来信》的不公开的刊物上，并且加了一个标题：《重谈“包产到户”》。陈新宇说他“确信‘包产到户’是终将出现的必然的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像冯志来一样，他闭门拒友，坚持独身，打算一人做事一人当。

那时候，乡下认为“包产到户”是个好东西的人多得出奇，可是能够把它讲得这样头头是道并且公之于众的，只有这三个人。显而易见，“包产到户”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行动，而且让这三个人找到了不少理论根据。这使得

农民对人民公社发起的挑战更加有力。几十年后，人们终于发现这几个小人物的见识远远高于那些大人物。这三个人都出自浙江，又都不谋而合地采取了犯颜直谏的行动。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毛泽东指着浙江省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口气之严厉，令人心惊肉跳。不过，真正的狂风暴雨还没有到来。7月中旬，陈新宇还接到了报社寄来的稿费，共计25.5元。这迹象多少让人觉得轻松。他将稿费买来一大堆桃子分给同事，一时间他的周围竟有了笑声。但就在这时，风云突变。

冲突的导火索是由一个出乎意料的人点燃的。此人就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本来深悉毛泽东的心理，亦持有同样的反对“包产到户”的倾向。毛泽东委托田家英到他的故乡湖南去做一番调查，这是1962年早春时节，乡下适为“包产到户”的高潮，毛泽东也许是希望他能提出一些有利于人民公社的证据。不料田家英这一去就完全站到了“包产到户”的一边，农民对于“包产到户”的热烈情绪令他感慨不已。但是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报告，而是依次向政治局中最主要的成员游说他的想法。

毛泽东不打算过早地干预这件事情，他只含糊地表示，“包产到户”只不过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共产党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然后就稳坐如山，静观事变。他的同事们却按捺不住了。陈云称赞田家英的看法，并且决定向毛泽东当面进言。他向毛泽东建议，“发挥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克服农村困难”。邓子恢在一封信中主张，给农民多一些“小自由，小私有”。他把这封信以及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直接交给毛泽东，然后就在京城里到处作报告，说“农村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办到的。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起早摸黑都下地了”；还说“不能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但是他用不了多久就什么也说不行了，因为他被解除了农村工作部部长之职，罪名是专“刮单干风”的“资产阶级农业专家”。

那时的中央书记处对经济的事情是不能沉默的。邓小平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他的著名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看来邓小平打算用一种更加超然的态度对待眼前这场争论。他解释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说了一些外圆内方的话。比如说“赞成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的要求总有道理”，“新生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事物，可以实验”，等等。他明里不说他的倾向，但这些话让人一望而知他是“包产到户”的支持者，可是却又打他不中。<sup>①</sup>

刘少奇的情况有一点复杂。他在这两年里担负着权力机构中的主要角色。在他执政期间，他先是纵容“包产到户”的实际进展，接着又怂恿田家英向毛泽东去进言，他甚至还曾明确表示“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这些来自最高领导核心的方针导向，无疑正在构成对人民公社制度的威胁。但是，刘少奇的这一立场，实际上只保留到这一年的7月18日。依据官方文书记载，这一天他对一批即将到乡下的干部发表演说，严厉地批评“包产到户”，还说这证明从中央到基层都有干部“对集体经济的信念有所丧失”。又过了三个星期，他进一步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对农村的困难“估计过分了”。这些情节后来无论在反对他还是同情他的人中均被忽视，其实刘少奇的进退转圜在权力中枢至为典型。以当日国家的危机情形而论，党的高级官员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务实立场来处理国家大政，否则就不仅是农民进一步的大批死亡，还会危及整个党的生存。当然这只能维持在一定限度。事态的进展逾越限度，就得以变通来代替原则。这中间的原则与变通，智慧和愚蠢，都有着恰如其分的理由。

应当说，直到此前的两年，毛泽东一直都很温和。据他身边的人回忆，他对“包产到户”的争论一度不置可否，甚至表示“可以在小范围里实验”。可是，人民公社毕竟是他的心血结晶，上下左右联合起来加以攻击，就令他再也不能容忍。

整个8月，政治局会议上一片紧张气氛。毛泽东不断地讲话，不断地质问他的同事，不断地打断人家的话。语气中充满应战和挑战的尖刻与激昂，真是怒火中烧。他指出单干之风越到上层就刮得越大：“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但是假如仅仅是乡下的混乱，还不至于让他这样恼火。问题是“这股风从何而来？”他自问自答：来自党内。他认为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包括贫农、下中农、富裕中农、地主，还有知识分子和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还有人出身封建官僚。“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热闹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他的同事听到这些，就有点

<sup>①</sup> 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不知所措了。但是毛泽东还没有完。他厉声道：“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这一番话更说得众人闷声不语。又过了三天，毛泽东接着这个话题，只不过怒火更甚：“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了，这不是压我？”当日在场的薄一波回忆说，从这以后，政治局里就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所有人都变成“单干风”的坚决反对者。那个夏天可真是政治成果的丰收季节，很多东西是共产党历史上之首创。比如资本主义倾向说，资产阶级复辟说，反对翻案说，前途光明说，阶级斗争再搞一万年，以及党内会出修正主义，儿子不出，孙子出……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再一次迫使他的同事纷纷检讨，接着一起举手同意他的方针。

60年代初期风行乡村1亿农民中间的“包产到户”，终于再度沦为非法。一场批判运动由此发动起来，据说受到牵连者多至400万人。“浙江三杰”自然首当其冲。冯志来由武装警察押解回乡，在监督之下劳动改造，终日沉默寡言，却身怀100粒安眠药片，昼夜不离，随时准备赴死。直到18年后，也即1979年，冯看罢话剧《于无声处》，大哭一场，满腔悲愤，喷薄而出。这是他平生第二次大哭，前一次是在1958年其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籍被开除的时候。杨木水于次年被逮捕，刑期八年，与死囚同监。杨不甘受辱，于是大骂林彪，以求死刑。次日果然成为死囚，负18公斤铁镣等待处决。恰在这时，林彪垮台，杨木水得免一死，但仍然加刑四年。陈新宇是被毛泽东亲自指名的“单干理论家”，故处境更加悲惨：7次抄家，120次批斗，挂木牌、戴高帽、游街示众。他自认“迷天大雾终须拨尽，春照丽日还教重来”。他不停地写信上告鸣冤，连续20年，总计200余封。待到真的“迷雾拨尽”、“春照丽日”之时，他已是一个干姜一般的小老头，孑然一身，一无所有，只余满脸皱纹，宛若斧劈刀凿。

毫无疑问，刻在这些“单干理论家”脸上的斑斑痕迹，也会刻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中间有着一个“大同”制度的美好初衷和惨痛结局，以及“包产到户”这一抗上行为的险恶遭遇和巨大牺牲。无情的现实，究竟还能让这一悲壮的历史持续多久呢？



## 第三章

# 大梦谁先觉

5万个人民公社为城里人提供了多少食物——几百万农民乞讨为生——“三年决战”与安徽“六条”——“真理标准”讨论对人民公社的影响——“责任制”：一个持续时间最长含义变化最多的概念——凤阳的“四级所有”







1978年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去世已经一年又三个月。伟人辞世长卧，令我们庞大而又古老的国家失去了以往的平衡。一个时代戛然而止，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却又如坠五里雾中，那时候，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里都弥漫起这种感觉。但是，历史的交会点此刻被装在一个信封里，竟是大大超过世人所料。

1月1日凌晨，整个中国还在睡梦之中，一个搬运工人从床上爬起来，揉揉眼睛来到北京火车站上，把这一纸书信和着一大堆邮包，塞进一列火车的邮政车厢，然后照往常一样，甩甩手就走了。这信的外表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此刻正随车向南京而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无奇。《光明日报》的哲学编辑王强华在这封信中告诉他的作者，文章已经编定，寄还征求意见。信内还附有一纸清样，文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胡福明。

这时的胡福明，远没有后来那样的声名，还不是江苏省委党校的校长以及省委常委。他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里一个少为人知的教师。亦教亦学，寻章摘句，作文著说，在他的职业里为常事。投石于报界，一鸣惊人或者泥牛入海，都不足为奇。忽有编者复信，他有那么一点儿受宠若惊，当然不会作出否定的回答，他不假思索，当即回信同意编辑对文章的改动。

整整十年之后，胡福明对《光明日报》记者张义德说，最初写作这篇文章，完全是“我个人的行动”<sup>①</sup>，其本意是说他并未受到任何人的指使。看来这是实话。那时候，这位哲学教员即使有再强悍的哲学思辨，也无法预见，他这“个人行动”竟会酿成震撼整个中国的大波澜，也改变了人民公社的命运。

今天来看，胡福明的最初动机确实有着很浓的偶然色彩。几个月前，也就是1977年盛夏的时候，胡的妻子患病住在医院里，胡白天在哲学课堂上为人师表，晚上到妻子的病床边尽为夫之道。南京的夏夜，酷热难挨。那时候，家用的电器还未流行起来，普通人拥有一个收音机已是一种奢侈。医院里普通病人的房间，自然不会独有清凉。溽热里，蚊虫的鸣声、病人的呻吟、人

<sup>①</sup> 《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体由于汗浸发出的各种味道、医院深处充塞着的各种声息，把胡福明包围起来，令他无法入睡。万般无奈中，胡忽然想到王强华，他们在几个月前相识于一个讨论会上，他还记得王强华曾经约他为《光明日报》理论版撰写文章。于是，胡从家里抱来若干经典与材料，坐在妻子的床前构思他的文章。文章四易其稿之后，胡将它寄给《光明日报》。胡后来说，他的文章是在医院里孕育出来的。<sup>①</sup>

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对解放军报社的副社长姚远方说，他的文章是“逼出来的”。逼他写文章的并不是医院里的酷热、沉闷、汗臭和蚊子，而是《人民日报》的社论。

“你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勇气？”姚远方问道。这时已经是十年以后，姚显然认为胡从一开始就抱有大义凛然的动机。

“那是逼出来的。”胡回答，“1977年2月，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看到这‘两个凡是’，我觉得，是语录标准，还是实践标准，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果束缚于‘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就无法纠正，当时，一种责任感驱使着我，决心写这篇文章破一破‘两个凡是’”。<sup>②</sup>

以90年代人们的眼光来看，“两个凡是”的荒唐和霸道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具有明确的批判意识，并且付诸行动，确需一种罕见的勇气。胡福明最初的行动可能仅仅是为了消磨漫漫长夜，这是任何一个在医院里守过病者的人都可以想象的，也可能是出于某种见义勇为的心理，或者更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对于这些细节的辨认，常常不为历史学家看重，但是，这些细节却可以令我们知道，历史这条河流在它转弯的地方，常常会有一些偶然的风生水起，推动它突然跳跃起来，急转直下，一泻千里。假如不是王强华结识了胡福明，并且要他为自己的报纸写文章；假如胡福明的妻子没有患病也不用他在医院照料；假如那个时间不是三伏，或者南京的医院里面有一部空调，让他在夜间安然入睡，那么，胡是否也会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写出这样一个题目来，并且寄给这样一家报社？以后的事态证明，文章的命运与一连串偶然的事情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sup>①</sup> 《光明日报》1988年5月13日。

<sup>②</sup> 《解放军报》1988年6月7日。

在中国政治的格局里面，胡福明这样的人物，本来并不具有任何影响大势的力量，就如同在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小岗社员之不能影响大势一样。若没有后来那些人在这件事上的推波助澜，胡的努力不论出于何种动机，都会消弭于无形。

最初的推波助澜发生在光明日报社的编辑部里。编辑部位于京城南边一座淡黄色的老式楼房。这地方在旧时的北京乃是贫民艺人聚集的所在。直到现在，街头巷尾人影物形之间，仍然溢出一种洒脱无拘的江湖气息。1977年10月，胡福明的两篇文章寄到王强华的手上，除了含蓄地批评“两个凡是”的这一篇，另外一篇以批评江青为主要议题。这位哲学编辑对于批判江青的文章弃之不理，而对于向“两个凡是”发动的袭击，却有一种异常的兴奋。

这在当时的报界是一个惊人的选择。尽管如此，报社的编辑在这时候仍然谨慎行事。他们的设想只是要把胡的文章作为一种学术探讨，发表在每月一期的“哲学”专版上。大样排出，按照既定的程序，要等上一两个月方能见报。假如不是后来发生的意外，胡的文章就只能和另外三篇文章一道，刊登于三版，其内容也只是含沙射影地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表示不满，远不是后来人们见到的那个样子。

可是，这个时候恰恰又发生了一件偶然的小事。1978年3月，杨西光调任光明日报社社长。他在任内所遇到的第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看到《哲学》版清样上那篇署名胡福明的文章。以其政治的经验和对时局的敏感，他完全可以看出眼前这篇文章中的意味。他当即将胡的文章从版样上撤下，准备大加修改之后拿到要闻版上去发表。几天后，胡本人应召来到北京，但以他个人的功力，此时已不足以达到杨的目标。于是，杨请来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高级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小的写作班子，修改工作也移至京城西郊一座与颐和园相邻的院子里，持续了整整一个春季。至5月初，十易其稿，胡福明的文章也已面目全非。

京城西郊的这些文人并没有留意，1978年的春天已经结束。他们整日深居室内，字斟句酌，连窗外已经层林尽染也不知道。可是，在1000公里之外那个偏僻角落，小岗村的社员却留意着气候的变化。旱象仍在继续，江淮一带，方圆千里，乡下的饥荒正在蔓延，那些刚刚被遣送回乡的社员再度背井离乡，其凄惨的景象，即使世界上这些最具坚忍精神的人们，也已无法忍受。小岗在日后所要发动的事变，也就从这时起酝酿在村民中间。不过，这些日暮途穷的叫花子无论外表还是经验，与那些理论专家们都不是一回事：一个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在乡下，一个在城里；一个在最低层，一个在最高峰；一个为了衣食，一个为了真理……这一切看上去隔着遥远的距离。可是，仅仅在几个月后，人们就会发现，两者的联系原来如此紧密，以至竟能融为同一种力量。

在1978年初的这几个月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还没有体会到这些事情的严重性。那时候，中国人对于“变革”二字，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无限恐惧。他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外资”，不知道什么是“股票”，不知道什么是“特区”，不知道什么是“保税”，不知道什么是“开放”，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他们指斥一切不合既定之规的行为是离经叛道。80年代城里人中间流行的各种工业消费品，此刻大多数还未曾露面。没有彩色电视机，没有录像机，没有摄像机，没有家用空调机，没有自动开关收音机，录音机只是被装在一个巨大笨拙的箱子里，托着一盘厚重的磁带“吱吱”地转。那时候还没有洗衣机，没有香波和浴液，没有干洗精，没有微波炉，没有洗碗机，没有吐司炉，没有烤箱，没有电咖啡壶，没有家用电冰箱，没有电饭煲，没有电剃须刀，没有真皮手袋，没有尼龙丝连裤袜，没有麂皮夹克，没有真丝内衣，没有马赛克浴缸，没有乙烯基地板，没有彩色的或是瞬间即成的照相机，没有玻璃纤维的钓鱼竿，没有静电复印机，没有计算机，人们还是拿着算盘来与计算机竞赛。稍微富裕一些的家庭每天晚上挤在一起看看九英寸屏幕的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还没有见过这个玩意儿，所以全部挤进来享受这现代工业品带来的愉快，这样一来，就把一间通常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塞得水泄不通。家家户户都还没有立体声音乐中心，没有镭射影碟，公共场所也还没有音乐播送装置，没有卡拉OK，没有迪斯科和摇滚，没有歌王和影后，倒是有邓丽君，不过是“靡靡之音”，属于禁歌。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因为所有的电影院里只是放映国产影片，或者就是描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员们，如何在40年代打击侵略者。张扬资本主义文明的电影还在禁演之列，或者至多作为“内部参考”供高级官员欣赏，青年们当然也还不会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一首歌，不过孩子大都会唱的一首歌里，讲述了一个名叫小杰克的美国黑人孩子如何无家可归，而且在财主的血汗工厂里被鞭打。大人们则在另一首歌里唱道，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虽然那时候中国人真的以为他们生活在一块乐土之上，但他们能够购买的工业消费品只是有数的几件。中国人用他们特有的对于数字的概括能力，

把这些东西叫做“三大件”，它们是：“凤凰”牌自行车，156元一辆；“上海”牌手表，120元一块；“蝴蝶”牌缝纫机，187元一台。那一年，一个刚刚进入工厂的学徒，每月的工资只有18元，两年之后满师为正式工人，也只有31元。最具资历也是最熟练的老工人，可以享有“八级”的薪金，每月108元，这已经是普通人中最高收入。所以，购买数以百元计的工业品，对于他们来说，确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有了钱也不一定就能买到这些东西。因为商店里面空空荡荡，你根本找不到这些东西，即便找到了，也不会卖给你。几乎所有你想要买的东西，都要凭借一个叫做“票”的小纸条。这是政府为了对付物资紧缺而想出来的办法，西方在战争的年代也曾经使用过的。只不过中国人使用这种办法的时间长一些，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大约22年里没有间断。“票”由政府监督印制，然后分配到每一个机关工厂学校里面去，再由这些地方的领导分配给下属，其数量大体是每十个人中每年可有一人分配到一张，或自行车，或手表，或缝纫机。所以，你为了买到其中一样，常常不得不等上几个月甚至几年。1977年最后一天的下午，北京大学一位28岁的教师得到一张“票”，可以用它买到一辆自行车。他欣喜若狂，因为这足以使他在一个月后的婚礼上向他的朋友炫耀一番。可是到了1978年的第一天，他欢天喜地地跑去买他的自行车时，发生了不幸：“票”丢了！这位教师在北京最大的百货大楼里满地寻找他的“票”，最后失望地掉下泪来。

但是，平心而论，像这位教师这样，为了自行车而处心积虑的中国人，在那时也还是少数，普通中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只不过“衣食”二字。即便稍微富裕一些的城里人也是如此。那时候人们生活得异常仔细，根本不像今天的人们这样大手大脚。大街上没有车水马龙的车队去挨家送礼——这种车辆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后箱，以便把礼物包裹搞得更加丰富。各个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的大院子里，也不会有一包一包的鸡鸭鱼肉分给职工，即使是逢年过节也不会如此。生活在那个时期的社会调查者，如果尾随一位家庭主妇到菜市场上去，就会知道一个家庭一次购买的东西通常不会超过一公斤。主妇们通常是用这样的话来招呼售货员的：

“同志，给我割块肉。一毛钱的！要这一边的。”

“同志，给我来一根儿葱，那根儿葱白大点儿的。”

“同志，我买半个冬瓜，要小的那一半儿。”

不过，在北京城里，也会有例外。冬季寒冷干燥，万物不生，所以，家家户户都不会忘记漫漫冬季里的蔬菜。每年11月的第一周里，大街小巷便为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大白菜所占据，城里百万人家，每一家至少会有一人走到街上，或者或少或男或女，每一家也至少会有一辆车子推到街上，或三轮平板车或两轮自行车或独轮手推车。大白菜每一公斤不过两分钱，一个四口之家花上四元钱买回小山似的一堆，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挖一个深坑存放在里面，或是用一些旧棉絮包起来，放在屋檐下面朝着太阳的地方，就可以吃上整整一个冬天。那些天里，白菜把整个北京城覆盖起来，车流与人流环绕其间，场面至为壮观。只不过，这样的购买浪潮每年只有一次，而且是为了以更加节俭的方式度过严冬。

其实，依照那个时候政府计划供应的食品数量，普通人家已经不可能再节俭了。在城里，粮食从婴儿出生开始定量，每月3公斤，以后婴儿渐渐长成，定量亦渐渐增加，一般成人的粮食定量，最高限为每月15公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工人和军人，则可以吃到22.5公斤。在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看来，这些粮食大约不会太少。可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是以粮食为主，其他食物在他们只是一种极为有限的享受。其数量之少，不要说外国人，就是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也难以想象。每人每月可以买250克猪肉、4个鸡蛋、半小瓶豆油、100克白糖、两块豆腐和50克绿豆粉丝。把这些东西做成普通人家饭桌上的食物，再仿效政府的配给政策，来平均地分配到每一天，则每个人可以吃到一个猪肉饺子或者一个直径不超过一厘米的猪肉丸子、一小口鸡蛋羹或者半小口炒鸡蛋、一勺豆腐、十根粉丝。除此之外，孩子可以按照规定喝到半磅牛奶，孕妇可以拿着一张特别的证明去买一公斤红糖，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可以买到半公斤牛肉或者半公斤羊肉。

8亿农民在5万个人民公社里轰轰烈烈地干了20年，所能提供给城里人的食物，大体就是这些。不过，就算这些东西少得可怜，也还是乡下人向往的生活，天知道，那一年乡下的境况更惨。

弥漫于全中国的旱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春天，竟无一丝缓解的迹象。我们的国家乃是建立在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之上，气候非旱即涝，其旱涝的转换，大致十余年为一周期。这一年就正是处在干旱的时节。北方无雨，河水断流者十有其九，南方本为多雨地区，这时候的库湖塘堰也纷纷干涸。湘鄂两省守着一条浩浩长江，向有千湖水乡之说，昔日由于水位之高已经超过地面，所以当地有着“水在房上行，车在河下过”的民谣。可是到了这一年春天，八百里洞庭湖水位，为2000年历史记载中的最低点。汉水两岸1470

台巨大的抽水机不分昼夜全力提水，仍无力缓解旱情。这一年农业的减产已成定局。依据各地官员的报告，粮食减产 35 亿公斤，棉花减产 13 万担。仅从数量上看，仍为正常幅度之内。可是实际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政府用赈粮的办法来接济饥民，将各地余粮调往缺粮的地方，仍不足为济，所以只好打开国库，把原本准备用于战争的存粮也拿去放赈。世人皆知，准备打仗是共产党自 60 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战略，毛泽东生前曾有“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名言，周恩来逝去之前的最后一次手书，也就是写了这一句话。以领导人的这种心情来看，非到迫不得已，绝不至动用备战之储存。现在这样一来，就放出去 100 亿公斤。当日中国农村 8.032 亿公社社员中，有 2/3 的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初期，有 1/3 则连 30 年代也不如。平均计，每一个人在一年之中可以吃到 124 公斤粮食，并且这些粮食全部都是未经加工的原粮，倘若农民要按照一般的标准来加工这些粮食并且精细到不丢一粒，则可以得到大约 105 公斤粮食和若干麸糠，平均每天可以吃到 280 克粮食和一把麸糠。这是平均的数字，那些穷地方则更加可怜：1 亿户人家的粮食不够吃、4000 万户人家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另外几百万人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粮食。他们依靠着政府的救济，而政府运来的粮食，常常只是在仓库埋藏多年的红薯干，漆黑一团，已经变质。据北京一位调查者的报告，他亲眼目睹了农家煮这些红薯干的过程，由于一股浓烈的苦涩，必须连续两次煮沸后又将水全部倒去，再以新水投入，长时间地蒸煮，方能食用。即便如此，当他本人试着吃了一顿这样的食物之后，立即开始拉稀。

讲到这些人的现金收入，就更加难以启齿。如果不分成人与孩子平均计算，这一年的农村，有 1.12 亿人每天挣一角一分钱，有 1.91 亿人每天挣 0.137 元，有 2.716 亿人每天挣 0.164 元。收入最低的地方为山西省平鲁县，每人每天大约 0.06 元。另外还有大约 2 亿人属于农村中的高收入阶层，但实际的现金也不会超过每天 0.2 元。尽管当时物价低廉，这一点钱也实在买不到什么东西。它大约可以买一包最差劲的香烟；一支蜡烛；一个小学生练习本；一包卫生纸；三块蜂窝煤；或者到澡堂子里洗一次澡。不过，农民根本用不着这些。把乡下所有人全都算上，每人每日用于衣食的支出不过 0.255 元（其中食物 0.218 元，衣着 0.037 元），他们不会花钱去买那些东西，那都是城里人的玩意儿。乡下人虽然抽烟很凶，可是他们只不过把自己种的烟叶碾碾碎，在不论什么地方拽一张满是油墨的宣传纸，卷一卷就行了。至少有一半的农家是没有电的，有电的地方也常常停电。可是蜡烛毕竟太贵，点油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灯已经足够。政府要求孩子上学，大多数孩子却根本没有进过学校的门，因为没有钱，还要帮助大人劳动，也有的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学校。即使进了学校的孩子，用树枝在地上画一画也就学了写字，哪里用得上练习本。燃料是田野山梁上的树枝灌草，一早一晚捡回来。洗澡在农家是一种毫无用处的事情，他们祖祖辈辈都没有这个习惯，一年甚至一生都不洗一次澡乃是正常。至于说到卫生纸，那简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60年代后期，城里的中学生们纷纷到乡下来安家，与农民朝夕相处。农民最看不惯这些城里孩子的事情之一，是他们在拉完了屎之后，竟然要用一种灰白色的纸来擦屁股。农家之不讲卫生虽然还不至于到拉屎不擦屁股的地步，但他们大都是顺手捡一块砖头瓦片或者撅一截黍秸秆，伸到下面刮一刮就算完事。砖瓦在乡下仍属稀有之物，因为农家的居所大都是由土坯垒墙并以茅草麦秸来覆盖，能够大范围地使用砖瓦于建筑，还是几年以后的事。黍秸秆是玉米打净之后留下来的秆和叶，农家常把它做成厕所的围栏，在农村这东西取之不尽又不用花钱，所以，乡间厕所的黍秸围墙总是被人撅得少了上半截。

农民们省下了这一切，却绝对不能省下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这些农民用以延续生命的最基本的用品，说起来令人惊讶。那一年冬季，甘肃省的天气格外阴冷，可是榆中县上庄公社的社员宋同安一家的炕上，连一张炕席都没有。他和他的一儿一女，以两个纸制的水泥袋为铺垫，三人蜷缩在一起合裹一床被子。除了这两个水泥袋和这床烂被，宋家全部财产还有一个案板、一口小锅、三个破了边的瓷碗、几双柳枝做成的筷子和一个粮柜。这粮柜历几十年风尘沧桑，外面已经不见了原本的漆色，里面则从来没有装满过。在距离宋家不远的地方，另一个公社社员张伦青，20多年前是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军人，昔日人称“最可爱的人”，可是如今家境似乎更窘，因为他连水泥袋也无缘捡到。每到夜晚，夫妻二人拥着四个孩子，凭着一条棉被度过寒冷的冬天，这是20年前他从部队带回来的，现在已然经纬不分，脏烂不堪。当外人走进他家时，他就用身体挡住那床军用的破被，仿佛这昔日给他带来荣耀的被子，今天令他感到耻辱。在他周围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他的乡亲父老的贫穷更甚于他，在他所居住的这个国家，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他难分伯仲。《农业经济丛刊》的编辑称他们是“缺衣少食的人民”。两年以后，两位青年学者谈到了当日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

距省会兰州市仅40公里的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人均



口粮才40—100斤！老百姓靠借账买返销粮。仅国家贷款一项，人均欠债102.26元之多。全公社49个生产队，有48个队人均收入40元以下；家产在30元以下的有188户；在15元以下的41户（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了）。全社7000多人，竟有4371人没有棉衣裤或者棉衣裤破烂不堪。一到晴天，很多孩子都趴在草堆、田埂上晒屁股！并且这些缺衣少食的人民，都是在海拔2300—2800米的高寒阴湿山区生活着。<sup>①</sup>

甘肃在地域上属中国西部，十几年后，在中国东部经济急速地起飞，并且把西部远远甩在后面的时候，人人都知道西部是一个穷地方。可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天，贫困是横行于全国的魔鬼，全中国至少有几亿人的生活之艰难与宋同安和张伦青的家乡相似。虽然舞台上那些表演各民族大团结的演出中，一群一群的青年男女身着五彩缤纷的服饰载歌载舞，令人感到5000多万少数民族同胞在政府的帮助下一定生活得幸福无比。可是当新华社的一位记者来到真正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时候，他所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云南省与越南相邻的边界附近，这位记者走进一个苗家山寨。百姓的生活所给予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一团漆黑”。草棚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没有玻璃，用一块塑料纸蒙在上面，将这唯一的光线挡住。里面没有任何照明设备，所以这位记者走进的时候，因瞳孔的来不及放大一时间竟看不清楚任何东西。稍待片刻，他借助炉灶口里闪闪烁烁的一丝火光，看到两团黑乎乎的东西在一堆稻草里面蠕动。几分钟后，他终于可以看清这里全部的东西：一个炕和一团破棉絮，墙角一堆稻草，稻草中一个孩子和一头小猪依偎着相互取暖，孩子一丝不挂，浑身污垢，和那灰黑色的小猪全然一个颜色。他蹲下身去看那孩子和小猪，忽然有一种异常的酸楚，接着就是一滴眼泪从眼眶里落下。他后来说：“我见过无数的穷人，还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人的境遇能够悲惨到如此地步。”可是当他站起身回到门口的时候，看到的一幅画面就更加令他吃惊。那里坐着一个姑娘，是古人诗歌中赞美的那种年轻女郎。可是，她的目光呆呆地跟着他，裸露着的上身搭着一块破布，下面着一短裙，裙子上面隐隐显出的花色，令他想到北京大舞台上那些五彩缤纷的服饰。只是眼前这一条实在太脏，脏得几乎不能辨认本来的颜色。然后他就看到一大群苍蝇

<sup>①</sup> 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环绕着姑娘飞来飞去，这时他才想到，这间屋子里面如飞机盘旋一般的嗡嗡声，原来竟是苍蝇的合唱。那些苍蝇居然可以肆无忌惮地落在姑娘的身上，爬来爬去，而姑娘毫无知觉。他带着一种强烈的惊奇再次蹲下身来，数了数姑娘双腿上的苍蝇，一共八只。“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一个活人，”他后来在日记中感叹，“可是，她确实是活人。”

农村的破败真是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苗家姑娘毕竟还有一条衣裙遮羞。在贵州省安顺地区，有一个关岭县，许多姑娘甚至没有裤子穿。那年冬天，阴雨连绵，这些赤裸裸的姑娘，双腿冻得通红，家家都是漏雨透风的泥草房，人畜同居，所有的孩子都是赤身露体，缩在火堆旁瑟瑟颤抖。三年以后，这里的境况大有改善，据报纸的报道，粮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也增加了一倍，可是其贫困的程度依然令人吃惊：在全县最贫穷的215个生产队中，这一年每人可以吃到138公斤粮食，挣到39元钱，有一件半衣服穿。在一个公社的91户人家里，有91条被子，一家一条，平均由五个半人合盖；另一个公社的1368人里，恰好有1368件上衣和相同数量的裤子，合一人一套；还有一个公社，每十家里面就有一家没有被子，每十人中有八人从未买过鞋子，只穿着草鞋度过春夏秋冬。<sup>①</sup>

但是，另外一些人可能会对贵州的一切无动于衷。他们会说：“是的，这些人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甚至连漏雨透风的泥草房子也没有呢！”这些人是新疆的牧民。报刊上仅仅有一次把他们的情況透露出来：在较为富裕的北疆，8万多户牧民中有1.6万户的毡房破烂得几乎支撑不起来了；南疆则又逊一筹，4.1万户牧民中，有1.4万户根本没有毡房，终年露宿于山上坡下，到了冬季最冷的时候，就挖一个土洞钻在里面挨过寒夜。

还有一些人也不会认为贵州的老百姓是最倒霉的一群，他们也会说：“是的，他们很穷，不过，我们更穷！我们的粮食还要更加少呢！”这些人是山西省五台县的农民。当日他们贫穷的程度，报刊上始终未予公开。所以人们知之甚少。人们知道五台，多是因为那地方自古以来为佛教著名的朝圣之地，在20世纪的40年代，又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总指挥部所在的地方。到了1978年的那个冬季，生活在这个佛教圣地和八路军总部的黎民百姓，吃的是一种黑乎乎的东西，其成分中大部是山上生长的各种野菜和草类，粮食只占十中之二三。农家把这些东西和在一起碾碎，再揉成一个个的团子晒干，他

<sup>①</sup> 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们就是吃着这样的东西度过整个冬天。然而在那个地方，这并非最悲惨的生活。倘若旱情过甚，山上寸草不生，农民之维持生命的办法之悲惨，常人难以想象。五台山向东延伸，即为河北省境内，这里有一个武安县，其乡民竟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血来度日的。有个刘庄公社，6082个社员中，卖血者1631人，其中包括925个男子和706个女子。为了加入卖血者的行列，老人向医院缩小自己的年龄，孩子则极力装得像个大人。按照当日医院的规定，一个人在一年中的抽血，不能超过4次，并且每次不能超过300毫升。否则卖血者的生理将不能维持正常，其血浆品质亦不能保证合格。可是这些血换来的钱，仍然不能维持卖血者的家用。所以相当多的人出卖血液的数量，至少两倍于此。武义忠的大儿子，从一家医院跑到另一家医院，在一日当中居然抽血3次，共得300元，然后就到集市上去换回341公斤玉米。他摇摇晃晃走进家门的时候，一家六口都张大嘴等着这些粮食。破衣陋室本来已经不能使这些可怜的人获得温暖，现在又失去了身上的血液，其度日之艰辛可想而知。于是又有人说，女性卖血较男人更为适宜，因为女性之造血机能强于男性。这样一来，卖血者中妇女日众。她们肯定是过分相信自己的生理机能，结果悲剧接二连三：刘双新的妻子怀孕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卖血，最后一次是在分娩前的两个月。到了分娩的那一天，儿子坠下地来就死了，那个小小的身体里面几乎没有血在流动，而她本人也再没有活过来。另一个妇女，张堂第，生下女儿之后第二十天，出去卖血，归途上晕死过去，一命呜呼。她把她这一条命卖了128元。

那一个冬天，流浪在全国各地靠乞讨为生的公社社员有几百万人，其情景之惨，今天人们可能已经不再记得，但是安徽省滁县的农民朱成友是记得的。十几年后，他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企业家，和人民日报社的一位记者谈到那时他四处讨饭的日子时，双手还在颤抖。另外一个老农，是广东省珠江三角洲顺德县人，此地一向为中国最富庶的地方，如今老人家徒四壁。北京来的一位官员问他对什么事情最不满意，他说道：“三十年了，人民公社一是不让我们吃饱，二是不让我们说话。”又问他什么时候生活最好，他说是陈济棠时代。陈济棠是30年代当地军政首脑，所以这件事让北京的官员惊讶万分。

乡下的人民公社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但在当时，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中真正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仍然极少。李富春是其中一个。他说：“‘文化大革命’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给了我们很深的教训，为什么那么多的民众把矛头对准我们的干部？因为共产党欠账太多了。”另一个人是万里，那一年的冬末春初，他是安徽省的省委书记，他和一个叫花子的对话，也令他永世难忘。当他私访他治下的淮北农村时，偶遇一个青年，上身着—棉袄，里面光着身子，外面扎—草绳，从破烂的地方绽出棉花。万里问道：

“你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拉开棉袄，拍拍光肚皮：

“吃饱肚子！”

“你这个要求太低了，还有什么要求？”

小伙子又拉开棉袄，再一次拍拍光肚皮：

“把地瓜干换成粮食！”

……

这位省委书记那时上任不久，又是徽服简从，所以青年人并不知道他是何人。不过，一年以后，全中国的农民都会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成为在农村里发起改革的关键人物。此刻，他还不知道怎样才能满足这个小伙子的愿望。据随行的人员后来的描述，他良久无语，热泪长流。毫无疑问，他所见到的事情令他对人民公社的信念发生了根本动摇。因为就在当夜，他对随行的人员提起此事时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三十年，连人家这么一个要求都不能满足！我们再不让他们吃饱饭，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吃不饱饭。”这还算是客气的说法，不久，他在国务院召开的高层会议上再次提到乡下的贫穷，话说得更加尖刻：“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华国锋这时候的想法，是要将毛泽东生前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加以推进。按照这个计划，中国农业的机械化要在1980年完成，这当然并非外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劳动技术的改进。事实上，按照当日共产党人的设计，农业劳动改由机械完成，是将土地大规模地连接在一起的基础。千百万农民的劳动，亦将由此集中于统一的意志之下。所以，机械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可以成为一种统治人的力量，甚至还可以造成一种压力，让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更快地转向国家所有的制度。这个计划在毛泽东时代已经不遗余力地加以推进，到了1977年，有记载说，乡下的拖拉机已经达到155万台，并且拥有大约18000万马力的机械总动力。就总量来看，低于美国和苏联而居第三，但若平均到耕地之上，则就少得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仅

为纸面上的统计，实际的机械则有相当部分因没有配套或者损坏严重而不能使用。所以，在1978年1月4日，华国锋就召开了一次全国的会议，试图以激昂的号召鼓励属下认真对待这件事情。陈永贵在这一天宣布说，现在“已经到了决战的阶段”，因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只剩下三年的时间”。陈此时是新领导中位居第八的副总理，他的农民出身和经历，使得他的演说洋溢着农民的感情，也刺激了台下那些乡村官员的热情。一时间，大厅里掌声雷鸣、山摇地动，其情景仿佛象征着党的号召与农民的心愿融为一体。第二天清晨，报界一起开动起来，呼喊着重“夺取三年决战的胜利”。《人民日报》的社论还说，这是全国农民的最迫切的愿望。<sup>①</sup>不过，用不了多久，所有的中国人就会知道，所谓“决战”的计划，与乡下实际的情形和农民的心愿相去何其遥远。

党中央的部署已经下达，“三年决战”也已经拉开序幕，可是，万里却说：“我们把农民忘了。”在他所领导的安徽省，情形也挺奇怪。农业机械化的诱人蓝图没有什么反响，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在议论由省委发下来的一个文件。这文件的条款共有六项，所以人们后来都把它叫做“六条”。内容在今天已经不足为奇，可是在当日，几乎全都牵涉着最有争议的问题。包括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要规范起来；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员负担；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的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令人惊讶的是，“六条”之中，居然将“农业机械化”弃之不顾，更不要说鼓动农民去展开什么“三年决战”。

“六条”颁发于1977年11月15日，先于党中央确认的农业机械化方针仅仅49天。依照由上而下层层转达的行政传统，以及农村交通邮路之传递速度，当电台播音员不停地播出“机械化大决战”的号召时，“六条”也正好来到农民手中。他们当然可以发现，“六条”果真施行起来，即可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农民奔走相告，称之为真正的“爱民政策”，又说“共产党又关心老百姓了”。其兴高采烈的情状，和他们对于机械化的淡漠恰成鲜明对照。

看来，万里对于农民的同情，正在他所管辖的地区里发生作用。他在1977年8月由北京南下安徽就任省委第一书记，所遇第一件麻烦，就是农村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78年1月5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的贫困。每当驱车经过乡下的道路，他就会看到大面积的土地被弃耕抛荒。手下执掌农业的官员会告诉他，不能下种的原因乃是天气的干旱。所以，除了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之外，别无良策。但是万里在到乡下走了几次之后，他的基本常识和敏锐的洞察力令他得出结论，农民的弃耕，更是由于失去了对土地的热情。这使他强烈地感觉到近在身边的危机。以往的农业政策不仅不能摆脱危机，而且可能正是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要是再不改弦更张，农民就会由消极怠工转而为大规模的抗议。于是，他召开紧急会议，把他的一群下属唤来商讨对策。结果意外地发现了在他辖区里面，有一个地方党的组织，颁布了一系列的应急之策，旨在给予农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以激励他们生产的热情，而且事实上真的发生了效果。苦无良策的万里这时候调集手下数百工作人员，分赴乡村去寻找农民的真正心愿。然后以那些应急之策为基本的蓝图，制订他的“六条”，颁发于全省实行。

我们国家的农民，应当说是举世最易安抚的一群。这时，在安徽千万农民的嘴上，新来的省委书记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圣明天子”。假如他们能够知道一件正在秘密酝酿着的事情，要不像迎接天子那样冲着万里三呼“万岁”，才叫怪事。就在那次紧急会议上，万里表明他要奉行务实的宗旨，而不会顾及意识形态的训示。他说：“与其眼看着大片土地抛荒，倒不如把土地借给农民。”也就是说，农民可以在实际上占有土地，而人民公社对于土地的权力将只是一种名义。这几乎等于再一次分田分地。果能如此，农民焉能不欣喜若狂？不过，此事有违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宗旨，关系至大，实在没有可能写进省委的正式文件，“借地”也只是在秘而不宣的情况下悄然进行。

到了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终于发现安徽出现的变故。它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旨在以此推动全国奉行与民休息的方针。不过，报社的编辑仍然试图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针中做个和事老，因而在按语里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恣意破坏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带来了极大危害。这样，万里的“六条”，看上去就成了恢复人民公社传统的办法，而不是纠正人民公社的错误。最妙不过的是，这一天的报纸在第四版上刊登了邓小平出访缅甸的13幅照片，占满了整整一个版面。邓小平和万里在同一张报纸上相遇，当然只是偶然，但安徽的故事却显然引起了邓小平的兴趣，这时候他从缅甸归来又将赴尼泊尔访问。转道途中，于四川小憩。赵紫阳恰在不久以前就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邓小平经过此地，当然要去迎送。根据当日记载，虽值隆冬，成都却是阳光灿烂，竹林青翠，蜡梅

盛开。不过，那时候没有公开出来的一件事是，邓小平在这一天与赵紫阳谈到安徽的事情，邓还特别提到了万里“借地”给农民。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万里采取的这些行动，是与他人先谋而后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的行动几乎立即就得到邓小平的赞许，也在赵紫阳那里获得心领神会的呼应。一年后，四川省把农民的自留地扩大到总耕地数量的15%，在全国引起一个大震动，若论缘由，似乎出自万里的安徽。

2月6日，干旱13个月的中国北方，忽然飘起雪来，开始稀稀落落，然后连成一片，越来越大，三日不绝，覆盖了晋、冀、鲁、豫、陕、京、津、苏以及安徽北部。瑞雪兆丰年，乡下人的脸色明朗起来。万里也动了乘胜追击的念头。他用他的“六条”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小试锋芒，静观一月而没有遭遇任何挑战，于是胆子大了起来。3月，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题目是《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看来他是想将自己的行动进一步地理性化。几天后，《人民日报》转载此文。这么多权威的报刊来为万里张扬，终于引起舆论方面的主持者汪东兴的注意。汪是不能同意万里的，所以人称“汪万不同路”。但是，现在万里还没有走得太远，汪也还没有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种局面又维持了十天。3月27日，《人民日报》编辑看来是被暂时的平静弄昏了头，又忘乎所以地发表了一篇文章，更加露骨地向人民公社挑战，文题《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这一明显不符既定方针之举，使汪东兴勃然震怒，他立即质问报纸总编辑，说此文“把矛头指向毛泽东思想，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

实际上，党中央在22天以前就已经把中国的蓝图画定。五届人大一次会议3月5日闭幕，华国锋总理和13位副总理组成的新政府，拟定了一个宏伟而又详尽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今后十年的中国会有一个高速飞跃。农业的总产值的年递增率超过4%；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则达到10%。等待建设的工程，将包括12个大面积的商品粮基地，10个钢铁基地，9个有色金属基地，8个煤矿基地，30个电站，6条铁路和5个大港口。粮食产量也将达到4000亿公斤。这些许诺的豪迈的确震撼人心。几年之后，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吹大牛的计划，官方也拿它和1958年相比，说那次是“土跃进”，这次是“洋跃进”。不过，当日华国锋满怀豪情地宣布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人站出来它太过分。2000多位人大代表照例一致地举手通过。所有的舆论一起歌颂这个新的蓝图。一个化名“万里浪”的诗人，还借用时间之口在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纸上唱道：

人们对我有着新的概念：  
可以把一秒拉长，  
也可以把一分缩短……

另外一个叫做晓雪的诗人述说了春天的感慨：

今天我浓如酒、甜如蜜、深如海，  
多少年不准开放的千万种花朵，  
今天在眼前争奇斗艳一起开，  
多少年不能歌唱的亿万支欢歌，  
今天在这里纵情放声唱起来！

表面的万众一心常常是一种虚幻，轰轰烈烈的事情总是不能久远，而细枝末节反会日显其价值，这也是我国历史的一个特色。以当日情形来论，万里所求虽然远不如华国锋的目标显赫辉煌，但却在农民中间具有更大的感召力量。大政的分裂，端倪已出，在1977年的那个冬天，这分裂还只是在私下百转千回，不久便由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豁然涌出而成大潮。

1978年中国所发生的意识形态之战，实际上意味着新旧时代的真正的分水岭刚刚出现。由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连串倾覆下来的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块。不过，这场意识形态较量中无论失败者还是胜利者，都不会想到，它其实也是即将倾覆的另外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

要想恰如其分地估计“真理标准”的讨论对于乡下人民公社的影响，应当记得，城里人的呼吁“实践”与公社社员的呼吁“自主”，是亦步亦趋地发生的。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自1977年夏秋酝酿，到1978年春夏的公开，再到这一年冬季成为定局，这也正是乡下要求“自主权”的历程。如前所述，华国锋主席发动全体农民来批判“四人帮”破坏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可是老百姓却对接近他们的政府官员更加痛恨。他们纷纷述说这些官员对村子里的事情如何横加干涉，且把他们的冤屈投寄报社。那些日子，全国所有报纸的编辑都在埋头编写这一方面的来信。这些





控诉大都只涉及地方官员的横行霸道，而这些官员通常又都是地方帮派集团中的成员，并不直接地牵涉现任高层领导人的利害，所以报纸编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来加以揭露。看来官员的横行确已到了无可迁就的程度。比如在浙江省，他们强迫农民把已经种好的大豆翻进土地，播种其他作物，是为“犁豆事件”<sup>①</sup>；在广东，他们则在属于农民的2.5万公斤稻草上点燃一场大火；<sup>②</sup>在江西，农民说，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我们会种地；<sup>③</sup>福建的农民则把一个富裕的公社归结为没有官员的干预，而另外一个公社之所以穷，也就是因为那里有官员的指手画脚。<sup>④</sup>从1977年年底到1978年年底，全中国504万个生产队中，至少有478万个投入到这一场控诉之中，其余20多万个也并非无可控诉，而是因为那些地方实在是太过偏僻，没有公路，没有报纸，也没有电视广播，农民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控诉的机会已经来临。

11月23日，也即“凡是派”正在党中央的会议上面垂首检讨的时候，安徽省风阳县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的上级提出一份报告，吁请上级承认他们的“包产到组”为合法。这在当日已经是一个逾越常规的举动。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在要生产队的自主权，分明是要将生产队拆散。如果“凡是派”知道风阳县的委员们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所说的话，就一定可以估摸出他们的失败引起的连锁反应有多严重。这些发言者中，以县委委员支道友最为直截了当。他说：“人民公社的‘队为基础’，实践证明是不行的。我们可以三级所有，户为基础。有人讲共产党喜欢穷人，好像越穷越苦越累越好。这样的办法调动不了生产力，非变动、非改革不可。责任到组只解决一时问题，从长远看，还是个体搞。”支道友的这一番讲话，分明是把京城里面的书生理论，用到自己庄稼人的头脑里。仅仅一年之后，几乎全中国的农民会在“实践检验真理”这几个字的怂恿下，公然讲出大体同样的话了。

不过，这时候凤阳还不敢真的打“包产到户”的主意，而以“分组责任制”为名，即使这样，其将生产队再加以分割的用心也是一目了然的，以当日情形论，这明显是与人民公社理想背道而驰的行为。然而凤阳此举的危险还远不止这些。当陈庭元向上级禀告这些想法的时候，实际上他治下的土地

① 《浙江日报》1978年12月3日。

② 《南方日报》1978年12月28日。

③ 《江西日报》1978年12月5日。

④ 《福建日报》1978年12月4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上，“包产到组”早已如火如荼，甚至在八个月前县委会议的记录上，全县2905个生产队中，已经有1469个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只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下进行的。如今陈庭元的打算，是借“实践检验”的招牌，将自己的越轨行为合法化。陈庭元当日为县委书记，官级相当于县长，在旧时为七品，乃是官制中最低一品，所以有“七品芝麻官”之说。委员支道友则连七品也还够不上。如陈、支这等小人物，当然无从洞悉北京中南海里面的风云变幻，可是他们竟也知道接过“实践检验真理”的宗旨，以维护自己的“责任制”。看来，这面大旗的招扬于全国，是无论如何也不可避免的。

责任制在中国，可能是持续时间最长而含义又变化最多的一个概念，50年代曾由邓子恢加以提倡，1962年中央政府制定的人民公社条例中亦曾出现。到了80年代，中国农村在经历了一连串的酸甜苦辣和起伏跌宕之后，仍然是用这个概念来确定改革的进程。比如1992年邓小平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的时候，其口吻与气派，就如同毛泽东30多年前讲“人民公社好”一样。只不过，中国文字的奥妙无穷，总是可以赋予同样音形的词很不相同的意义。“责任制”即为其中最典型又最富戏剧色彩的一个。

1978年“责任制”的含义，在于摆脱政府组织的行政干预，而使生产队获得自主的权力。报纸头版常以“反对瞎指挥”，或者“恢复生产队的自主权”为题目。这一切均以“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名义展开，换句话说，党的方针不能允许自己去干预生产队的事务，后来对于生产队种种指手画脚的行为，只是一系列错误决策的结果。但在实际上，人民公社的制度，本来就不具有让生产队掌握自己命运的内容。依照这一制度，农村财产的占有，分属于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而以生产队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是，既然权力为三级共有，其实际的力量自然就在最高一级手里，因为中国的官制，下级官员的任免均由上级来决定，所以下级官员在实际运作之中，便没有可能违反上级意志，偶有此种行为者，常常是早上直言抗命，晚上便被解职。所以在官场之反叛者中，有“把乌纱帽夹在胳膊窝下”的说法，意即要反对上级决定，自己先将顶戴乌纱除去，不用等待他人来夺。生产队的所谓“基础”，在条律中本就含糊不清，又有既成官制约束，自然从一开始便只能成为口头上的承诺，实际上却无从执行。到了70年代后期，则连说也不愿再说。那时，将生产队权力全部交由大队支配已成时尚，根据党中央这时的计划，至少要在50万个生产队中迅速采取这一步骤，而现在所谓“责任制”的提出，恰是针对这样一种局面，开始要求恢



复生产队的权力。很明显，这种要求的实质也在于恢复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

就大局来说，这一年中国人的思绪，大都不在人民公社上。毛泽东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一个贫穷的乡村，人们却很难一下子明白，贫穷乃由制度所铸。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情况就大不一样。几十年意识形态的纠缠，造就了太多的含冤忍辱之人，这些人大都活在世上。他们包括，50年代后期的右派；60年代所谓“四不清”的人和被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70年代的“右倾翻案”分子。这些人连同他们受到株连的亲人朋友同事上级部下，人数可达1亿人。

那时候，喊冤的人群到处都是。中国人的心理还不是90年代初期的这个样子，说到“解放思想”，就是“下海”做买卖，就是到处牵线搭桥找项目，就是开辟第二、第三、第四职业，就是和发达国家比阔气。那时候的人们，政治生命甚至比生理的生命还要重要，说到解放思想，还是想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再生，想要“平反”，想要“恢复名誉”，只要组织上说一声“你受委屈了”，他就会感动得泪眼相向，觉得十几年的冤辱苦难终于有了补偿。

在这种局面下，乡下人要求在经济方面享有权力的呼声，还没有成为势如破竹的潮流。只有在最穷的地方，这问题才富有爆炸性。那里的老百姓强烈地感到饥寒交迫，连物质生存尚不能维持，精神的荣辱自然无暇顾及。这些人的人数在当时至少有2亿。他们对于“权力”的要求，在城里人听来，如同来自遥远的天边的声音。有安徽省东部，那里曾是出名的“乞丐之乡”，后来被史家称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有内蒙古南部河套地区，这是中国北部一个连接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地方，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部落征战的历史，在这里至少持续了20个世纪；有广东省潮汕地区，在20世纪的上半叶，由于贫穷从这里出走的农民遍及全世界，今天已经成了世界各国数千万华侨当中一支强悍的力量；有浙江南部的温州，这里的农民有着桀骜不驯、独闯天下的传统，1977年冬季，有100多名城里的干部进驻此地，要把社员集合在人民公社里面劳动却没有成功；有青海省，这是中国西部一块最落后的地方，高原苦寒，藏汉杂居；有河北省的沧州，其荒凉肃杀自古闻名，因为这里在古时曾经是罪犯流放之地，明末小说《水浒传》中最有名的一个人物林冲，就是在负罪之后被官府发配此地，落草为寇；有贵州省，这是西南地区一个边远省份，比林冲去的那个流放之地还要远上十倍，由此地乡村赴京城，汽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车与火车的交替运行至少要一个星期；有陕西省的商洛山区，17世纪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就是从这里起兵打进京城，令明末皇帝崇祯上吊自尽；有陕西省北部的榆林地区，这里是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严重的一块土地，很多地方已经支离破碎，寸草不生；有山西省的吕梁山区，这里在40年代曾经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隐藏之地，其偏僻的程度，令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无法到达，而游击队中的一员，就是今天领导着中国的华国锋……

穷乡僻壤里的人们这时候忽然明白，何以古人会有“天高皇帝远”的睿智。他们背离人民公社宗旨的行动，在1978年的时候，就是借助于交通不便与消息的闭塞，才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政府的官员们都在忙着为自己洗清冤屈，根本顾不上农民在干什么，这为农民提供了天赐良机，此时干起来，只要小心地不要与“臭名昭著”的“包产到户”搭上边儿，也就行了。四川省一个老农告诉他的县委书记常光南说，他的生产队已经拆散为几个小组，定产定酬，多产多得，少产少得。他之所谓“定”其实就是“包”。他巧妙地避开一个“包”字，就是为了不致引起书记的震动。常光南一眼洞穿老人的计谋，不过却抱着同样的心境：“只要有饭吃，管他是‘定’还是‘包’呢？”他说。<sup>①</sup>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公社的书记詹维舟，则是以一种更为隐晦的方法向他的上级提出建议，他在自己的手上写了一个“富”字，为什么会富呢？他说道，“宝盖头”为家，“口”为人，“家”中一人一方“田”，就是富。这意思说穿了就不仅是“包产到组”，而且要包产到每家每户了。不过，他巧妙地用咬文嚼字把这一切都藏在深处。可是，另外一个人显然没有这种咬文嚼字的本事，那时他也不敢相信他的上级可以纵容他的言行。这是山西省闻喜县的一个生产队长，名叫孙炳新。在1978年的春季，他决定要在自己的生产队里“包产到户”，副队长愣着眼睛不知所措，这时候他就说：“上头、下头，咱只能热一头，顺上头，社员没饭吃；顺下头，领导要批判。咱要两头都不得罪，就一个办法，偷着干。”<sup>②</sup>

如此胆大妄为的人，那时候还不多，但毕竟已出来好几个。以中国乡间的传统，这种具有反叛意识的人通常有极为强烈的号召力，其一呼百应的力量，甚至远胜于政府的官员。但是，还有更大的危险，一些本来对于人民公社制度最忠贞不贰的党的官员，这时候居然也露出离心离德的倾向。钟永棠

<sup>①</sup> 《四川日报》1980年7月18日。

<sup>②</sup> 《中国青年》1981年第19期。



的上级把他派到甘肃省武都地区去当党的书记，本是指示他把那里的人民公社搞得更加生机勃勃，可是他在那里竟说“人民公社是战略性的失策”，“集体经济是有集体没经济”，还说不让社员“包”的人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自己吃饱喝足，坐在大沙发上空喊高调不腰疼。他们只知道一个社会主义，离开人民太远太远了”。他认定“迟早要冲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钟永棠说得一点也不错，不过这样一来，就昭示了他公然反叛人民公社的立场，甚至让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个共产党员。陈庭元与他明显地沆瀣一气，可是却不肯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人民公社分道扬镳，他的方针是悄悄干，做一点算一点，而且每干一点都要取得上级的支持，因为他确有一把最好的“保护伞”，这就是万里。1978年的这个时候，他领导的风阳县委已经连续开了三次全体委员会议。并且决定在“三级所有”之下再来一个第四级，也就是把每个生产队分成若干小组，以组为基本的生产组织。他报告他的上级，那些官员中间立即引起了分裂。人家说他搞了一个“四级所有”，此风若不刹住，势必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他什么也不说，转身去找省委书记万里，他心里一定知道万里会说什么。他果然如愿以偿。万里说：“四级核算有什么了不起，增产了，五级也行。”然后他就在县里理直气壮起来，到处说：“四级有什么了不起？增产了，五级也行。”

果如反对者所料，陈庭元搞他的“四级”的时候，就有人在打“五级”的主意了，而且竟然是在一个有着10万社员和15万亩土地的范围里，明目张胆地干起来。这在当时真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它发生在安徽省肥西县的山南区。1978年秋，山南大旱，秋粮无法下种。这时候，城里人在辩论真理，但农民的真理就是如何把粮食种下去。结果“包产到户”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家分得一块田，自种自管，来年收获季节算账，多收多得，少收少得。总计1006个生产队中，有777个如此分散开来，余者为人民公社阵营中的立场坚定者。这样一来，在分散了的那些土地上，庄稼不仅全都种下，而且后来还长得挺好。可是在人民公社堡垒里面的那些土地上，要么是把庄稼种下去了却长不出来，要么是根本就没有种。到了秋季，这个地方已经有8万农民公开要求“包产到户”。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居然完全被隔绝起来，不为北京所知，这件事情可以证明，党的中央政府的力量虽然庞大而坚实，但在成千上万的农民中间仍然难以解决鞭长莫及的问题。直到几年以后，国务院里一位研究农村改革的专家陆学艺考证说，山南是实行“包产到户”最早的地方。就时间看，它的确早于小岗，不过，由制度的演变来看，山南的“包产到户”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却不如小岗来得彻底。它使得社员的劳动与其收获的多寡有可能更紧地联系在一起，但并不排除生产队掌握最终分配产品的权力。也就是说，社员仍须将自己的全部所得交给生产队，再由队长根据其数量的多少，取出相应的部分给予社员。小岗则是把分配的权力也交由社员掌握，农民只要按照规定交足了集体的部分，剩下的便全归自己。小岗的社员说是“一年早知道”，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包干到户”。这办法显然不仅仅具有更大的物质刺激作用，而且涉及权力的分散。农民如果全都掌握了自己的劳动所得以至劳动本身，人民公社又该怎么办呢？

## 第四章

# 一步一步回头

1978年12月1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通过——  
省委书记的迂回战术——中国的改革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1978年的12月13日实为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具有这种价值的日子并不多。“两个凡是”终于结束，这中间的含义当然不仅仅关乎某个人的沉浮，事实上它等于是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从此，74岁的邓小平终于可以开始自己的时代了。

这一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全会上以一个长篇演讲宣布了他的时代的开始。现在他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领袖。这种概念与权力的位置并无直接的关联。邓小平的职务仍然居华国锋之下，公开排列出来的名次也还在叶剑英之后。他的领袖位置来源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气质。他深知我们庞大的国家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真正地赢得人心而不仅仅获取人们嘴上的阿谀。而取得人心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这种思想的萌生大约是在60年代初期，此后两度被贬以及三年流放的经历，使邓小平对这些问题的理解逐渐加深。有一段日子里，他不仅失去了他的权力，而且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物质保障。工资已经全部被取消，只按月发给可以维持他一人生命的费用。可是他还要赡养年迈的继母，以及为他的更加贫困的儿子筹措来看望他的路费。人类对于物质的看法多少有一点忘恩负义，你拥有的物质越是充分就越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只有当你真正挨饿的时候，才会懂得一口饭的珍贵。当日邓小平困于赣南一隅，不得不自己开出一小块土地，每日在地里耕种蔬菜来弥补家用之不足，这样的感受一定时时出现在他的心头。20世纪30年代，邓小平在同一个省份里也曾遭遇过艰难的岁月，这种艰难乃是由于蒋介石的攻击造成的。那时候，他曾经主张红军建立自己的生产地位，不过，那是一个出自领导者头脑的战略考虑，全然不同于这种发自本能的切肤之痛。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将朝廷命官称为“父母官”，一个具有责任感的官员，应该在自己任中使百姓在丰年得以足衣食，灾年不至饿死道旁。总而言之，物质乃是治国的第一要旨。至于意识形态，例如政治运动之得失，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利弊，毛泽东思想之功过，自然也很重要，但人只有吃饱了饭才会有工夫来讨论这些。或者反过来说，如果这些是非之争不能给人们以更多的物质利益，反而令人民越发贫穷，则意识形态的教义即使再崇高，领袖的思想即使再辉煌，仍不免是空中楼阁，终有倾覆的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一天。

考虑到这些基本的道理，邓小平为他的时代讲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我国人所尽知。这一方针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经济建设为纲”。这里面的价值以及其间埋藏的种种冲突，人们只是到了后来才逐渐地意识到。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官复原职已一年五个月。华国锋发表了他的检讨，而邓小平发表的却是新时代的宣言。其沉浮逆转之势已然铸成。不过，仅仅如此难道就具备了开创新世纪的条件？就可以成为领袖？45年前被王明打倒的时候，10年前被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对这些问题都曾发生过疑问。今天的邓小平对这一切已成竹在胸，我们的国家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但是权力的展开需有精神上的支柱。毛泽东的时代是理论层出不尽的时代，邓小平又将以何种理论来支撑他的时代？

邓深思熟虑地提出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这个思想原本是由毛泽东阐述出来的。30年代，毛泽东曾经以此作为对抗共产党内部教条主义统治的武器，大获全胜。现在，邓小平接过这个理论，来对付重新具有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哲学力量。毛泽东仍然是导师，可是毛泽东的错误理论绝对不能再拿来指导新的时代。这是一种技巧极高的策略。从表面上看，这一点与邓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权有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打倒邓的主意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那时毛还活着，神志清楚，显非“四人帮”的矫诏。所以邓小平在还没有复出之时谈到“两个凡是”，只是提到它关系着自己能不能平反的问题。现在，1978年12月13日，这个问题就已经不仅仅关系他本人的命运了。他说：这“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sup>①</sup>换句话说，开创邓小平的时代与打破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分离。几年之后，邓小平开始考虑以某种方式来评价毛泽东。他说，毛主席的思想是集体的智慧。这是一点也不假的。从现在起，邓就在毛的真理中加进了自己的理解。

---

<sup>①</sup>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其实天下的真理都可以从个人的情感中找到根据。在共产党的内部具有如此惨痛经历而又能重获历史之钥的人，唯邓小平一人而已。昔日如毛泽东和周恩来，今日如华国锋和叶剑英，权力都在邓小平之上，但他们全未体验过他坠入社会底层时的种种酸甜苦辣，不可能对当日制度中的种种弊端有如此深沉的痛楚。刘少奇和彭德怀比他还要惨，可是他们没有重新获得权力的机会，所以他们的所有感慨都只不过成了身后的挽歌。从这个角度说，邓是中共权力核心中空前绝后的人物，而彻底改革共产党既成制度的人物，恰恰是由共产党自己造就出来的。

有些历史学家称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并且认定这是他的一贯精神。事实并非如此。邓本人就多次讲过他的错误，说他曾经支持了毛泽东的“反右派”和“大跃进”。不是多少具有一些理想主义色彩，邓小平当然不会有那种狂热的行为。但是，从个人情感的进程来看，邓小平的倾向实用，是无法避免的。

比如他说“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sup>①</sup>，这话一定是发自肺腑的。落难中的邓小平，已经太多地领略了“鸦雀无声”的可怕。无声的落日黄昏，无声的乡间小路，独自一人无声地散步，工人们望着他时的无声的眼光，儿子离开他时无声的泪，还有将他数次打倒时的那些没有遭到任何反对之声的决定……

他深知国家需要共产党掌握领导权，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sup>②</sup>。这种说法也一定有着痛楚的感受作为铺垫。因为这种官僚主义的危害不仅牵涉到他本人，甚至还危害着他的孩子。小儿子沦落山西农村，只在极罕有的机会里才能父子相见。女儿还记得父亲为儿子送行的那一天，伤感之情令他无法自制，“面色苍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更何况还有长子朴方，因他的问题受到株连，党籍学籍不保，批斗致使胸以下全部瘫痪，在京郊一所救济院里度日如年，全靠自己唯一还能活动的双手编纸篓来维持生活，虽终日高烧不断亦不能停止劳作。听到这个消息时的那个悲痛欲绝的夜晚，邓小平夫妇至

<sup>①</sup>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145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141—142页。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今难忘。

又比如他告诫他的听众：“要相信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他甚至说：“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这话也一定包含着他对普通人的情感。正是由于落难江湖，他对官场中的种种虚伪更加了解，而人世间的真情常在百姓中间。诸如一个工人在他劳动的时候帮助了他，一个妇女送给他家一些做米酒的酒药，另外一位工人为他的儿子到处申诉和治病，几个工人悄悄地把每天必经的小路修整平坦，这样的一些事情让他一家没齿难忘。10年以后，当邓小平80岁生日的时候，他的一家想到的就是这些。女儿毛毛撰文说，这些正直的普通的中国人像“大海岸边黄金一样的沙粒”，“无论是巨浪，无论是泡沫，都永远吞蚀不了，淹没不掉”。这篇文章感人至深。像亲情、友情、爱情这样一类的情感，本是属于普通人的，邓小平如非落难，绝不会有这么深切的体验。在1978年12月13日，他尖刻地讽刺党的官员中间存在的虚伪贪鄙之风，并且痛切地指出党的领导制度需要改革；又在其后的几年中把老百姓作为改革的基本力量——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邓小平并不希望毛泽东落得斯大林的结局。他决心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至少五次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两个凡是”<sup>①</sup>。不过，毛泽东的思想和毛泽东的行动是两回事，就如同作为神的毛泽东和作为人的毛泽东是两回事一样。邓小平不需要毛泽东的错误，但是他需要毛泽东的旗帜。他说：“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sup>②</sup>他的诚意得到同事的尊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被有些人批评为背离了毛泽东的道路，而被另外一些人指责为不能把中国彻底地从毛泽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并不因为这些批评而改变他的既定方针，旁人处在他的位置，可能会首鼠两端，左顾右盼，可是他这一辈子什么阵势没见过？现在大权在握，再也用不着温和谦恭，他径自我行我素。

这些指责交织在一起，酿成了邓小平时代的第一次风波。不过，这是几

---

<sup>①</sup> 邓小平五次批评“两个凡是”的时间为：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日，1978年6月2日、9月16日。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sup>②</sup> 关于这一点，邓小平讲得最多的是在1980—1981年。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

个月以后的事了。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1978年12月的这个会场上来。邓小平的时代显然要从农村开始，因为这时210位与会者正在讨论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其最后的通过，对于人民公社的命运甚至整个中国，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不过，今天来看这两个文件的内容，一个仍然是毛泽东留下的遗产，另一个也只是承前启后的过渡。

毛泽东最重要的遗产之一，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他一生签署的指示不计其数，但是由他本人亲力亲为的并不多，这“条例”为其中之一。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当日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乃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反省。按照他的想法，这一文件一经形成，其“不变”的周期就将延长到“三十年”。现在，1978年12月，“六十条”的生命还远未到“三十年”，毛泽东已不在人世，轮到邓小平来考虑人民公社的前途。“两个凡是”已经威信扫地；人民公社也已日暮途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正在实际的进程中悄悄发生变化，只不过不是如毛泽东所愿走向更大规模——比如以大队或者以公社为基本的核算单位，而是退回更小的规模。包产到小组的风尚已经弥漫在安徽、四川、贵州、河南诸省，甚至“包产到户”也开始蠢蠢欲动。

所有这些全都成为当时会上议论纷纷的题目。这样，共产党内部就前所未有的发出多种声音，而且居然牵涉到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今天将这些议论归纳起来，大致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定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并无弊端，只是由于“四人帮”的捣乱才变得丑陋起来，所以只要返璞归真，便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一种是认为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方面值得保留，但它有着极大的弊端，故为“四人帮”所利用，所以，纠正弊端就可迎来公社的春天。这在与会者中间占了大多数，包括过去十多年间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部分政府官员和部分农民中的精英人物。最后，只有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敢于设想，人民公社制度扼杀了农民的热情和创造性，导致农村的衰败，其集权的性质不可能满足人类起码的自由原则，所以人民公社必须废止，代之以市场化和民主化的制度。

不过，邓小平似乎还不打算把公社的蓝图彻底抹去。眼前这个会议上对于“六十条”的讨论，虽然修改之处甚多，但是并没有对其主导思想以及关键部分加以修正。比如人民公社仍然是今后农村必定要走的道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然是人民公社不可改变的制度云云。“新六十条”所增加的内容，大体只是“四人帮”如何地破坏了人民公社，所以现在要把“六十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条”加以重申，以激励农业更快地发展。邓小平的战术是先为未来确定新的意识形态，至于技术方面的步骤则属于枝节问题，即使不去追究，也必定会随着根基的动摇而瓦解。

但是邓小平在一个要害的地方采取了行动，这就是终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以使全体中国人一心一意搞经济。他极巧妙地把在“真理标准”争论中所获得的战果引进经济领域，说必须坚决地修改和纠正那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政策。这就是邓小平所谓“工作重点转移”的关键所在。他的主旨为党中央所接受，并且发表在后来的会议公报里。

今天回过头来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部文件，就会想到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老实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真正听到过从邓小平嘴里说出的这句话。这话之所以赫赫有名，可能还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间它曾经是邓小平的一个罪状。后来的史学家在说到这件事的时候，只能证明邓小平此言大体出于60年代初期，却无法指明邓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以及什么地点讲过。十年以后，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即以“白猫、黑猫”题名，作者贾鲁生说这是全世界最为著名的格言，但他仍然没有说明它的由来。倒是一个名叫巴拉奇·代内什的匈牙利记者研究邓小平多年之后，作出他自己的猜测。他说此话本是出自邓的家乡四川省的农家俗谚。“在那里，啮齿动物总是损害庄稼，”他写道，“因此那里的人们常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另外一位研究者却试图证明，第一次将此论用于表述共产党之大政方针的人，并非邓小平，而是刘伯承。但是，尽管有这些节外生枝，我们仍然相信邓小平具有这种思想并且在相当高级的场合里讲过这句话。否则，当邓小平因为这句话受到这么多的贬斥和磨难时，他不会不加申辩。这一点直到90年代才由薄一波加以证实。据薄一波的回忆，邓小平在1961年6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并且说这话是安徽人所说。但是在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再一次重申这话的时候，又表示这是一句四川话，曾为刘伯承津津乐道。<sup>①</sup>从这以后，再也没有人听到过邓小平在任何公开的场合重提“猫论”，但他的整个80年代的改革部署，分明充满了“猫”的精神。

话说回来，邓小平的“猫论”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事实上，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热情一度并不亚于毛泽东。他本人也从未想过要为自己掩盖。比如

<sup>①</sup> 参见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1980年他承认自己是反右积极分子，并且说：“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他还劝告人们不要把“大跃进”的失败全部推诿于毛泽东。他的话听起来至为勇敢真诚：“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sup>①</sup>很明显，邓小平并不想做一个一贯正确的领袖，他信奉的是没有人会一辈子不犯错误。这恰恰是他的过人之处。不过，邓小平最引人注目的品质乃是他的求实精神。有一段时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声势颇大，北京的街头却流传起邓小平的一句话，说是“毛主席的著作我就记住了四个字：实事求是”。这话传得有一点走了样，其实，邓说的是，毛主席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今天来看，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来自他对1958年失误的痛楚，他的“猫论”也是由此才产生出来的。一些内部报告提供了公社社员挨饿甚至死亡的消息，这令总书记至为震惊。他在1961年春天去了农村，在那里亲眼看到农民的悲惨情形。于是他坚信自己错了，党的方针也错了。似乎就是从这时起，他对意识形态的争斗失去了兴趣，他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务实的人。他说“我们必须使非法的事情合法化”，“现在一切都取决于生产更多的粮食，只要产量能上去，就可以允许个体的主动性”。紧接着下面的一句话，就是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时大约是1961年3月。

邓小平为这句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却始终不渝，直到1978年12月仍未改变。22日，毛泽东的“六十条”在经过修改之后，由全体中央委员举手通过。不过，“新六十条”依然只是“试行草案”，而且日后也从未成为正式的文本。它无声无息地跑了出来，很快便被人遗忘。十年以后，官方的史料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在回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甚至已经完全不再提起它。毛泽东的时代在“清醒过来”的时候创造的“六十条”，邓小平时代却在清醒的时候把它扔到一边。

今天历史学家不厌其烦津津乐道的文件是另外一个。它是这次历史性会议上产生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被210位与会者举手通过，并且下发到乡下去执行，文题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不过，《决定》在当日仍只是“草案”，其最后的定本，要到十个月后的下一次中央全会上才能通过并且公布出来。将1978年与1979年

<sup>①</sup>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页。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的两种版本加以对照，修正多达百余处，大部分是技术性改动，但有若干重大关节处的变化，就绝不能用文字或者技术性的改动来解释。比如1978年版本中的“不许包产到户”六字被删，而代之以“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显然是因为实际进程中“包产到户”已难以阻挡，令党中央对这个昔日“最危险的阶级敌人”略加宽容。比如1979年版本中增加“我们狠抓粮食生产是对的，但是忽视和损害了经济作物、林业、畜牧业、渔业，没有注意生态平衡，这是一个教训”一句，显然是对毛泽东“以粮为纲”的露骨批评。新的版本还将“要继续抓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把这个运动同贯彻执行上述各项政策和措施紧密联系起来，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这一整段一笔勾销。这就已经明显地暗示，华国锋发动的“普及大寨县”的运动应该结束，因为它与执行新的农业政策已经无法“紧密联系”。最后，它还毫不留情地删去了“首先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这又等于是宣告毛泽东倡导并由华国锋继承的“在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计划已经流产。

但是，在1978年的这个冬季里，农业方针的变化在可以操作的步骤上还是含混的，新的决定中仍然带着历史的惯性：不许包产到户，生产队的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地位是不能改变的，粮食关系到备战备荒之宏旨，所以一定要抓得很紧，普及大寨县和执行党的政策是一回事，农业机械化仍然是农村的首要目标……这一切令人感到既定方针的不可动摇。但是，人们仍然把它视为新时代的起点。后来十几年中，无论赞成还是批评邓小平方针的人，对这个起点的界定倒是一点也不怀疑。看来，在新时代的起点上，邓小平给予农民的最大好处并不在于技术细节，而在于思想观念。农民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懂得了把“白猫、黑猫”的理论用以对付阻碍他们行动的教条主义官员。所以虽有“不许包产到户”的禁令，但是那些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都一律从文件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们需要的鼓励。“三中全会的精神，用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对访问他的一位记者说道。事实的确如此，农民从这个历史性会议上得到的全部实惠，就是“可以”二字。后来几年的事态发展证明，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

然而有一个重要决定的获得通过，在这个会议上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这就是部分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按照中央委员会批准的文件，到来年夏季



粮食上市时，将把国家收购价格提高 20%。还许诺将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和林产品的收购价格也作出相应的提高。这一决定的正式通过还要等到 1979 年的秋季，但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行动实际上自春天就已经开始。1979 年 3 月 1 日，国务院依据中共中央决定中的这一条款，作出进一步的规定，将提价的时间表由夏季提前至 3 月。这中间一部分的原因是要将提高价格的行动赶在春耕之前，以提高公社社员的耕作热情以及全年的收成；另一部分的原因是这一项方针本身没有引起任何异议，所以可以畅通无阻。不过，价格的提高由于各地的自行其是，而令最后的统计发生分歧。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叫做《新时期专题纪事》书里说，这一次提高价格的幅度平均为 22.2%，第一批受惠的农产品计有 18 种，果真如此，则超过了中央 1978 年 12 月会议所认可的幅度。不过，大约十年以后，农业部和统计局联合起来对这时的提价之举做了更详细的调查。结论是提高价格的幅度大体为 18%。这一项调查还开列了主要产品的提价幅度：

粮食，20%；油料，23%；棉花，15%；甘蔗，20%；甜菜，25%；大麻，20.3%；柑橘，26.3%；蚕茧，20.3%；蜂蜜，8.2%。

猪的运气比蜜蜂和蚕好些，一头 100 公斤的毛猪原来只能卖 98.92 元，现在则可卖到 125.06 元。母鸡则更加幸运，因为鸡蛋的价格提高了 30%。

最有福气的是羊和牛。羊肉价格提高了至少 35%，而羊绒则提价 45.1%；牛肉的提价幅度高居榜首，为 60%。

上一次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为 1962 年。所以今天乡下 20 来岁的青年，根本就不会知道还有提价这回事，尤其不会知道他们手里的东西原来能值更多的钱。200 多官员在一天里一举手，8 亿公社社员收入就在这一年里大约增加了 108 亿元。当时农产品的出卖所得在他们的全部收入中占有 85% 的份额，此中又有大约 70% 出自粮食。这就可以想见，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针，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利益上均给予农民极大的震动。因为他们迄今为止所接受的全部教育，都是告诉他们如何压制自己内心深处的发财梦想，以及如何为国家作出贡献。他们在人民公社 20 多年所做的一切，都具有爱国的性质，诸如“爱国粮”、“爱国棉”、“爱国猪”、“爱国菜”云云。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等于是公开承认他们的产品与金钱的直接关联。这就牵涉到当时农村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农民的劳动是为了意识形态的净化，还是为了物质利益？

也许是出于这样一种理由，大多数评论者都说此举是一种划时代的变革，其实这也是一种过分的夸张。提高价格与共产党以往的方针来比较，虽然可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以说是皇恩浩荡之举，但是平心而论，却并没有在农业方面开辟出新的道路。就制度方面的含义来说，即便它是了不起的一步，也仍然因循着统购统销的既定道路。肯定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没有遭到任何方面的反对，这与“包产到户”所遇到的激烈对抗形成鲜明对照。看来，至少在这一点上，当时我们的国家宁愿以数百亿元来买得旧体制的稳定，而不愿主动采取超越常规的举动。

这中间的含义，一定要和政府奉行了 20 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联系起来，才能使人理解。按照既成的制度，农民劳动所得的大部分，是由政府来控制的。政府一旦规定所需农产品的品种数量及价格，农民即须遵守，无论收成丰歉，都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倘若农民余粮不足，则应以自家预备的口粮先行上缴，然后政府再酌情以国库陈粮返销，补充农家食用。政府将乡下购得的粮食运至城里出售，购买者亦须依照政府规定之数量和价格，同样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这种制度被叫做“统购统销”，其建立，当在 1953 年的 10 月。在此之前，农产品营销当中有相当部分由私商操作。从这时起，私商被陆续宣布为非法，而由中央及地方的政府接管农产品的营销。这种管制先是在粮食方面进行，然后是油料、棉花、生猪、烤烟、茶叶之类，到 1957 年，又包括所有品种的水果和中药。又过了大约三年，这种制度最后完善起来。那正是我们的国家坠入大饥荒的时候，对于农产品的管制达到了最严厉的程度。粮棉油除政府所辖商业部门来经营之外，其他营销者哪怕只交易一斤一两也属非法，这叫做“一类物资”，是为统购；其余农产品大体属于“二类”，为派购。名义上，“派购”产品在交足国家计划征购部分后方可上市，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因农业生产能力极低，而国家的征购数额又极为庞大，所以农民在把自己的收获呈缴国家仓库之后，所余无几，所谓“剩余上市”一说，其实有名无实。所以，虽然名义上统购和派购的产品为 20 种，但实际上由国家控制的农产品可以多至 230 多种，几乎囊括了农民在土地上的全部收获。

对于政府来说，这种制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购买农产品的价格总是低于市场的价格。所以，虽然农业本身税率极低，但是农产品之强制性的低价收购，与工业品之高额售价间的差额，是对于政府的一种补偿。而且，这种差额的日益扩大，可以令政府以隐蔽的方式将财富从乡下集中到城里，为其工业化目标提供资金方面的积累。其具体的步骤，是使城里人获得低价的衣食供给以及低价的工业原料。如此，则又可以在工厂里面实行低工资和低成



本的制度，来提高工业的利润和积累。20年后，中国经济学家将这种制度所带来的隐蔽价值公开出来，说它大约有6000亿元。这大致相当于同一时期政府用在工业上的投资。

这种制度的秘密一旦大白于天下，其不合理的方面也就暴露无遗。问题在于，它在长达20多年的实行当中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这就不能不归功于人民公社的建立。公社本身为生产的组织，又是分配的组织。农民的劳动所得全归公社，个人不能直接占有，就如同他们不能决定自己的劳动一样。所以，这种制度不仅可以保证农民与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得以长期进行，而且也可以保证农民无法以减少生产的办法来表达不满。但是，这种制度却不能改变人的本能中追求劳动所得的天性。农民利益的被剥夺，造就着农村中广泛的消极怠工以及对土地的不负责任，虽有种种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亦不能扭转此种每况愈下的局面。

现在，政府再一次提高收购价格，客观效果是使隐蔽的差额大大缩小，但却并没有对制度本身的弊端加以纠正。比如这种差额在1952年，也即实行统购政策之前的一年，为66亿元，到了1978年就多至337亿元。1979年的提高价格，使其在当年就减少至200多亿元。如果农民知道在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个地方叫做国际市场，那里也有粮食的交换，并且有能力把自己的小麦送到那里去，则他们换回的食盐可以多88.6%、白糖多53%、火柴多47%、化肥多22%、白布多11.4%、煤油多2%。可惜他们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没有办法把他们的小麦弄到那里去。所以，他们只以为政府在这一年里让他们多得到108亿元的好处，却不知道，政府其实只是从他们的手里少拿走了108亿元。

新一代领导人当然深悉此种制度的奥妙，所以他们面临着历史上的一个大难题：既需不断地弥合这个制度的缺陷，又不能彻底地改变制度本身。此后几年，他们不得不一再地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同时又不能取消城里人所享受的低价食品，以致令提价的方针成为政府财政上的一大负荷。到了8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方针已经无法继续。就制度而言，由政府决定价格的方针本身就埋藏着失败之因，倘若不能最终依靠市场的力量，则政府无论怎样殚精竭虑和让利于民，也断无成功的可能。

12月23日的晚上，全中国的老百姓都从收音机里知道了邓小平的打算。记者们纷纷跑到街上去收集鼓舞人心的消息。一位记者写道：“23日晚上，广播公报的声音响彻家家户户。”另外一位说：“24日早上，刊载公报的报纸在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街头迅速销售一空。”新华社的消息里特别提到，会议已经号召中国人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对于中国来说，否定阶级斗争理论是一个重大变故，但是，震动远比人们预料的要小。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变故，他们已经习惯于在不假任何思索的状态下，张开双臂接受任何变化。新中国里出生的人合起来差不多已有6亿，这时候全都不满30岁，略大一点儿的都知道“变天”的概念并非只有气象台的预报员才用得上。只要想想在他们长大成人的这些岁月里面中国发生的事情，就不会对这种心理感到奇怪。50年代初期将资本家的工商产业剥夺过来，几十万资本家都成为穷光蛋也不过为一夜间的事，现在的青年那时候还穿着开裆裤呢；到了七八岁的时候，是合作化，他们就看到他们的父辈怎样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的土地充了公；十来岁就看到了“反右派”，几十万知识分子的“百花齐放”，一下子全都成了“大毒草”。这些都没有令他们有一点点惊讶。到了他们上中学的年龄，周围就更加热闹，毛主席的理论层出不穷，一会儿“天下大乱，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一会儿“亡我之心不死”，一会儿“要关心国家大事”，一会儿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一会儿“走资派还在走”，一会儿“安定团结”……古代大诗人苏东坡将人世间的种种悲欢离合，用月亮的阴晴圆缺来加以描述，半是忧伤半是潇洒地说“此事古难全”。今天的中国人则用月亮来形容党的政策，说是“初一、十五不一样”。可是无论怎样的“阴晴圆缺”，中国人又有哪一次不是张开双臂来欢迎的？

组织声势浩大的游行已经不大时兴，城里人对这些事情大概是疲倦了，没有再跑到街上来高呼别人教给他们的口号；乡下人整日为了衣食牵肠挂肚，哪里还有敲锣打鼓的闲情。不过，大标语还是盖满了街头，政府机关的大门上张灯结彩，商店把巨幅贺词覆盖在商品之上。那一个早上，中国大陆出版的253家报纸，一律将鲜红的颜色套在自己的头版上，有的索性还把这象征节日喜庆的色彩染到二版和三版上去。新华社的消息说，北京的“人们精神振奋”。到了第二天，记者们可能是觉得这样的话这些年里已经说了无数次，今天再一次重复已不够味道，所以各地报纸又发布消息，说有14个省、市的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在23日连夜开会。记者们异口同声地说：“大家表示，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适应这个转移，跟上这个转移。”随后，大部分省、市的领导人沉寂下来，他们中间一些最重要的人物本身就是会议的参加者，亲临现场，自然会将种种内外关节一一看在眼里。他们需要时间向下级通报一些惊人的消息，并且一同来考虑如何应对新的局面。但是，舆论并不会出

现空白，各个大报的总编辑早已经运筹帷幄，全部的程序乃是仿照十几年来屡试不爽的办法。到了第三天，该轮到社会各阶层的代表出来发言。于是，最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就有机会在《光明日报》上表达他的激情。他写道：“盼！平生的盼望！早就盼着这一天！”<sup>①</sup> 其余名人雅士也都不甘寂寞，或撰文或演说地讲述他们的“盼望”。甚至佛教界最有名望的班禅大师也介入进来，他用一种大有禅意的话来影射华国锋的理论：“我历来认为，为了永远不穿草鞋暂时穿草鞋是应该的；如果为了穿草鞋而穿草鞋是没有意义的。”<sup>②</sup> 然后又轮到普通百姓。山西省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郭风莲蹲在著名的狼窝掌里说：“太符合我们贫下中农的心愿啦！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贫下中农想到一块啦！”<sup>③</sup> 她还不知道“英明领袖”现在有多尴尬，不过不久就会知道，而且她自己也会饱尝这种尴尬的滋味。那时还没有那种大铁锅似的东西来转播卫星播送的消息，但到了第五天，遥远的丝绸之路上也有“盼”的声音传来。一位叫做肖克忠的铆工将20年来的政治运动一个一个数了一遍，然后说道：“国家受害了，人民受苦了！我们盼的就是今天，可盼来了。”<sup>④</sup> 后来的几个月中，这种情绪迅速弥漫起来，有一句话在上上下下大为流行，这话说三中全会是“第二次解放”了中国。

对于那些终于摆脱屈辱重蹈政治舞台的老人们，说“第二次解放”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多少年来大家第一次发出了由衷的笑声，邓小平也以胜利者的微笑来接受大家的祝贺，不过，他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放下心来的。这倒不是因为他经历的风波太多，以致今天还在担心天有不测风云。他是熟谙政治舆论的行家里手，知道民心的价值。表面的舆论常常不能说明真相。两年又八个月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舆论也是一夜之间铺天盖地，举国高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批邓’进行到底”。这件事给予邓小平的印象太深了。他根本不会相信那是民心。报纸叫做“党的喉舌”，其实党是由人组成，因而报纸只是最有力量的人的喉舌。几天前，他在中央全会上曾尖锐地说，在共产党内，大家只能奉命行事，什么问题也不用思考。不讲原则，

① 《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6日。

② 《中国新闻》1979年1月1日。

③ 新华社新闻稿1979年1月8日。

④ 《人民日报》1978年12月30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说话看“来头”、看“风向”，“随风倒”的现象已经多起来。<sup>①</sup>过去是随毛泽东的“风”。现在，轮到他邓小平主持大政，他必定也对这种现象抱有高度警惕。问题不在于人们表面上说什么话和敲什么锣，而在于心中所想及弦外之音。

1979年元旦刚过，省委书记们使用自己的言论把报纸的头版占去了大半。农业以及农村的问题乃是必须要说的话题。安徽乡下有些地方本已经悄悄地把田分开，这时候却看到了全会决议上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看来他们的行动大有越轨之嫌，这时候只好先避开短兵相接的搏斗，采取远兜远绕的迂回战术。历时15天的省委会议宣布了自己的方针：“在建立健全责任制的问题上，思想要再解放一点，办法要再多一些。”它还说：“生产队愿意采用什么办法，应由群众民主讨论决定。”等于是说，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这一条是算数的，但这“不许”、那“不许”可不一定算数。<sup>②</sup>青海省的领导一下子没有看出此中奥妙，却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省委机关报发表了一篇不痛不痒的社论，说“在我党的历史上，每逢历史性的转变关头，都会伴随着全党的学习运动”<sup>③</sup>。邻近的甘肃省，报纸也在早几天发表了社论，说政治要保护经济，阶级斗争必须同排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联系起来。<sup>④</sup>赵紫阳这时还未进京，还在四川省当他的省委第一书记。他虽未像万里那样在农村发起对人民公社的挑战，但他明显地对华国锋的失势与邓小平的崛起感到愉快，而且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丝要在邓的道路上大展宏图的情绪。他在四川省委会议上报告：“从总体上说，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已经扫除。”<sup>⑤</sup>这话的大胆之处在于，当公开的舆论还把华国锋看作党的中心时，赵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他扔到一边了。辽宁的任仲夷也是数十位省委书记里面最具反叛精神的人之一，几个月前，当“真理标准”的争论双方还胜负未卜的时候，他最先表示了自己反对“凡是派”的立场，这是中国官场上极少见的勇气，可是这时他还是没有敢直面“包产到户”。他的办法是把精力集中于阐述较少争论的问题，他告诫下级：“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必须抓住一个中心，

---

<sup>①</sup> 参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

<sup>②</sup> 《安徽日报》1979年1月19日。

<sup>③</sup> 《青海日报》1979年1月5日。

<sup>④</sup> 《甘肃日报》1979年1月2日。

<sup>⑤</sup> 《人民日报》1979年2月15日。

就是工作着重点的转移。”<sup>①</sup> 这话现在已经不会再有风险，因为即使是华国锋也不会反对这个话题，只不过，华的“转移”与邓的“转移”不是一回事。

看到舆论绕来绕去还是在外围徘徊，《安徽日报》似乎有些不耐烦了，它发出进一步的暗示，说“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土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块水面没有利用起来，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这里面主张“包产到户”的味道，即使再愚蠢的人也会闻得出来。可是多数省区要么是真糊涂，要么是太聪明。整整一个月里，没有人出来呼应安徽的声音。到了1月下旬，终于再也不能回避。西部的陕西省打破了沉默，但不是附和安徽的声音，而是相反。23日，陕西省省委会议决定：“必须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刚刚进入政治局的王任重副总理在这次会上讲了同样的话，这使得陕西的理直气壮看上去大有来头。江苏省在东部，与陕西有遥遥数千里之隔，现在却决定与陕西异口同声，省委书记许家屯虽然说要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可是又说：“试行责任到组联系产量有奖有赔办法，进行比较，但不要急于全面推开。大农具不能分，更不能‘包产到户’，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坚决纠正过来。”<sup>②</sup> 这大致是重复了会议的文件。这一来，不少省委书记都记起三中全会上的这一句话，于是全都照方抓药，包括云南、新疆、山西、河北、河南、湖北。这是一种无论什么风吹浪打都不会翻船的办法。看来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的力量仍占有绝对的优势。四川这时也许有一点犹豫。私下里，赵紫阳在省委扩大会议上问，干部最大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大家说，最突出的是“恐右症”。这种思路要是延续下去，四川立刻就是安徽的同盟军了。果然，会议发表的决定给了农民一个前所未有的解放，它说：“各种办法都可以进行试验。”不过，赵还是没有勇气拆除最后的屏障，他重申，“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sup>③</sup>。广东省的习仲勋再次仗义直言，只是略施小计。他们说，只要不分田单干，各种不同的办法都应当允许。<sup>④</sup> 他们的小计谋是故意不提“不许‘包产到户’”。既不禁止，农民也就可以实行；可是他又没有允许，一旦有失，作为一省之领导，还大有退却的余地。另外一些省委书记一定意识到这里面事关重大，所以与其打一场无准备之仗，不如行兵家避实

① 《人民日报》1979年1月9日。

② 《新华日报》1979年2月19日。

③ 《人民日报》1979年1月31日。

④ 《人民日报》1979年2月7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就虚的策略。内蒙古的周惠说，内蒙古的“关键是解决好遗留问题，配备好领导班子”<sup>①</sup>。山西省还是念念不忘它的大寨，第一书记王谦说：“大寨是在毛主席指引下成长起来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sup>②</sup> 湖南的书记毛致用也学着山西的话，一句也不提生产责任制，只是说湖南“要继续坚持学习大寨的基本经验”，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发表这个讲话时，竟把这一句话全部删去，令毛书记大为紧张了一阵。<sup>③</sup>

到了2月，表面的热闹已经平息，大家都发现气氛有些沉闷。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心口不一的本领，非到关键时刻，不会把心里话讲到桌面上来。大多数报刊的编辑都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用“心有余悸”来描述那个时候的局势。《安徽日报》的文章说：“十分明显，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地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然后作者就鼓动人们去做“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sup>④</sup>。

不过，真正心口不一的还不是这些心有余悸的人，而是另外一些从来不知“悸”为何物的人。对于他们来说，邓小平的得势是一场灾难。这种情绪虽然从未公开表示，但在私下里却也宣泄得淋漓尽致。有人问：“现在的党中央姓马还是姓刘？”这是把马克思和刘少奇当作“主义”的分界。有人说：“果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不错，修正主义出来了。”三中全会闭幕那一天夜里，山西省运城地区党委的大院子里，就贴出来几条标语，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说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标语的书写者竟是地委机关里的一些干部。湖南省的传言中，有一种说法借用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容，说三中全会后“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还有人说，“中国将在混乱之中前进，好像电影《逆风千里》一样”。这电影说的是一支军队如何在极为恶劣的气候里与敌人作战的故事，这些人借此来形容新的时代。可见确有不少人对邓小平的主张怀着深深的不满，等待着再一次“变天”。

事情有些稀奇古怪。沉寂了两年的中国，如今居然在一夜之间就急剧地旋转起来，每一个人又都忍不住要将满腹智慧一吐为快。那一年的年初，似

① 《人民日报》1979年1月24日。

② 《山西日报》1979年1月25日。

③ 见《湖南日报》1979年6月5日和《人民日报》1979年6月19日。

④ 薛理：《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见《安徽日报》1979年2月12日。



乎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站在街上拥挤的人群里面，大发议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当作讲坛。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讲坛是由当代中国一群最著名的文人开辟的。

文人们现在要把思想解放的成果再行扩大。他们对“两个凡是”的初次打击居然获胜，这是从未有过的战绩。看来乘胜前进是必要的。1月18日，文人们聚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里几乎所有有点名气的人都来了。这可真是一个理论的春天，只不过，会议的名称有点怪：理论工作务虚会。

会议看来具有某些官方色彩。其最初酝酿是在党的政治局中，由叶剑英提议，而由胡耀邦全力推动。但是数百名与会者却是形形色色。这些人满怀豪情整整说了一个春天，直到4月3日才算完事。《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在十年后还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路线的大转折，务虚会是理论上的大突破”，而且，他还找了一句培根的名言来歌颂这个春天的价值：“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

他的激动乃是由于这些人对中国既成的理论体系发起了范围更加广大的冲击。其矛头之尖利，已由马沛文所开出的一个长长的序列加以证实：

- 革命经常被滥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应该抛弃；
- “文化大革命”是武化大破坏，没有一点文化的味道；
- 毛泽东的错误千真万确，批评毛泽东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 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条恶性发展的左倾路线；
- 必须废除领袖终身制；
- 不是人民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
- 指定接班人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
- 人治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靠不住；
- 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法院只服从法律；
- 反对“协商最好”，应为民主选举恢复名誉；
- 警惕封建复辟，“四人帮”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
- “建党大纲”完全错误；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反右斗争是一大政治失误；  
不应有思想犯、言论犯、政治犯；  
应给刘少奇平反；  
发扬民主不是恩赐；  
经济的问题，根子是国家所有制；  
不应再给现代化贴什么“主义”的标签；  
国家盲目的计划，危害不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愚昧无知的保密制度应当废除；  
破除理论工作中的奴才气；  
党的领导人的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反对；  
反对理论恶霸；  
……

会议后期，邓小平发表一篇讲话，此文后来录于《邓小平文选》，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一讲话震动了全中国，其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两个凡是”的破产。对这些表述的毁誉均极为鲜明，从此各色人等为此嫌隙丛生，难以弥合。不过，那是今后的事了。但在当时有一件事非常令人奇怪，这些最优秀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用了这么多的时间，说了这么多的事情，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提到农民的饥饿，以及农村里的“包产到户”呢？看来，当日这些人思想无论多么解放，还是对乡下的事情了解不够，估计不足。

就在这时候，京城里面聚集了另一群年轻的理论家。这些人均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民主思想而无既得利益。但是当时这些人还只是一些民间的清谈家，在他们所谈论的种种宏图大略中，有一个今天看来颇值回味：

我们的国家一定要有根本的政治变革，可是又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呢？  
——他们说，要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入手。

经济体制的改革又当从何处做起？

——他们说，从改变计划体制入手。

然而计划体制庞大无比，又当从何处做起？

——他们说，从改变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做起。

统购统销又当怎样改变？

——他们说，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人民公社又怎样改变呢？

——他们说，从农村里面实际变革进程开始，也即推动“包产到户”。

官方发动的解放思想的潮头刚刚过去，民间理论家们的设计已令人惊讶地预示了我们的国家在未来十年所经历的改革过程。不过，在1979年的这个春天，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理论家们，都还没有足够的智慧预见到下面一个事实：在已经开始的一年中，真正改变中国方向的事情不是文人的理论，而是农民的行动。



## 第五章

# 从昔阳到凤阳

“张浩事件”——陈永贵的辉煌与黯淡——“要吃米，找万里”——“包产到组”：向人民公社制度的挑战——尊重农民的选择





中国农业的大旗由昔阳易帜于凤阳<sup>①</sup>，是有相当具体的时间的。

1978年12月26日清晨，风和日丽，为京城冬季里面少有的好天气。此刻陈永贵正在城北交道口大街他的四合院里往来踱步。像往常一样，他早早地起床。这一天本是毛泽东的诞辰，在他陈永贵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他还记得11年前那个12月26日带给他的辉煌。那一天，大寨淹没在一片红旗彩灯和标语的海洋里。为了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更加引人注目，他选择了毛的生日来庆祝大寨的丰收。数千人从东西南北拥来，如朝圣者的队伍进入6亿中国农民的麦加，列队四行接受他的检阅。他还在这一天里接受了17个县、20个公社和340个大队的贺礼，收到400张喜报、100份“决心书”和至少4个歌舞团的男男女女们献来的舞蹈。这时候他在冥冥之中感到自己的精神力量之大，足以相当一颗原子弹的威力。于是他让全体大寨人豪迈地致电毛泽东主席，其电文至今读来仍让人激动不已：“大寨掌握了您的光辉思想，就变成了强大的精神原子弹！这颗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爆炸了，炸得革命人民欢天喜地，炸得牛鬼蛇神胆战心惊……”陈永贵那个时候肯定认定自己手里的旗帜永远不会坠落，所以他对伟大领袖保证：“十年以后，我们还要召开比这次更大的庆丰收大会！再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报喜！”如今正是十年以后，眼前却是一片落寞萧瑟。没有了红旗，没有了语录，没有了贺礼和喜报，没有了决心书和歌舞团，没有了毛主席，也没有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只有一种特别难以平复的感觉如鲠在喉。他明白这种感觉乃是由于他主管全国农业的权力实际上已被剥夺。就在前一天下午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王任重由陕西省委书记一跃而居京城重任，一身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其角色刚好取陈永贵而代之。陈永贵长期观察政海风云，知道自己虽然还在副总理位上，却已是明日黄花，所以他才能够用一种洞悉一切的口吻告诉儿子，他无法继续忠于职守：“唉！干不了

<sup>①</sup> 昔阳是山西省的一个县。在人民公社的时代，昔阳以及它所辖的大寨大队是全国农民学习的榜样。凤阳是安徽省的一个县。它在80年代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因此成为农村改革的象征。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啦！人家不免咱，咱也别等人家免，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然而还有更加令他感到忧伤的事情。老实说，陈永贵原本不过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农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走进帝王将相出人的红墙深宫，现在就算夺去顶戴“乌纱”，他仍旧可以扎上他的白色头巾务农去。他的心肝是他的大寨，叫他不能平心静气的也正是这件事。大寨不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么？怎么这些人连大寨也要反对哩！他恨恨地告诉李韩锁：“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日蒸蒸日上的胡耀邦。胡耀邦居然敢说大寨的农田建设是“劳民伤财”。陈永贵一气之下，就觉得骂其为“狗日的”仍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于是又说胡耀邦是“胡乱邦”！

胡耀邦从来没有去过大寨，也不懂农业，所以陈永贵不会相信他对大寨的攻击是出于自己的主张，进而怀疑所谓“劳民伤财”一说乃是出自他人的唆使和告密，昔日反对大寨的人有极大的可能集合在这个新的权力周围。一个最明显的迹象就发生在三周以前。1978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将一封来信摘编出来，写信人自称“陈灵风”，来自山西，其述评的矛头全部指向大寨。他说报纸上宣传的学大寨是“胡乱吹”，昔阳学校的升学率倒数第一，还说大寨和昔阳的人纷纷升官，却丢掉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传统，是“国家出钱，农民种田”。尤其令人难堪的是，这个人居然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证明其所言不是伪证：比如六十九军把郭庄水库的水引到大寨、墨西哥总统送给大寨喷灌设备、政府出钱安装了高压电线、省军区的官兵放炮炸跑了冰雹……这个姓“陈”的还质问那个姓“陈”的，说“有必要把很大的山搬掉，去造那一点地吗？这样的干法合算吗？”最为要命的是，信的作者认定大寨没有和“四人帮”顶着干，甚至还骂过邓小平是“邓纳吉”，这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中共中央机关报把所有这一切无遮无拦地印行成册，到了第二天一早，就摆在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办公桌上了。

陈永贵并不知道陈灵风为何许人，但是，以多年的政治经验，他完全可以断定，若无更高权力机构的支持，陈灵风断不敢写出这样一封信来，即使写了，《人民日报》也不会采取行动来响应。从12月2日到25日，所有的一切看来都像是安排好的，时代终于逆转，中国农业的旗帜由此也就在昔阳坠落而在凤阳升起。

陈灵风的告状辗转上达中南海，这是抨击大寨的一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在1978年开始的几个月中，这种活动还只能在暗中进行。大寨在公开的





场合仍然保有昔日的辉煌。中央政府仍将大寨作为农业立足之根本，其信心之坚定似乎还要超过以往。比如2月份有两个规模盛大的会议，科学大会与文化大会，看上去均与大寨极少关联，但是却都在大寨召开。依照华国锋的意见，大寨作为一种象征，其光辉将能普照天下，所以，便有了数千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云集昔阳的盛况。一个月后，昔阳终于略显平静，可是它的四位最显赫人物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又一个月后，国务院副总理耿飏夫妇领来了一位外国总统。到了夏季，郭沫若的骨灰，也撒向大寨的虎头山。大寨全体贫下中农还共撰祭文，悼念这位史学和文学的泰斗，说“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赋诗说大寨是“共产仙乡”，所以死了以后要来到大寨“和我们朝夕相处”<sup>①</sup>。在当代中国，学问之大者如郭沫若，寥若晨星，所以这件事在全体人民的心中当然会留下感情的色彩。不过，大人物死后的魂归大寨仍为罕有之事，郭沫若之后，唯陈永贵一人，那是八年以后的事了。这一年里，毕竟还是活着的人纷纷进入这个小小的山村，总计有182954个中国人和5405个外国人。

不过，到大寨来朝拜的人一天比一天少，舆论的注意力也已悄悄地转而讨论真理的标准。反对大寨的人们日益活跃起来，只是他们还不敢太逾越分寸。

这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影响舆论，日后这种力量就更加微小。到12月陈永贵被夺权留职的时候，舆论对这位昔日的农民英雄已经失去了同情，只不过还没有发展到公开贬损的程度。攻击者首先质问，为什么江青要“三上大寨”，尤其是毛主席辞世前夕，江青居然敢于离开领袖的重病之躯跑到大寨，莫不是大寨与江青有着某种特殊关系？这一质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所以他们又问道：学大寨究竟学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这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颁布的学大寨之“六条标准”，以及陈永贵数年苦心经营起来的“根本经验”。这些攻击仍然没有能够动摇大寨的地位，但是，他们所说的“学大寨”乃是在走一条“左”的道路，却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这一攻击正中大寨的要害，大寨红旗几乎立刻就被拖到了悬崖边上。

局面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个地步，起因至少要追溯到两年以前。1976年10月4日，也即逮捕“四人帮”的前两天，陈永贵已经在感情上站在华国锋的一边，不然，他就不可能在华大功告成之后“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这

<sup>①</sup> 《山西日报》1978年6月22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是18年后《农民日报》记者吴思的描述。陈永贵与“四人帮”的不能合拍，在当时即为人人皆知的秘密。他在江青来到大寨的时候可以做到毕恭毕敬，等到江青一走就会擅自决定在江青的防空壕里面养猪。姚文元始终不肯屈尊到大寨来，令他极为不满。而张春桥对他这个乡巴佬儿的不加掩饰的轻蔑，就更加令他义愤填膺，以致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与张春桥大吵一架。当日这几个文人权倾天下，敢于直接与之对抗者绝无仅有，所以就连最无所顾忌的将军许世友也对陈永贵的勇气自叹弗如。不过，这些疑嫌多是一个乡下农民和城里秀才的差别所致，很难说有什么政治上的动机。“四人帮”顷刻瓦解，陈毫无疑问在心里大大地出了一口气，但是老实地说，他也并不真正明白自己与这些人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他的最得意的助手郭风莲为事态的突变所震惊，一时不知这些人有什么卑鄙的罪行可以让大寨的社员批判，于是求教于陈永贵，陈指点说：“你上去骂狗日的就行。”以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之身份作出如此指示，固然浅薄粗俗之至，但是，当日某些评论说他与“四人帮”早有勾结，也实在是一个冤枉。至于说他没有与“四人帮”对着干，即便属实，也无可厚非。以当日之情景，又有谁能“对着干”？自然不能以此对陈永贵大加指责。这一点，已由邓小平本人加以认定，他安慰陈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这当然也等于宣布，大寨不是“四人帮”的大寨，它与小靳庄完全不一样，后者是江青一手导演出来的一个专门作诗唱戏的村庄。

话虽如此，大寨旗帜的黯然失色，却是由“四人帮”的垮台开始的。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但这并不表明他可以成为邓小平的改革阵营所接受。事实上，在当日中国政坛激烈角逐的几种力量中，陈永贵更有可能属于华国锋的阵营。华的诞生地交城县，与陈的大寨相隔数百里，为同一省份。华国锋奠定自己最初基业的吕梁山，与陈的太行山也是遥遥相望，更何况这两个人又同为“文化大革命”之受益者，政治上的倾向，乃至种种利益攸关的细节，均有更多的相通之处。可谓同仇敌忾，同病相怜。这在二人先后去职赋闲家居的时候，发展为一种至为真切的关怀。这种真情本来极为少有，而在这两个人中间却能至死不渝。大约八年以后，陈永贵终于病逝，华国锋闻讯甚是伤感。就在遗体将要在烈火中化为灰烬的时候，他昔日在中南海里的同事们谁都不肯来表示一下悲哀，对于这些人来说，最后的分手可能早已完成。此时，唯华国锋一人蹒跚而入。他在离职之后几乎不再于公众中露面，现在却置身在一个死者身旁。青灯花影，絮语孤魂，昔日中国政坛上两个风云人

物，生死两依，真有惺惺相惜的感慨。

陈永贵之忌辰为1986年3月26日。当他终于告别人世间种种是非恩怨之后，人们曾经尝试为他盖棺论定。卓儒说他拥护三中全会，还说他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副总理。<sup>①</sup>吴思说他正相反，开三中全会的时候，“一脸气哼哼的神色，见了人连招呼都不打”。孙启泰和熊志勇则将陈永贵连同他名下的一行人马全都说成是“大寨式的干部”，这些人“以各种方式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方针政策”。其实，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明了。陈永贵在政治局的会议上的确投出赞成票，但他的内心却并不是真正的赞成；他不能接受对极“左”的批判和对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的否定，但他却也没有依照他的本性破口大骂起来。过去他强迫所有人对大寨顶礼，全不问人家是否愿意，现在这局面终于轮到他自己来承受，其间滋味或许直到今天才能体会。

陈永贵本人一向热衷于在政治运动中居于领先地位，在真理标准的争论之中却一反常态，不置可否，对批判极“左”也只是冷眼旁观，并且暗中嘱咐大寨不要赶这趟浪潮。看来他做得足够周到，所以到了十几年后，很多人想要从公开的报章上发现他此时的立场，都没有成功。陈永贵的豪放久有名声。现在，他却只能在自己家里指桑骂槐，在公开场合则韬光养晦。这局面虽勉为其难，但他终于做到了。不过，他还是忘记了官场行事的一个基本要则：沉默本身也是一种态度，而他私下表达出来的任何情绪也必有走漏出去的一天。

事情果然如此。陈在家中逢人就骂的情形不久就传播开来，这引起华国锋的忧虑。他不希望这位农民政治家再给他增添不必要的麻烦。的确，任何人都可以借题发挥，说陈永贵的不满是受了华国锋的影响。后来陈对三中全会的决议投了赞成的一票，十之七八是由于华的劝慰。

其实，华国锋无力阻拦的事，陈永贵更加无可奈何。1978年4月，令人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新华社派驻大寨的记者冯东书在这一月回到北京，就听见有人说新华社如此鼓吹大寨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当他和他的上级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都感到新华社有改弦更张的必要。几天以后，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将派驻在大寨的记者悉数撤出。<sup>②</sup>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距离大寨不远的忻州，也有两个人在写信揭露大寨和昔阳的问题。《人民日报》则在自己的版面

① 《山西青年》1986年第8期。

② 《报刊文摘》1989年3月21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上批评道，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搞大队核算等等行为，并不符合党的政策。这显然是在影射大寨。

这些事暂时还不至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但已经使陈永贵感到窘迫。按照他收到的情报，假如不对这种挑战公开还手，事态必将更加严重。但是这个时候大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指挥舆论，陈永贵只好另辟蹊径。这一年阳历10月，昔阳县委副书记李喜慎想要召开大会总结11年间学习大寨的工作，遂将总结报告呈请陈永贵过目。陈指示说与其消极沉默不如主动迎接新的局面，以此来维护大寨的威信。后来李喜慎就宣布说，大寨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也是不应该怀疑的。学大寨的真理已经有11年的实践来证明。这种精心设计的逻辑虽然悄悄地利用了“实践检验真理”的潮流，却正好暴露了大寨的气短心虚，以及论争双方攻守之势的逆转。

尽管李喜慎还在威胁人们：“牢记历史教训，防止在学大寨的道路上再走弯路。”可是人们的情绪已经如火如荼，不能遏制，已经开始一个接一个地致信北京，攻击大寨和陈永贵，这些信件多数都是来自大寨左邻右舍中那些最了解实情的人。人民日报社所刊登的陈灵风来信，只不过是所有这些申诉者中的一个。在陈永贵的眼里，这件事情的真正威胁还不是一个小小的陈灵风，而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公然介入。这中间的象征含义十分严厉，足以在反对者中间引起连锁反应。

很明显，陈永贵已经无法抵御这些控诉。这局面又由于一个小人物的出狱更加动荡不安。此人名叫岳增寿，是邻近昔阳的平定县里一个普通工人。他在1974—1976年连续写了12封信寄给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和叶剑英，其内容全部是控诉大寨的黑暗和陈永贵的无法无天。事情后来以岳增寿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而告结束。岳被拳打脚踢之后继以五花大绑逮捕归案，法院判以18年监禁。但是，到了1978年12月，这个人居然仅仅服刑两年便获释出狱，并且宣布为无罪，这件事与陈灵风的告状信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事情竟会如此巧合，这不是要将人们反对大寨的情绪煽动起来又是什么？陈永贵已经明明白白地看到，在这一系列事件后面的鼓励者中，必定还有报纸，还有省长，还有公安局，还有法院，甚至可能还有政治局里他的那些同事。现在，整个农村都感到1979年的新年钟声宣布了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他陈永贵却除了叹息外，别无选择。

春天来临，万象更新。北京的报纸弹奏出一串串迎春的乐章，灰色的乡

下重新染上淡淡的绿妆。周扬兴高采烈地宣布了气候中所包含的政治意义。他说：中国正在经历 20 世纪以来第三次思想解放，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感叹道：历史上有多少思想家、科学家，都期待着打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sup>①</sup>

不过，在 1979 年这个春天里，最先走出牢笼迎接黎明的中国人，不是思想家，不是科学家，而是农民。农民们将人民公社的耕地依照土质优劣、面积大小以及远近的不同，重新划分开来，又在一种相当自由的气氛中三家五户地结为一个小组，共同拥有分给他们的那一份土地。到了这一年春耕开始的时候，已有至少 200 万个村庄的 3 亿社员采取了这种被叫做“划分作业组”的行动。整个过程颇似昔日土地改革时的“分田分地真忙”，原本生产队的组织结构也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形同虚设。

然而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个既在意料之外、又为情理之中的事件。事件本身的过程转瞬即逝，但它却在新一代领袖的农村政策中间引发了第一次分裂。这局面在当日即有严重的征兆：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北京向阳宾馆里面正在召开一个农村工作会议，数百名与会高级干部为之大哗，以致正常的会议议程无法进行。乡下的社员则目瞪口呆地听着高音喇叭里的声音，然后就不知道是否还应当下地播种。

事情由《人民日报》发动，它在第一版紧挨着报头的地方，刊出一封读者来信，编辑还为读者的意见写了一段长长的按语。写信者名叫张浩，所以后来人们称之为“张浩事件”。

“张浩事件”发生在 1979 年 3 月 15 日清晨。其起因仍要追溯到 1978 年 12 月 25 日王任重的任命。如果这件事能够为乡下的人们所知晓，则多半是由于小道消息的传递。因为直到今日，政府的正式文书以及史学家之笔墨，并没有提到过王任重与此事的关联。

王任重的新职由华国锋总理提议，又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认定，在 12 月 27 日发表。究竟是什么事情使得王任重由陕西省委第二书记一跃而为国务院的副总理和农业委员会主任，在这个异常关键的时刻接替陈永贵来掌管全国的农业？这问题在今天只能有一个大致的估计。王任重是党的老一代革命者中的一员，和当时重新执掌大权的老人们经历过大体相当的荣辱，这使他成为新政权里当然的候选者。不过更加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在党的高层领导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79 年 3 月 15 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人中，他是有着农业经验和农业感情的官员，其农业的思想兼有利益与道德的双重色彩。和他的前任陈永贵不同，陈永贵始终不渝地坚守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实在坚守不住的时候还要唉声叹气，王任重却有着怀疑人民公社的记录。比如1961年他在湖北省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就曾热衷于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所以刘少奇被打倒的时候，他也随着倒霉。当日湖北的报纸把他叫做“刘少奇在湖北的代理人”而大加讨伐。根据麻城县闵集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揭发，他的罪行之一是津津有味地把一个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那故事说有一个姓刘的先生和他的老婆去向神仙祈祷，他的老婆总是舍不得丢下自家的房子和鸡狗，甚至在向神祈祷的时候也不肯忘记。王任重说上天做神仙好比是进入了共产主义，并且要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个故事的寓意，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不要忘记了自己住的老房子和自己养着的鸡和狗。倘若事情果如这个揭发所说，则王任重在那个时候显然认为农民在人民公社里面应当保有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且他不赞成对物质利益的弃之不顾。他的这一主张还可以由他在1961年曾经极力将人民公社生产队的规模缩小的事实来证明。到了1978年的12月，主张人民公社制度必须加以改革的人们，很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王任重身上。不过，王任重又与他的继任者万里不同，后者在以后的若干年中被认为是农村改革的真正先驱，但在当时却几乎没有任何领导农村的经历，既没有积累下对于人民公社的任何情感，也用不着对人民公社肩负任何责任，但他却由于农村的破败而对人民公社制度充满了厌恶。1978年10月，万里在他领导的安徽省宣布：“我们省不组织去大寨参观，也不去学大寨那一套。”这样的念头决不会出现在王任重心中。他在50年代是人民公社化的参与者，在60年代又是农业学大寨的参与者，直到1977年，他在历尽多年政治磨难重新担当省委领导人的时候，还坚定地认为“人民公社的实践过程没有完结，还要发展，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公社的体制”。到了1978年10月，也即万里公然与大寨分道扬镳的时候，王任重的下级向他讨教究竟应当怎么办，他依然不改初衷地认为，“大寨是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农业学大寨不能动摇”。<sup>①</sup> 这些事实显然可以为坚守传统农业方针的领导人所关注。他们似乎有理由相信，由王任重来取代陈永贵，既可以弥补当日农村中某些过于明显的弊端，也不至令人民公社的营垒自乱阵脚。

<sup>①</sup> 见《河北日报》1970年3月19日、1970年4月7日，《陕西日报》1978年10月31日。



王任重 在西安古城平平静静地度过了阳历新年，然后北上就职。这时候中南海里并不平静。关于农业方针的争论虽然还未公开，但却已经在很小的范围中变得尖锐起来。各地农民争土地抢农具，甚至分去库中存粮进而要肢解生产队的消息不断地送到他的案头。一切消息都在证明，人民公社已遭遇巨大的挑战。他由一省之领导为一国之领导还不过刚刚几天，一下子拿不出确定的方针来对付这种局面。谙于做官之道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一定会退避三舍，静观事变。可是王任重的道德观念不容他做一个尸位素餐、见风使舵的圆滑政客，他必须尽快有所动作。这时，乡下春耕将近，《人民日报》按照惯例，把督促社员下地的社论送来审阅，王尚未拿定如何回复，却意外地从一个批示摸到了华国锋的脉搏。华在社论清样的空白处留有一段批示，其中批评农村中出现抢农具牲畜、闹分队的现象，影响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一个名叫张浩的人由甘肃省兰州市回到他阔别多年的老家探望双亲。他的双亲居住在河南省洛阳的黑羊大队，那里正在分队为组，大约六到八家农户自发结合在一起，并且把土地农具和牲口也都分开。农家的自由结合，自然劳动力强壮的家庭最为走红，老弱病残者则受到冷遇。张的一家恰巧属于后者，因之也有被遗弃的感叹。这使张浩得出了与华国锋差不多同样的结论，便以严厉的措辞致信人民日报社。张浩显然并不知道英明领袖的意见，但是王任重知道。3月14日，他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出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决不能倒退回去。并且要《人民日报》站出来说话。尽管《人民日报》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但是来自上级的如此急迫且具体的亲笔指示也不多见，毫无疑问，编辑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只有依据王的指示改写编者按语，又在一大堆读者来稿当中选出张浩来信。

3月15日，张浩的信和编者按语一同见报。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信中说，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已经实行20来年，群众已经习惯，现在轻易地从队为基础倒退回去搞分田到组，有一点像另立一级新的核算单位，定会削弱和动摇队为基础的组织，搞乱思想，造成危害。所以张气愤地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干？并且说有些干部群众顶着不分是对的。这种明显的偏激之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使人猜想作者是否已经获知党中央决策的底蕴。然而令那些正在分田分地的人们更加吃惊的是那个编者按语，它要大家认真地读一读张浩的信，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和“包产到组”的地方，必须认真地学习中央的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文件，坚决纠正错误的做法。尽管主张“分组”的人们答辩说，既然中央文件规定“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不分农具怎么包工？不分地怎么联产？但是这时张浩的信以及党报编者的意见已经起到了王任重所预期的效果，不论是非曲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党对农村方针的最新解释，而不会简单到仅仅是一个普通读者的意见。

事情极为分明，无论张浩还是王任重所代表的并不仅是他们自己。要求制止乡下混乱的信件继续寄到编辑部来。编辑遂陆续将这些信件附以自己的意见，上达更高的领导人手中。这些信说报纸抓住了问题的苗头，制止了混乱。真的就有人兴高采烈地拿着报纸责令队长取消分组分田，不少地方顺势做出决定，所有生产队立即停止划分为组的责任制。汝阳县则把已经分为作业组的315个生产队中的半数重新合并起来。陕县有个生产队本来正在往地里面送粪去做肥料，这时候忽然大喇叭里播出张浩的来信，社员们当即便停下手不再送粪。支部书记说：“报上又批评了，算啦，不干了！”有些人还从报纸的声音里面听出了更多的东西，说“看起来三中全会的政策都是复辟资本主义”。种种明显的夸大之词使得几乎所有主张分组分田的人都哑口无言。那些既不愿重新合并又不敢对抗报纸的生产队长，干脆躺在自己家里说是生病了。

不过，看来更多的人不同意张浩的意见，对于编者按语的半威胁半命令式的结论更加不满。这些信说报纸不是制止混乱，而是在制造混乱。乡下的农民争吵了好久，终于分好小组，配好土地牲口农具等等，如今春耕在即，一张报纸就全都乱了套。那一天清晨，安徽省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正在嘉山县的乡下吃早饭，忽然喇叭里面响起了张浩来信，他目瞪口呆地听完，一屁股跳起身就上了他的吉普车，径直跑回滁县地委自己的办公室里召集会议商讨对策。十年后，他回忆说：“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坏了，又要折腾了。”农民们可没有这样的政治敏感，他们只知道气愤。有人说，编辑都是吃着老百姓种的粮食、坐在办公室瞎编胡说的“老爷”，然后痛斥：“你们几句话给农民造成了多大的困难，你们知道吗？”另外一封信说，这一下他们的村子至少要减产几十万斤粮食。因为报纸一到，全乱了套，作业组砍光，农民垂头丧气，如此分分合合，谁也无心生产。愤愤不平的写信人最后说：“你们应当赔偿老百姓的损失，可你们赔得起么？”甚至在张浩的老家洛阳，人们也并不同情他。他们揭发说此人家劳动力不多，在分组的时候受了冷落，才会借着维护人民公社的招牌来索回自家的利益。有人赋诗一首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诗说：



人民日报太荒唐，  
张浩不写好文章。  
一瓢冷水泼洛阳，  
弄得群众没主张。

这个地区党的领导则转而求救于另外一家权威的新闻机构，地委书记告诉新华社记者，张浩所说是真实的。报纸发表这样的东西是不慎重、不严肃的。这位书记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腾出时间来工作，只顾一天到晚迎接一个又一个的电话，在话筒里面解释他这个书记是不是犯了错误。然而最忙的还不是这位书记，而是在北京城向阳宾馆里面开农业会议的那些人，几乎所有人床头的电话都是铃声不断。这些电话由各个省、市、区打来，话筒里面都无一例外地要求回答共产党的农业方针是否又发生了变化。人们冲着电话讲得口干舌燥，掉过头来又向《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大发牢骚，指责说“你们怎么搞的”。面红耳赤的李克林本来就不赞成发表这个东西，可是《人民日报》是党的工具，她一个编辑除了服从，又能怎样？她甚至不能详细地加以解释，只把一口气憋在肚子里，说出两个字：“奉命。”

李克林是一个胸无城府的老太太，一向具有直言抗命的精神。然而以当日情形来论，她还是不能直陈所奉之命系出何人。直到十年以后，她终于有机会著文将此事经过加以说明，可是仍然未能说出王任重的名字。不过，“张浩事件”以及由此而起的风波，却是王任重主持农业大局 15 个月里所做的最有影响的一件事。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一句话，竟然会在中国上下引起如此巨大的震动。这在不了解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一场震动的兆头其实在 20 年以前就已开始，那么整个故事就会显得更加具有戏剧效果。

1959 年 3 月 15 日，也即“张浩事件”发生的整整 20 年前，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也曾有过一封重要的信件。不过，那一回写信的可不是《人民日报》的什么读者，而是毛泽东。他在这一天所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公社应当以生产大队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说：“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他的这个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认定有必要给所有省、市、区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写一封信来加以阐明。因为他听到了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四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省正在发生的争论。据他得到的消息，河南、湖南主张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广东和湖北则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王任重此时恰为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他有机会向毛泽东面陈他的主张。根据王的说法，湖北在那几天正在激烈地辩论这个问题。上下官员可分两派。大抵公社和大队的官员主张由大队来统一核算，而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则几乎全部主张由他们自己的生产队来核算。看来这中间虽然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但两个阵营的界限分明若此，主要还是因为不同的位置对于权力和利益有着不同的要求。王任重显然站在生产队长的一边，而且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这时正在从前一年“大跃进”的狂热当中冷静下来，考虑实行一种更符合农民愿望的农业方针。他说：这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既然他们觉得大队核算太勉强，就宁可选择生产队。在目前这个时候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他进而解释说，他所提出的“队为基础”乃是指生产队，也即人民公社之前的高级社，而非现在的生产大队。

毛泽东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王任重的强调。所以他在信中说，问题是由王任重提出来的。事态的发展证明，王任重做了一件好事。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公有规模终于由公社和大队退了回来，生产队成为基本的核算单位，并且成为一条原则，在今后20年间对中国的农村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王任重，在1979年的3月，他肯定还会记得早年那一次辉煌的胜利，在重大的方针上能够影响毛泽东，并且能够长时间左右中国局势的，中国能有几人？更何况他的想法在60年代初还挽救了农村的破产。所以即使有人拿出“实践检验真理”的武器向他攻击，他也有足够的力量反驳。他在这个时候一定相信“队为基础”的金科玉律具有无往不胜的力量，所有分组和分户的行动都必须在严禁之列。好心的副总理一心要在自己任上重振公社昔日的原则，以为农村今日的破败并不是坚持了这个原则，恰恰相反，乃是违反了原则。他希望以原则的力量，领导人民公社重归理想境界，但是他没有想到，政府不用经济和技术的力量支援农民，而仅仅依靠主义和道德的感召来解决农民的衣食，其结果必然事与愿违，而昔日他所获得的重大胜利，在今天恰好就是导致他失误的缘由。

不过，此刻王任重手上最为有力的一张牌，却并不是1959年毛泽东的那一封信或者1962年产生的那个“六十条”，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几十年间，中国人虽然总是回避历史的延续而追随现实的英雄，但是王任重眼前



的争论当中却能占尽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风流。比如三中全会刚刚通过的文件中有着“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明确界定，其用词是如此确凿无疑，而他指示必须稳定地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也几乎是逐字引自党的文件。所以，王任重有理由断定，他在这场争论中已立于不败之地，即使时过境迁，1962年的条文已经不再作数，也还有三中全会的白纸黑字作为根据。若干年后，批评者认为张浩的意见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都违背了当时三中全会的指示，其实这只是一面之词，以当日情形来看，实在不能做出这样的结论。

毫无疑问，虽然陈永贵和他的大寨所代表的时代就要成为过去，但是想要改变人民公社制度的人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不是来自一个张浩、一个国务院的副总理，当然也不是一个党的主席华国锋，事实上还有党中央集体的最新决定，这个决定正在被作为金科玉律加以宣扬。依照中国政治的运行逻辑，这样的局面必定会使反叛者一败涂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过去一年的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国人的思想顿呈走火流星之势，一时间，竟无任何力量能够令他们皈依于一种统一的意志。更何况，反抗人民公社的人手上还有一个新的武器，他们会说，既然英明伟大如毛泽东都需要实践的检验，那么你王任重、华国锋，就可以不要检验了么？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后来的事实则证明，这样的问题在那个春天的确充满了乡下的每一个角落。不过，今天真正有据可查的事实，仍然来自安徽省的凤阳。“张浩事件”发生后的两天里，凤阳民情鼎沸，县委已无力将之平息，不得不召开会议来讨论应对之策。会议在3月17日召开，根据当日记录，与会七人均有发言，用词或委婉或尖刻，对张浩和《人民日报》的不满却如出一辙：

陈庭元：实践来检验，要能增产明年还要搞。

秦永言：划组大包干是人心所向，好坏要让群众讲话。

支道友：秋天看成果，好就坚持，坏就改过来。

徐万里：不管报纸怎么讲，干到秋后再说。

王行汉：分组大包干，就这么干了。

吉绍宏：能增产就是好办法，再改变群众要骂。

王子新：要解决思想问题，农民怕不让他干，干部怕丢乌纱帽，顺风倒，反正工资不少。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这种不留任何余地的表达方式，是我们国家官员中极少有的事情。他们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使用了“实践检验真理”的逻辑，一意孤行地拒绝党报的警告，实际上也是把新任副总理王任重的批评束之高阁。

然则若无上级的怂恿，党的下级官员没有可能如此我行我素。事实上，凤阳县的胆大妄为，十之八九是由于当日安徽省省委书记万里的私下支持。就在他们慷慨陈词的前一天晚上，万里叫他的助手打电话到凤阳，转达他的意见。他用委婉的语句对那些不知所措的人说：“《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这个暗示的含意清晰可鉴，所以县委书记陈庭元在会议伊始即行宣布，用它来引导众人的发言。

我们无法断定万里在这个时候是否已经知道《人民日报》背后有他的上级的操纵。但是，至多在五天以后，万里一定知晓这个变故的全部内情。这位省委书记这一天晚上在嘉山县的县城里和副总理有过一次直接交锋。王任重由京城打来电话，急于找到省委书记。接线员把电话由省城合肥转到滁县，又至嘉山。万里这时正离开自己的房间去看一场新编京剧，不得不由走廊折返答复王副总理的询问。这是我们今天知道的万、王二人第一次正面交锋。万里的随行官员都感到就要发生什么事情，拥挤在走廊上等待消息。万里情绪激动地拒绝改变初衷。他对着电话说他是“秋后算账派”，所以不论什么形势，在他领导的地域里面，就是单干也不变了。一切等秋后再说，不管什么办法，能增产就是好办法。然后万里走出房间，对挤在走廊里的人说，副总理同意他的意见。这时候剧场里的演员和观众，已经等了至少半个小时。

今天来看这件事情，全部经过当中只有一个细节令人怀疑，这就是万里所说他从王任重的那个电话里得到了支持。实际的情况更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而万里当日所说，或者是为了稳定下属的情绪，或者是为他的上级饰非。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万里在当时的态度就不至于那么激烈。这一疑点若干年后为中南海里任职的一位官员所澄清。根据他的回忆，王任重在电话里尖锐地指责万里，安徽正在分田到组，可能还有的分田到户。这样，就把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变成“三级半”，“你知道不知道？”

如前所述，中国农业的方针在1978年12月已经有了一个新的选择，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奇怪的是，这个时候，对农业的争论反较没有转变的时候更多。关于往事的激烈争吵，无论朝野都会卷入其中。舌战之间伴有笔战，公开战争后面有着幕后战争。中南海里面似乎已经出现两种意见，每一



个省、市、区都闹得沸沸扬扬。无数旧恨新愁需要清算，激烈的争吵有时会源于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幽怨，有时又会因为某些大人物的嫌隙。毛泽东建立起来的最令人向往的人民公社天堂，已经出现不可收拾的分裂局面。分裂的象征，恰是凤阳的小岗和昔阳的大寨。

作为一个大队，大寨是当日农村里面最小的行政单位和生产单位。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它的影响却足以徘徊在整个中国的上空。其兴衰的全部过程大约持续了20年，这同我们国家人民公社的历史大致相当。

大寨坐落在太行山腹地。在中国的巨大版图上，此山脉由西南向东北绵延千余里。地理的位置为北方，气候上又属旱带。无论怎么看，这里都不会是现代农业的理想之地。大寨所居的太行山，与其说是农家生存的地方，不如说是更好的兵家争夺之地。这种争夺由炎黄三帝开始，一直可以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在这里设立其军事总部。后来大寨声誉日隆，史家便考据出它的名称由来，正因为此地昔日曾为军队营寨，方能代代繁衍而成村庄。小村依山面壑，山名虎头，壑名狼窝。这在中国人的眼里均是大凶之兆。实则所谓“大凶”，不过是人心的反照，山里自然资源的贫瘠以致人类难以生存才是事实。然而毛泽东是认为“穷则思变”的，依据这样的理论，自然资源的贫瘠往往正是富有的政治资源。

大寨最终成为一个小小的村落，即是由于穷困的逼迫。无地无业之饥民由四方聚集而来，因山取势，掘洞藏身，垦荒种植，繁衍子孙。这一过程大致发生在宋代以后，至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来到这里的时候，已有64户人家。若由人的本性来检讨这颠沛流离而至安营扎寨的过程，其动力只不过是人们生存的需要。由历史之延续来说，我们古老农耕的起源由丘陵开始，乃是因为那里的多种生态环境可以令农牧狩猎各取所需。这种文明后来逐渐拓展到平原，则是由于平原有着更加优越的农耕条件。只是后来这些易于人类生存的地方渐渐人满为患无可拓展，人们才不得不扩散到山区里来。这里的农人是我们国家中最为贫穷以及最少政治保障的一群，他们往往会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沦为流寇匪盗，甚而导致旧王朝覆灭和新王朝崛起。这种大历史的影响力在大寨之自然的生成中格外明显，日后在其政治的沉浮中就更加重要。

由兵家营盘而为穷人的避难生存之地，大寨的这一段变故历800年之久。悠悠岁月，很多事情都已经发生，其中最为重大的事件，是当年少数贫困者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后来成为新兴的富人。这些富家以一户为首，三户次之。据说在 40 年代后期，四家富户已占有全村七成财产，总计有 490 亩土地、4 头牛、5 头驴、1 口猪和 70 只羊。余者均为贫户，或终日劳作，或离乡乞讨，最悲惨的则是卖儿卖女、寻死觅活。这也就是共产党后来说的“两极分化”。中小地主依托对土地的所有权，鱼肉乡里，扩充家产，虽规模极小，但对几乎没有生存条件的饥民来说，已经足够引起义愤。这种情绪后来则成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最重要的精神力量。比如陈永贵就曾声泪俱下地控诉地主富农如何害他一家五口丧命，而他自己又如何被卖掉和被剥削。如果不是共产党来了，他陈永贵也难免成为道边饿鬼。可是，共产党不仅来了，而且还把他痛恨的地主富农抓起来由他打骂，甚至还剥夺了这些人的财产分给穷人，这就难怪他要流着眼泪发誓说：“我就是党的人了！”

从表面上看，共产党最终掌握国家权力，乃是靠了军事的力量，实际上，党在农村里面的真正立足，是靠了土改分地。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的步骤，看上去有一点像中国历史反复出现过的“平均地权”，共产党是用一个更具现代色彩的词来描述这个行动：“土地改革。”大寨的土地改革发生在 1945 年，这就是说，在日本人投降和共产党军队进入以后，蒋介石的势力就再也没有到过这块穷乡僻壤。四个地主富农被严加管制，其全部产业依照品质优劣和村里人丁的数量平均分配。大致每户农民分得 12 亩地、1.5 只羊、1/10 头牛和 1/10 头驴。然而对于农民日后的生活真正发生重大影响的，却不是这些实实在在的产业，而是共产党带给他们的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个梦想在当时曾由党的一位区委书记亲口表述为“共产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他说，“东西多得你需要多少就可以拿多少，没有盗贼，没有土匪，没有骗子，乡下人和城里人过一样的好日子，老百姓和当官的也一样受人尊敬，所有的人都可以上学，地主富农再也不敢猖狂。”陈永贵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是这些美好的描述仍然深深地打动了她，以至 30 年后他已名扬四海的时候，还能清楚地记得。

共产党于公元 1949 年立国，但围绕土地采取的行动却要早得多。大抵是随着军事力量的推进，党的势力每到一地，必发动农民集合起来剥夺地主和富农，毛泽东用着一种意气风发的豪迈赋词曰：“分田分地真忙。”到了 1953 年春季，乡下的地主富农已被全部管制起来，3 亿多原本无地的农民，总计得到至少 7 亿亩土地，他们过去每年须向地主交纳地租，总计粮食 350 亿公斤，



现在也全部取消。乡下一片欢天喜地，农民的解放之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用不了多久，也即这一年的冬季，他们就会接到指示，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的数量和价格，将粮食卖给新政府。毫无疑问，任何一个政权的维系都需要粮食。但是，由粮食问题而生出的种种是是非非和恩恩怨怨，却是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独有悲剧。

当日农村里面的组织方式，是以自然的居民群落为基本单位，来构成一个近于自治的集团，叫做“村”，这是农村里面最基层的生产单位和行政单位。旧时留下的村长制度依然延续。村长多为乡里有威望的老者担任，以仲裁村民的产业、婚姻、邻里、家庭的纷争和表扬善行。在共产党接管政权的时候，中国农村中这样的村庄至少有500万个，直接管理着1亿以上的农家。新政权的统治力量渗透到乡间民舍，其间需经过无数繁文缛节，且管理的对象又是如此庞大和散乱无矩，显然在技术上和行政上有着许多难以超越的障碍。因之全靠农村中党组织成员的和衷共济来加以克服，这种组织在每一个村子里面必有一个，是为党支部。一般而论，一村之中，总有几人对于共产党政权抱有最强烈的热情和最积极的支持，甚至不惜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样的人总是很快地成为共产党员，又由所有的共产党员结合而为一个支部，其中最优秀者被选拔出来，是为书记。书记对于村民的统治权力，远在村长之上，到后来，支书和村长之职，常常合由一人担任。此人对党忠诚不息，爱憎极为分明，背后常常有着高级官员甚至军队的支持，本人又有着超过常人的威望和行政能力。

陈永贵得任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即是因为党的需要和他本人具有这种条件。在大寨辉煌而又悲壮的历史当中，陈永贵由一介村民进为一村领袖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页，但是这一页上有一个事实少为人知。陈并非大寨村中第一代共产党元老。他在1948年入党，这时候贾进财已有两年党龄，贾承福的入党则更早些。当这两个人出生入死地为共产党做事的时候，陈永贵还是日本人“新亚反共救国会”的一个成员。日本人战败之后，他因此事而遭村委会的拘审。这件事若在他人身上，以当日情形，乃是非死即监的结果。但是，陈永贵一贫如洗，苦大仇深，对地主富农深恶痛绝，甚至对中农也不肯有一丝容情。1947年，当党支部书记贾进财决定把地主的财产也分给中农贾计元一份的时候，唯有陈永贵挺身而出质问：“土地改革是让贫雇农翻身的，他是中农，为啥分东西给他？”这一来，老支书哑口无言，中农贾计元没有分到任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何东西。陈永贵的阶级觉悟和彻底的斗争精神深为上级党的领导人称道。毫无疑问，这是党所需要的人，其历史劣迹也就变得无足轻重，或者是“莫须有”，或者是被迫所为。他不仅没有受到追究，还在一年以后成为党员。又两年后升任党的副书记，这是大寨村里权力仅次于贾进财的位置。陈永贵渡过了他的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这件事情在后来人们评论他的历史时成为第一个焦点。其实，我们国家的政治虽然讲求道义上的是非，但其严肃的所在并非追求一人一事的客观公允，而在于大局的平稳与延续。大局之中利害的变幻常令具体事件的是非发生逆转，个人荣辱也总是不能够由个人来决定。这样的道理在陈永贵初出茅庐的时候已开始给他以教育，在他今后道路上还会多次地强化起来。

陈永贵在30岁这一年忽然发现，自己的一生已经不能离开共产党的左右。这个原本无立锥之地又不识一字的农民，如愿以偿地得到一份土地，但是他的资本并不在于土地，而在于他本人的政治天赋。他体魄彪悍而又聪明敏感，无论出力气还是动脑筋均超过常人，其精于权谋远在老支书贾进财之上。他的特质在一年之后就露出端倪。这时他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在大队成立的第一个互助组里就只能是贾进财互助组里的一个普通成员，然而由于顽强的性格，他不会甘居人下。就在这个时候，贾进财互助组一分为二，这种分割或因小组的规模由15户增加至29户而显得过于庞大，或因上级派来的工作组直接干预，抑或是像陈永贵所说，是贫困的老老少少与身强体壮且家境富裕的人们之间发生分裂。这些事实在日后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所强调，成为大寨历史上最含混不清的一个故事。但是，有一个事实却为所有的论者共认。陈永贵就是在这个时候成为另外一个组的组长。他与贾进财的分道扬镳使他终于树起自己的旗帜，这对他本人以及大寨的历史都是极为重要的开端。贾进财当然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这就是赶快把陈永贵吸收进共产党内，他在1948年完成了这个任务，三年以后又把自己支部书记的位置让出。陈永贵的回报是将前任支书派到30公里以外的山上去养18头牛。贾进财也许是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所以一去数月不再回家。他说：“闹不过人家，让人家干吧！”陈永贵则在日后宣称这是路线斗争在大寨的第一个回合。如今追溯它的来龙去脉，胜负之势虽然显见，但若说“路线斗争”，则属于子虚乌有。那时所谓互助组，在本质上并不符合共产党的理想，因为它没有动摇私人拥有土地、农具和全部产品的基本权利，其互助，只是全部成员在某种程度上交换各自的劳动。比如某人花了一天的时间为他的邻



里运送粪肥至田里，双方都将铭记在心，以便在另外一天由邻里助他把田间的杂草锄去。至于庄稼的丰歉多寡，仍由土地的所有者全部拥有。这种互助，充其量只是道德上的契约，对当日的私有制度没有任何触动。

这样看来，陈永贵和他在政治局里的那些同僚不一样，他本人就是一个乡下穷光蛋。他所做的一切好事与坏事，都是一个农民所为。毛和他的战友们即使出身农民，也都是殷实之家，受过良好的教育，30岁的时候已经驰骋天下，而他陈永贵30岁时却连一片土地也没有，40岁还不识字，50岁还没有所有城里人都有的城市户口，60岁还不肯除去身上的对襟棉袄和盘桓在头上的白毛巾，他把这毛巾一直戴到72岁。毕其一生72年中，他有61年没有离开过家乡。他崇拜土地，总是在土地上生出无数奇想。当胡耀邦对他的造地运动表示不以为然的时候，他恼怒异常。按照他的想象力改造出来的那些土地遍及全中国，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用。他喜欢农民的形象，并且以此来标榜自己，有时甚至会渲染到近乎矫情的程度。他对文人们的海阔天空不以为然，不能相信我们的国家会在农村以外的地方找到繁荣之路。他相信立国的根基在于农民的和衷共济。而他的“和衷共济”，乃是依照最严格的标准和最激烈的方式执行。如果国家需要农家把大米白面交出而留下薯粉糙糠自己食用，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否则采取任何强制性的措施都不算过分。他的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身体力行为证。他官至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死于癌症，身后留下一大堆药片，均为半片。他每日将医生开具的药量服一半留一半，积少成多，遗嘱儿子奉还国家。

然则和他的那些乡亲也不同，陈永贵不会满足于土地上的劳作，不会因为吃饱了肚子就万事大吉。他崇尚权力，喜欢在太行山深处这个荒僻的角落里想全中国的事情，善于在本属于人类生存本能的问题里面，开辟出道德的天地。而且，他思维敏捷，性格坚毅，热衷政治，头脑中充满着与众不同的念头。他由山野走进中南海，周旋于官场又坚持着他的农民形象。他的内心世界，则是官僚意识和农民意识的奇怪混合体。

陈永贵在思维和性格方面的异于常人，似为与生俱来，其后来的表现，只不过是在时代的推动下走向极端。1948年，他还不是共产党员，并不知晓所谓集体化以及社会主义的种种概念，毛泽东这个名字于他也极为陌生。可是他已经能够毅然脱离一群壮汉组成的互助组，而与村里11个贫困老少结合。当日乡下的初级互助，乃是农家自愿的结合，所以多为家境较好、体力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较强者的结合。谁又肯把自家的好处去与贫者均分？从自耕经济的角度讲，陈永贵的行为的确有违常理。旧时乡里开明富绅接济穷人，并不少见，陈永贵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以他的家境，虽不至潦倒，但也不能说在任何年景均能自足，然而他在此种境况之中所求的并非经济的利益，而是政治上的得失，这在乡土社会中间是一种罕有的天赋。事实证明他获得了政治方面的弥补。他就是从这里开始，与他的前任支书分道扬镳，在大寨筑起自己的王国。

诸如此类的事情今后还要被陈永贵更加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比如他把廉价的马车送给邻村，自己宁可用高价购买另外一辆；出卖自己的谷草一定不肯接受两角一斤的价格，而只要三分钱；他要自己的乡亲吃玉米窝头而将白面悉数交给政府；自己任昔阳县委领导共计七年，却从未在县机关设立他的办公室；比如山洪暴发，地陷房塌，庄稼尽数毁去，全村老少无不失声痛哭，他却笑道，“我给大家道喜”，然后把眼睛看着一张张惊讶的脸，解释说：“人都在，这不是大喜么？”诸如此类的事情几乎全都没有经济意义而只具有政治的价值，其见识胆略又是那样独到，在我们国家亿万农民中间能够依此种标准来确定自己行为的人，几乎没有第二个。当他死后，官方在一个简短的讣告中只认定他是“劳动模范”，史学家更以“生产的榜样”来恢复陈永贵之本来的面目。其实，这些评论并不真的恰如其分，追究起来，陈永贵的本性从始至终充满了政治光彩。作为一个农民的领袖，他的思维在很多地方与毛泽东的秉性也能不谋而合，在以后陈永贵的政治崛起当中，这一点是无形但却意义重大的烘托。

陈永贵以互助组的组长为起点，很快取代贾进财，得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在当日我们庞大的农村里，这样的支部书记有数百万之多。理论上党是领导一切的，但是实际上天高地远，往往鞭长莫及，全靠陈永贵这样的书记来加以推动。陈永贵是集体化方针的坚决推进者，但那个时候对党忠心耿耿的书记绝不仅仅是陈一人，事实上几乎全部的书记均有这样的忠心，而名声远在陈永贵之上的，还大有人在。由那次访问苏联的代表名单来看，至少就有耿长锁、韩恩、李顺达、汪汉国这些人。陈永贵的名字之所以为党的领袖格外关注，以至后来居上，乃是由于他不仅一力推动集体化的进程，而且还能卓有成效地证明集体化的优越。这一点在他大规模改造土地的过程当中尤为显著。

自古以来，山河的治理就是我们国家的一大难题。由于自然地理当中充满着山壑大漠和沼泽碱滩，国家的庞大并不能够相应地表现在可以利用的土地面积上。国土之广在世界当居前列，可是实际可资利用的耕地极为稀少，从理论上说，不过为国土总面积之一成，其中又有1/3的部分在丘陵沟壑间。山地的发展乃是因为平原上人口饱和以致不得不向山区大规模迁徙的缘故。其耕地全部依山而辟，地形散落，星星点点，形态万千，小者仅可立足，大者也不过几厘几分。比如大寨村当日耕地总计800亩，却分成4700多块。依照这样的比例加以推算，则当日全国山区5亿多亩耕地，就分成了大约30亿块。这些土地星散于千山万壑，土层厚度通常不过几寸，且土质疏松，摇摇欲坠，几乎没有灌溉的条件，一旦狂风席卷，则大有飘飘欲飞的样子。而且，自然植被一旦为大规模的垦殖所破坏，土地失去了生态保护，干旱时节不能保持水分养料；大雨一至，即成洪水，冲决农田，摧毁庄稼，甚至席卷整块土地而去。

以这样的土地为基本生存条件的农民，在我国至少有两亿之众，这是中国最贫穷的一群，其衣食不能自足已经延续几个世纪。对于这一问题，中央政府历来的办法只有两个。

一个是迁徙饥民至土地条件稍好的地区，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规模的迁徙由先秦至明清几乎未有间断，早期的迁徙多是向着人口罕见而又适于农业的地方，后来则还包括着战争的因素。只是在近几个世纪，由生计所迫有组织地离乡背井才成为一种需要。其中最著名者，如15世纪山西省太行山一带农民聚众，从洪洞县城一棵老槐树下出发东去华北平原，据统计，这次大转移之人口数量达几十万。以至到了今天，华北农家还有以洪洞槐树来寻宗觅祖的习惯。但是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是一种持久有效的办法。且不说中国农民的恋乡之情甚笃，常常拒绝官府的迁徙计划，宁愿困守僻壤，即所谓故土难离，即使他们能够进入新的垦殖地区，那里原有的居民也常会对他们加以排斥，以致其中不少移民无法适应而重返故居。就算这两方面都能如人所愿，完成进入和接纳的过渡，迁徙过程的本身也会产生极多的社会问题，是技术上难以操作的。更何况近代中国到处人口膨胀，流民日益难以定居，结果常常落草为寇，甚至为有野心的政治家所利用，成为诱发暴乱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鼓励农民在当地展开大规模的造田工程，削高填低，改造山河，以使土地更加适合农业种植。古代中国有所谓“愚公移山”的传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说，讲到一个名叫愚公的老叟，决定将自家门前一座山移开，带领子孙日夜苦干。人微力薄，撼山当然不易，但愚公对嘲笑他的人说，他的子孙无穷无尽，而山则不会再长，世世代代挖山不止，终有一日可将此山平去。这个传说里面包含了我们民族传统中“人定胜天”的哲学精神。而在当代中国，最为著名也最有成效地移山平地的人，就是陈永贵。

这位农民在他的大寨村里提倡改造山河。他主张在山坡上内切外垫，以使倾斜的山坡成为平地。深沟筑坝，拦洪淤泥，亦可以成田。他把前者叫做“水平梯”，后者则是“刮金板”。全部耕地均以人力运输土壤垫至一尺，以期在降雨的时候，能够吸收保存，其性质犹如海绵吸水，所以统称“海绵田”。当日大寨拥有八道山梁、七条山沟和一面山坡，方圆可及数十里，而农家所能拥有的工具只是锄头牛犁之类，难以为凿山所用，更无力支付工程所需之钎锤、炸药、水泥以及交通通信的费用。很明显，实现陈永贵的计划，依靠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绝无可能，需全村64户人家的同心协力。而要将这一切组织得井井有条，不致因莫衷一是的纷争或者自然界的意外变故中断，还需一位具有实干能力，又能深孚众望、操纵自如的领袖。大寨作为集体主义的象征和陈永贵作为农民领袖的声望，能够在日后的一鸣惊人，正是由于顺应了这两种需要。

对山河的战争在1953年的冬季展开。陈永贵将村中50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全部带进一条700米长的山沟，宣布了他的计划。这对大寨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工程，所以异常激动人心。50个农民披星戴月，滴汗成冰。18天后，沿沟底垒出七道石坝，造地六亩。在贫穷少地的农家看来，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大寨有史以来，集体的力量第一次得到证实。陈永贵乘胜扩大战果。至五年后已将全部山沟穿凿一遍，造成70余亩土地，原来4700多块小地也并为2900多块。事情看来非常顺利，不过，这种工作实质上是在自然形成的洪水必经道路上人为设置障碍，若不附以科学的行洪设施，其危险必会一触即发。灾难终于在一个叫做“狼窝掌”的地方出现。1955年冬季，这里首次筑坝38条，担土数万方，至夏季，暴雨成洪，一扫而光。次年冬季，二次筑坝不但将基础打得更深，而且选择更大的石头，可是到了夏季，洪水再将这全部的劳动毁于一旦。陈永贵的百折不挠和他的巨大的号召力量这时候起了作用。第三年冬天，两度失败的大寨竟然重新开始。坝基拓宽，坝顶弧形，且用石灰灌浆。这一次终于取得了成功。这整个的过程后来被编成一个“三战

狼窝掌”的故事，绘声绘色。不过，其中着重点并不在于大寨的改造生存条件，而在于证明了只有走集体主义的道路才能拯救贫穷。陈永贵亦坚决地认为这是他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典型一例。的确，由于对大自然的无知和过分自信，大寨付出了太多的人力和物力的代价，可是却又在政治的方面得到了补偿。这样的事情在以后的日子还会有许多。

单纯以人力长时间坚持不渝地向荒山野岭宣战，大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例子。陈永贵为什么一意孤行于这件事，并且得到党的支持，今天很难由经济的方面作出完全的解释。单就经济的方面来计算，大寨之改造河山的举动是否真正合理，不是没有疑问。事实上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作出这样的努力，确属得不偿失。但是，问题并不仅仅在于经济的得失。我们国家治理农村的要旨，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而不是经济上的发达，其施政的关键又在于让所有农民都能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组织的强大。在与山河较量的过程里，会令人们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种“渺小”与“强大”的对照，也才更有可能在散漫无矩的自耕农民中间，造就领袖的权威和百姓的服从。后人评论大寨之改造山河的举动，常由单纯的经济得失来衡量，比如说大寨造出一亩地要投资1000元，所以得不偿失。其实这是忽视了农民的得失和政治家的得失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

农民基于生存需要而发动大规模的垦殖，非由陈永贵首创，大寨也不是唯一的一例。陈永贵的例外在于一种天赐机缘。

1963年8月2日，一场大雨降临大寨，据史书的记录为百年不遇。暴雨连续七天，山洪倾泻而下，小村十年辛劳毁于一旦。地垮坝塌，庄稼或淹没或倒伏，民宅十伤其九。这样的结局对于另外的村庄一定是一场灾难，依照常规，此时一村之长应将紧急的局面呈报上级，以求资助，或拨付钱款，或赈济衣食。即使这些都无法做到，也要减免全部或部分的税收及征购粮食。但是，对于陈永贵来说，这件事情里面更加重要的内容在另外的方面。前一天他已经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长篇报道，介绍他本人的英雄事迹，党的报纸已经把他描绘成在农村坚守社会主义阵地的模范支部书记。<sup>①</sup>既然他已经成为一个政治角色，那么他也就应当将这突然的事变看作一次政治的机遇，以证明他的确比他的同类高明一筹。于是，他宣布大寨将自力更生解决困难，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63年8月1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不会向国家要任何的粮食、金钱和物资。继而又保证在这一年里，大寨卖给国家的粮食、分给社员的粮食和集体的收入一斤一两也不会减少。这件事随即由县政府的文人们归结为“三不要”和“三不少”，广泛传播。根据后来的计算，大寨所拒绝的政府支援款项共三笔，计有1180元。这数字看来过于微不足道，所以只能在1964年出版的一本描述大寨的书中有记录。后来大寨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候，鼓吹者反而不好意思公布。至于“三不少”的记录，即卖给国家的12万公斤粮食，以及户均分得1500公斤粮食。不过，此记录公布的时候，大寨所谓英雄事迹，十之八九已经言过其实。

但是，当日大寨的“三不要”和“三不少”当中，真正物质的内容无论怎样微薄，陈永贵却由此声名大震。是年年底，《人民日报》再次报告，“大寨大队受灾红旗不倒”。这时候大寨的老百姓终于明白了陈永贵的“三不要”和“三不少”的真正价值。大家说老陈“十年备鞍，一日扬尘”，老陈则大有深意地说：“这灾，倒是遭得迟了。”的确，若非天赐一场大灾，他老陈到今天也只能在那小小的山沟里面逞英雄。现在，他终于有机会走向全中国。几天后，头上系着一条白毛巾的陈永贵进了北京，站在人民大会堂高高的主席台上，面对一大片整整齐齐的脑袋讲述他的业绩。听者人数上万。陈永贵侃侃而谈，口若悬河，长达数小时竟不使用任何讲稿，其口才的伶俐和思维的敏捷，实非常人可比，也令京城里听惯了官样文章和照本宣科的人们惊讶万分。在这一天，陈永贵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注意，由此开始了他与共产党政治家们的错综复杂的遇合。

至迟在1963年的秋季，陈永贵的名字已经出现在中南海的会议上，但是，还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此时已经决定在这件事情上赋予更重要的意义。不过，可以肯定此后大约一年当中，关于陈永贵和他的大寨的消息不断地传进春藕斋中。到了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终于决定采取某种行动，只不过不是像他通常所做的那样，向全国人民发出伟大的号召。他把陈永贵请到中南海来，参加他71岁生日的小型宴会。陈永贵得以进入中南海，乃是一种难得的政治资本，甚至可能是一步登天的先兆。以当日之情景，普通百姓之于毛泽东，能够遥望一眼或者触握一下，已经是一件足以欣喜若狂的事情，陈却能够和毛泽东比肩而坐，可见毛泽东对他的关注之情已非一年前可比。不过，后来追溯历史的人们大都认为，毛泽东是在这个宴会上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指示，这显然一个误解。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毛泽东在这一天



讲过关于大寨的什么有力量的话。毛泽东之“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至少还要等上两年。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1963年秋天中国的局面已如前述，共产党内的务实方针已在乡下取得成果，社员们重新得到少量的土地，用做“自留”。虽然这一次他们得到的不是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是经营和收获劳动所得的权利，但这已经足够。自留地上的收获总是几倍于公社土地的收获，这帮助他们渡过了饥荒，农村的形势也缓和下来。可是，大饥荒的悲惨真相却无法对高级官员隐瞒。中南海里人人都知道党的方针出了问题，人民公社可能不是什么“天堂”。党的上层再一次发生分歧。与50年代初期的那次不同，这一次，主张保护自耕农利益的刘少奇占了上风。“大同”理想却受到进一步挑战。难道它真的只是“乌托邦”而不能成为现实？难道“一大二公”还不如自耕农的经营？如果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圆满答案，则实现党的改造农村的计划也就不能上下一心，人民公社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本。六年以前，毛泽东说：“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社的一切怪论都打下去。”现在，毛泽东一定比那个时候更加需要一个办得好的人民公社。恰在此时，一场洪水淹出来一个陈永贵。

由逻辑上来说，1963年的大寨的确可以让人产生许多联想。中国一向有“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的古训，但是，大寨的“三不要”和“三不少”看来已经大大地超过“志”所能包容的价值。若没有人民公社的力量，他们又靠什么扶起540亩庄稼、修复139亩土地、重建113孔窑洞和77间房屋？他们又凭什么保证粮食自足又能奉献国家？明白了这一层道理，就会发现，陈永贵的“三不要”和“三不少”不仅在当日紧张的粮食形势中提供了一线自救的光明，而且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它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想。有了大寨的榜样，人民公社的设想无疑就会重新生动起来。

对于陈永贵，表扬者认为，他的名誉出于他和他的大寨父老们的奋斗不止，批评者则认为这些都是出于他欺世盗名的手段。其实，陈永贵本人既有上下求索的至善精神，寄望于找到一种适当方式使一群最低贱的人能为社会所尊重，又有为所欲为、欺世盗名的恶行。如果他的“至善”精神多少带有图强的意味，那么他的“恶行”却把他的图强变得格外丑陋。可是几乎所有的论者都会忽视一个问题：这些看来荒诞不经的事实，其实都有时代的痕迹。个人的毁誉无一不产生于某种政治的需要。

今天回头来看，陈永贵其实只是一种失败的农村方针的影子，亦步亦趋。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这种失败的方针导致了无数人间的悲喜剧，而陈永贵是其中最富有喜剧色彩也最富有悲剧色彩的一个。对于他的一生，人们曾经给予过热烈的颂扬以及尖锐的批评，直到多年以后才会发现所有这些褒贬原来并不是问题的焦点。党的理想从来就是用集体化的道路来取代自耕农的乐园，但是作为一种组织制度，无论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都没有足够的力量让每一个农民为大家劳动比为自己劳动更有热情，于是只有借助道德的力量来规范农民的意志，其结果，意识形态的强制仍然不能弥补组织制度的缺陷。陈永贵一生的经历以及大寨的跌宕沉浮，正是这种矛盾的悲剧。

在陈永贵的悲剧之后，万里却成为一场大喜剧的主角。此人在61岁上得任安徽省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军区政委，可以说握有当地党政军三方面的最高权力。原拟任职五年，却在两年十个月之后赴京取代王任重之职。以当日情形来看，安徽之职对于万里似乎并不是一种升迁，而仅仅意味着恢复他的名誉和重整昔日旗鼓。他祖籍山东省东平县，为历史上黄河下游泛区，亦是中国最贫穷的所在。他本人大器早成，不足40岁时由建设部部长转任北京市副市长，主持京城建设。此后其命运便随着邓小平的沉浮而沉浮。1975年邓小平复出，任他为铁道部部长，然后他又随着邓一同倒霉。1977年邓小平再度崛起，他就成为邓小平的第一批幕僚中的一个。那时候，中央政府在地方官员心里的权威，远比现在强大，一个号令三山五岳都要呼应。万里由京城权力的中心远涉安徽，取代“文化大革命”当中风云显赫的二十军政委宋佩璋主持当地军政。他一进门就宣布安徽的混乱与不景气全由前任领导的错误所铸，他将彻底地解决省委领导的问题。在地方的官员和老百姓来看，这种威严若在旧时只有钦差大臣可与相比。当天安徽报纸头版报告这一消息，是按节日喜庆的惯例用套红色彩印制，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用张贴标语、鸣放鞭炮来庆祝这个时刻的到来。

这安徽省在长江下游，乃是中国腹地广大地区与东南沿海的缓冲地带，向有农业传统。20世纪初期，徽商之名远播天下，最为著名者如胡雪岩，描述其人其事的一部长篇小说直到90年代还能流行于世界华人当中。不过，这些都是昔日的辉煌，共产党的执政方针是抑商崇农，徽商失去政治的依托，迅速凋敝。至20世纪70年代，安徽全境人口中，十分之九以农为生。照常例，这样的地方须由富有农村经验和了解农民的人来主持，万里既不知晓农村经济，又不曾洞悉农民的感情，其仕途上的辉煌，是在北京指挥大型建筑



的营造，以及在铁路上维护安全正点，显非领导安徽的合适人选。可是，中国的事情确有它特殊的地方，当日领导农村的大小官员，几乎无一不是随着人民公社的兴起而功成名就，这些人包括2000多个县委书记、5万多个公社书记、500万个大队长和3000多万个生产队长。他们心理上的喜怒哀乐，难免与人民公社的兴衰息息相关，因利害的关联就更加难以割舍。万里则与昔日农村种种恩怨没有任何纠葛。他不了解乡下，正好没有人民公社的重负；他没有学过大寨，自然不会为大寨所累。虽然他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任上也曾说过“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那不过是为一时风头所误，无伤大体。所以，当他看到乡下的凋敝之时，便可以无所顾忌地痛斥：“解放三十年了，还有那么多人吃不饱饭，大批群众外流讨饭，这能说过去吗？”所以，他在华国锋号召学大寨经验的声音未落之时，就斥责大寨的“大队核算”、“大概工分”、“大批促大干”是给贫困的人民公社社员扒了一层皮，“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的样板。我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这等于是在说，人民公社20年的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水深火热的农村。能够具有这种相反意见并且敢于直言不讳地道出者，在当日党内真如凤毛麟角，万里的无所畏惧显然有其本身的价值观念在起作用，但是与他的农村经历的一片空白以至身心毫无挂碍，一定也有某种关联。这样看来，他在日后居然能够成为农村改革的最为重要的推动者，是事出有因的。

说到价值观念，这位省委书记不相信治理农民可以单单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他甚至不大看重理论的意义，常常嘲笑文人的能说会道。一位名叫张万舒的记者，那时候常追随万里左右，自认为知之甚深，按照他的描述：“万里没有什么系统的理论，但却极有主见，往往一句话就能惊天动地。在他要说出什么重要的话时，他的手就会像刀一样地直劈下来。”这种描述至少有一点言中，也即万里的“惊天动地”。因为过不了多久，江淮一带农民中间就流传起一句话，“要吃米，找万里”。他在农民中间的深孚众望在于他的彻底务实和尊重利益。比如他公然宣称自己“只知道一件事，要让农民吃饱饭”。他一看到那些饥寒交迫的农民就会泪流满面，看到“包产到户”的农家丰收，就会眉开眼笑，还敢于把这些人的花生拿到党的高层会议上去，以证明农民自己选择的生产办法要比过去20年中所维护的公社制度更加英明。

还在1979年春季他与王任重交锋之前，他就已经受到华国锋的警示，党的主席要他行事不可逾越中央规定，他却坚持要尊重农民自己的选择。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他还受到陈永贵的严厉申斥。可能是他太急于要让农民渡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过饥荒，所以到达安徽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一部分土地借给农民任其耕种与收获。这个消息不久为陈永贵得知，陈于是大骂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这时候，陈永贵尚未离开领导全国农业的座椅，可以说是万里的直接上级。可是万里再次表现了犯颜直谏的果敢精神。他说，你们不要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强加于你们，“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句话很快成为名言。一年后，一位记者把它作为文章的标题登到报纸上去，令人民公社的挑战者们声威大壮。熟知万里的人都会提到他的刚正不阿和斩钉截铁，大概就是出于上述的事实。万里将这种物质第一的精神推行于乡间，取代意识形态至上的施政原则。这一点直到15年后他彻底离开中国政治前台时仍然矢志不渝。1993年3月，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任期已满，将要离开，他在自己任上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把所有农业大省的主事官员集合在北京，指责他们漠视农民利益，致使乡下民怨四起。几天后，他便卸去一切职权，回到家中颐养天年。

一个官员敢于屡屡违背上级的意志竟没有丢官去职，这在90年代已经不算稀奇，下级对付上级、地方对付中央的本领已经日益成熟且花样繁多，以至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流传最为广泛的一个口号。不过，在70年代，这样的事就不免令人把一口气提到嗓子眼里。万里一生仕途历57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纷争沉浮。“文化大革命”中间曾经两度被贬。现在，当他第三次崛起之时，依然我行我素。有一段关于他的故事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中军人的涉足政治极为厌恶。这些军人本来应当待在他们自己的岗位上，却跑到文官的领域里耀武扬威，仰仗毛泽东对他们的信任介入派性政治。所以万里一到安徽便把政权机关中所有的军人一扫而光。这段故事可能有些夸张，不过，这位地方部队的第一政委就职之后，在政府中握有重权的军人们立时委靡不振，不久便踪迹全无，则属确定无疑。

1977年年底，万里实现了他的第一个承诺，结束了对安徽省前任党政领导人的审查，自此可以转向他所关心的农民。如前所述，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制定出六条方针，希望农民由此可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这些办法和当日华国锋制定的普及大寨县的方针并不能融会贯通，所以在官员中间引起震动。但是乡下群情激昂，认定万里为圣人明君。新闻记者也来凑热闹，要将这一切公之于世，这时候万里审阅记者的文稿时却又犹豫再三，不愿将之发表。到1978年年初，报纸到底忍耐不住将文章公之于世。这时候万里却在安徽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描述了一番农业学大寨的形势，并且向大会推荐当涂、

全椒和庐江三县为学大寨的先进县。他甚至还发表文章号召乡下掀起学大寨的新高潮。表面上万里似乎和大家一样在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其实，所有他的私下谈话的记录均证明，这时候他已经认定大寨是不可学的。这种表面与私下的分别日益明显。1979年1月5日，他在凤阳县对陈庭元说，“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过，这种怂恿下属逾越中央规定自行其是的做法，仍然只是私下的行动，因为在十天以后省委党的会议上，万里又义正词严地禁止下属分田单干，并且把他的这次讲话发表在报纸上。

这些事实表明，万里并不是不懂得，在阳与阴、表面与内心之间可以有奥妙无穷的过渡。他表面上向上级表示他并不想违抗成命，私下里却向他的下属示意可以自行其是。他后来找到一个合理的逻辑来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有一天晚上，滁县地区党委书记王郁昭向他解释“包产到户”是治穷的妙药。地委书记起初以为万里会制止他的胡言乱语，不料万里竟同意他的意见。“既然可以‘三级’，为什么不能‘四级’、‘五级’？”万里含蓄地怂恿说。这等于是在暗示“分组”和“分户”他都将不予追究。就在这一天，他做出结论：“包产到户”将要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判断是如此耸人听闻，当时在场的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不禁插嘴，提醒万里注意这样的决定明显不符合中央的文件。显然。记者的提醒若能成立，则会给反对者留下攻击的口实。但是万里似乎早有准备，他说：“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加速生产的发展，而不在于一两个具体的条文。最根本的是实事求是。句句照搬文件那还要你这个领导干什么？这不是组织纪律，这是不负责任！”这时候是1978年10月中旬。以后的两年四个月中，省委书记万里就用这个逻辑对付他的反对者，几乎所向披靡。

不过，在1979年的春天，向人民公社发起挑战的人们还远未达到所向披靡的程度。中央委员会一下子发布了两个专论农村方针的文件，这是自60年代中期以来还没有过的事，但是，城里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人们更加关心过去十年留下的创伤如何医治。所有的“走资派”都在申述自己的冤屈，所有被赶到乡下去的工人教师干部和被叫做知识青年的中学生们，都在想尽办法回到他们原来居住的城市，这些人加在一起，总数至少在3000万。但是这还只是60年代留下来的冤情，还有50年代的50多万右派分子，他们忍辱偷生已经20余年，现在除了五个人，全都在一夜之间重见天日。连那些地主富农忽然间也不再是地主富农了。那时候，人们关心的是“四人帮”会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不会被枪毙，还是有一天会东山再起？毛泽东的纪念堂会不会改做他用？华国锋的权威能不能持久？“走资派”们会不会卷土重来？小人物们当然特别关心自己的命运，过去30年里的种种是非，今天似乎都要来一个重新颠倒。城里大大小小的街道两旁，张贴着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当然已经不再是“打倒”、“火烧”、“油煎”一类的标语，而是昔日那些被“打倒”、被“火烧”、被“油煎”的人们在如泣如诉地表达自己的冤屈。几乎在所有的城市里，政府的门前都拥挤着上诉的人群，这些人蓬头垢面，蹲在肮脏的角落里面，从晚上直到天明，只要看见有一位政府的官员出现在眼前，便立时趋前没完没了地述说他的愁怨，以至于党中央不得不通令各地政府成立信访部，调集大批官员专事冤案的调查。这样，全中国一下子就成立了一万多个信访办公室。报纸上不断地宣布清理冤假错案的成绩。描写“伤痕”的小说一下子铺天盖地而来，文学评论家赋予一个最具时代特色的名词：“伤痕文学”，说它们写出了“伤痕的时代”。的确，“伤痕”里容纳了城里大部分有教养的人的政治热情。这些人包括工人、学生、作家、记者、编辑、政治犯、政治家、外交官、诗人、演员、教师、医生、司机、厂长、商店职员、政府官员。

不过，这些毕竟都是城里人的“伤痕”。虽然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的国家，国民当中城里人为少数，每十个中间只有两人，可是两个城里人的声音就能大大地压过那八个乡下人的声音。这情况过去30年就如此，今后也还会延续下去。在1979年在这个春天，城里人嘴上笔下的无数“伤痕”中，居然极少提到乡下，更不用说人民公社。在那些想要改变这个农业国家现状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心中，农村以及农民的事情居然没有留下多少“伤痕”，这是令人奇怪的。差不多就在这同一个时刻，万里却由城里跑到乡下去，他所看到的凄惨场面令他大吃一惊，老泪纵横。他说：“我们把农民忘了。”

那时为农民流泪的城里人的确很少。许多年以后，一位学者换了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多亏了我们那个时候对农村熟视无睹，才给了农民更加自由的天地，”他说，“想想看，人人盯着你，你又能干什么呢？”这话可能有点道理。向人民公社发动进攻的人们，这时候确实都还在边远穷困的山沟里面伺机待发。

城里人只关心他们自己，看到涌进城来的衣衫褴褛的乡下人就感到厌恶。乡下人却对城里的事情格外热情，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激动起来，不是大喜，就是大悲。现在回想那个时候的情形，历史家们多少总有些诧异。“乡下的广



场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像看戏一样聚精会神”，一位记者在报纸上这样描述农民的集会。1979年的1月，他亲眼看到干部拿着省城发下来的文件一字一句地念，台下的农民“侧耳静听”，“鸦雀无声”，连无法无天的孩子也不再喧闹。这场面出现在乡下，不用说记者从未与闻，就是生产队长也感到惊讶。这不是说过去乡下不开会，实际上农民早已把共产党的会议之多同国民党的税多相提并论，说是“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可是以往的集会从来没有令农民如此关注。一位生产队长把这种情况编成了打油诗，后来流传极广：“干部挨门赶，喇叭哇哇叫，到了开会时，一半人不到。干部一开讲，群众就溜号，剩下几个没走的，都在睡大觉。”不过，1979年的那个春天，乡下人开会却不肯走也不会睡觉。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来到会场上，据说，安徽省全椒县有一个老农民就是在家睡觉睡过了头，醒来一看会议早散了。邻居告诉他，共产党让老百姓养鸡养鸭了，也就是说不会再派工作队来“砍鸡头”。他竟听得如痴如醉，然而兹事体大，光是听人转述，不能令老汉尽释心中疑问，他索性背上几块干粮，跋涉数十公里来到县城，向县委会询问，方信确有其事。共产党在乡间的会议出现此种盛况，真是极为罕见。

一连串的会议似乎是夜以继日地进行。报纸依然在发动着政治舆论的浪潮。一年来这样的局面持续不断，愈演愈烈。不过，这一次和“文化大革命”那十年不一样，甚至和刚刚过去的两年也不一样。那“十年”批判的是再早一些的“十七年”，说“十七年黑线一条，乌云漫天”。刚刚过去的“两年”则反过来批判那“十年”，而“十七年”成了阳光明媚的日子。是啊，“四人帮”是如此之坏，他们把党的正确的方针说成是资本主义，把按劳分配诬为物质刺激，把评工记分斥做“工分挂帅”，砍去了乡下的树木，收去农家的自留地，还不许老百姓养鸡养鸭。《人民日报》的编辑在报纸上没有忘记把林彪也列入罪魁的行列：“林彪‘四人帮’的罪状之一，就是践踏生产队的自主权，动摇生产队这个基础。”在江苏一个叫启东的小县，县政府和公社大队几乎天天都有官员跑到生产队里去，耀武扬威地向那些敢怒不敢言的生产队长借钱，结果总计借去1900万元，很多生产队因此分文不剩。四川省省委一个写作组揭发说，“四人帮”的代理人对生产队的主张不管不顾，强迫农民种植数百万亩双季水稻，全部失败。甚至就在毛泽东的家乡，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也招致许多怨言。那里的农民任由政府和党的领导人调集使用，只需一纸文件或者一个电话，成千上万的农民汇聚在一块土地里付出劳役，全部无偿并且没有任何回绝拖延的可能。1978年4月，省委书记毛致用到乡下转了一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圈之后愤怒地发现，大举调集农民劳役之频繁，一年之中竟然有 35 次之多。他看到这样的事情不过才几天，可是蹲在东西南北每一个角落里面的农民们却是长年累月陷身劳役难以自拔。这样的事实被公之于众都是为了说明一个逻辑，既然“四人帮”破坏生产队的基础，那么恢复生产队的昔日权力就是必然的选择。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此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同仇敌忾。大家的注意力几乎一致地将“恢复生产队的自主权”与落实党的农村方针合而为一。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开始发表他的关于农村问题的文章，所有的省委书记都在发表公开的讲话，湖南的毛致用、四川的赵紫阳、山西的王谦、甘肃的宋平……连汪东兴、陈永贵也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华国锋在一次会议上异常激昂地宣布，恢复党在农村的政策，就是要恢复生产队的自主权。报纸的编辑听了如获至宝，他们赶回报社写出一连串的社论、短评和编者按语，说明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农村里面最重要的拨乱反正。那些日子里，乡下似乎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逻辑：既然农村的破败是因为“四人帮”破坏了毛泽东和整个党建立的制度，那么，只要恢复了这些既成的制度，农村的振兴也就指日可待。“‘四人帮’是农村一切坏事的总根源”，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地区党委员会的领导人说。换句话讲，“恢复生产队的自主权力”这个方针，既是清算“四人帮”一切坏事的有力量的武器，也是捍卫人民公社制度的最后堡垒。这意思毛泽东在 17 年前，也即 1961 年 12 月，已经有过明确的表示，按照他的意思，“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本的核算单位”是最后的防线，不能再退。

但是到了 1979 年春天，许多人显然已不能满足这样的讲法。

“大包干”这个词，在人民公社的成宪中是没有的。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它写在毛泽东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第一条里面。有“生产队统一分配制”，它是由“定人员、定任务、定质量、定报酬、定奖惩”组成的。到了 1978 年 12 月，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又加上了“可以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但是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品的权力仍在生产队手中。在日后的种种争论当中，这一关键的环节被双方屡屡提出，因为这的确是人民公社制度的要害所在。这个制度由毛泽东建立起来至今已历 17 年之久，其中凝聚了大约数千位最有权势也最有教养的共产党人的智慧。

但是在 1978 年的冬天到 1979 年的春天这段日子里，一群生活在最底层且最为贫困愚昧的农民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制度。它在几年之间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解决了 11 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些人占有世界人口的



22%。这一制度就是“大包干”。

按照今天史家的描述，这种奇妙的制度最终形成，当在凤阳。在1979年春天，凤阳采取了一种叫做“包干到组”的制度，其要害是不仅将生产队分解为若干小组，而且生产队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品的权力也随之过渡到小组之中。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用一句农民的话解释说，“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而且他还同他的上级王郁昭一起，赋予这种制度“大包干”之称。在我国，一种制度的形成常常有着广泛和久远的渊源。“大包干”究竟源于何时何地，今天已无从查考。以我们接触到的事实来看，至少有安徽、四川、甘肃、贵州和内蒙古五个省区，曾试图证明自己是这一制度的创造者。或者更可能是许多地方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里的不谋而合，殊途同归。不过，有证据表明，作为一种制度，“大包干”在18年前于河北省保定地区的乡村里曾经自发地实行起来，并且在1961年9月27日这一天为毛泽东所知晓。那时候毛泽东已经部分地意识到人民公社的生产组织并非越大越好，所以正在考虑将公社的经济权力放至大队，但是河北省委领导人却向毛泽东报告说，把社员劳动所得的分配权放在大队，仍然不能解决大队内部诸小队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很多地方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办法，即由大队从生产队的总收入当中将一定数量的税金和费用一次提清，剩余全部交由生产队，再由生产小队从中提取自己所需的费用后分给社员。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把核算的基本权力由大队下放至生产队。使得公社社员有可能更加直接地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因而大受欢迎。老百姓叫做“砸估堆”。当地党的领导人对此采取了支持的方针，并且还为它起了一个名字：“大包干。”看来毛泽东接受了保定的创造，他就是在这一天里强烈地意识到，“基本的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这证明那时候无论在党的主席还是乡下的农民，“大包干”只不过是“包干到队”。18年后，这几个字风行全国，其含义有了极大的不同。

以时间的顺序而论，向生产队的权力发起的第一次挑战，乃是由生产队长自己主持的。1977年秋，四川省广汉县金鱼公社数百个苦不堪言的生产队长挂起了“分组作业，定产奖惩”的招牌，也就是把他们治下的社员分成若干小组，并派以一定数量的土地和农具。社员的劳动由小组来调动，队长们不再干预。只管将年终分配和小组产量的多寡联系在一起实行奖罚。事情的起因几乎完全是由于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的积极策划和一力推动。这位胆大妄为的中年人看上去像是要把“队为基础”的原则抛到一边，但无论如何这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还不是彻底的反叛，因为他并没有要生产队长们放弃最终分配产品的权力。所以，常光南的办法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大包干”，而仅仅是“包产”。为了避免政治方面的种种麻烦，他还有意识地绕开“包”字，而把他的办法说成是“定产”。尽管如此，压力仍然不小。一位年轻同事问他：“定就是包，包就是定。说法不同，实质有什么不一样？”一位下级劝他谨慎行事，另一位上级也跟着出来挡驾：“这个办法搞不得，实在搞不得。”但是常光南一意孤行，他得到了省委以及地委领导人的支持，大笔一挥让金鱼公社来实验他的办法。以后几个月里，他和他的百姓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地里的庄稼。他只能寄希望于金鱼公社的粮食丰收。这样没着没落地过了几个月，到了1978年夏季，金鱼公社的粮食不仅大获丰收，而且竟然比1977年的产量超出2.6倍。常光南领导的其余公社，没有一个可与金鱼相比，大家不久就知道了真实原因，于是纷纷起而仿效。这时候是1978年的深秋。常光南已经信心十足，但同时又为他的方针辩解说：“集体所有制不变，生产队分配不变，天就不会塌下来。”

他之所谓“天”，其实就是“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这句话倒是说出了1979年春天农村的一个特征。把生产队拆散的事情在1978年夏秋的时候，还只是零零星星地出现在安徽、河南、贵州、山东、广东、四川、内蒙古的某些地方，现在已经在全国都弥漫起来。这叫做“包产到组”。不过，乡下人不会精细到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一一作出“大事记”以传后世。所以人们只是在几年以后，才会在报纸书籍的回忆中发现这些事实。如果这些回忆确实可信，则我们可以知道在1979年这一年里无论人们做了什么，都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在颠覆“队为基础”的制度。

从很多方面来说，新时代的开始是有些模糊不清的。人们还分不清楚“包干到组”和“包产到组”的区别。写信的张浩、《人民日报》的编者以及副总理王任重，只是将之一概加以反对。即使最坚定的改革者，也搞不清楚他们是在恢复人民公社的本来面目，还是在彻底改变人民公社的原则。可是差不多同时，《人民日报》又在鼓动人们不要盲从文件，甚至搬出党的领袖来号召人民大胆地超越常规。它的社论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是思想解放的人，他们只尊重事实，只服从真理，决不迷信盲从，决不让任何违反科学的缺乏客观根据的条条框框禁锢自己的头脑，束缚自己的手脚。”社论的作者还说：“书里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别人多说一句话，多





做了一件事，则视为‘越轨’，横加指责，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不是经常可以看到吗？”这样，报纸就为争论的双方都提供了有利的理论武器。

看来党的领袖急需把人民的意志统一起来，不然局面将难以收拾。所以党中央在这年的3月，把所有省市里主管农村方面的官员都召到北京。不料这一来就把争论全都挑到了明处。大家对这些话题全都感兴趣，可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政府无意之中推动了自己不愿看到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把各地的官员召到一起来，本身就为事态的扩散提供了绝好的条件。这些人都懂得官场之上的阴阳之道，他们在会议室大庭广众之中发言的时候自有一套说法，私下里却无不关注着新的事态发展。对那些竟敢私自“包产到组”的地方，人们纷纷打听。其中不少人第一次听说凤阳发生的事情。但是仅仅一次也就足够。凤阳取代昔阳，成为人们嘴里新的故事，其中有无数事实令人惊讶不已：懒汉变勤了，光说不干的现在只干不说了，上工不用队长再没完没了地吹哨子，从来不下地的老人妇女也下了地。还有一个最为流行的故事也发生在安徽，说是来安县有一个魏郢生产队，21户人家在1978年分成了两个小组，土地也按照水田旱地品质好坏坐落远近分至两组，正副队长各带领一个组，并且讲定，到年底各组上交粮食2.5万公斤，两组合为5万公斤。以产量计工分9万，超产1公斤，奖励2分，减产亦相应扣罚。这个行动当即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时值早春二月，皖北依然寒风肃杀，两组争相跳进泥塘，各自占据有利位置，挑水挖泥。此塘名魏家大塘，据说已有60多年未加清理，人人其中，泥深过膝，汗透全身。半月时间，将泥全部挑起，运至田里，小麦春茬之上，覆盖乌黑塘泥一片。三个月后收麦栽稻，又如法炮制，将低产稻田覆以沟泥，每亩500担，加以密植，再施化肥，促其早发。当年粮食产量6万多公斤，增产30%。这个故事的诱人之处在于，它既没有触犯人民公社的既成条律，又收到人民公社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吵吵闹闹的农业会议持续了十几天，“到底该不该分组”的事情还是没有一致的结论。可能是为了尽量找到一些共同点来号令天下，所以大家最后都同意一个意见：“尊重农民的抉择。”十年后，王郁昭就是用这句话来做他的一部描述农村改革的书名。不过，当时有人说得更加尖刻。六安地区地委书记徐士奇就说：“共产党任何时候都不能和群众对着干。”这话让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的人们听来就像是吃了一只苍蝇，因为这分明是在批评他们只知道搬弄自己的理想和原则，而漠视8亿农民的利益和愿望。可是这话的本身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又绝无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这不是叫他们恶心万分又不好发作么？

争论虽然如火如荼，但是历史在这里仅仅张望了一下就旁若无人地继续前进了。农民当然还不知道他们终会胜券在握。他们只是在利用党的高层中的分歧所造成的裂缝，下意识地舒筋活络了一下。但是现在想来，真的就是由这种裂缝开始，改革者的天地才能够越来越宽。这种裂缝就像闪电一样，走火流光，一下子划破了天空，划破了大地。它在哪里出现，哪里的农民就活跃起来，最后整个农村都像是烧开了锅似的，人情鼎沸，把生产队分解为小组看来已经无法控制。

现在，也即1979年的春天，陈永贵在京城深处他的寓所里枉自落寞，另外一个人却觉得格外振作。此人偶然地与陈永贵同姓，乃是凤阳县的县委书记陈庭元。他在三中全会公报上面，把所有写着“可以”的字全都用笔画上黑线，然后对他的同事说道，叫我看，这文件的内容就是“可以”、“可以”、“也可以”。他的意思是从此以后农村里面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甚至把队分成组、把组分成户的办法也在其中。他治下的凤阳县正在如饥似渴地把“可以”变做行动。虽然陈庭元有无穷的想象力从党的文件中选择对他最有利的词句，也能够把文件中全部的“不许”弃之一边。但是，他还是想不到，凤阳日后竟会震惊全国。只不过，与当年的陈永贵不一样，没有人宴请他，没有人来号召向他学习，也没有人来为他文过饰非。凤阳与昔阳间的最大差别，还有另外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陈永贵和大寨是党的理想的工具，永远尾随在党的后面亦步亦趋；陈庭元和凤阳则是农民利益的表现者，在党的方针前面蹒跚而行。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更多地涉及。现在要回到本章的开头，中国农业的大旗由昔阳转换到凤阳，用更加彻底的话说就是，改造中国农业的动力，正静悄悄地由党的官员手里转换到了老百姓的手里。

然而农民并不知足，他们又在从事新的冒险。

## 第六章

# 相持不下的日子里

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三个不怕死的县委书记——  
张世贤和迟世光为何未能成为英雄——人民公社最后的意识形态  
屏障——人民公社在九个贫困省区开始瓦解



说来蹊跷，在以后十年里震撼中国的改革，竟是由一些最无足轻重的人所肇始。1979年的4月，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出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故事的题目是“王魁包山”。第一段开门见山地说，王魁一家承包了66亩山地。这在当时是一个耸人听闻的事件，所以就有人在王魁住着的村头写了一句话：“进了王门沟，有个单干户，你知道吗？”

那时候有机会到这里来的人，一进村子就可以看到这一串歪歪斜斜的字，其实，王魁距离“单干”还远着呢。这个故事后面的部分告诉我们，他是甘肃省庆阳县一个公社社员，住在山坡上，村里31户人家和583亩耕地大部分散在四周山上。王魁住的那个地方特别遥远，他每天跑下山来干活，另外的人却又爬上山去。上上下下，爬山不止，地上却长不出多少粮食，真所谓人乏地瘦。后来生产队一分为三，成立了作业组，王魁一家十口人，为全村大户，队长索性把王家当作一个作业组，把他家盘踞着的那个山头全都交与他耕种。队长把算盘珠子拨了一大阵子，然后要求王魁每年交出5544公斤小麦，记1175个工日。超产的部分奖六成，减产则扣去六成工分。照理这个条件异常苛刻，因为队长要的粮食超出这块土地往年产量至少30%。可是王魁还是一口应承。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对的。他在这一年把这块土地的产量增加了大约60%，最终收获的粮食是7575.5公斤。然而这个故事的最后一段才是事情的本质：王魁一家按照工分分得3128公斤粮食，此外得到1239公斤粮食为超产奖励。<sup>①</sup>他的生产队长果然不负前约，不过，这一切并没有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生产队长本人依然握有分配产品的基本权力。所以王魁要把他的劳动果实全部送至生产队里，然后再由队长酌情发回。

类似的事件还发生在另外一些地方。广东省罗定县在当时也有一个和王魁家相似的农户，不过只得到八亩山地。户主的名字叫盘秋，听上去很像是一个文人，可是他只关心自己的土地。“这办法真不错，”他对《南方日报》的记者说，“每亩交给队里一百七十公斤稻谷，就能得七百工分”。云南省有一个堡子四队，它给社员定的规矩是“交一斤包谷给一分工分，超产的包谷

<sup>①</sup> 《甘肃日报》1979年11月21日。新华社新闻稿1980年1月9日，第23页。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五五分成”。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钦州，有一个第八生产队，用差不多同样的办法把两亩一分八厘大的一块鱼塘承包给六家社员。《广西日报》的编辑为了这件事情特别地说明，这件事没有什么可怕，因为它有利于集体。甘肃省武都从来不养鱼，但是那里有的是药材，农民就把种药材的地分了，然后拿着地里长出的当归去顶工分。河南省兰考县在枣树上如法炮制。安徽省天长县新街公社的骄傲是棉花，171个生产队，到处都有棉花，不过，他们的棉花在1977年每亩只能长出14公斤来。1978年开始“联产计酬，责任到人”，其实也就是包产到户。这一来棉花的产量就增加了一倍。社员们皆大欢喜，说这才像人干的事。有位新华社的记者闻讯赶来调查，他发现社员的收入虽然由于产量的多寡而有了差别，但棉花仍然是集体所有，分配的权力仍由生产队来掌握，就信心十足地发表文章说，这不是“单干”。

对于北京城里的人们来说，这些地方的山山水水过于遥远，诸如养鱼种药摘枣植棉一类的生产，也只是乡村经济的细枝末节，所以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然而这正是乡下人的幸运所在。多少年来事情都证明，我们的国家总是树大招风，椽头先朽，静悄悄的事反倒较易成功。

不过，有一个地方已然山雨欲来，再也不能安静。它居然把“包产到户”推进到15万亩土地上，这就是安徽省肥西县的山南区。

1978年夏天种麦时节，这里竟是滴雨不下。旱象已经持续半年，到这时候简直无法收拾。农家都知道“救荒如救火”的俗谚，可是只有干部拿出了救火的样子。他们喊着“大干三十天，抗旱保丰收”的口号，逐个寻找社员，其雄心勃勃的计划是要在这一段时间里播种4.8万亩。可是30天过去，10万社员仅种了1000亩，老百姓喊着“没有办法”。看来他们说得不错，土地上绽开的口子宽度超过了三寸，河渠库塘里几乎舀不出一滴水来，气象台的报告也说，“这是百年不遇的大旱”。照这样，另外的地是种不下去了，甚至已经种下去的这些也不一定会长出芽来。到了9月15日，有个农民看着差不多要哭出来的区委书记，不紧不慢地说出一句话来：“只要‘三包到底，责任到人’，就能把麦子种下去。”他之所谓“三包”，就是包土地、包产量、包工分；“责任到人”，即一个劳动力从播种到收获负有全部责任。乡下劳动力的分布，大致每户以一人为主。所以，区委书记完全可以洞悉，这八个字就是“包产到户”的委婉表达，他在想象中完全可以看到农民所说的情景正在应验，只是他的身份不能允许他参与此种策划，便索性装作从来不曾与闻，不置可否，一走了之。这在农民看来是一种默认，于是，他们把地分开，规定

每亩交100公斤小麦，记200个工分。说来真是难以置信，25天后，竟然种完了5.9万亩，斗志倍增的书记乘胜前进，要社员向“十万亩”进军。社员说没有问题。果然，又过了20天，10万亩就种完了。不仅如此，还把2.2万亩油菜和2.74万亩绿肥也种完了。不过，这时候，山南1006个生产队当中，已经有610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如此大规模的反叛行动，搞得人人皆知，沸沸扬扬。有人就作出统计，说全中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中至少半数集中在安徽，而安徽的“包产到户”至少有半数集中在山南。区委书记现在又要胆战心惊，电话的铃声一响，就会神经质地跳起来。“我总是觉得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他说。当然不是麦子的问题，而是“道路”的问题。这一天终于到来，肥西县党的工作组，怀里揣着坚决纠正“包产到户”的文件，开进山南区。

在反对“包产到户”的人看来，局面的危险还在于这件事产生了连锁反应。消息先是传到了豫皖交界处一个叫花庄湖的低洼荒地。社员们决定用他们听到的安徽办法来开垦这块荒地。开荒在任何地方都是一项艰难的劳作，并且难以有确定的利益保证。可是这一次，145个农民喊着“我们要包产到户”，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原来的生产队，另组新军。当然这一切在当时都是不能大张旗鼓的，报纸也只是四年以后才公布说，这支新的队伍成立于1979年早春二月，一个叫刘义昌的河南农民，自告奋勇当了他们的队长。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变卖了自己几乎全部的家产，包括一辆自行车、一头猪、两只羊、一小车粉条，还有准备用于建筑住宅的储蓄，总计得款1300元，投资于荒地的开发。他对他的追随者说：“五年之内，不让这块土地每亩长出四百斤粮食，我这些钱就归你们了。”这在当时已是空前壮举，然而他做的第二件事更加令人心惊。他把全部土地和牲口分给农家，然后向社员们解释了国家要征购的粮食和集体的提留，“咱们谁也不要难为谁，”他说，“你们交够了这些，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刘义昌的办法得到社员的拥护，事实上他后来只用了一年便把花庄湖的亩产达到250公斤。这甚至大大超过了他提出的“五年目标”。在经过了十几年的苦苦煎熬之后，这些农民即使发挥他们最大的想象力，也不会料到他们的眼前会一下子堆起这么多的粮食。毫无疑问，花庄湖一片欢腾。但是这些胆大妄为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行为所包含的意义已经大大超过了他们的安徽榜样。这是彻底瓦解人民公社制度的关键一步，后来人们把它叫做“大包干”，这件事发生在“小岗事件”之后两个月。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1978年到1979年春天的这十几个月里，由“包产”到“包干”的演变，乃是乡下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其演变程序大致如下：先是认定生产队享有当然的自主权力，也即后来史学家所说“农村改革”的序幕，它在1978年年初拉开以后曾经有过异常生动的感染力。但是，如前所述，这场戏的最初旋律，并不是要使中国进入新的时代，而是要中国回归1962年人民公社的既定方针。接着就发生了农民自发地将生产队解体为小组的事情。在1979年的春季，“包产到组”至少在乡下1/3的土地上成为实际的行动，另外还有1/3正在讨论实行的可能。不过，在我们的国家中，“组”的伸缩余地极大，大可至“中央文革小组”，一度曾有号令十亿人的权力；小可至一个村子里的十几户、几户，甚至可以是“兄户”和“弟户”、“父户”和“子户”之间的合作。看来农民对于“小”情有独钟，这一来就“小”到了“包产到户”。只是当日敢于这样做的生产队为数甚少。尽管如此，这却构成了对生产队这个“基础”的真正有力量的威胁：深更半夜分田分地，支支吾吾地欺骗干部，将自己积蕴了十几年的力量投进土地，大丰收，这一轮过程又像瘟疫一样传染到四面八方，如此等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佳话。然而“威胁”在这时候还只有象征的意义。因为无论“包产到组”还是“包产到户”，均未接过生产队基本核算的权力。

“包产”是一种耕作制度，同时也是一种分配的制度，这也就是当日党的方针所能允许的“联产计酬”。其主旨在于既不危及人民公社制度，又能具有某种激励农民热情的动力。“包干”则没有那么客气，它将生产队基本核算的权力化于无形，基础一经瓦解，人民公社的大厦也就成为空中楼阁。这之间种种复杂的因由，很多人至今未能深悉。

这种复杂的情况首先缘于农村的分配制度。当日中国人民公社多至5万，其中农民的土地以及稍大一些的生产工具已全部交由集体所有，农民获得产品的多寡只有凭借劳动力的支出，这在理论上说是“按劳分配”。但在实际操作中，衡量一个人的劳动，较之衡量土地和资金显然具有更多的困难。后者可有确定的数额，前者则往往具有极大弹性以至无从查考。

在这个问题上，人民公社制度显示了设计上的精巧。它将社员归入不同等级之中，其上下优劣差别的依据，是每一个人体力强弱、经验多寡以及技术高低。不同的等级享有不同的工分数量，这在制度中为“底分”，一经确定，便难以更改，所以又叫“死分”。农民的收入一般地是由所能积累的工分数量来计算。考虑到人的七情六欲是一个多变的因素，精神的状态又会直接



影响到劳动效果，所以“工分制”还设计了“活评”的程序。根据这个办法，每天日薄西山，鸣金收工之时，疲惫不堪的人们并不能马上回家，而须对身边每一个人当日劳动的实际情形加以评说，酌情对“底分”增减。

这种制度虽经深思熟虑，但是执行起来往往难如初衷。仅仅是日复一日地要农民在劳累了一天之后再来说三道四，就是一件令人讨厌的事。以乡间风俗和农民受教育的水平，更无可能公平地利用自己的权力。事实上所谓“活评”，常是基于彼此间的好恶或者意识形态的原因。比如每一村庄里面必有昔日的地主富农或者他们的后代，这些人常常肩负最繁重的劳动，而实际所得工分却只有贫农社员的一半。这种裁判无疑是出于一种政治的原则而非对于劳动的衡量，所以才格外严厉，而对于大多数有着正常政治位置的社员，几乎所有的“评议”都会成为一种形式，要么鸦雀无声大家都是好人，要么乱成一团成为互相攻击的战场。这状况曾经由一部电影详加描述：在一整天的劳动之后，一群社员坐下来评工分。一个叫大风的女人虽然完成规定的数量，劳动质量却非常糟糕。但大风是副队长的媳妇，所以没有人愿意指出这一点来。这时，电影屏幕上好一阵沉默。接着，张瑞芳扮演的李双双按捺不住，她批评大风，并且要求扣其工分，结果是一场争吵后，大家不欢而散。李双双回家之后立即遭到丈夫的指斥。此种情节在乡下并不少见，这在当日广为流传的若干民谣中多有生动的交代，其中一首曰：

每天活好干，  
工分不好评。  
评工装哑巴，  
你好我也行。  
评工说句话，  
翻脸伤感情。  
评工到半夜，  
累得真要命。  
评过来，评过去，  
不如就按底分评。

“操作问题既无法解决，“活评”事实上也就不复存在。农民的劳动所得，仅仅依照“底分”加以固定。大体一个壮年男人一天所得为十分，成年女子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为八分，未婚娶的青年为六分。到了60年代后期，1200万名中学生从城里移居乡下，其“底分”略低于当地农村同龄青年。每到年终分配，各色人均按“底分”的累加来计算自己所得。表面上看，一个壮年劳动者和一个妇孺在收入上仍可能有近一倍的差别，实际的情况则又不然。因为依照制度的规定，全部的收入只是在减去每个农民的基本口粮之后，才会按照工分的多寡来区分。当日农村生产的水平极低，在出售了国库所征粮食之后，能够令农民吃饱已属难得的境况，即使能有所余，也至为可怜。陆学艺在他的一本研究农村制度变革的书中认定，这一部分大约为总数的15%，即使全部按照工分的多寡来分配，差别也只在毫厘之间。

此种分配制度之不能激励人的劳动热情，是明显的。制度的缺陷无可避免，人们遂转而期待道德的力量。但是事态的发展证明，道德力量无法解决制度之弊，正相反，道德的完善还须以制度为前提。这一点我们以后还会涉及。在1979年的这个时刻，人们似乎终于懂得，衡量农业劳动的唯一途径是和产量相联系，因为产量乃是劳动数量和质量的最终表现，以产量的高低来确定分配的多寡，也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动农民去关心他们的劳动。

可是我们的农业又不同于其他的行业。工人的劳动可以衡以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文人衡以文章；军人衡以杀敌；科学家衡以发明创造。农业的生产由种延续到收，四季之中贯穿无数环节，统统由一个集体的领袖来安排，将这些环节交给不同的人去完成。这样，每个环节的优劣都会影响到最后的收成，但又不能单独地计算出它在其中所能占有的份额。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倘若不能将所有这些环节交给一个人或者一户人家去完成，则“按劳分配”的原则仍然不能有效地体现。所以农民每有机会总要作出“分田”的努力。

“包产到户”的制度将一定数量的工分对应于农作物的一定数量的产量，显然就是由于这个最简单的道理。然则这种制度的重点仍然在于从人民公社的成宪中找到合法的位置，所以还不能忘记实现生产队的基本核算的权力。由生产队来决定不同的土地应当长出多少粮食，再来决定不同的作物需要施以多少肥料药物，然后是计算付出多少人为的劳动，又须在收获的季节衡量实际的产量。农民将收获如数交与生产队，此后是计算工分，计算各种成本的扣除，计算集体的公益积累，计算国库的征集，计算超产奖励或者不足的惩罚，计算实际上工分的价值……以上种种烦琐程序，都被看成是生产队基本核算权力的体现，只是这样一来，一个生产队在一年里面所要完成的账目就会多至两万多笔。这不仅为多数只有初级小学文化水平的会计无法胜任，

也为整日忙忙碌碌的生产队长难以负担。

在70年代末期，电子计算机远没有现在这样流行，乡下没有集成电路板，没有会计手册，没有数学公式，没有能够把实物换算成货币的可靠标准，甚至连一个最普通的袖珍型计算器也没有。这无关紧要，因为即使有，农民也不会知道是什么东西。事实上，当日这些人手里连一张四边整齐的纸头也很难找出来。不过，他们具有原始的智慧，具有把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天才。一个53岁的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成了这种天才的代表，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说，两万笔账算来算去，其实就是三笔账：“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都是自己的。”1979年1月，陈庭元和他的上级，滁县地区党委书记王郁昭，经过一天的密谋，就给这种办法起了一个名字，叫“大包干”。这种算法极其准确而又简明易行。完全无须用人为的办法计算各种琐碎的细节。不过也有一个麻烦，它把生产队撇在一边了，所有的农民现在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生产以及最后的收获，用不着眼巴巴地等着生产队长把他自己种的粮食再恩赐给他，只要对生产队长说：“你应当要多少，我给你就是了。”王郁昭听到了这件事情，当即道破了这中间的奥妙，他说：“‘包产’的权力在干部手里，‘包干’的权力在农民手里。”陈庭元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私下承认，“大包干”是把生产队架空了。到了公开的场合又说，我支持“大包干”，你不干可以，不准反对别人干。这一段话载于史册，在当时实为惊人之语，在日后也为人景仰不已。多年以后，“大包干”风行全国，终成定局，史家大都以陈庭元为其发现者和推进者。童大林评价他是“统一了全中国”的人物，其功绩可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相比。他说，凤阳出了两个统一中国的人物：第一个是朱元璋，在马背上打天下统一了中国；第二个是陈庭元，用“大包干”叫农民有饭吃，以至迅速扩及全国，是用“大包干”统一了全中国。这样的评价虽然不无事实根据，但却言过其实。因为陈庭元当日所说“大包干”，乃是“包干到组”，并非日后扩及全国的“包干到户”。以现有记载来看，陈庭元迟至1979年秋季还是“包干到户”的反对者。他转而支持“包干到户”是在1979年冬至1980年春的一段时间里。

陈庭元其人，微胖，面黑，敦实得像个树桩。公刘在三年以后见到他时，第一个印象是，他应当是土地的儿子，而不是党的官员。他在乡下跑了20多年，绷着一副愁肠，辛辛苦苦，可是没有人知道他干了些什么。从“大包干”这几个字一出来，陈庭元便成为农村中的传奇人物，很快就声名鹊起。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把他看作时代的代表。真正的奇迹是由农民造成的。他们差不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多都是衣衫褴褛，营养不良，但贫困以及生存的本能使得他们无所顾忌地施展自己原始的智慧。这一点无论是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学者滔滔不绝的思想、记者左右逢源的笔锋，都无可比拟。只不过，他们没有想到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姓名，他们的创造在当时也没有任何惊人之处，他们甚至连自己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创造这一点也还不知道。

多年以后，陈庭元和王郁昭在许多问题上的回忆不能吻合，但在这一点上看来是一致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创造者”最先产生在凤阳县的岳林大队，时为1979年的1月。不过，那时的岳林农民还没有想到用这么一个词来代表他们的创造。多亏这位地委书记和这位县委书记来到岳林，而且想到了“大包干”这三个字，还在这里编了几句歌谣。这成为80年代中国农民中的流行歌曲：

大包干，  
大包干，  
直来直去不拐弯。  
保证国家的，  
留够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  
该拿的拿在明处，  
该得的心中有数。  
一刀一个血口子，  
我们越干越有劲。

歌是从岳林唱起来的，这一点不假。可是，单就时间的先后来计算，小岗在岳林之前几周即已谋划了几乎同样的行动。这点在小岗全体农家的契约当中可以找到证明。其所采取的办法，不仅具有“大包干”的全部内容，而且索性连“组”也弃之一旁，彻底分田到户，真的像万里所说，是“五级核算”了。直到小岗的办法风行全国，岳林也把自己的“包干到组”改成“包干到户”，此为两年以后的事。在1979年的这个时候，小岗的农民还在像地下党一样地东躲西藏。当陈庭元在3月份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试图瞒天过海。陈是行家，到地里把庄稼看了一眼，心如明镜。“他妈的你们干的是什么？别骗我。”他丢下这一句话，然后就走了。几天之后，有人来告诉他，小



岗正在搞资本主义。“知道了，”陈庭元轻描淡写地说，“让它搞吧，凤阳三千六百一十六个生产队，就算它复辟了资本主义，不就是三千六百一十六分之一吗？”话虽如此，陈还没有胆大包天到公开纵容小岗的地步。他的办法是“不推广，不宣传”。

在改革还没有稳操胜券的情况下，岳林的“大包干”无疑在政治上较少风险。这是“包干到组”。一个小组大致包括几户或者十几户人家。仍然可以看作一个集体。尽管如此，“组”的规模小于生产队。有了“大包干”的制度，小组可以很容易和生产队分清归属。事实上也就成了一个核算的单位。这样，“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就多出来了第四级。这使陈庭元很快陷入反对者的包围。很多人倒不一定真的反对他的想法，只是为他担心，说他做这样的事情是要倒霉的。但是有他的顶头上司王郁昭共同患难，令他胆子壮了不少。1976年1月，在离开岳林的时候，这两人达成了协议，无论如何要得到省委书记万里的同情。

一周以后，万里来到王郁昭统辖的地面上。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王郁昭的一番游说之后，陈庭元又添油加醋地告诉万里，在他治下的百姓当中，正在流传一句民谣。接着就一板一眼地唱起来：“大包干，最简单，干部群众都喜欢，只要能干三五年，收的粮食堆成山。”当这两人确信省委书记懂得了“大包干”的含义时，反而紧张起来，瞪着眼睛望着万里的脸色。然后大家一阵沉默，看来，事情有些难办。谁知万里想的却是为什么这些办法没有早一点实行。万里后来的一番话被陈庭元记录在凤阳县委的档案中，这和他以前和以后所公开发表的那些文章可是大不一样。

“让他搞。”万里吐出这几个字来。嘴巴里的大舌头搅得声音有些含混不清，可是他那即兴演说的风格极为鲜明：“就怕你不增产，只要增产了，什么都好办。”接着，万里开始对人民公社的条例发起攻击：“现在不怕别的，就怕群众的积极性起不来。我们自己不要有倾向性，什么办法能调动群众积极性都可以干。你们说群众愿意‘大包干’，三年就能富裕，就让他搞三年。哪怕他搞一万年也可以。我只反对一种倾向，平均主义和单干。其实，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南斯拉夫单干，还不是承认他是社会主义？现在有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

这话可真是说到头了。陈庭元当了那么多年的共产党员，可从来没有听谁这样说过。他坐在椅子上，可以感觉到脊梁靠在硬木的靠背上有些颤抖。一会儿看看万里，一会儿看看王郁昭，终于忍不住抹抹头上的汗，说出八个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字：“干部怕错，群众怕变。”万里等他把汗擦干净了，就说：“你干吧，搞了再说。我不提倡，可是错了负责，有问题我检讨。”一直正襟危坐的下属彼此相望，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他们站起来，群情激昂，紧张气氛一扫而光。假如这时他们知道万里不仅让他们“包干到组”，甚至还批准了肥西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还说这叫“百花齐放”，那他们脸上说不定会放出什么光来呢。

情势一发而不可收，安徽乡下成为举国瞩目的地方。1979年的最初几个月里，陈庭元领导的风阳，有2556个生产队分成了9074个小组，还出来202个单干的农户。这等于是让48万农民中的40万人逃脱了生产队的控制。那一边，来安县县委书记王业美走得更远，他鼓励他的百姓索性“包产到户”，所以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单干书记”。当时人们的确是把“包产到户”和“单干”看作一丘之貉的，连陈庭元也是这样。说“包产到户”也是集体经济的一部分，是几年以后理论家们的新的解释。既然“包产到户”的名声还这样的不好，所以王业美之流也就少得可怜。“包产到组”已经烧遍了淮河两岸，“包产到户”依然是危险的禁地。敢于进入这个禁地的，在安徽全省也只有1200个生产队，平均每250个生产队中才有一个。

自1979年早春安徽省肥西、凤阳、来安、嘉山四县的一番表演之后，历史飞快地向前运转起来。本来，乡下将原有的生产队解体为小组甚至单家独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省份里都能见到，在四川、贵州、内蒙古、云南、甘肃、广东、广西这些地方还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不过为数不多，只是星星点点。安徽的情况可就有点不一样。“包产”、“包干”、“到组”、“到户”这把火，竟已经烧红了半边天，其燎原之势也似指日可待。这使得我们国家那种按部就班振振有词的节奏，一下子乱了阵脚。

70年代后期的中国人可完全不像90年代，大家可以总结出“遇到黄灯闯，遇到红灯绕”一类的办法来暗度陈仓。那时候人人都知道既定的政治程序决不可以缺少。此后的几个月中，大家异口同声地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英明伟大，同时表明自己的坚决拥护和坚决贯彻的立场。按照既定程序大致先由北京开始，然后是中央政府各部、三军总部、各省市自治区党政首脑、十大军区高级指挥员、社会名流、劳动模范，最后轮到党的基层官员和老百姓。党的纪律当中有一句话专门描述了这样的过程，叫做“先党内后党外，先上级后下级”。舆论则在某种程度上负有组织政治程序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履行

体现于全体报纸的和衷共济。人民日报社的编辑将自己头版的消息标题以及版面编排拟定之后，需要通电京城同仁。30家省委机关报的夜班编辑，总是要在夜晚纷纷致电人民日报总编室，将当日消息题文一一核对，此外还包括版面编排、标题字号之类也要参照改定，务使自己的报纸与北京一致。

从1979年5月底开始，各地领导人轮番发表几乎一字不差又模棱两可的演说。5月20日，浙江省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告诫下属：“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一系列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坚决排除来自‘左’右方面的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全会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sup>①</sup>四天后，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当着280位下属严厉地批评“左”右“两种错误思潮”是两种危害，都不能低估。他一会儿说，“当前要注意思想解放”；一会儿又借着一个“老工人的话”说：现在正常的民主不够，胡闹的民主太多。<sup>②</sup>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的听众有7000人之多，所以他的讲话更加激昂：“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实际上是对三中全会的看法。”这话倒是说到了点子上，可是，用听众的话说，接下来却又成了永远正确而又没有用处的话。杨说：“两种错误思潮表现形式虽然是一‘左’一右，都是否定反对三中全会精神的，都是怀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过了两天，北京市委的工作会议也召开起来，书记林乎加在他的讲话当中继续重申这一句，只不过他多讲了一句话，“我们必须严肃对待，不能任其泛滥”。然后，那个夏天，所有的省委书记都在他们的省委工作会议上争先恐后地发表讲话，各省委机关报则及时地在自己头版头条的位置上发表消息，报道他们的书记的演讲。包括吉林王恩茂、山西王谦、天津陈伟达、青海梁步庭、甘肃宋平、四川赵紫阳、福建廖志高、湖北陈丕显、内蒙古周惠、广东习仲勋、辽宁任仲夷、江西江渭清、贵州池必卿、广西乔晓光、湖南毛致用、安徽万里。

那些日子，所有大城市里的官员都坐在烟雾腾腾的会议室里。时代改变了，但是会议的场面却还没有什么改变，通常都是由党委书记的讲话开头，又由书记的讲话来结束。其间漫长的一周两周或者三周中，委员们依次发言。大家一边喝着茶，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表明：既反“左”，又反右；既坚持解放思想，又坚持四项原则。讲出来的话全都一模一样。这也难怪，这些人哪一个不是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过来的？现在即使说些永远正确的“废话”，也

① 新华社新闻稿 1979年5月29日。

② 《陕西日报》1979年5月29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只是既定之政治经验的实践。只不过，这种云山雾罩的话并没有持续多久，每个人的真实思想和情绪还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因为乡下的消息不断地传到官员的会场上来，而这些消息十之八九都是说农民们如何不听约束，如何造成了农村的混乱。土地已经被瓜分得七零八落，碰到好地大家都抢，有的竟被分割成几米宽，这哪里是在种地，简直是在擀面条。牲口分了，农具拆了，拖拉机被大卸八块，劳动力少的人家唉声叹气，五保户更是无人过问，民办教师把一屋子学生撂在那里回家种地去了。本来一块好好的地，现在叫几户农民占领了，你要种粮，他要种棉，还怎么机械化？怎么水利化？在河南，一首顺口溜成了1979年反对“包产到组”的战斗口号，这是一位县委书记的杰作，对大多数官员来说，每一句都在他们心头留下极大的震撼：

耕地累死牛，  
用水打破头，  
拖拉机不用了，  
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

在安徽，1979年的夏季诞生了一个讨伐“包干”的檄文，作者开列当日农民之行为和农村之景象，计十二条：

集体干分掉了；  
人心干散掉了；  
干部干瘫掉了；  
耕牛干死掉了；  
农具干毁掉了；  
机械干锈掉了；  
公房干倒掉了；  
大田干小掉了；  
科学干停掉了；  
公活干歇掉了；  
教育干低掉了；  
贫富干大掉了。



此文上达京城，令人触目惊心。农业部一位副部长惊道：“我的天呀！这些农民正在干什么呀！”这种情绪很快就传染开来，几位专管农民计划生育的官员联合签名提出一个报告。他们抱怨道：“这下可完了。过去谁不结扎我扣她的粮食，现在，粮食在人家自己手里，她就是生出一个排来，有什么办法？”

城里人都以为乡下正在出现一场混乱，云遮雾障的会议上陡起波澜。官员们再也顾不上字斟句酌，细嚼慢咽。在他们掐灭烟头怒发冲冠拍案而起的时候，就谈到了下面这些话题：

“万里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什么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乱”；

“搞‘包产到户’比‘四害’横行还要坏”；

“我们这些老同志可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顶住复辟风”；

“邓小平早就该提出四项基本原则”；

“就是应当拿四项原则来纠正三中全会的偏向”；

……

阵线就这样分开了。这情景在毛泽东早有预言。他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过去大家只在心里计算着这种局面，表面上装糊涂。现在这句话就在京城里面流传开来，大家都惊叹还是毛主席英明，皆知已经到了不能再装糊涂的时候。6月22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说：“我们党内的认识不一致，有分歧。”<sup>①</sup>虽然高级领导人都小心谨慎地避免将分歧公开，但所有了解中国政治行情的人却懂得“听话听音，锣鼓听声”的奥妙。内蒙古的周惠说：“在这样一个大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一点问题，是难免的。”<sup>②</sup>这话一听就知是为乡下的“混乱”开脱。甘肃的宋平说：“我们决不能听风就是雨，决不能动动摇摇。”<sup>③</sup>赵紫阳显然认定解放思想为当务之急。他在左右逢源了一阵之后，终于忍不住真情流露：“从党内尤其是从高中级干部的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思想比较容易统一，而继续解放思想，仍然是比较大的问题，要用很长的时间，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解

① 《人民日报》1979年6月22日。

② 《人民日报》1979年4月22日。

③ 《甘肃日报》1979年6月6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决。”<sup>①</sup> 他没有说要用多少时间，不过他警告说，这些人甚至会把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当作四项基本原则来加以坚持。他的这番话发表在成都，很快在千里之外的沈阳引起回应。“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把‘开头’当‘过头’，”任仲夷尖锐地说，“解放思想不是已经足够了，而是许多人的思想还很僵化。”<sup>②</sup> 几天后，《辽宁日报》编辑范敬宜就拿了“莫把‘开头’当‘过头’”这几个字当标题，写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冯文彬也在《人民日报》上写道：“贯彻三中全会政策的主要障碍，还是干部中的思想僵化问题。”<sup>③</sup> 这样，这一股潮流又转头南下。习仲勋说：“决不像有些人说的，现在要‘收’。应当说，解放思想是‘开头’。”<sup>④</sup> 廖志高说：“特别是‘左’的面目出现的思潮，更能迷惑人，更具有欺骗性。”<sup>⑤</sup> 一个名叫马良超的人在《安徽日报》上撰文写道，有些人振振有词地感叹说，“早一些提出四项原则来纠偏就好喽”，其实他们当初就是反对三中全会的人。<sup>⑥</sup> 《江西日报》的一位评论员说得更加尖锐：“要说今天有可能引起混乱的原因，那倒不是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的方针，而是至今仍然坚持‘两个凡是’，阻挠解放思想的那些人的言行。”<sup>⑦</sup> 眼光敏锐的看客见到这些东西，往往会感到不安。他们心里预感，众口一词、不偏不倚的虚伪局面终于会被戳穿，新的时代不能允许模糊不清的选择。

不过，有一个人一点也没有不安，反而有意识地把嘴上的分裂引导到实际进程中去，这就是万里。1979年由春到夏的这段日子里，解放思想的主张虽然占了上风，但是谁也不敢说到底能够解放到什么程度。“包产到户”的人们再也掩盖不住自己的行为，事情暴露出来，这些人一下子陷入社会的批评中，压力极大。这时候，万里竟露骨地煽动他的下级说，“我早就盼着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人带头呐”。结果，他真的找到了三个“不怕死”的县委书记。来安县的县委书记王业美把川剧《七品芝麻官》里那个不畏强权、我行我素的县官的一句名言搬了出来：“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门心思向南。”另一位，嘉山

① 《人民日报》1979年5月23日。

② 新华社新闻稿 1979年5月26日。

③ 《人民日报》1979年6月7日。

④ 《人民日报》1979年6月11日。

⑤ 《福建日报》1979年7月4日。

⑥ 《安徽日报》1979年7月16日。

⑦ 《江西日报》1979年6月1日。

县县委书记，说得更加不留余地：“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动摇。”万里频频在这些县里穿梭往来，和这些人谈话，对他们的行动大加赞扬。老实说，当时敢于这样做的省委书记并不多。

“包产到户”不能符合社会主义理想，在某些人看来是明白无误的，这一点根本不必请示最高领导人就可以作出决断。杨易辰即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国最北方的大城市哈尔滨痛斥“包产到户”是一个魔鬼。山东省下决心纠正农民的反叛，机关干部分赴乡村，结果战功赫赫，原来已经有60%的生产队“包产到组”，两个月里大半重新合并，只余15%。许家屯的江苏毗邻万里的安徽，现在真有大兵压境、四面楚歌的危机。官员们沿着苏皖的边界挂起一串串喇叭，男女二重声音在喇叭里整天高喊“坚决顶住安徽的分田单干风”。山西省委机关报的编辑们则写出14个版的文章，说是要向安徽射出威武雄壮的“排炮”，目标自然就是“包产到户”。人人皆知山西是“农业学大寨”的大本营，假如连这里也烧起“承包”这把火来，人民公社可真是无地自容了。然而叫人料想不到的是，这“学大寨”的后院里的确着起来一把火。闻喜县南郭三队的19户人家偷偷地“包产到户”，而且竟然得到县委书记张世贤的支持。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年初，早于山南“包产到户”大约四个月，早于凤阳“包干到组”至少十个月。到了1979年年初，张世贤又在他属下的877个生产队里推广南郭的办法。他的计划如能善终，则日后人们在寻找农村改革的开路英雄时，一定不会忘记将之载于史册。可是，我们国家的制度一向不能允许任何个人具有左右功名荣辱的力量，下级官员的成败常须仰仗上级官员的意志。张世贤的运气不好，他在山西居官而不是在安徽。山西省省委书记王谦不是安徽的万里。所以在陈庭元为英雄之举，在张世贤却是叛逆行径。尽管南郭三队的粮食亩产在那一年里增加了3倍，这件事情还是令王谦极为恼火。他当着几百官员对张世贤威胁道：“你讲过没讲过，责任田搞错了，你负责。”此话等于是要张世贤知趣地交出辞职报告。张世贤承认讲过此话，却并没有辞职。不过事情已经容不得他来做出决定。几个月后，他奉命离职去学习，他的一意孤行的实验也就悲壮地夭折。<sup>①</sup>差不多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山东。公社党委书记迟世光纵容他的下级把生产队分解为小组，这惹怒了上级，后来他就莫名其妙地离开书记之职当了计划生育局的局长，这在官

<sup>①</sup> 《中国青年》1981年第19期。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制上为平调而非降职，可是他现在再也管不着生产队的分与不分了。<sup>①</sup>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意识形态的战场上，同时存在着两个战役。前述高层领导人纷纷对三中全会的决定和党的农村方针表明立场，只是其中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叫做“真理标准的补课”。“补课”这个概念的出现大致在1979年夏季。华国锋总理在他提交给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说到它。整整十年以后，中国一大批有名望学问的人，如痴如狂地说起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不过，他们所念念不忘的乃是1978年的争执，几乎没有人把1979年的“补课”当作一回事。事实上，不论“补课”的发明专利属于谁，在当日中国你来我往相持不下的局面中，都可以说是击中了要害。哲学正是由这时开始，从哲学家的殿堂中走了出来，成为老百姓手里的武器。

凭情来论，1978年那场“真理标准”的争论，只是一场更大争论的序幕。出场者只是哲学家、政治家、记者和城里文化圈子里的一群人，充其量不过几万人。当时乡下人在干什么呢？他们要么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要么是在旁边看热闹。“啥真理标准，无非是大鹅和小鸡斗嘴，看谁嘴大谁嘴小了，”他们说，“谁的嘴大谁就是真理。”接着，1979年夏末，第二个浪潮就开始了，两个月后，当秋天就要过去的时候，十亿中国人差不多都参加进来，工人、军人、教师、学生、商店职员和机关干部、街头小贩和农民，连根本没有上过学的文盲也会集合起来同声叫喊：“对不对，看实践。”这些人虽未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们有时候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因为这些文盲连同那些只上过几天学的人加在一起，至少有2.5亿。他们的确不懂“真理”为何物，但若有人告诉他们，多打粮食就是真理，保证个个都明白。

其实天下的大道理都可以用常情来度量。任何动员民众的政治运动，奥妙也就是把政治家的高深莫测简化为老百姓的浅见陋识。政治家的媚俗与老百姓的附势，是相映成趣的一回事。我们的国家自50年代以来于此已有多次证明。现在看到“真理标准补课”的一呼即来和势如破竹，就更加不会怀疑这一点。在距离广州市大约十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出名的公社，叫东圃。其所以能够出名的唯一理由，乃是毛泽东在1958年4月30日这一天曾经在这里走了一圈，并且在一小块土地上面站了一会儿。从此，这块土地声名远播，

---

<sup>①</sup> 李延国：《中国农民大趋势》，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4月30日也成为值得纪念的日子。每到这一天，各地代表云集此地，五颜六色的“忠”字漫卷天地之间。官员和百姓依次序列队，鱼贯行至毛主席像前，三呼“万寿无疆”，行礼如仪。随后即有一面旗帜迎风招展，上书：“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又由职务最高者挺身列于队首，率领众人沿着毛主席当年走过的道路缓缓而行，秩序井然，庄严神圣。现在大家手里忽然有了“真理标准”，都说这是“宗教式的狂热”。党的书记钟叙本说，这种狂热叫我们成了“众人狮头”。他说的“狮头”是百姓世代代放在太公祠堂里供奉的圣物，虽为偶像却人人可以恣意耍弄，久而久之，“狮头”须发尽折，断耳残鼻，大眼眶里的眼珠也杳无踪影。他说，这个凄凄惨惨的“狮头”正像他领导的公社，虽然神圣地舞来舞去，终究破败不堪。说“以粮为纲”，就把菜都挖了种稻；说铲除资本主义，就把社员的花卉全部砍尽；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把生产队的财产收归大队。这样舞了20年，他的老百姓成了当地最穷的一群。现在他一听到“毛主席是人不是神”这句话，就觉得说得真是不错。接着就把“自留地”还给了农民，富农摘去了帽子，素馨花盛开了，“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走”的仪式也即行取消。<sup>①</sup>

人民公社里面诸如钟叙本这样的下层官员，多至数百万个。在80代开始之前的几个月里，这些人全都坐下来对真理的问题发表意见。包括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和大队长、公社书记、县委书记和县长。他们的声音一下子全都汇集在一起，其广泛和响亮的程度的确不容执政者忽视。不过，这些声音当中十之八九都是在谴责自己以往的行为。如此真诚且又不谋而合的忏悔回荡在党的下层官员中间，也属前所未有的悲壮之举。樟木公社党委书记周化里说自己看到党的新方针和自己多年的信仰大不一样，就生出“怀疑之心”。坦平公社的副书记曾永光说自己“很不习惯，甚至心有抵触”。大坡公社的书记孙凌才说：“现在的问题是上级让农民富，是咱们阻碍着不让富呀！”几天以后，华塘公社党的书记唐振精就发表了他的“有错必纠”的讲话。东北地区的吉林省有个腰新大队，1964年发生了著名的“腰新事件”。上级派下来的工作组说了一句“没有好东西”，10个大队干部就成了坏蛋，27个党员也就“腐烂变质”，90家贫农不是变成中农就是富农。到了1979年，又来了工作组，这一次宣布当年全错了，所有“坏蛋”全都不是坏蛋。“真相得见天日”，支部书记许占林终于把憋了15年的一口气吐了出来。他说“真理常常会在一个

<sup>①</sup> 《广州日报》1979年12月5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时期内不被承认。但是实践终究会战胜谬误”<sup>①</sup>。在华东的福建省，有个大队支部书记，名叫郑学探，9月5日这一天对于他来说真可以算做“复活日”。“过去，我可真的是中了毒”，他在公社的讨论会上老老实实地表白。因为他在村里专门抓资本主义。党的干部率领民兵队员，白天站岗，晚上伏击，捆住出去做买卖的社员，砸烂人家煮山楂糖的铁锅，把山楂统统倒进粪池。“我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人心收回来搞集体生产了，可是根本不成，”他说道，“社员叫我这个党支部书记是‘土皇帝’，把团支部书记叫‘帮凶’。这小书记想要找个对象的时候，人家就说，谁嫁他谁绝户。”<sup>②</sup>就在郑学探悔恨不已的时候，1000多公里外，湖南省湘阴县县委副书记谭载阳也在忏悔。他说到自己如何颁布禁令不许生产队烧制砖瓦，不许开动机帆船，又如何不许人家引进水稻新种。“现在我服从真理，向老百姓检查自己的错误，”他说，“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实践证明，我是在干蠢事。”<sup>③</sup>

报纸把这些事情登出来，连篇累牍，不依不饶，令当日的舆论如火如荼。《人民日报》曾经在一年前的争论中表现出过人的勇气，现在更加有恃无恐。7月12日，它发表了沈钦礼的文章，措辞尖锐而不留余地：“不管什么人，如果还想用自己手里的权力，封住群众的嘴巴，剥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必会遭到广大人民群众唾弃，弄得不好，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落得个‘霸王别姬’。”这后一个典故在2000多年以前即由太史公司马迁加以陈述：楚王项羽刚愎独断，一意孤行，终至兵困垓下，在最后的时刻与自己心爱的女人挥泪相别，双双自刎乌江。这个包含着浓烈感情色彩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

这一年报纸的威望也大大上升，发行量增加空前绝后。《人民日报》700万份。还有无数的报纸赶在这个时候纷纷创刊，其中就有《中国农民报》和《经济日报》。这是党报史上最灿烂的一页，直到十年之后，人们回忆起来还能激动不已。老实巴交的农民在报纸的鼓动下越来越不安分，他们不再把报纸拿去糊窗户，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它贴在扁担箩筐或者随便什么农具的上面，说是“白头文件”，举在手里去对付不让他们随心所欲的干部。这一来，胆大妄为的农民步步进逼，干部处处倒霉，连连败北。这情况让《吉林日报》的

<sup>①</sup> 《吉林日报》1979年8月21日。

<sup>②</sup> 《福建日报》1979年9月18日。

<sup>③</sup> 《湖南日报》1979年9月20日。

记者赵国光一说，就像一篇浪漫的散文：“卡岔河、拉林河、三道河，以及那些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溪流，在百里沃野之上跳跃着，奔跑着。它们一经注入松花江，就汇集成汹涌的洪流，一泻千里，奔腾不止了。”<sup>①</sup>

从很多方面说，那个时代犹如“大江东去”。所有的人都会理直气壮地说，“权力不是真理”、“本本不是真理”、“条条不是真理”，都会拿一句话来对抗他的上级：“连毛主席都有错误，你又怎么能一贯正确？”都会喊着“实践第一”的口号，要上级允许他们去做一些在过去完全不能允许的事情。按照县委书记周化臣的说法，这些昔日里最卑微的人现在几乎成为真理的化身，因为，实践就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生气勃勃的东西”。这样一种观念的确立可真是不得了的事情：谁还能阻挡农民的行动呢？广西有个民安公社，说是要搞“包产到组”，干部不敢说行也不敢说不行，老百姓说，看看实践效果吧。结果就“包”了。几年之后干部还在庆幸有了一个“补课”，才使得他们没有从“时代之车”上甩下来。<sup>②</sup> 云南省有个黄山大队，9个生产队中8个不敢“包产到组”，一个壮着胆子“包”了，可是三个月后便又收回成命。现在大家就后悔怎么没有早一点“补”上“真理”。<sup>③</sup> 在贵州省的石阡县，“包产到组”一举在80%的生产队里实行起来。县委书记说，这是因为“真理标准一明，我们余悸全消”。他还信心十足地说：“在人民群众的实践面前，任何用强迫命令推行的假社会主义模式都会黯然失色。”<sup>④</sup> 毫无疑问，人民公社正在失去最后的意识形态的屏障。

这种局面对于人民公社来说，的确如同一块石头扔进一池死水。种种好奇、恐惧和非难同时出现。连城里人也前所未有地关心起乡下。厂长说家在农村的工人已经不安心生产；军官说家在乡下的战士整天心神不定；机关干部开始抱怨自己甘当社会公仆，老婆孩子却要在家种地；农业部说拖拉机全都分了，还有什么机械化？林业部说树都砍了，还有什么绿化？商业部说国家必需的农产品从此将难以收购足额；教育部说教师都去包田、学生都去种田，百年树人之计休矣。报纸已经不再发表来信像张浩那样批评“包产到

① 《吉林日报》1979年8月21日。

② 《广西日报》1979年9月24日。

③ 《云南日报》1979年7月7日。

④ 《贵州日报》1979年9月26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组”，可是还可以发表来信批评“‘包产到户’增加了工人的后顾之忧”。

产量的增加和农民的欢迎已经无话可讲，“包产到组”看来还可以算做一个集体，更何况党的中央委员会也已认定，大致可以看作是第一回合的胜利。可是，“包产到户”还留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被一些人看作是“单干”，或者至少是“滑向单干”的开始。1979年的年终，这种声音并没有因其增产的奇效有所减少，反而由于事情暴露于世人面前而大大增加。这种来自意识形态的攻击在当时仍然很有力量，所谓“不要争论姓‘社’姓‘资’”的说法，那时候的人连想都不敢想，搞“包产到户”的人其实也不像后来所描述的那样大义凛然，他们大都偷偷摸摸，并且总要给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合法的名称，比如讲“定产”，不讲“包产”；说“定田”不说“分田”；说“到人”不说“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是“集体经济的一个层次”，是几年之后理论家们的杰作。这时候，即使推行“大包干”者如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也会把其治下的“包产到户”看作是与“单干”一回事，施以手段坚决纠正。他尤其对更多的农民喊着要仿照小岗的办法感到忧虑，所以在11月23日召开县委电话会议作出严厉部署来阻挡这种势头。这些措施包括，把已经“包产到户”的202个生产队重新合并；撤换不听话的生产队长；坚决不改正的人统统集合起来学习，直到改正了方可放回村中。仅此一件，就不难窥见当日局面的混乱。改革者的确是一步一回头地走向他们的目标，没有什么人可以在历史上居有超凡至圣的位置。小岗也就是在这时被强迫合并为八个作业组。他们喊着质问：“增产粮食犯不犯法？”没有人说他们犯法。不过，报纸上却清清楚楚地指责他们这些人，“既没有坚持公有制，也没有坚持按劳分配，实质上是退到单干”。

小岗虽被强迫回归人民公社的集体。但这一年来，种种神话般的大事件流传于乡间，影响已经无可挽回。在即将到来的1980年，中国农村的改革史，仍是一个相持不下的记录。

此前所论向人民公社发起挑战的人们正在遇到巨大的压力，其实，坚守在人民公社里面的人们处境更加不妙。后者的威信扫地虽然要早一些，但其权力大厦的最后瓦解却是在1980年。这一年，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成为党的全部经济方针中的焦点所在，它是1979年的继续；而且还要在今后持续至少24个月。这一年的年初，问题由幕后趋于台前，拉开这一帷幕的人，还是万里。当日党的文件仍然没有取消对于“包产到户”的限制，然而他依据



自己的理解，竟然敢在1月11日省委农业会议上公开说道：“‘包产到户’不是单干，而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他在接下去的一段话里，再次显示了某种既成原则在不同人的内心世界里面会随时随地地变迁。他说：

现在对这种“包产到户”的办法是不是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形式之一，同志们的看法有分歧。有些同志承认这种形式对改革长期低产落后的生产队效果显著，但又担心这样做违反中央的决定。其实，这样做正是实事求是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和中央决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这些话使得万里声名远扬。据说，这是自60年代以来，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公开表明支持“包产到户”的立场。其倾向无论和当年毛泽东的思想还是今天党的文件相比较，说“实事求是”还算过得去，若说“一致”则为明显的牵强。这使中南海感到尴尬，一时竟是难以言辩。倒是在万里的属下和乡下百姓当中腾起一片欢呼。这位省委书记的威望从此如日中天，其体恤民情的诚意也为百姓奔走相告。不过，万里并没有几天平静的日子，很快他便会感觉到风雨飘摇。

2月5日，《农村工作通讯》杂志大批运往全国各地。其中有一篇文章，文题触目惊心：《分田单干必须纠正》。依照编者在按语中所说的发表此文之动机，与万里提出的问题如出一辙，即“‘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实际上的倒退为分田单干？就有不同看法”。可是文章的结论却截然相反。作者反反复复地引述党的文件当中“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许‘包产到户’”之既成条款，又不厌其烦地证明现在所谓“包产到户”其实就是“分田单干”。令人惊讶的是他说自己刚刚自安徽省访问归来，那里的“包产到户”已经使得“集体经济成为‘空壳’，‘队为基础’被瓦解”。整个文章的论证方式可以说是“捉骨剃皮”。攻击者立论由人民公社的核心开始，诸如“集体经济”、“队为基础”等等，然后转而揭发种种表面的问题，比如一个公社卖掉了12台拖拉机；一个大队的集体收入由41725元下降为25291元；一个社员分得土地却没有劳力，不得不花了50元钱请人助耕；一个书记不去开会，写下假条说他要回家种地……作者将这种种小事积累化做乡下的大局。进而转回整个政治的结论，也即人民公社的基本原则不容动摇，“坚决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反对和防止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户’的错误做法”<sup>①</sup>。

考虑到杂志印制的周期，作者和编者在制作这篇文章的时候，肯定还不知道万里的讲话，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这是一次有组织的行动。不过，攻击者的深思熟虑和细致周详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缺憾是大多数读者并不知道作者“印存栋”为何许人，其攻击的激烈程度在讲究名分的中国人眼里也就大大地打了折扣。这种感觉更由于万里在2月下旬入选党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而强化起来。万里这时由地方官员进身中南海，在机敏的人看来，可能兆示了某种未来的兴衰。

这种气氛，不消说令人疑惑，任何一方都不敢断言自己究竟有几分胜算。《农村工作通讯》为月刊，乃由国务院农委主办，具有相当的官方色彩。它既要发奋挽回狂澜，便再接再厉地在它的“三月号”发表言论。这一回作者可不再是无名之辈，而是全中国都公认的农业权威杜润生。此人身形瘦小，眉眼峭刻，一生环绕于最高领导人左右，由50年代的毛泽东时代而至80年代的邓小平时代，专为农业方针出谋划策，无论阐发何种思想总能头头是道，且精力旺盛，思维敏捷，颇有口才，极富感染和煽动的力量。所以京城理论圈中称之为“高级侃爷儿”。杜润生的最高任职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并无实际的权力，然而几乎所有内阁部长和省长对他都有三分敬畏。此人不开口则已，一开口总是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垂头丧气。现在，他在这份杂志上写道：“‘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只要领导者稍微放松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就会使它滑向单干的道路上去，最后非冲破集体经济不可。”当然，“包产到户”也能增产，那是多年来集体的积极性和个体的积极性都没有发挥的缘故，现在发挥了个体的积极性，所以能够比原来增产，可是这种增产是有限的。所以，他规劝大家把农业的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上，如果“包产到户”，“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营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被破坏了”<sup>②</sup>。

杜润生是一个精明敏感的人，具有洞悉历史演变的能力，并且能够为任何一种演变的结局找到理论和事实方面的根据。不论他在1980年早春对于“包产到户”抱有怎样的成见，他此时所作出一个判断却说中了事实。他说：“这两年建国以来农村战线上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事实上争论的范围

<sup>①</sup> 《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2期。

<sup>②</sup> 《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3期。

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事情到了这一步，即已失去最后回旋的余地。我们国家的惯例，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关乎宏旨的争执久拖不决的，我们的政治和司法的制度又极为简单，缺乏裁决争端的机制。在这种局面下，问题总是要由一个至尊无上的权威来作出决断，这个人在昔日为毛泽东，在今日为邓小平。这件事不必等到这一年12月华国锋辞职之后才能看明白，以1980年4月邓小平所享有的威望，已经足够一锤定音。他在这一个月里提到了四个省区——甘肃、内蒙古、云南、贵州——的贫穷，主张这些地方“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一个月后，5月31日，他对政治局里几位领导人说：“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令人关注的是，这一次他还大有深意地说到安徽凤阳的“大包干”和肥西的“包产到户”，说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sup>①</sup>。在这个争吵不休的岁月里，邓小平公开表明支持“包产到户”的立场，此是记录中的唯一一次。毫无疑问，万里的主张在权力中枢发生了作用。他在4月16日离开安徽，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取代王任重主管全国的农业。他就任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安徽正发生的事情来影响中南海的决策者。

由于这一重大事变，旷日持久的僵持开始出现转机。反对者只好作出部分的妥协，其防线从最贫困的地方开始瓦解。国务院的官员们决定，可以在大致10%的地方实行“包产到户”。邓小平提到的四个省区本来已经蠢蠢欲动，现在立刻就放开胆子干起来。云南省省委书记安平生说，现在是“从天上回到地下”。内蒙古区委书记周惠把他的早就准备好“包产到户”的村庄到处宣传。甘肃的宋平说，可以“搞责任田”，消息5月11日在报纸上发表，老百姓如获至宝，成为“十一号文件”。贵州省省委书记池必卿早就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一直觉得不能理直气壮，现在就长出了一口气，说乡下一年来的局面是“一场拔河比赛，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还说现在是“下决心‘包产到户’”的时候了。这样一来，这几个地方就全都大干起来。到了这一年的夏天，安徽境内“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经有30%，贵

<sup>①</sup> 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州 50%，甘肃和内蒙古至少 20%。

在主张“包产到户”的人们看来，80 年代的第一个春天真是美好，坚守在人民公社营垒里的人眼看就要全线溃退。但是，在赵紫阳看来，情况并不如此简单。从道理上讲，乡下发生这样的事情，的确证明了公社的制度在苟延残喘。不过这个过程的难处在于，实际操作并非会议室中的争论所能解决，况且，他也不能相信决策中枢已经同舟共济。对于农村的方针，权力的核心并未取得一致，也并不是每一个省的领导人都愿意放弃人民公社。如果以为“包产到户”在几个地区占了上风，就可以在全国推而广之，不能说是明智的选择。从 1980 年 6 月 19 日赵紫阳写的一封信中，我们大致可以体会到他的这种心情。他建议“对‘包产到户’应做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表面上看来，这种谈论问题的方式是不偏不倚的，而实际上他几乎可以肯定他的提议一经实行，必定有利于“包产到户”的推行。这位未来的总理提出，现在正是生产的季节，所以无论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应当稳定下来。贫困地区的“包产到户”当然可以，即使经济比较好的地方，已经“包产到户”的也可以实验，看看结果如何。继之则建议在秋后召开专门会议加以讨论。

赵紫阳在 1980 年 2 月 29 日成为政治局的常委，又在 3 月 17 日成为新成立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这几乎使他具有了领导全国经济的最高权力。我们今天所见的这一封信，乃是在接管这一权力之后首次表达他对于农村争论的意见，他在日后始终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农村问题。尽管研究这一时期农村历史的人们大都将他与万里并提，“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传言在乡下到处弥漫，但是，以现有的记录来看，他的进退自如较之万里的旗帜鲜明的确不同。这一处理争执的方式，更清楚地代表了政府施政的典型特征。我们庞大的国家虽然无事不需统一政令，但是对于“统一”的力量实在不可高估也不可低估。一般说来，中国各地区千差万别，人们的精神也从来没有真正地统一过。因之，中央必在每时每事详加干预，甚至一个村庄的百姓以何种方式种地也会在权力中枢发生激烈的争执。然而每到关键时刻，决策者却不一定需要当机立断，有时候模棱两可反较独断专行更加必要。因为问题的解决在于最后的胜负而不在于逞一时之强。

赵紫阳所发动的调查研究在夏季里大规模展开。但是调查组的组成是由万里掌握的。国家农业委员会的人员分成五组，分赴在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和内蒙古调查，为时月余。其调查的中心问题正是“包产到户”。8 月，

这些人全部汇集京城，这样，京城里面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第一次获知如此众多的关于“包产到户”的种种下情。但是，争论仍然未能消除。不仅如此，还由于“包干到户”的事实也在这次调查当中充分暴露，又引起了更大的争论。反对者现在质问，“包产到户”好赖还有一个生产队的统一分配，“包干到户”则使集体连这一点权力也不复存在，这同单干又有什么两样？但是其中一路调查组由安徽回京后却提出一个惊人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中国的希望”。他们的意见为决策者充分理解，并且对决策本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胡耀邦说是“起了重大作用”，邓力群则说是“决定作用”。当然决策者们对这种看法即使赞成也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对于报告中所说“‘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胡耀邦和邓力群全都不能同意。这件事情再一次证明，人民公社的既成制度在我们国家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力量，即使坚定的改革者，也曾在一个短暂时间里不能痛下背叛的决心。

但是有迹象表明，万里此时依然是少数派。事实上，虽然“包产到户”已经不再非法，但大多数人宁可认为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不仅不是什么“伟大创造”，即使说“曙光”和“希望”，也只是属于贫困地区的，所以，有必要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等到9月14日中南海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的时候，这种看法就占了上风。名义上会议是在讨论农村的生产责任制，其实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说“包产到户”。杜润生此时一定后悔自己在六个月前轻率地发表了那篇贬损“包产到户”的文章。从那以后，万里进入中央政府主持农业，邓小平出面支持“包产到户”，各地以此为界分道扬镳。夏季的收成则再一次证明孰优孰劣。形势的变化出乎他的预料，令他不再固守对于“包产到户”的成见。并且迫不及待地想要表明自己的心迹。所以在会议的第一天，他就率先发言了。他指出，全国已经有90%的生产队建立了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其中有55%是定额包工，25%是“包产到组”。尤其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在万里“四月就任”、邓小平“五月讲话”之后，“包产到户”的声势大振，目前可能已达20%，并且正在由边远地区向着中心地区推进。于是就产生了争论。他说，围绕“包产到户”的争执，范围还要大得多，势必联系到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这种趋势是应当鼓励的”。他说得不错，1980年夏秋时节，我们国家的农村方针的确是在围着“包产到户”转来转去。但是，杜润生此时仍未无条件地站在“包产到户”一边。他说，他赞成对集体经济进行改革，但是不可因此抹杀20多年来在集体化基础上发展农业的成就，不能认为我们的国家没有集体化就可以现代化。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基础上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大规模地利用机械、技术和进行基本建设，都至为困难。“所以，重复一下已经说过千百次的话，还是有必要的。”杜润生的结论是，区别对待“包产到户”和单干、单干和资本主义。允许“包产到户”，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可以在大约20%的地区，也即云、贵、豫、鲁、甘、宁、内蒙古、闽、皖九省区最贫困的地方，作为一种对经济恶性循环的突破。这种办法是低级的过渡性的，现在适当退却，是为了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然后再前进，这样更有利于我们达到最终的目的。

他停下来，省委书记们为他的演说鼓掌。这一番话滴水不漏，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支持自己的逻辑。所以，掌声一落，争执又起。各个省、市、区中，只有安徽和四川公开声明，在落后的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其余要么是模棱两可，要么是坚决反对。阵营的划分由此更加鲜明，万里在两年以前讲过“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现在成为双方的武器。一方说，人民公社是阳关道，“包产到户”是独木桥，时刻都有跌进资本主义深渊的危险。另外一方则说，你阳关道虽好，但我这里全是崇山峻岭，即使是独木桥也非走不可，否则就到不了阳关道上。

一个在中国农村历史上具有独特位置的文件，就在这样一种激烈的争吵当中被通过了。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接受用“包产到户”的办法去对付农村的贫困。其文件序号为“中发1980年75号”，所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习惯地称之为“75号文件”。党的历史上矛盾百出的文件不少，这是其中典型的代表。里面充满了两种对立意见折中的痕迹。它说“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但就是不说它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也不肯接受杜润生所说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责任制”；它不再否定“包产到户”，但又说要“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而且要使“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其具体的操作是，“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其他集体经济稳定的地区，就不要“包产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也可以继续实行，但是应当因势利导，进一步组织起来。这一文件并没有对“包产到户”的数量作出严格的限定，但是，由会议的记载可知，当时这些决策者是设想将这个数量限制在27%。这根据来源于统计部门提出的一项分析，说当日农村中504万个生产队中，每个社员平均收入在40元以下的占16%，人均年收入50元以下者，约占到27%，为贫困地区。其余60元以下的约38%，51—100元者大约47%，其余100元以上者，已经是中等的以及比较富裕的地方，当然

也用不着再来“包产到户”。

此即1980年秋季我国对于“包产到户”的政策归趋。历史在这一时刻就只能前进半步，而不是像万里所期待的那样一劳永逸。这样一种结局的出现，也正好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人民公社的制度虽已不合经济现状，但是它还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价值，所以人们才会不厌其烦地加以袒护。

颁布这一文件的初衷，是为了稳定夏季以来乡下发生的混乱局面。决策者希望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在未来的农村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万事大吉。但是随着冬季的来临，随着农业生产旧的一轮结束而新一轮酝酿，乡下的争吵反倒愈演愈烈。文件中的矛盾之处把整个农村都弄糊涂了。有人说，文件上已经讲了，“包产到户”不是资本主义，这就可以干了；又有人说，文件上也没有讲“包产到户”就是社会主义呀！难道真的可以干么？不知所措的农民纷纷给报纸写信，要求对这种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予以解释。这样，在那个冬天里，报纸上“包产到户”的文章一下子多了起来。像内蒙古、黑龙江、安徽、江苏、北京、山东、云南、山西、甘肃、宁夏、广东、河南、辽宁、湖南这些地方的报纸，都在展开讨论，连《解放军报》也加入进来。因为军队中的官兵多是来自农村，他们原来都认定“包产到户”是魔鬼，现在魔鬼一下子穿上了新装，所以都不能理解。这种事态本身其实就使得“包产到户”具有某种合法色彩。贫困地区农民闻之大都鼓掌欢呼，在安徽、四川、贵州、内蒙古这些曾经我行我素的地方，官员们也很高兴。但是也不尽然。报纸是由人来编辑的。杜润生当日说：“只有通过多样化，才能达到定型化。定型化仍然将是多样的定型化。”乡下的“多样化”还没来得及展开，报纸已经前所未有的“多样化”了。这家报纸批评那一家报纸，这一篇文章批评那篇文章，有时候同一张报纸也会发表大相径庭的两种观点。真令人眼花缭乱。10月30日，雷鸣春在《广州日报》上质问道：“‘包产到户’是‘倒退’吗？”他断定农村的“包产到户”“同分田单干是根本不同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劳动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就好像城里面实行的计件工资制。为什么工厂可以定额管理，农村就不准“包产到户”？这说法看来挺有道理。可是，20天后，又有两个人，吴群策和宋正春，在同一张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是“也谈‘包产到户’”。这两个人说，雷鸣春的说法“过于笼统”，假如“包产到户”同城里的计件工资差不多，那么“不论穷队、富队，集体经济巩固不巩固，都可以一概推行‘包产到户’”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了”，按照作者的看法，有些“包产到户”“不能说它没有改变生产队的统一核算和分配，它虽然不同于合作化前的单干户，但它已经基本上是在公有制下的独立经营了”，所以它至多只能算是“一种低级的经济形式”。这种说法很快地在不少地方得到反应。《辽宁日报》的编辑以教科书般的耐心写道：

问：党中央为什么允许一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

答：是作为在困难地区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的一种必要措施。而不是到处搞“包产到户”。

问：这些地区是指的哪些地区？

答：主要是指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在这样的地方，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

问：“包产到户”的社队应当遵守哪些规定？

答：一、保护集体财产，不可拆毁平分；二、不准买卖土地，不准雇工；三、妥善照顾烈军属、五保户和困难户；四、经济效果好的集体生产项目要尽可能保留；五、生产队和社员严格履行各自义务；六、必须保持生产队的组织。

问：“包产到户”的前途怎样？

答：它可以作为一种对恶性循环的突破。当然，我们也要明确看到，“包产到户”往往变集体统一经营为独户经营，自负盈亏，也是会有不良后果的。特别是搞“大包干”的形式，副作用就更为明显。有些群众总结“包产到户”是“天灾抗不了，人祸顶不了，干部管不了，农机用不了，劳动累得不得了”。所以，其前途还是集体化。

问：如何对待“包产到户”？

答：一定要正确对待，慎重处理。<sup>①</sup>

这些话现在看来有一点可笑，其实它几乎全部重复了“75号文件”的内容。编辑以为，这样就一定非常保险，不会犯错误。可是实际的情况是，在报纸的编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包产到户”的规模别说谈不上“慎重”，甚

<sup>①</sup> 《辽宁日报》1980年12月10日。





至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文件规定的比例。其中甘肃达到 60%，安徽 53%，河南、贵州差不多也有此数。山西、山东 7%。有消息说，闻喜 65%，宿松 70%，平凉和临夏有 70%，定西 80%，武都 80%，天水 81%，沈丘 85%，张家川 99%，总计全国，吴象说，已有 20%，陆学艺则说已经超过，约为总数的 25%。

决策者们高兴了一阵，以为他们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难题，现在却越来越发现难题根本就没有解决。人们仍然在各行其是，政策也已经被肢解。所有的人都在文件当中挑选有利于自己的条文。坚持“包产到户”的人们已经将“突破恶性循环”这一概括充分地加以利用。《内蒙古日报》说“庄稼人露出了笑脸”<sup>①</sup>。《山西日报》说是“找到了治穷的好办法”<sup>②</sup>。《解放军报》也来凑热闹，说是“穷困地区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sup>③</sup>。《湖北日报》还呼吁人们更大胆地“解放思想”<sup>④</sup>。可是，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面的人们也不会束手就擒。既然全部制止反叛行为已不可能，所以他们便力图将“包产到户”约束在“27%”这个界限之中。显然，对于这些人来说，这是一场防御战。但是他们手里的武器却非常有力量。所有地区的领导人全都制定了严格的数量界限。安徽省的规定是已经“包产到户”的不再纠正，没有搞的也不再进行。这已经是最客气的了。在山西，规定的界限是 20%，超过比例的部分则要限期改正，像闻喜这样的地方，就要让 2/3 的“包产到户”回归人民公社。四川省更加厉害，有一位市长说，“坚决纠正，不要怕减产，不要怕干部躺倒不干，不要怕群众闹事”。广东省的南海、顺德坚持不搞“包产到户”，《南方日报》便予以表扬，说“硬要推行‘包产到户’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符合群众愿望的”<sup>⑤</sup>。《南方日报》的评论员还看出“包产到户”正在向中心地区蔓延，认为这是事关“稳定全局的一个重要问题”，要求予以警惕，而消除这一“不稳定因素”的办法就是“不搞‘包产到户’”<sup>⑥</sup>。但是，就在这时候，他们却惊讶地发现“包产到户”就像一场瘟疫一样到处传染开来，现在连富裕的乡村也不能幸免。危险的征兆从博罗县福田公社开始出现。这里有一个

① 《内蒙古日报》1980年10月30日。

② 《山西日报》1980年11月26日。

③ 《解放军报》1980年11月6日。

④ 《湖北日报》1980年7月30日。

⑤ 《南方日报》1980年12月12日。

⑥ 《南方日报》1980年12月27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冲径生产队，社员的收入可以达到 220 元，这在当时来看已相当富裕。可是这里居然也荡起“包干到户”的声音。生产队长决定召开社员大会，让大家举手。结果 88 户人家当中，50 户主张“包干到户”，4 家不同意，剩下的全都不表态。于是，在 10 月 7 日这一天，队长就决定顺从民意，分田包干。事情刚刚开始，即为公社的官员所知，他们认定冲径为中央文件所说不能“包产到户”的一类，所以立即前往制止。这一事件的发生的确证明，违反中央规定的征兆已经出现，所以《南方日报》便将冲径生产队一度受到“包产到户”“传染”的事件加以披露。这家报纸的评论员还借题发挥，说有些社员思想上受到“包产到户”的“传染”，这不可怕，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若及时地加以解决，就一定能使大部分生产队坚持统一经营，沿着“阳关大道”胜利前进，这“不是很好的事吗？”<sup>①</sup> 还有另外一些地方，已经把“包产到户”看作人民公社的叛徒，虽然不能施以强制手段阻止，也还有另外的办法。比如到信用社去贷款买化肥，人民公社贷款利率为二厘四，“包干到户”的农民则要付出三厘六；要是买牲口来种地，生产队之间买卖均可免税，若是“包产到户”的农民购买，则需缴纳 5% 给当地税务官员。

现在，1980 年已经结束，1981 年即将开始。全年的收获已有成算，大致上，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增产 30%—50%；实行“包产到组”增产 10%—20%；仍然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面的不增不减。然而乡下仍然陷在一种极为激烈的争吵之中。在反对者看来，既然“包产到户”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便一定会有收起来的一天。此中逻辑可由当日流行起来的一副对联加以表述：

一年快，二年慢，三年就完蛋；

一年增，二年平，三年就不行。

农民现在更加糊涂，不是说党中央的文件给他们解开了绳索么，怎么还是处处碰到麻烦呢？不是说实践检验真理么，他们已有连续两年的收成可以借鉴，又为什么增产粮食也算犯法？这些农民当然不能懂得，他们的所有行为涉嫌彻底否定人民公社的庞大制度。庶民的理想只是丰衣足食，但是一个

<sup>①</sup> 《南方日报》1980 年 12 月 31 日。

政党却一定要有自己崇高的奋斗目标。人民公社的历史到现在已有 22 年，在今后还将延续 4 年。事实上，在人民公社的意识形态和既定原则已经逐渐为物质的力量蚕食之后，这一大厦也就不可能再存在于世间了。



## 第七章

# 公社精神的破产

昔阳的欺世盗名昭揭于众——经济问题缘何演变成政治问题——“文化大革命”与人民公社制度——“学大寨”：号令6亿农民的政治旗帜黯然失色——公社精神永远不会再放光彩



陈明珠几个月来的心绪一直很坏。此人横行乡里，欺男霸女，一向无所顾忌，居然还能成为昔阳县党的委员会的宣传部长。现在，他丢官卸职，声誉扫地，沦为乡里百姓的众矢之的，报纸编辑不再把他当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来介绍，而是把他叫做“虎头山下一恶少”。说不定哪一个晚上，警察就会拿着一副手铐站在他的面前。惶惶不安的感觉终于令他无法容忍，他于是跑到北京城里找他的父亲。时为1980年早春，正是人民公社的精神面临强大挑战的时候。

这一情节之所以会同人民公社的兴衰相关联，正是由于陈明珠的父亲乃是陈永贵。父亲当日为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在儿子的心目中，这无疑具有足够的力量来驱散头上的阴云。却不料，在京城中心交道口大街那个小小的院落里面，儿子看到的父亲也是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陈明珠还没有来得及述说自己的遭遇，他一听父亲开口就吓了一跳。父亲要他代笔，向党中央写一封辞职信。内容简单得只有三句话：身体不好，没有文化，不能适应工作啦。

用陈永贵自己的话来说，“干不了啦，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陈永贵的这一切悲剧，可真是演到了尽头。过去十几年间，他是亿万农民景仰的英雄，连毛泽东也会笑眯眯地望着他说一声“永贵好”。现在这一切辉煌都已经逝去。两年来，和他一起辉煌过的那些人们全线溃退，纷纷倒了霉，他老陈硬起头皮抵抗了一阵，却接二连三受挫，最后只好踉跄后撤，躲进自家的院落里骂人，骂了这个骂那个，不过没有人理他。除了儿子还能听他的话以外，其他人想到他时甚至连名字都不提。只说“大寨那个代表人物”，或者说“昔阳前主要负责人”。

依照我们国家的政治，这样的用语出现在报端，就意味着攻击矛头正在向他靠近。批评者采用的是“吹糠见米”的战术。先说他“将大寨神话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榜样”，恣意把批评大寨的人打为“反革命”。然后就指出“学习大寨的运动当中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渐渐地，批评涉及大寨本身亦有着严重的不足，比如“以粮为纲，全面砍光”；比如“违反党的政策收去社员的自留地”和“关闭了自由贸易的市场”；又比如分配制度中的平均化倾向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热情。这些批评日益严厉起来，以至于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学大寨简直是“一场灾难”。但是，对于陈永贵来说，所有这些仍然不是最要命的。致命的打击在1980年7月7日这一天终于到来。《人民日报》发表的消息揭露，“昔阳县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在1973—1977年的五年中间，将粮食的实际产量多报了24%，共计虚报产量13600万公斤。人人皆知大寨为昔阳所辖，昔阳又因学习大寨的坚定不移和卓有成效成为我们国家的第一个“大寨县”，华国锋主席提出“普及大寨县”方针，昔阳本是一个重要依据。<sup>①</sup>现在，欺骗的丑闻一经暴露，显然不会仅仅牵累一个昔阳，它甚至可以说是对于整个学大寨运动的严重打击。这一消息又由新华社通电全国，为各地报纸电台广为传布，里面口口声声所说之“主要负责人”，虽然未具姓名，明眼人一望而知必为陈永贵无疑，其间接的效果是诱发人们对于大寨本身的全部业绩顿生疑窦。

这表明新一代领导人对陈永贵的过去仍然不肯见谅。然而究其原因，这种无情的揭露并不在于他的说谎和专横，全在于他与“文化大革命”时代那些叱咤风云的造反者过于密切，甚至可以说，这个农民的沉浮荣衰，完全是“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具体而微的象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号召中国农民学习陈永贵的大寨大队，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在这一天里由同一个文件宣布成立。这一文件还断言党的几名高级官员，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是“阴谋反党集团”，这些人后来或被严加管制，或被投进监狱。大约两个月后，陈永贵的辉煌与刘少奇的黯淡又碰到一起。这是8月12日。党的一个著名文件发布出来，是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刘少奇在这一天里失去了党的副主席之职，“文化大革命”由此展开于全国，林彪也就进入了他个人历史的顶峰。但是在1966年8月12日受到毛泽东特别垂青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陈永贵。党的文件在这一天里第一次说“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乃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出。

如今，世事已然倒转。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的被免去职务，与刘少奇的冤案昭雪为同一天的事情，在这同一日里被免职的还有纪登奎、吴德和陈锡联。此辈都是陈永贵在政治局里的好友以及同盟，现在惺惺相惜，他就忍不

---

<sup>①</sup> 华国锋的这一方针在1975年9月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他宣布已有300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并且计划在五年之内，每年再建成至少100个“大寨县”。



住对儿子说道：“他们都下去了，就我一人还干什么哩。”

“申请”虽然呈递，解除他的职务却是在6个月以后，也即这一年的9月10日。就在这一天里，华国锋辞去了国务院总理之职，由赵紫阳取而代之。

一个农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与那么多政治家的沉浮联系在一起，在我们古老的国家中怕是仅有的一例。但是这件事却有着普遍的和必然的性质，探究缘由，还须从人民公社精神在我们国家所引发的巨大冲突说起。

概括地说，人民公社的政治理想与农民源于自身利益而生发的经济动机，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与我们国家自古以来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元的农业传统也不能合拍。当强行推进的政治主张不能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时，通常就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出现危机。这一点已由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席卷中国的饥荒所证实。但是，共产党的理想，以消灭私有制度而达到世界大同为施政的前提，承认了1958年的失败，也就意味着党的方针发生了问题。这是为数众多的党的官员所无法接受的。但是，就共产党执政者内部的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和行政规则，往往使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气质，也即更加注重实际的进程和眼前的效果。如果既能获得眼前利益又可接近长远的理想，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若追求“主义”的行动已经危及眼前形势，他们宁可暂时在意识形态的方面作出妥协而实行“经济第一”的原则。这导致了毛泽东和他的那些经济计划制定者们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自50年代中期以来便没有间断过，毛泽东的对立者的行列也似乎绵绵不绝，先是农业的主持者邓子恢，时为1955年，接着是1956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他的四位助手，然后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最后是60年代初的几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

这种观念上的不能一致，在开始的时候，充其量只会导致经济方针的不同倾向，并不会涉及意识形态的本身。可是实际执行的结果，是在党的权力机构中出现了两个重心，如同坐在跷跷板的两端，此起彼落，要么是1958年毛泽东的克敌制胜及人民公社如日中天，要么是1962年刘少奇行使权力而至“包产到户”横行。断无两个重心并举共存的道理。此种局面在党内的出现乃是不祥之兆，因为党的政治组织的要则为一元化，如果听任另外一个重心滋生和延续，则一元化的制度也就没有可能如所期待地成长和发展。更由于这一切乃是由1958年人民公社第一个回合的失败所致，所以环绕着人民公社的争论也就自然地演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到了1964年年末，毛泽东已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他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刘少奇居然不再像从前那样对他的旨意言听计从。还有掌握中央日常事务的总书记邓小平，他自1959年开始就不再向他报告工作，而且居然还会提出一个“白猫、黑猫”的理论。邓子恢旧习不改，搞出一个“三自一包”<sup>①</sup>。王稼祥更加失掉分寸，竟然上书“三和一少”<sup>②</sup>。还有李维汉，名为“统战”，实为“向资产阶级投降”。周恩来的问题是姑息养奸，乡下的“单干风”已经把人民公社吹得摇摇晃晃，他却装出一副没有看见的样子，极有可能还在私下表示出某种同情。如果这是事实，也不是没有缘由。因为几年以前他就是“反对冒进”的领头者。

毛泽东也不是没有作出挽回狂澜的努力。事实上他已经连续三年采取行动：1962年夏天讲了阶级斗争；1963年春提出农村“四清”和城市“五反”<sup>③</sup>；1963年秋天又说，“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要在农村里面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以“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1964年初夏，他又以明确方式提出，中国已经有1/3的基层党委的权力为敌人所拥有，有必要对此加以清理。<sup>④</sup>但是也就在这几年里，毛泽东认定中央机构中反对他的力量已非个别和分散，而是一个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毛泽东终于发现他想要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于是他就觉得他在几年以前放弃领导责任退到二线是一个错误，大权旁落的结果是导致了这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发生。现在，毛泽东将这种种大事件以及细枝末节联系起来一并加以考虑，就下定决心：刘少奇必须下台。

毛泽东急速回到北京，带回一连串急风暴雨般的事变：召开三月会议、四月会议和五月会议，撤销《二月提纲》，宣布彭真有一个反对党的集团，解

---

<sup>①</sup> 邓子恢在这个时期的关于恢复农村经济的主张，集中起来为“多留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这个主张后来被概括成“三自一包”，并且成为刘少奇反对毛泽东的主要罪状，实为一种误解。刘少奇在这一时期的政策的选择上，明显地倾向于邓子恢的主张是事实，但他却不是这些主张的创造者。

<sup>②</sup> “三和一少”，即“文化大革命”当中所说“对帝国主义要和，对现代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的支援要少”，也是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其实，这种说法缘出当时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王稼祥。王是1962年春向党的中央领导提出，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缓和，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sup>③</sup> “四清”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五反”为：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sup>④</sup> 关于毛泽东在这三年当中的这一连串指示，见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散五人小组，成立新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警告他的同事：“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一切只不过是更大事变的序幕。毛泽东的反攻一旦发动，便丝毫不会放松。他甚至觉得有必要以红卫兵的造反方式来推动中南海里面的僵局。那一天是1966年8月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在召开，可是全体与会者都意外地看到中南海的院子里面张贴着一张大字报。第一行是五个字：“炮打司令部”，最后一行为毛泽东的签名。毛泽东尖锐地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人，现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着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些话已经足够令人惊心动魄，然而接下来还有更加严厉的措辞。大字报的最后一句话说，“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现在所有的人都会明白，总清算的时刻已经来临。但是，毛泽东用以发动总清算的这两个事件，均源于共产党内农村方针的分裂，却又为世人所忽视。

在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眼里，大寨这个小小的村庄居然在20年间吸引至少710万人到这里来参观，实属不可思议。它偏僻、贫穷、群山环绕，又为干旱笼罩，草木难生，没有机场和铁路，只有崎岖不平的山路与外界相连，从距离最近的大城市驱车到那里去，要走上整整一天。资源方面也没有任何可供现代农业发展的余地。村民由于缺少教育而显得愚昧。在60年代中期，这里唯有1个中学生和10个小学生，余者全部一字不识。把这么一个地方作为数亿农民的希望和人民公社的前途，实在是难以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办法倒是将这里的人口迁徙至更加具有生存条件的地方。因为即令能够在这些荒山野岭之上凿高就低，改造地形，令其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从经济的角度来衡量，也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其代价除了巨大的资金投入与劳动消耗之外，还会付出农民的鲜血甚至生命。比如昔阳县奋斗10年终于成为一个大寨式的先进县，它的能够名扬全国的一个壮举，就是这些荒山之上完成了10395个工程，开辟出65800亩土地。其代价是9725万个农民的工作日、2457万元钱、730人致残和310人丧命。

但是这种想象中的逻辑并不符合于当日中国的现实。局势的紧迫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毛泽东的任务不仅是要证明人民公社的优越，他首先必须在政治上证明自己的正确。人民公社是乡村社会的组织制度；“大跃进”只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能鼓动起民众的力量；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仅仅有助于渡过衣食方面的困境；“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也不具有足够的力量，它至多可以清理下层官员，对于睡在中南海里面的那些修正主义人物就会力不从心。看来需要在农民当中采取政治色彩更加浓烈的行动，这个行动一经发动起来，就会由下而上，顺水推舟地搞垮中南海里的那些人。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历史机缘，大寨方有可能在人民公社历史上获得特别重要之处。

对于人民公社的历史来说，从60年代中期到末期这四五年里，实在是一个风云漫卷、天翻地覆的时代。政治急流所形成的旋涡原本是在城里，那里红旗招展，标语连天，商店的陈列窗上覆盖着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学生们不再上课，走到街上呼喊口号；老师们不是垂首弓腰，撅着屁股站在台上接受批判，就是像个过街老鼠似地东躲西藏。学者吴晗自尽；总书记邓小平放逐江西；刘少奇主席被打得鼻青脸肿，一幅画着绞索、笔尖和拳头的漫画套在他的脖子上；彭德怀元帅被打断两根肋骨……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城里。可是，乡下的人民公社里面，毕竟有着6亿以上的人口。“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追根寻源，莫不发生在这里。可见应当让宁静的农村也激动起来。

在这个动荡的岁月里，乡下的确在没完没了地闹着什么事，可是不论什么事情，总也脱不开与大寨的关系。你随便在哪一天里翻开哪一张报纸，定会有“农业学大寨”的字样赫然入目。今天回顾起来，我们可以说，“农业学大寨”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常的农民运动。它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毛泽东个人决定的结果。后来全中国的农村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邪门歪道。”这话现在听来未免可笑，但在当初，毛泽东本人一定是坚决地相信，过去几年当中由刘少奇执掌权力而动摇了的人民公社制度，可以经过学习大寨的运动再度辉煌。

“学大寨”这事，似乎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随机选择。在毛泽东所采取的重大行动中，很少有哪一个像“学大寨”这样，让他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发动“大跃进”，不足半年；创建人民公社，四个月即已大功告成；把钢铁的产量提高一倍的念头，在一个晚上就诞生了。可是，自从他在1963年夏季第一次知道有一个叫做大寨的村庄，到1964年12月26日把陈永贵请到他的生日宴上，到1966年8月12日终于证实“农业学大寨”为他本人的“伟大号召”，其间历时三年之久。这甚至比筹划“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还要长一些。

我们已经知道大寨能够引起中南海的关注，是由于它在60年代初期艰苦

奋斗战胜饥荒和天灾的杰出表现。但是，如果它的价值仅止于此，也就不可能在日后的岁月中独树一帜。因为具有这种价值的并不仅仅是大寨一个。当日农村劳动模范的一长串名字中，陈永贵也并非位居榜首。这种局面至少持续到了1964年。这一年6月某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表明了大寨在他的头脑当中所具有的位置。他说：“农业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时隔不久，一份涉及山东省曲阜县陈家庄的文件送达毛泽东面前。推荐者说陈家庄自力更生的事迹尤为可歌可泣。毛泽东的反应迅速而且意味深长，他由这件事想到的是党内斗争，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又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要靠自力更生，事情总会起变化。”陈以梅是曲阜的一个农民，此人与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教育家和至圣先师孔子同乡，但却一字不识。他的值得称道的事迹是率领他那个小小的村庄，用着一种自己拯救自己的信念度过了饥荒岁月。这与陈永贵如出一辙。毛泽东说他“小学没上过，大学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此事所显现的征兆，是毛泽东已经将自力更生的问题与修正主义问题联系在一起。手批当中，把陈以梅列在陈永贵的前边，至少可以表明，毛泽东此时还没有将陈永贵和他的大寨看作唯一的选择。大寨在日后成为独一无二的榜样，乃是因为它在政治方面的迅速升值，令陈以梅和其他无数劳动模范都相形见绌。

一种出于谋生本能与恶劣环境相抗衡的自发行动，终于能够成为一种操纵6亿农民攻守进退的政治力量，这个过程在大寨大体于1964年夏季到1966年夏季完成，但直到1970年夏季才为大家所公认。在这一漫长的进程当中，夏季有着格外突出的含义，但是在其他季节里面事情也一样层出不穷。究竟在什么地方才是质的飞跃，一直未能水落石出。按照陈永贵的说法，大寨在1963年夏季就已经懂得学习毛主席的著作。那一年水灾，十年建设之梯田渠坝毁于一旦。“没有办法了，我们就请教毛主席著作，”陈永贵后来说，“越学越清，越学越通，越学越红，越学越有办法。”大寨也是从那时起便得到了一个经验：“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毛泽东思想。”这一时间如果不虚，已经比林彪鼓动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政治运动早了至少一年。可是，我们今天考据起来，陈永贵本人的阶级意识与判断政治是非的尺度，实在还有着更为悠久的由来。1948年，共产党还未执掌天下，33岁的陈永贵也还不是一个共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产党员，太行山区的土地改革刚刚兴起。这时候是富裕中农的黄金时代，共产党还没有没收他们在旧时代积累下来的财产，所以他们就有余力指点着那些穷光蛋窃窃讥笑。贫农们的确蹒跚难行，他们从地主手里分得土地，却没有足够的农具和金钱使生产恢复起来。这时候陈永贵挺身而出，联合村里另外穷人，形成了与富裕中农相对峙的局面。几年以后，陈永贵声名大震，成为共产党员并且取代老村长成为大寨村的领袖人物，富裕中农无不表示臣服，连地主富农也要抓住机会向他邀宠。据说其中有一位抱着一领绒毡送到陈永贵的家中，这是一个早春的晚上，富农说：“这东西又隔潮，又暖和。”陈永贵不动声色，却在第二天以此为由召开全村大会说明绒毡的来历，然后向他的父老乡亲讲了他过去的遭遇。他说解放前他地无一垄，就是给这个富农做长工为生，有一次他家里断粮，万般无奈下想去借一把糠，那富农却说，他还要把糠来喂鸡。“他现在送毡来，说是心疼我，”陈永贵说，“那时候他就是这样心疼我的。”这样一来，大会就成了批判会。据说最后全村的社员得出了共同的结论：“狼总归是狼，不会变成羊。谁要是躺在敌人的毡子上，就会灵魂发霉，由人变鬼，变成个资本主义的看家鬼。”

如果所有这些故事都由于形势的影响而夹杂了自我标榜和过分渲染的色彩，不能全部相信，那么，大寨与它的上级山西省委的决裂，则可以确信无疑。因为这有当日陈永贵的讲话记录以及他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为证。

事情的起因是1965年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列举山西省在两年当中学习大寨的成果，说“最大的收获是，全省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区，在农业生产上都有了像大寨那样稳产高产的典型”<sup>①</sup>。文章的作者为山西省省委书记陶鲁笏，写作此文的初衷是动员人们起来学习大寨。不过，他这样概括大寨的价值，明显地是将大寨作为一个农业生产的榜样，而非政治的力量，这就埋下了危险的隐患。也许他在写作此文的时候，农业生产的问题在党的方针中尚属优先考虑，但是，到了文章发表之际，已经是这一年5月。这时候，政治局面已然紧张起来。京城里面谣言不脛而走，其中一个说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方针已有间隙。这个消息虽然不能证实，但是毛泽东所说要“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尤其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已人人皆知。事有凑巧，这个月的21日，周恩来总理和他的两位副总理李先念、罗瑞卿，陪着阿尔巴尼亚的一个代表团来到

<sup>①</sup> 《红旗》杂志1965年第11期。



大寨。对于这个偏僻的山村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难得的殊荣，其象征性的含义是，在眼下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大寨已经和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山西省省长卫恒在三天后所说的那样，“学大寨的问题现在不仅是全省全国的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世界性的问题”。这话现在看来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但在当时乃是由衷之言。那时候中国人是认定苏联和它在东欧的卫星国统统成了修正主义，唯有这个南欧的小国才是“一盏社会主义的明灯”。大寨的光彩经由这盏“明灯”放之四海，可以想见这是一幅怎样激动人心的情景。

但是，这样一来，省委书记陶鲁笏便有了麻烦。把大寨当作农业生产的榜样还是当作政治斗争的榜样，私下里曾有争论，却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重视。现在他的文章真是不合时宜，偏偏在政治风暴席卷中国的前夜，使问题见诸党刊，人人瞩目，其遭到围剿的结局乃是势所必然。

按照我们国家的惯常做法，政治围攻在开始所采取的策略是“对事不对人”。这种办法通常可以令言辞更趋激烈，又不至过分地使旁观者因心惊胆战而踌躇不前。直到最后关头，舆论已成，人心也视种种反常之说为必然之理的时候，才会让一切昭然若揭。1965年5月，报纸的编辑已经开始用“红色的五月”来形容当时的局势。所谓“红色”在中国有着特定的含义，即政治的价值位居第一。最先将这种局势与大寨联系在一起的倒还不是陈永贵。一次政治工作会议由晋南地区共产党的委员会召集起来，其主题乃是要决定学习大寨在本质上为一场阶级斗争。会议纪要中最为著名的一句话，相当精辟地概括了那个时候中国人的心态：“毛主席是政治第一，赫鲁晓夫是经济第一，这是毛泽东思想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按照这样的逻辑，大寨当然不能够再成为经济的榜样，否则又如何能够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加以区别？昔阳县委也在这一个月中做出新的决定，检讨过去对大寨精神的要旨没有能够领会。这要旨就是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经过这一番总结之后，县委信心十足地说，现在已经出现“昔阳县学大寨运动的转折点”。此说一出，立刻就把省委书记陶鲁笏置于尴尬的境地。

看来，把这个山村和当日国家政治连接起来的最初纽带，是地方官员想要自我表现的急切心情。至少在那个夏天里，陈永贵还没有表现出政治上主动进攻的姿态。他的上级说，学大寨是“要不要政治挂帅的大问题”，他就跟着说，“政治工作永远做不完”；他的上级说，“大寨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是总路线的威力，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就说，要“实行公社所有制，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所有制越大越好”；他的上级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使学大寨同阶级斗争直接挂上钩”，他就说，“要让地富反坏怕我们”。那几个月里他到处作报告，说的话真不少，可是让你觉得这是一个跟着老师亦步亦趋可以走到任何地方去的乖孩子。当然你也可以认为他是大智若愚，不到把战场上的敌我之情彻底看清楚，不会冲出壕堑。

不过，到了秋天，陈永贵就开始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老到，甚至还在他的“老师们”之上。9月初，他参加了山西省第二届党的代表大会。面对全省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他坦然趋前，口若悬河，情绪激昂但却方寸不乱，用庄稼汉的质朴语言说出一串一串朗朗上口的豪言壮语。比如他说大寨的历史有四个阶段，又将这全部的过程编制成一个顺口溜：“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这时候，制造和崇尚豪言壮语的时代已经开始，此类言过其实的表述在代表当中引起普遍的激动自然不是怪事。当天晚饭后，“四不倒精神”已经被人们挂在口头上。但是，陈永贵的老练还在于，他此时小心地避免立即卷入由他而起的争端。因为已经分裂的上级们还没有显出孰强孰弱，周围那些公社的生产队长们更放出话来，说“只学陈永贵的生产技术，不学陈永贵的政治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唯有调剂折中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陈永贵反复说明大寨的四个阶段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这样就突出了他的政治价值。但是他将他的政治与生产扯到一起。他说大寨每一次人的思想革命化之后，就会出现一次大的生产高潮。这就叫做“精神变物质”。

毫无疑问，发生在山西的这一场争论一直为北京所关注，或者说，山西的官员们一直就是做给北京看的。到了11月1日，北京终于作出公开的反应。《人民日报》在这一天发表社论，题为《农业靠大寨精神》。这是毛泽东一句话的前半截，后半截是“自力更生”四个字。社论的作者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学习大寨，并且试图代表党中央对大寨的价值作出结论，他说：“大寨精神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革命、不断革命的精神；就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穷干苦干巧干实干，吃大苦耐大劳的自力更生的精神；就是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这样，赋予大寨的政治价值就大大地超过了它在生产上自力更生的价值。现在，陶鲁笏要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为大寨的崛起奠基了。因为，用不了多久，陈永贵就要发表他的气焰冲天的文章，指责陶鲁笏是个“公然篡改大



寨精神”的“砍旗能手”<sup>①</sup>。

1965年夏秋时节，大寨逐渐披上政治的光环，毛泽东的另外一场战役也正蓄势待发，即对明史专家吴晗的批判。吴晗在他编写的一部剧作中，描述了明代官员海瑞的刚正不阿，终于不能见容于嘉靖皇帝，被罢了官。在毛泽东特有的政治眼光来看，这分明是为了彭德怀的罢官鸣不平。他由几年前农村里面的“单干优越风”，以及要求“退田”和颠覆人民公社的行为想来，《海瑞罢官》的历史寓意定然包含着重大的政治动机。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1965年2月开始酝酿，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在上海发表。时为11月10日，也即《人民日报》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学习大寨的社论发表之后第九天。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将不可避免。大寨在此之前就把阶级斗争作为根本，可见其远见卓识。现在人们终于能够理解，《人民日报》社论所说的那句空泛的大话其实有着非常具体的含义：“世界上最强大的劳力”——5亿农民——将会变成“用大寨精神武装起来的伟大的革命力量”<sup>②</sup>。当然也会明白，大寨终于超越了其他所有自力更生的模范，在人民公社历史上奠定了它的特殊地位。它将不仅仅是为了证明人民公社的优越而存在，而且也将成为打击共产党内修正主义派别的社会力量，当然，它还可以为全体农民造就新的神明。

神明在老百姓的心中出现，也是在那一个夏天。7月，报纸纷纷发表毛泽东在长江里游泳的照片报道。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在他们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说：毛泽东是“试图以这一行动显示他具有即将到来的政治战役所需要的充沛精力”。用不了几天，战役就打响了。1966年8月9日，全中国的人们都可以听到党中央新一轮全会对毛泽东的颂扬之词。公报实际上可以说是一篇讨伐刘少奇和他周围那些“走资派”的檄文，但它首先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天，全中国所有的城镇和乡村里面都成为红色的海洋。人们汇集在一起，潮水般地涌向政府机关所在的地方，去表达自己激动的情绪。在北京，“毛主席万岁”的喊声压倒了喧天的锣鼓。六部口街角以北那条幽静的林荫大道，现在已经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中南海大院一个西向的大门坐落在这条街上，间隔不远的地方就是中共中央开辟的群众接

<sup>①</sup> 陈永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大寨的胜利》，《人民日报》1967年12月11日。

<sup>②</sup> 《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待站。接待站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专门向来自全国的人们解释政治局势以及革命方针。此时此刻，从各地赶来的学生包围了那个大门，齐声呼喊“我们要见毛主席”，喊声夹着热浪翻卷直上，跃过中南海高高的红色围墙，从晚上到天明，又从清晨到了晚上，24个小时没有间歇，令京城为之震撼。到了第二天傍晚7:15，忽然大门洞开，毛泽东走了出来，蓦然间周围一片肃穆，喊了整整一天的人们竟料不到真的会有这神圣的一刻，全都张大嘴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毛泽东随便挥一挥手，只说了一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狂热的人群再一次翻滚起来。一个学者看到了这个场面，觉得用“鼎沸”这个词也难以形容。但是，失去了理智的人们毕竟没有忘记记下毛泽东那一句名言，后来这话就成为让全中国翻天覆地的一声号角。

这些事情大都发生在城里，但是它却诱导着乡村里的人民公社运动出现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关注农民运动的确一如既往。在这么紧急的政治摊牌的时刻，他依然没有忘记农民。薄一波后来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对于在农村里开展的“四清”运动“已经不太感兴趣了”，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而他转向发动“文化大革命”。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证明薄一波的说法不无根据。就在这种时候，毛泽东第一次决定将“农业学大寨”作为自己亲自发出的号召，他最后地选择了大寨作为号令6亿农民的旗帜。

1966年中央全会的公报中，还有一句话表明了典型的时代精神。这就是“人民解放军和工厂、农村、学校、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应该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大学校”。公报写道，这个号召是毛主席提出的“英明决策”。可是不知是何原因，后来的历史学家在谈论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很少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实际上，这个时候的人们，无论工人、农民、学生、军队、红卫兵和“黑帮分子”，几乎所有感觉到被一种气氛激动起来的人，都喜欢把他们所处的团体叫做“大学校”。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学校。那种学校已经解体，学制和课程已经废弃，小学生全部无限期地放假回家，中学生停止上课到处造反，或者云游四方广结天下革命同志，大学从这一年开始便不再招生。但是，“大学校”这个词却从未这样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或者引申为形形色色不同表述但含义相同的概念，比如“学习班”、“宣传队”、“讲用会”云云。机关干部成批地流放到乡下去，组成一个个临时的集体，这叫做“五七干校”；城里的中学生则分散到农民中去安家落户，这是“接受再教育”。整

个社会都成了“大学校”。这确实是毛泽东的本意。按照毛泽东在三个月前的阐述，这个“大学校”里“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这个词的应用表明，我们的国家对于一个已经破碎的梦想依然如痴如狂地信守不渝。它在20年代被叫做“新村”，在50年代则叫做“公社”。经过那一次叫人不寒而栗的饥荒，无论“新村”还是“公社”，都已黯然失色。尽管危机已经过去，人民公社的声誉也在相当程度上得以恢复，但农民们在卷土重来的“包产到户”中表现出来的离心离德倾向，始终令毛泽东耿耿于怀。毫无疑问，需要有一种新的标志将人民团结起来，以维护既定的信念。这标志现在诞生了。《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将其中精髓概括为“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sup>①</sup>。但是，60年代“大学校”之纲领，与50年代“大公社”的蓝图并无实质的区别，只不过，有鉴于反对人民公社的势力已经跋扈于一时，现在也还有着死灰复燃的危险，所以新的纲领多了一个重要内容：“批判资产阶级。”

可是，与其说“大学校”像“大公社”，倒不如反过来说“大公社”现在像一个“大学校”。日后的事态发展证明，人民公社制度在组织农民从事有效生产的方面虽然效率低下，但它在调动农民的信仰狂热和完成“大学校”的政治课程方面，却具有超乎寻常的行政效能。这种情形的出现，原因在于人民公社的组织结构为一元化。一元化的行政基础是2000多年来的中央集权制度。自上而下，每一级都对他的下属拥有绝对权威，下级则对上级保持着依附和服从的责任，而无须保有自己独立的意志。这就决定了所有政令的下达和实行并不一定遵循科学的原则，而大都只是依据权力的大小以及形势的顺逆。这种制度一经形成，一句空泛的口号或者一个实际的步骤风行于数亿农民中间，常常只不过为几天甚至是一夜间的事情。对于气候、土壤、水源等等条件殊异的中国农村，这种机能应用于生产的结果只能是一场灾难。但是，政治的奥妙却在于同仇敌汽，一鼓作气，因之也就使得这种制度能够屡建奇功。

此前我们已经叙述，将人民公社制度导入政治的原则，乃由大寨始。它所造成的第一个政治行动，也即“大公社”与“大学校”的合而为一，自然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66年8月1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也就一定发生在这同一时刻。这一行动的着眼点是彻底地改变农村中传统的信仰世界，而建立起新时代的偶像和禁忌。

1965年夏季，陈永贵宣布，在大寨成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核心小组”。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件小事竟会酿至大局，如滴水而成江河，浩浩荡荡，席卷全中国。大寨的“核心学习小组”由大队党支部委员们构成，陈永贵是当然的组长。以下全部的社员分别编入14个学习小组。大寨从此宣布“懂得了毛泽东思想，就懂得了一切”，所以他们“不信天，不信地，最信毛主席”。后来接替陈永贵任党支部书记的年轻姑娘郭风莲，这时候也显示出她的不同凡响。她说：“毛泽东思想用到哪里哪里灵，照到哪里哪里亮，什么人学了什么人变，什么地方用了什么地方红。”既然学习大寨必须着眼于政治价值，那么大寨的政治行动也就应当迅速地普及开来。它所在的昔阳县便在几周当中成立了1584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小组，这些小组遍布所有公社，据说有42000个农民每天在小组里面参加学习。学习的时间此时尚未发展为固定，只是在吃饭前和劳动的间隙，以及晚饭后太阳落山之前尚有余辉的时候，规模小而分散，较大的学习会议则通常是在下雨的天气。这样的情况在乡下持续了大致两年之久，又由于林彪说了一句“毛主席的书要天天读”，于是一种更为严密的“天天读”制度便取而代之。这种制度的要旨在当时被概括为“雷打不动”。公社社员每日劳作之前，必须先有一个小时静坐于地头读书。众人围坐一圈，由其中识文断字的人高声诵读，余者洗耳恭听。然后每人依次报告本人学习进度和体会，班组长则须认真记录在案，然后向上级报告。每到这个时候，任何紧急的时令和农务均须为此让路，学习时间和内容不得擅自更动，个人也不得迟到早退或者请假。

这种日复一日无穷无尽的政治仪式，在农民的精神世界中所产生的影响，实际上比它的内容更加重要。很难说这些几乎从未受过文化教育的人们，真的能够从学习中领悟毛泽东的精神。为了让人们能够将他们听到的那些警句名言永远镌刻心中，一种新的活动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人们在一块一块的墙壁之上敷以朱红的染料，再用金黄色的油漆将毛泽东的话写在上面。这些巨大的语录标牌覆盖在街头、田边、砖墙、土壁，甚至商店的橱窗、农舍临街的大门和厕所的围栏上。因为它具有铺天盖地的视觉效果，故被当时的人们恰当地称为“红海洋”。它在1966年夏秋由城里人发动起来，几周之内便传染到乡下。不过无论“天天读”还是“红海洋”，对于农民来说都只具有形式上的感召力量，就内容来说则是一种机械的寻章摘句和简单类比。比如数

十天未有阴雨，庄稼久旱盼甘霖的时候，人们就学习了毛泽东的一个教导：“坏事能够变成好事。”每一个人就都明白了必须为这种变化的到来出力，这也就是他们所说“天不下雨不要紧，毛泽东思想就是雨”的道理。又比如处在崇山峻岭间的人显得至为渺小，任何凿山垒坝的劳动，通常总会令人生出蚍蜉撼树的情绪，这个时候就要学习毛泽东的另外一句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根据报纸上的报道，毛主席的思想光辉不仅可以普照集体的行动，而且还能深入到农民的家庭以至人的肉体内部。比如一位社员得了疾病，在万般痛苦的时候，他就在学习小组里面背诵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他自称没有文化，但却已经精通用最朴素的言辞表达一种最华丽造作的思想，他说：“千服药万服药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宝书治好了我的病。”诸如此类的穿凿附会，决不可能像他们自己所吹嘘的那样，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已达到“出神入化”之境，但是，他们所谓“毛主席的书百用百灵”，却并不完全是撒谎。其中原因仍然不外乎行政与政治融汇为一的制度。以党的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学习小组”，在形式上也就是权力与“大学校”的合一。行政指挥权力附之以对毛泽东著作的信仰，令人民公社不仅恢复了往日的光辉，而且还能具有前所未有的威严，形式由此便有了比内容更加重要的价值。

另外一种制度和这种“天天读”相伴而生，风行于一时，此即“早请示，晚汇报”，无论高官百姓，老幼妇孺，均须严格遵守。这种制度的要点仍然不在于它能产生多少实际的效果，而在于它的形式。每天清晨，农家在展开一天的劳作之前，所有男女老少鱼贯来到毛泽东画像之前，列队立正，其距离刚好可以使每个人呈仰视之态。右手则以拇指和其余四指的合力握住一本鲜红色的《毛主席语录》，贴于胸前。当所有人完成这些动作之后，便有一人放开嗓子朗声念道：“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话音将落未落之际，众人齐声高呼：“万寿无疆！”这样的声音通常重复两遍，同时所有人又将手中的红书举过头顶，随着声音的节奏前后挥舞，以使得人际上空的声音起伏和红色浪潮能够相互协调。然后又由领班作为众人代表，向画像上的毛主席呈报，当日将要遵循他老人家的哪一条教导，完成哪些艰巨的任务。至此礼仪全部结束，解散令下，众人方可各就各位。“晚汇报”的程序部分地与清晨一样，只是到了汇报的时候通常需由每人逐一完成。汇报的内容大体包括这一天里学习了多少毛主席的著作，是否写下了体会和决心，以及解决了什么问题。全部的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仪式犹如基督徒的忏悔，其内容可以因人因时而有多寡轻重，但是在最要紧的地方决不可以马虎，这就是内心的深处是否还有不能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杂念存在，以及是否悔过。至此，农民的一天大致可以结束。

大约在1968年的时候，一种新型的集体舞蹈盛行起来，成为“晚汇报”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叫做“忠字舞”。顾名思义，舞蹈的设计乃是为了表明对毛主席的忠心。当汇报结束的时候，全部男女老少便围成一个心脏形状的圆圈，每一张脸都朝向遥远的北京，组成一颗向着毛主席的红心。然后一呼百应，唱起一首情深意切的颂歌。随着歌声的节拍反转错步，手足的动作可以直观地与歌词的喻意相联系。比如，当歌声中出现“敬爱的毛主席”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举起红色的小书，抬眼仰望书上毛主席的画像，到了“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这一句，便将“红语录”收至自己的心口处，同时将另外一只手伸向天空，来回摆动，以示天空中太阳的光辉正在洒向心头。这全部程序的实行，无论“请示”、“汇报”还是“舞蹈”，并不复杂，困难在于实行者必须每日早晚完成完全同样的步骤，日复一日，不能间断。虽然不可能每一次都保证不折不扣，没有丝毫的懈怠，但它的形式却足以在农民的精神世界中唤起对新的偶像的崇拜。

从古老的传统上讲，农民对于身外事物的观念与情感，乃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精神偶像铸成。农民所信仰的偶像，通常包括鬼神以及宗族社会中祖先的灵魂。我们国家的大多数农民并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把物质现象看作神的感应。诸如天神驾驭四时以及冷暖旱涝，地神掌握作物丰歉枯荣，财神象征富裕，灶神意味足食。至于家族祖先的神灵祭奠，出生、婚嫁和死亡的仪式，则寄托着后辈世世安康的愿望，一年当中不同的时节，农民总是要举行各种祭颂仪式，来表达他们对神灵世界的崇拜和畏惧。因为在他们的眼里，神仙世界与他们自己的世界有着那么紧密的联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50年代。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使这一切迅速地萎缩瓦解。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收获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了，所以神的喜怒哀乐也就不再与他们的命运那么息息相关。家庭作为生产组织的作用已经全部地被否定，所以，祖宗在天之灵对后代幸福的庇护也就不再那样意义重大。农民的精神世界里从此留下了一片空白。现在，农民以种种庄严的仪式和虔诚的态度开始向新的神灵表达他们的愿望。新的神灵所向披靡地取代了旧的神灵，在打碎了农民以往的精神世界之后，人民公社终于在农民中建立起新的精神世界。

然而陈永贵是否真的相信这些政治的游戏，还是一个疑问。他和他的山寨这时候已经完全成为政治偶像。但是即使对他持有最强烈的批评态度的人，也不会否认他是一个耕作的行家里手。这样看来，他应当最能体会农业本是一个彻底务实的行业。有时候他自己也不能明白，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举行那些“天天读”的仪式？难道将书本上的话背得烂熟之后，就真能产生无往不胜的奇效？他本人自幼与文字无缘，文人理论和行政文牍的令人厌恶，他一定会比别人感受得更为强烈。比如一个年轻人一口气将毛泽东的《愚公移山》背诵完毕，然后就向他邀功，而他却不以为然。他用一个一字不识的老人教训青年，此人名叫贾进财，一生开山采石，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为世人知晓。“不要看贾进财背条文背不过你们，”陈永贵对得意洋洋的小伙子说，“可是他每天一锤一锤打的都是石头。”这样的情节似乎更加符合一个农民的逻辑。但是，为什么陈永贵还要一味对政治抱以狂热的眷恋，并且煞费苦心营造他的政治形象？这原因又要到当日农村的制度中去寻找。

我们的国家以人民公社的制度来治理乡下农民，其经济上的失败已如前述。但是，那个时候国家之施政原则，首先在于意识形态的不可侵犯而不在于物质利益的欣欣向荣，因为前者为政权的根本，后者只是一时的盈亏。用当时农村中广泛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公社所做的全部事情，就是以政治原则凌驾于实际问题，或者说是将实际问题政治化。例如1962年行于乡下的自留田和包产到户，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办法可以令土地上结出更多的果实，可是经过意识形态的解释，决定其取舍的要点就不是土地上的果实而是它所包含的反人民公社倾向。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任何农民想要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存在，进而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者立身名利场上，就必须以政治标准取代经济意识，越是不相信就越是要表现得忠贞不贰。这一点当陈永贵在1964年刚刚崛起的时候，便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

那一年的冬季，山寨大队被上级派驻的“四清”工作队查出，粮食的实际亩产量少于陈永贵的报告。此事等于宣布山寨的先进乃是一种欺骗，其所引起的震动可以想见。结果上达中央政府，导致周恩来总理亲自追究，如能坐实，则陈永贵定然一蹶不振，中国农村的历史也当改写。但是陈永贵似乎是一个天助神佑的人物，毛泽东恰在这时将他请到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山寨的问题也在这一夜之间不再是粮食产量的多少，而是对毛泽东的态度如何。这一来，陈永贵便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资源来渡过危机。大约一个月后，山西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省委的几位领导人亲赴大寨，名为“核实产量”，实则已有成见在先。于是，在1965年2月8日下午，大寨大队的队部里面就出现了下面一段对话：

“经过丈量，耕地面积定为七百九十六亩六分九厘……除了经济作物，六四年粮田面积是七百五十亩。”

“永贵呀，现在七百五十亩，正合报上说的。粮食亩产还不到七百五十斤怎么办？”

“山地和平地不一样，地块多啦，过去习惯不能上耕牛的地不能算地亩。”

“粮田达不到七百五十亩吧……地亩也变，产量也变。扣一厘以下地，扣了四舍五入，粮田可能就是七百二十亩……我已经给总理说，大寨的产量还在八百斤以上。”

“在七百五十亩中扣去四十五亩……”

“给参观人员说，粮田七百零五亩，粮食总产五十六万八千斤，亩产八百零五斤。”

陈永贵就这样安然地渡过了他的第一个危机。可以肯定他从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当中得到了教训。经济问题一旦化为政治问题，也就无所谓眼前的公正，农民以至整个农村的追随政治也就成为必然。

1967年2月9日，陈永贵在昔阳县第一次以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劳动模范的身份出现。虽然他在这时还只是一个大队的负责人，但是他的声望已经足以号令全县。他在县城中心的广场主持了群众集会，他原来的上级中至少有七人也被叫到台前，这些人现在统统成为“被告”，罪行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一片愤怒的叫骂中纷纷表示认罪。然后陈永贵起身发表演说，号召他的革命同志联合起来向旧的权力机构“造反夺权”。台下群情激奋，聚众已逾万人，其声势的浩大，为本县史无前例。几个寄居小城不甘寂寞的文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真理的声音，震动了整个昔阳，整个晋中，整个山西，整个中国”。两天以后，全县32个农民造反组织一致推举陈永贵为领袖。这些人成立了总指挥部，宣布夺取旧县委的一切权力，是为“二一一夺权”，陈永贵则在数万人的欢呼声中成为总指挥。两个月后，这个临时性的指挥中心为一种新的权力机构取代，陈永贵成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和省革命委员会副



主任。他曾经野心勃勃地说过“打倒皇帝做皇帝”，现在，仅仅两个月里，他便在这个内陆省份拥有了无上权威。

这整个事件犹如戏剧舞台上一个高潮迭起的片段。高潮中的陈永贵被称为“救世主”，“是统一千万群众意志的无形的力量”。但是若干年后的论者却以“得意洋洋”、“踌躇满志”来贬损这位风云人物当日的气概，说这一事件其实只是“显示了陈永贵等人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捏造罪名的才能”，文人墨客对于他的种种赞颂则属于“肉麻”和“狂妄”。所有这些评论不能不使人感到褊狭。因为，一般来说，这种类型的野心家和投机者如果敢于将自己的行径公之于世，在百姓们中间就会失去受仰慕的基础，甚至会引来万民的唾弃。但是这样的情况不曾在陈永贵夺取权力的那些日子里见到。陈永贵的奋斗精神和率领一方赤贫自给自足的经历，虽为官方所张扬，但应当承认仰慕他的人中主要是渴望富裕的农民，而非政治投机中的帮凶。人们认为他是农民当中非凡的英雄，可以带领他们进入一个新的乐园。这个乐园，那些官员们已经信誓旦旦地对他们说了十几年，却始终只是水中月。所以，当日对陈永贵的种种颂扬虽属阿谀不实，却不能不说乃是出于某种真诚。类似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陈永贵最后的失败，也并不在于他到目前为止的政治投机行径如何卑劣，而在于他在今后的岁月里，没有能够在历史上开拓出一条新路，甚至还使现实的发展距离农民所希望的一切日益遥远。农民在日后终于无法忍耐对他的厌恶，正如现在抑制不住对他的崇敬，是出于同样的理由。

但是，陈永贵和他的大寨在中国农村具有极为愚蠢、卑劣甚至是野蛮的影响，则属无疑。这些东西不仅属于这个小小的村庄，也属于把它推向社会潮头的那个时代。这种背景充其量只是激发了一个农民传统精神世界里阴暗的一面，而不是凭空地造就出一个现代的阴谋家。

陈永贵在夺取权力之后采取了两个重大步骤，仍然不外乎生产问题和政治问题。农村的生产问题乃是一件因地而异、因人而异的事，直到这时他也没有试图在这个领域里占有至尊无上的位置，而且还能承认要向其他地方学习新的耕作技术。但是政治问题就大不一样，按照列宁的理论，小生产在每日每时地、大量地产生着资产阶级，所以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便需随时随地地进行，没有什么可以例外。这个目标使得“一地之经验号令全国”成为合乎逻辑的施政要则。具体说来，大寨是以自己的行动，把共产党“全面专政”的理论变得具有实行操作的可能。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陈永贵的施政原则是，专政的力量必须涵盖所有农民，始终不能有丝毫懈怠。他认为资本主义是极端顽固而又奸诈狡猾的东西，即使在大寨这样充满着革命精神的村庄，一不小心也会让这一危险东山再起。堵死了自由市场，它就会钻到山沟里开自留地，堵死了自留地，它又会钻到村子里来化公为私。这是因为人之本性中的私欲冥顽不化，只要这充满私欲的混沌世界还没有获得完全净化，专政手段也就永远不能放松。基于这样的信念，陈永贵订立了一整套驱除人们内心私欲的方法。其要点是严密注视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从中找出违反政治标准或者道德准绳之处，将之消灭于萌芽状态。这种关注的包罗万象和细致入微，在今人看来一定不可想象。劳动吃饭说话行路办事读报睡觉做梦自在其列，甚而嘴里一声叹息、脚上一双袜子、腕上一块手表，以及内心深处所埋藏的邻里恩怨儿女恋情之类隐私，也会进入他人视野之内。农民最隐秘的世界通常是在家中，夫妻及其子女间的亲情似乎很难为外人离间。但是在大寨，对个人的关注可以势如破竹地进入家庭。比如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李田环和贾爱民，便因为担负起监视她们的富农父亲的责任，被誉为家庭内部的“社会主义钉子”。然而最具威慑意味的是，很多事情乃是见之于无形，用陈永贵本人的话说，是“思想动向”。“动向”虽然不是现实，但却有可能发展成为现实的危害，所以任何人不得企图隐瞒。每天晚上，党的支部委员们要在会议上将每个社员之思想动向公之于众，以供分析并研究对策之需。至于对策，则会由于不同的人而采取严厉程度大不相同的办法。倘若属于自己阵营里的人，虽然决不姑息，但方式较为缓和。有些事无伤大雅，只需当场严加管束。比如陈永贵的长子陈明珠在地里劳作的时候没有脱去鞋袜，陈永贵由此认定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表现，于是强令其赤足，以致儿子的脚底在烈日下烫起水泡，走路也不能如常。但是也会有一些事情相当严重，非一个命令可以根治。一旦这种局面出现，办法就是连续不断地把会议开下去，不彻底解决问题不使会议停止。这样的会议开得最长的一次是在1966年，一直持续三个夜晚。事情的起因是以郭风莲为首的23名“铁姑娘队”队员，差不多在同一天里提出了离开大寨的要求。因为她们各自的恋人都住在大寨以外的城里，她们想要去与他们结合。按照农村传统的习俗，婚后理应女到男家。这在陈永贵看来无异于是对大寨的背叛。全国都在学习大寨，大寨的这么一大批姑娘却“不愿在大寨找对象，眼睛盯着工人和干部”，这便证实了他的判断，“大寨有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新的阶级斗争”。而问题居然牵涉到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郭风莲，这就更加严重。他决定以郭风莲



为首次攻击的对象。于是，支部委员们共同来讨论郭风莲的婚姻，一致决定她必须终止初恋的感情。年仅19岁的郭风莲这时泪如雨下，凭着少女的纯真和任性拒绝支部干涉她的私事。双方相持三个夜晚之后，陈永贵忍无可忍地抛出致命一击：“如不答应，开除党籍。”这令少女终于屈服。据说她说服自己的理由是她在党旗下的誓言，那中间有一句是“不怕牺牲，为党献身”。这样，无产阶级思想终于占了上风，其余的“铁姑娘”们，也纷纷做出斩断情缘的决定，并且宣布“死了也不出大寨”。这是郭风莲在她一生中经受的第一次考验，也是最严厉的一次。她日后果真接替陈永贵成为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闻名全国，与陈永贵这一次对她的改造和她所作出的牺牲不无关联。

但是，把亲生儿子弄得一瘸一拐和把自己最信任的接班人逼成一个泪人，都不能说明“全面专政”的违反理性和不近人情的程度。事实上，“全面专政”残忍地剥夺人的思想、信念、尊严、自由以至生命，令人至今回想起来还要不寒而栗。陈永贵虽然对于逐字背诵毛泽东的话不以为然，但是，毛泽东有一句话却让他刻骨铭心：“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他和他的的大寨的不少创造，其实就是这八个字的延伸。他坦然承认自己，“没有上过学，理论水平也很低”，主要的办法“就是斗，我们斗了这二十多年，不批不斗什么事情也干不起来”。某些具有想象力的文人便和大寨的社员一起，编造出许多令人瞠目的警世名言。比如“‘斗’字是万好之源”、“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亡”、“斗得私字扫地出门，斗得修字挖根断苗”，云云。有一首诗写道：“虎头山下风雷吼，大寨社员敢于斗，大寨人的脾气就爱斗，七斗八斗不停休。”另外一首不是诗，但却传播得更为广泛：“不怕‘犯上作乱’，不怕‘过分过激’，全面斗，及时斗，事事斗，处处斗，斗绝做绝，斗争不息，才能演好社会主义的新戏。”这些说法的集大成者，叫做“红色恐怖”。当然这主要是针对那些被视为“阶级敌人”的人们。但是，影响也毫无疑问地深入到所有农民心中。甚至老弱妇孺亦不能避免。比如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经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里的一个婴儿，刚刚一周岁，不会说话，却能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只要他的父亲一喊“亲亲毛主席”，他就举起手做出笑的样子，如果父亲喊出“恨恨刘少奇”，他就会做出咬紧牙关的痛恨之状。这个孩子的表现被当时的报纸广为传播，作为大寨的斗争精神能够深入人心的一个明证。

对于人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打击，一向都是一种统治的力量，是使人心惊胆战谨小慎微而又疯狂痴迷胆大妄为的根源。“中国人个个都是与人奋斗的天才”，一位记者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这样说。他这个有点玩世不恭的比喻是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靠了引用毛泽东的半句名言，才显得格外尖刻。那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整整三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中国人由此将自己的智慧应用于人事的算计与攻防。这种力量即使到今天也还是死而不僵蠢蠢欲动，大多数中国人是在60年代中期诞生的“大学校”里学会这种本领的。大寨在这个大学校里成为第一个杰出的榜样。然后就是昔阳。这有下面的事实为证：在1966—1978年的12年间，在这个小县死于“全面专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计141条。伤者则不计其数。这是一连串恣意谩骂凌辱，甚至严刑相逼的直接后果，其中两人于乱棒滥鞭之下当场毙命，14人致伤而死，余者全部因为不堪忍受酷刑的惨烈自己了结生命，其自尽方式极为简单，再一次表明这是一群一无所有的穷光蛋：62人使用绞绳上吊、36人投水自溺、6人跳崖，还有两人一头栽进自家水瓮窒息而亡。这些事实在1980年8月公布出来，令闻者难以置信。

毫无疑问，昔阳县的可怕行动与大寨煽动“红色恐怖”有着密切关联。很多事情其实是一脉相承。在60年代最后几年中，昔阳全部公社和大队干部到大寨去参加“学习班”已经成为制度，这种学习即以大寨的斗争决心和斗争技巧为主要课程，分批进行，前后40批，参加者逾5000人。县委由此宣布说，这些人把大寨的经验带到了全县，这也是昔阳能够亦步亦趋地跟在大寨后面的最重要的途径。

批判会成为当日农村的一种制度，也是人民公社历史上的一个奇观。它的形成表明，被叫做“红色恐怖”的政治迫害已经多么普遍地深入到我们社会的底层。不过，它毕竟不是60年代中期才出现的一种新形式，那个时候的人们只是继承和发展了以往的愚蠢和野蛮。1966年6月16日，南京城里的一批大学生把他们的校长匡亚明揪到上万人面前，施以种种辱骂和批判；两个月后北京大学的学生又把至少10万人集合在京城里面最大的露天广场工人体育场里，批判他们的校长陆平，是为文字记载中最早的两次大规模批判行动。然后是《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全国都来学习学生的革命精神，这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代表党中央的意思。这样，批判会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前所未有地扩大起来。乡下人口居住较为分散，批判会的规模常常不如城里，发动者的组织工作也没有那么严密周全，但是其狂热、专横和野蛮的程度比之城里犹有过之。一般来说，会场四围的墙壁之上，必定为红红绿绿的大幅标语所覆盖，上面写着“打倒”、“绞死”、“火烧”、“油炸”一类的大字，不同的用词大体表达了人们不同的愤怒程度。被批判的人的名字一律倒写，并且总是有两道

鲜红色的重笔相互交叉覆盖其上，这种方法在旧时只有张榜公布极刑犯人的时候才会用到。但是，对于被批判的人来说，最难以忍受的还是站在众人面前示众。他们头上常常要戴着一顶纸做的高筒帽子，脖子上吊着沉重的木牌，上面写着各自的名字以及所犯罪行。随着一声“押上来”的喝声，他们便在一群彪形大汉的推搡打骂之中上了台。这时候全场一定是群情激愤，口号声震耳欲聋。这些人于是就被强迫将腰折成90°角，同时将两臂尽力伸向后上方，整个姿态犹如飞机张开两翼，所以叫做“坐飞机”。此种姿势必须保持至终场不变，若有变形，不论是出于极度疲劳还是投机取巧，都免不了遭到拳脚相加，很快便鼻脸青肿，鲜血从鼻孔或者嘴角溢出，其中很多人当场就会倒下。在他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时候，台下的人们还会蜂拥上来把唾沫或者鼻涕摔到他的身上和脸上。侥幸能够经受这些打击而没有晕过去的人，则要被拉到外面游街示众，接受他的邻里乡亲进一步的嘲弄。

不过，此种批判较为正式，需要充分的发动和严密的组织，并不是每天每时都可以实行。实际上，当日人民公社中更为常见的批判是发生在田地里。每至劳动间隙，只要队长一声召唤，所有被指为反革命的人或者旧时的地主富农，便须以最快的速度排好队伍，毕恭毕敬地站在田头，垂首折腰，听任大家揭发和谩骂，而不能作出任何申辩，所以这种方式就恰如其分地被叫做“田头批判会”。它还可以从田头延伸到农民的家中，或者村子里面任何一个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味的地方。用大寨人自己的归纳来说，“普遍问题大队斗，局部问题小队斗，苗头问题地头斗，点滴问题家里斗”。有一个名叫贾承良的人所以能够扬名于全国，就是因为他虽为一普通农民，却能够在自己的家里连续举行了120次批判会，为大寨村农家之最。批判会的反复实行，令被批判者习以为常，麻木不仁，批判者的话也渐渐成了陈词滥调，但是，没有人会显出一丝倦怠。而且，此种方式简便易行，具有很强的随机性质，因而能够无孔不入，且所有社员都有参加的机会，以保证对整个社会都有经常而持久的压力。所以，大寨的这个办法便被广泛推行开来。

回顾那一段历史的人大都不会怀疑，农村里兴起的每一个政治浪潮，几乎都是借陈永贵和他的大寨之名煽动起来的。1966年5月13日，陈永贵在报纸上发表了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三家村”是指当时北京市市委书记邓拓、副市长吴晗和另外一位文人廖沫沙。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首批落难者。一个月后，陈永贵的第二篇文章也见诸报端，这一次未指明具体的批判对象，但锋芒所指是“夺掉权威的霸权，打倒权威的威风”。陈永贵如前所述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是个文盲，当然不可能用笔锋去向那些文人挑战，报纸假以他的名义发表文章，其实就是要在数亿农民当中招展这一面大旗。受到鼓励的陈永贵果然不负期望，采取了夺取地方政权的行动。这一回，《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说陈永贵带头夺权，站在了斗争的前列，“不仅是生产模范，而且是革命闯将”，“不愧为贫下中农的好干部，为全省全国的劳动模范树立了光辉的榜样”。<sup>①</sup>当然，也并不是报纸这么一鼓噪全国就跟着鼓噪起来。但是，昔阳县迅速地把陈永贵和大寨奉为神明则是事实。到了1970年9月，《人民日报》的社论就有更多的理由了。它说，“昔阳的经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提供了在一个县的范围，全面学大寨”的范例。报纸的编辑振振有词地教训全国的农民：“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还特别地指出，这是“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这一来便没有人敢公开地漠视大寨。

大寨后来多次说他们的斗争是“文斗”而从来不曾发生过“武斗”，也即老百姓所说“动口不动手”。但是，这种声明即使从现象上看可以属实，也不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这个只有300多人的村庄里面，三年中参与批判会的人次超过10万，这意味着不论男女老少，每一个人在每一年里都上百次地参与了批判别人或者被别人批判的会议。这些批判有时的确是由于一些小过失，比如因为一时的懈怠而致一匹马在与同类的撕咬中伤及前腿，一头奶牛误饮了清洗化肥的池水中毒死亡，一个社员在采石垒坝的过程中没有达到应有的认真程度……所以还不能说这种批判会没有任何正义和道德方面的光彩。但是，更为经常的大批判则是依据陈永贵和他的革命同志的个人好恶，诸如说了一句风凉话、戴了一块手表、穿了一件花衣服、玩了一次扑克牌、曾经是地主富农或者父辈是地主富农的人顶撞了干部或者是得罪了他们的亲属，等等。以至任何人在完全没有过失的情况下都有可能突遭凌辱。如此大范围的行动对于人的精神折磨，远非肉体的痛苦可以相比。如果此类不正常的事件仅仅是偶尔为之，人们就会感觉到难以容忍，但是，假如它每日每时都会发生在身边，那么不正常的事情也就会被人视为正常。这一点大寨供销社的主任张润增一定有着极为惨痛的体验，所以他在弥留之际给医生刘启所留下的最后遗言，就是在陈永贵面前“做人的诀窍”：“我在这里多年，经常挨批斗，”他说，“当初我不了解他，现在摸到了规律，当他骂你的时候，应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67年3月5日。

该继续干，越骂越好好干。这样，他在政治上捞到了好处，经济上也得了便宜，他感觉你对大寨忠心耿耿，才把你当作自己人。如果他一骂你就改，那可就坏了。”

这样看来，所谓大寨式的“红色恐怖”，并不在于是非曲直的追究，而在于证明当权者的权势不可动摇。对于那些美好而纯净的道德说教，甚至就连他们自己也不一定真的信服。真诚的信仰与虚伪的沽名钓誉，其间常常含混不清。例如，当一个人因为一种动机、一种习惯或者一种本来具有的技能，而能恪守职责，这就往往可以饰以意识形态的解释，来证明自己本来就具有崇高的信念。陈永贵说他每逢困难的时候都会想到毛主席的教导，这历史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大寨治理那条叫做“狼窝掌”的山沟，他在那时便想到了毛主席的话：“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他对资产阶级思想的痛恨则又是那样的入骨三分，当他听到社员赵小和说“多弄几个钱花自在”的时候，这种痛恨就可以让他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心里就像被锥子扎了一下”。后来他的继任者郭风莲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她20岁的时候曾经参加了一个民兵比武大会，结果她以四枪击碎了四个瓶子。这当然可以证明她的聪明精灵，不过她却说当她举起枪口的时候，就好像对着的不是弹靶，而是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所以在心里喊着：“他们杀我们了，快瞄准呀！要一枪一个！”同样的事情总是出现在这个偏僻的山村，人人似乎都会将自己的行为看作是在拯救全人类，这包括了一位老人将路上牛马的粪便收集起来的行为。一本名为《大寨红旗》的书介绍说，他已70多岁，数十年间每天清晨必然走到街上捡粪，送到集体的肥料堆上去。这件事情被广为传播，于是一个外国人就来到大寨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结果老汉的回答令那外国人惊讶不已。他说“虎头山连着亚非拉，我们要建设虎头山，埋葬帝修反，为世界革命多作贡献”。诸如此类的事情，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毫无疑问只能说是愚昧、矫情和虚伪。但在当时，事件本身也许多少包含着某种真诚的信念，其虚伪的豪言壮语更可能是事后某些浅薄文人的添油加醋，而由当事者予以默认。若干年后，陈永贵病入膏肓，弥留之际终于不再掩饰内心的真情，遗言给后人不要将他的骨灰葬于“狼窝掌”中，说那个地方不吉。这时候，他肯定不会再去矫情地套用毛泽东主席的教导。

在农民的眼里，人民公社的干部是最耀武扬威的人。这倒不是由于他们更加聪明和更加了解世事，而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农民多半是唯他们之命是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从的，所有的生产活动也由他们来决定。每天早上，队长们站在各自统辖的村庄里，或者敲响一口祖辈传下的老钟，或者吹响一个哨子。社员们多半能够闻声而动，集合到队长面前，在三吆四喝当中站好队伍。直到这时他们仍然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完成什么工作。这些事情全部由队长一一分配。队长还有可能宣读几条毛主席的教导，或者上级的督促，对不服管理和劳动没有足够热情的社员加以申斥，如果此人仍然没有悔改的表现，那就要扣除工分，致使其最后的收入受到影响。然后这支队伍便稀稀拉拉地出村开向地里。直到再一次的钟声或者哨音响起的时候，大家便如法炮制再一次排起队伍，离开土地返回村里。每一个人在这整个过程中，只要遵守起止时间和尽力完成队长分配的工作，余者皆为次要。

人民公社当初创立的这一整套劳动方式，又在学习大寨的运动当中被强化为至高无上。其最显著的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抑制家庭和个人的各自为政的倾向，有效地实行大一统的调动。“一大二公”这几个字，自从在50年代末遭遇惨败，在60年代初期予以纠正，此后仍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现在，学大寨运动一起，它也就重放昔日的光芒。不过，新的说法是“想新的，干大的”。这个说法的发明者仍然是陈永贵。随着这句话的流行于全国，人们再一次看到了“大跃进”中曾经出现过的那种激情。在1967年春天，陈永贵把此种形势概括为“煽‘大跃进’的风，点大干快上的火”。

最激动人心的事情莫过于大规模地改造土地。如我们在前边所叙述过的那样，这在50年代曾是大寨的得意之作。现在他们则决定将那时造成的小块梯田全部毁弃，把山峰和低谷的地形彻底改造为“平原”。这种气魄首先令昔阳叹服，接着全国争相仿效。公社制度这时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每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乡下的青年人全部被调往工地，纷纷组成专业队、突击队、民兵队、铁姑娘队，总数可达2800万人。当然工地上还有数百万干部，以及无数拖拉机、汽车、手推车、镢头、炸药、粮食、医药和红旗。陈永贵很得意地说，“这是对大自然宣战”。如果它真的可以称为一场战争，那么它持续的时间之长为前所未有的。中国人赶走入侵的日寇为时8年，解放军打垮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为时3年，而学习大寨的改造山河的战役则用了16年。也许，很善于指挥战争的共产党干部真的以为他们又在打仗，所以他们为这件事起了一个只有大规模战争中才会提到的名称：大会战。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尾随乡下人到他们的土地上去，定会看到毛泽东称之为“人民战争”的军事战略在和平的土地上怎样实现。他们都是粗俗淳朴的人，像他们住的泥土房子一



样饱经风霜。抡镐的、挥锹的、抬筐的、推车的……单调的衣着，忧郁的表情，无休止地将岩石和泥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成千上万的人汇成的海洋般的场面，有着一种深沉的悲壮，感人至深。报纸上不断刊登这类场面的照片。一到春天，各地就争相公布他们的“人民战争”的辉煌战果。1978年春天则是最后一次公布这种战果，由当时全国农田基本建设办公室主任钱正英出面。她宣布说，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全国的农村共计动用土石一百三十多亿立方米，比上一年冬天多出百分之六十，扩大了三千三百万亩水浇地”<sup>①</sup>。这中间最有名气的是在华北一个叫做沙石峪的地方。那里的农民历数载艰辛，在岩石上造出大片田地。诗人们为此编出许多富于浪漫情调的诗歌，其中一首说，“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意思是说，步行5000公里路，肩挑5万公斤土，才能造出一亩耕地。

到了1980年，这一场“战争”已经偃旗息鼓。批评者说它华而不实，造成极大浪费，很多工程愚蠢到建成之日也就是报废之时。这一年的6月，昔阳县轰轰烈烈的“西水东调”工程，被党的新一届领导人责令停建。已经投入的500万工作日和4000多万元全部作废。《人民日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劳民伤财的工程”，应令所有好大喜功者引以为鉴。这一来举国震惊。当初争相传送“会战”捷报的那些地方，现在开始纷纷控诉学大寨让他们办了蠢事。山西省一个叫李家庄的公社，为了造成一片50亩的“小平原”迎接参观者的到来，花了7万元钱。这还不够，又在旁边以砖石水泥筑起一座墙壁，油漆彩绘，出资7000元，唯一的作用是供人观赏。但是公社领导人学着大寨的口吻说“要算政治账，不要算经济账”，现在则又大呼不合算。另外一个公社抱怨他们更不合算：农民花去14000个劳动日、5000公斤炸药和16000元钱，只造成3亩地。广东省有一个大源公社，通过一位记者在《南方日报》发出沉痛的感慨：就在1978年的那个冬天，他们派出一支队伍开赴山上，毁去10亩山林，引爆几百公斤炸药，将山头削去几米，开辟了9亩“小平原”，总计投资1万元，却因为没有水源灌溉不能种植庄稼。但是最惨的是沾尚公社的大寒口大队。这里的一条大坝4次建起又4次拆掉，几年之中农民付出8万多个劳动日和1万多元钱，居然未见1亩新地，而且连原有的一块土地也叫水冲得干干净净。应当说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若说十几年的“大会战”全是失败的记录，则忽略了另外一些重要的史实：自1965—1978年间的“人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78年2月6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民战争”，毕竟使10%的耕地获得了灌溉的可能。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享受着这一成果所带来的好处。

“大会战”这种劳动方式之所以会出现麻烦，是因为它对活生生的人的束缚。事实上它把人变成了只付出体力而不会独立思考和没有意志的劳力。这一问题仍然出在制度上。实际上，人民公社的整个制度，从上到下都在抑制农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按照这种制度，生产和分配总是由上面发布指令，很少出自农民的意见。农民除了付出体力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别的权利。而且，这种付出无论多少，大体只能得到很低的平均收入。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农民都会讲一个笑话：在我们的国家，只有四个人会种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和公社书记。他们说的这四个人，乃是党中央所属的四级组织的负责人。这四级组织在中国领导着全体农民。农民们每年种什么、何时种、种多少、何时收，以及他们每年一次的收入分配将是多少，全由这些书记们决定。农民觉得集体的土地其实就是书记的土地，他们对于自己的劳动，习惯于说“给人家当官的干活去”。于是，发展到最后，干部打钟吹哨，三请四邀，甚而驱赶农民下地干活的事情就成为农村里面的普遍现象。一位调查者曾恰如其分地描述当时农民的劳动，“头遍哨不买账，二遍哨伸头望，三遍哨慢慢晃”。毫无疑问，在农民的眼里，既然土地上的劳动不是自己的，那么，劳动的成果也就不会是自己的。因此，公社造成了广泛的怠工、挥霍甚至欺骗。有时候，农民以某种开玩笑式的小手段发泄自己的不满。比如当城里的学生落户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教给这些不懂农活的人一些特殊的怠工“技巧”。在中国北方的黑龙江省，一位农民就曾这样来传授他的施肥技术。他背着一篮子化肥飞快地赶到同伴前边，到了地的那一头就迅速地挖一个深坑，将全部的化肥倒进去掩埋，然后就倒在地头睡觉，等着队长的收工哨音。他的办法引起周围农民的哈哈大笑，但却没有一个人对这种欺骗行为提出疑问，因为大家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一些类似的花招，并且互相掩护以瞒过干部的耳目。

今天回顾学大寨的全部历史，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是不能随便忽略的。自从1964年《山西日报》的一位记者把大寨称为“红旗”，这小小的村庄也就成了这个包含着太行山和吕梁山两大山脉的山区省的一个标志。但是，真正的大寨之年是1966年，也即“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此后它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象征。1970年发生了一件对人民公社的历史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一年北方农业会议在昔阳县召开，会议的内容仍在于如何将学习大寨化为

一种政治行为，要点则是将一个300多农民的小村庄的做法，全面地应用于一个20万人的县，然后又要全中国2000多个县如法炮制。这样，人民公社的制度也就能够更大范围地建设和巩固起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人民日报社农村部的主任李克林说，“只要有农村和农民的地方，哪里不学大寨？”关于大寨的宣传从此席卷全国的报刊。北京所有最具权威的报纸和通讯社均派出强大的记者队伍，常年驻在这个山村，为那些农民的每一个行动唱出赞歌。《山西日报》的编辑们后来回忆说，他们的报纸在那些年里发表了760多篇文章来歌颂大寨和昔阳，总字数可达200多万字。他们不免感叹，那些报道的“地位之显要，版面之突出，文风之可憎，内容之荒唐，影响之恶劣，都堪称史无前例”<sup>①</sup>。但这并不是全部，还有其他地方那些学习大寨的积极分子们也开始会见记者，将他们的声音加入报纸的合唱。到了70年代开始的那几年，掀起学大寨浪潮的第一批功臣终于得到报偿，纷纷进入地方权力的中心，顶替原来那些执行人民公社方针不力的干部，因为他们均有忠于大寨的信念。大寨公社的农民当中，有20人走出山门，掌管了县一级的地方权力。昔阳县涌现的“大寨式干部”则被调往其他县里担任要职，其中50多人进而掌握中央以及省一级的权力。据说昔阳“陈、郭、王、李四大家族”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中迅速发迹的多至200余人。其中陈氏家族100多人，郭氏77人，王氏20人，李氏28人。当然最辉煌的要数陈永贵本人。他后来成为党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同时还兼有山西省、晋中地区、昔阳县和大寨公社的权力。一个人同时掌握着由最高层到最底层的五级权力，在中国，陈永贵乃是唯一的一个，此前没有另外的成例，此后就更加没有可能。

这些人构成了70年代人民公社盘根错节的权力体系，拉起大寨的旗帜为所欲为。比如当日大寨有一个名叫二苟小的二流子，他之所以可以横行乡里，是由于他是陈永贵长子的媳妇的弟弟。所以他扬言“反对我二苟小就是反对俺姐夫，反对俺姐夫就是反对陈永贵，反对陈永贵就是反对大寨，反对大寨就是反对党中央”。这个荒唐的逻辑即使在今天也没有完全失去效用，在那个时候就更加畅行无阻。当然此辈并非多数。很多人可能是带着一种美好的理想和道德净化的愿望，进入这个体系，但最终却染上了专横而又虚伪的恶习。这也证明这个体系并不能如传扬的那样使人从善，反而会造就种种使人为恶的契机。比如大寨无偿地得到844565元的国家援助以及无数的劳务支援，却

<sup>①</sup> 《山西日报》1981年3月7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到处张扬他们的自力更生；比如陈永贵从1973年就开始将昔阳县的粮食产量虚报达24%，以夸大丰收的程度。然而最令人惊讶的事情还在于陈永贵的欺骗行为可以上达天文下及地理。他常常要对昔阳县的天气报告加以审核，如果实际的降雨达不到他的“大旱年夺丰收”之标准，则要酌情削减雨量的统计。如此荒唐的欺骗手段居然行之多年不被揭穿，在人们的理智和感情上引起强大的震撼当属必然。这也可以证明学大寨的运动已经背叛了它的美好的初衷。

1978年的春天，湖北省贺家坪公社一个漆树林的工地上分外冷清。当地政府在三年前宣布，要毁林开荒建设千亩漆树林。并且指挥数千人上了山。但是现在漆树死了大半，农民也散去大半，山上只剩下一大片死树和300人苦苦支撑。<sup>①</sup>看来，所谓亿万农民战斗在学习大寨的水利工地上的说法，并不全是事实。实际上农民对于“天堂”的失望心理已经弥漫开，水利工地上到处都是消极怠工。在刚刚过去的那个冬天，山东省莱城县的农民一边干一边发着牢骚：“叫我们大干流汗，不管我们穿衣吃饭，这样干实在没有味道。”要是早两年，说这种话就有可能被视为煽动反对大寨而关进大牢，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诸如此类的批评在工地上流传得相当广泛，《人民日报》的编辑还认为有必要就此发表评论，指出群众的责怪“是切中要害的批评”。评论还说：“数九寒天吃不上热饭，酷热盛夏喝不到凉茶，还要经常牵三挂四，甚至辛辛苦苦一年，口粮不富裕，现钱分不到手，他们的干劲能持久吗？能越干越有味道吗？”<sup>②</sup>

事情极为分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大寨也到了日薄西山的时候。但是大寨也在这时候表现了它最后的辉煌。1978年1月28日，昔阳县召开了一个学大寨的“群英会”，记者们当时报道为“盛况空前”。“当红日从东方升起，”《山西日报》驻昔阳的联合报道组写道，“昔阳的山坡上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显得越发壮丽多姿。宽阔笔直的大寨路上，红旗迎风招展，彩灯凌空高悬……二千五百多名集体代表和英雄模范人物，排成威武雄壮的队伍，跨着豪迈有力的步伐，沿着这条洒满阳光的大路，向会场走去。”<sup>③</sup>新华社的

<sup>①</sup> 《湖北日报》1980年10月21日。

<sup>②</sup> 《人民日报》1978年2月10日。

<sup>③</sup> 《山西日报》1978年2月6日。

记者则更进一步地写道，这个队伍中有 20 个公社、400 个大队的 130 名标兵 2418 名模范。陈永贵作为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出现在会场，为这一瞬间增添了无限光彩。<sup>①</sup> 这时候中国人的眼光正在恋恋不舍地离开政治。可是农业的方针的确还是以大寨之路为既定方向。这可以从党的高级领导人的一系列讲话当中看得出来。山西省省委书记王谦就说过：“高速度发展农业是刻不容缓的战斗任务。要高速，靠什么？首先要靠大寨精神！”所以他建议要“毫不手软地把反大寨的歪风邪气打下去”。郭风莲则用大寨的历史来告诉全国的农民，“在现有条件下，农业不仅可以一年高速度，两年高速度，而且可以持续高速度”。那些领导乡村的官员们也就真的以为，大寨已经由“大批判”的圣地转而成为“高速度”的圣地，他们在这一年照样不停地率领下级到那里去“朝圣”。

我们可以将这一变化理解为，大寨运动的发动者们正在试图以最后的努力挽回自己的荣耀。可是，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然逝去。让那些热情万丈的官员们无法应付的，是老百姓的明显厌倦。湖北省那个漆树工地上的农民，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就只剩下 20 人，又过了几天，当旧历新年临近的时候，就统统卷起行李回家，再也没有回来。差不多同时，相隔 1000 多公里的福建省有一个学习大寨的先进大队，叫葫芦阵大队，也闹出一件事来：几个青年人在墙上胡乱写了一气，说葫芦阵是“苦难的人间”，还扬言要把大队里大寨式的干部赶走，以平民愤。当然这一年里发生的事情并不都是这样赤裸裸地毫无遮掩，很多变化细致入微但却意味深长。《人民日报》发表了路易·艾黎的文章，这位新西兰人告诫他在中国科学界的朋友，用“健全的头脑来与现实打交道”。果然，大多数农业技术专家在恢复了声望之后再一次活跃起来。他们联合起来重新建立了农学会，只谈科学技术不说学习大寨。这些人包括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兽医专家程绍迥、植物保护专家沈其益、昆虫专家蔡邦华和多倍体育种专家鲍文奎。河北省和山东省的两个大队更有一点含沙射影的味道。他们在 1978 年 2 月 1 日这一天，同时在《人民日报》上主张，不能以虚报灾情和超报产量来骗取荣誉。如果这样的事实还不能叫陈永贵和他的大寨人感到威胁，那么下面一段对话必定会令他们如芒刺在身。报纸上这样刊登着：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78 年 2 月 7 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在北关大队，一位负责统计工作的干部找大队书记陈顺德说：“老陈，干脆凑个整数，按每亩增十斤报。照实报，咱这个响当当的先进队多不光彩。”“不能虚报一两，”老陈说，“不能在数字上兜圈子。”<sup>①</sup>

令大寨以及昔阳真正感到大势去矣的时刻，在1978年7月2日终于到来。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出湖南省一个叫湘乡的地方的经验，并且指令昔阳也对照湘乡检查自己的缺点。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大寨不再是农民的唯一圣地。结果昔阳县委不得不找出自己有五条缺点，比如农业生产中的“大锅饭”、财物管理混乱、干部特殊、非生产人员过多等等。能够承认这些，在当时的昔阳来说，已经是痛彻肺腑，但在另外的人看来，这全是避重就轻之谈，即使在昔阳，也有一位县委副书记承认：“我们实际存在的问题，不仅是这些方面。”

现在到了1980年岁末。大寨的沉沦与它的崛起同样具有轰动效果。报纸上面批评大寨的文章一发而不可收，比如“大寨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评大寨经验”、“总结学大寨中的错误”、“学大寨是一场灾难”……文章用词和所举事实都是异常尖刻，与当初大寨批判别人的时候几乎一样。《山西日报》的不少记者就是因为张扬大寨有功，才平步青云起来的，现在更是惶惶难以终日。编辑部也不得不在头版发表整版的文章，向受了欺骗和打击的读者“赔情道歉”。批判别人的人总会反过来被别人批判，被批判的人亦会获得扬眉吐气的机会。这是许多年来中国政治中的一个规律。所以中国2000多年以前的一个寓言流传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故事由庄子所述，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它告诉人们倒霉时不要失意，得志时不要张狂，因为事物到头来总有走向反面的一天。可是，就在1980年，中国第一个大寨县昔阳连续五年虚报粮食产量的丑闻揭发出来之后，公社精神看来永远不会再放光彩了。

至于陈永贵，他对自己在这一年岁末被免去全部职务究竟产生多少感慨，对于他的轰轰烈烈大起大落又有多少怀念，在流传至今的官方记录当中已无可考。我们所知道的，是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到那个曾经生他养他又使他风卷残云般地吞没中国整个农村的小小村庄。他举家搬至北京城西，住在木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78年2月1日。

桦地南侧一座公寓，每日除了上街买菜就是坐在家里发愣，终于耐不住寂寞转至京郊的一个农场，成为那里的一个农业顾问。他在1986年3月26日死于癌症。躯体化做一团灰烬之后，由他的长子陈明珠护佑，离开了这座充满政治是非的城市。大寨全体村民出村数公里，迎接他回归故里，葬于虎头山上。那一天，众人群聚山上山下，无一不是痛哭失声，感天撼地。官方为他发布讣告，承认他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全体老百姓则仍然一如既往地叫他“永贵大叔”，只是这一称谓中的味道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早是崇敬，后来是轻蔑，现在则又夹着无限的惋惜。





## 第八章

# 余韵缭绕

“切三刀”：关于“包产到户”的折中方案——秋后算账：人民公社不如“包产到组”，“包产到组”不如“包产到户”——1982年第一天，中共中央再次颁布关于农村的新文件——人民公社失败原因的种种分析——人民公社最后的解体





对于成千上万的乡下人来说，1981年里令他们最为惊讶的一件事情，是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不是27亿元的财政赤字；不是9.8%的通货膨胀率；不是政府重提经济调整的方针，以及陈云说的“经济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要退够”；不是国库券；不是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不是邓小平提出了“党内认识很不一致”、“经济方针执行得很不得力”的警告；不是报纸编辑津津乐道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是农业委员会在3月9日为原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平反昭雪；不是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在7月的辞职；不是《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颁发，以及邓小平关于这个决议的九次讲话；不是姚依林副总理说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潜在的危险”，这种“危险”叫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们着实紧张了一阵；不是赵紫阳总理对于追求高指标的经济方针的尖刻批评；不是820万城里青年有了就业的机会；不是城市里面个体商业经营者卷土重来，在这一年里居然达到101万家；不是国家建设的投资总额减少了111亿元；不是“翻两番”的伟大目标；不是轰动城里的“伤痕文学”和“歌德理论”；不是崭露头角的“流行音乐”；不是128万大学生中争论的“人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不是江青在京郊秦城监狱里面是否还能耀武扬威；不是胡耀邦总书记在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的大会上发出的号召：“我们要善于经常清洗自己身上的灰尘，在执政的条件下永葆革命青春。”<sup>①</sup>……

让乡下人惊讶的，是一棵西瓜。

事情发生在这一年的夏季，至少有两家严肃的报纸一反常态地报道了这一桩奇闻。报纸的编辑说这是“一棵奇特的西瓜”。西瓜的确有些奇特。它完全违反了在一条瓜藤之上只能长出两个西瓜的常规，居然结了14个西瓜，个个巨大无比，有的满含纹理，色彩斑斓，有的却无一丝杂色，翠绿晶莹。<sup>②</sup>

然而最奇的是，那西瓜并不是生长在瓜地，更非人为的栽植。它神不知鬼不觉地发芽于一块山芋田的角落，自生自荣，由此便使得这件事情有了神

<sup>①</sup> 《人民日报》1981年7月2日。

<sup>②</sup> 见《光明日报》1981年8月16日和《人民日报》1981年8月30日。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奇的色彩。在农民看来，这或许就是一株“神瓜”。所以，瓜熟蒂落时，远近乡里的农民闻讯赶来，均以得食此瓜为天大的福气。西瓜在一片欢呼声中被切开，红瓤黑籽，并无奇处，可是一点也不影响乡民内心的虔诚，转瞬之间，西瓜即被食尽。人人述说瓜的甜美无比，接着就有一个谣言起来，说此瓜藤叶可以医治百病。于是，乡民中之老弱病残，便将全部藤蔓枝叶扯回家去，以文火煎熬成汤，一并喝尽。这时候，洛阳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也听到了消息。惊讶不已的技术人员赶来探查“神瓜”的秘密，但是晚了一步，他们只得到部分根须、几粒瓜子和一把曾经覆盖藤蔓的泥土。

技术人员的研究没有任何结果，于是只能报告农民说，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原因不明。但是乡下人的热烈情绪一如既往，种种情节经过众口相传，就显得更加神秘。没有几天，刊登“西瓜奇闻”的报纸已有十余家。整个夏天，乡下情绪激昂，如同天降福祉。9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人员也闻讯由北京赶来，想要在这棵西瓜中寻找社会学的意义。直到两年之后，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仍然津津有味地讲述着这个故事，作者陆学艺曾经亲往那块土地，在经过一番详细调查之后，他惊叹道：“真是奇特了。”

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自然物种的繁衍过程出现有悖常情的变化，本来并不罕见，比如公鸡生出小鸡，小牛多长一条腿等等。这些事情，即令前所未有，至多使人付之一笑。假使这株西瓜当中包含着某些生物工程方面的价值，可以用做良种的遗传，也属极为平常的事。这一事件之所以闹得纷纷扬扬，乃是因为西瓜以外的背景绝非一般技术性的因素可以比拟。其缘由，要从这一年的年初谈起。

1981年1月1日，赵紫阳在总理的任上度过了第一个新年。自从由四川来到京城，他已经很少有暇过问乡下的事情。老实说，他从政的主要经验，也是局限在城里。但是现在，在他耳边种种是非曲直的争执，大都是围绕着农村展开的，其论辩的激烈与莫衷一是，给他以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就决定到乡下去度过这个新年。他出城南行，由湖北荆州至中原南阳，最后来到鲁西。这鲁西正是后来发生“西瓜事件”的地方。

当然赵紫阳的光临与几个月后西瓜的滋生并无直接关联，他只是要拿定主意，看看对“包产到户”到底应取何种方针。他一路走一路说。他说“‘包产到户’，堵是堵不住的，只能导，不能堵”。在一个贫穷的村庄，他就说，落后的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我们就按群众意见办”。到了另外稍微富裕一点的地方，他又说，“先进地区，也有压制生产力的问题，也不能

照原样搞下去”。这些话说得轻松自在，但绝非信口开河。他既为总理，在他的语言世界中便不能有任何玩笑，也即中国所谓“君无戏言”。更何况，他所赏识的农业顾问，是当时国务院农业委员会的副主任杜润生，这位专家由农村的集体化运动中脱胎出来，深知人民公社的弊端却仍对合作化一往情深，从反对“包产到户”到提倡以“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对待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农业思想对于赵紫阳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一周之后，赵紫阳回到北京，即将一路见闻加以归纳。赵的看法是这样的，中国的乡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好一些的地区；中等水平的地区；贫穷的地区。对于这种区分，经济专家和政府里的官员们都无异议。所以，赵紫阳就有理由进一步提出他的解决争端的方案：将“包产到户”限制于贫穷的地方；集体经济稍好的公社，则应保留生产队集体的经营权和分配权，只在社员的分配中实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度，也即将农民最终所得和他负责管理的土地产量结合在一起；在中等水平的村庄里，也须坚持生产队集体统一经营和分配，但可将产量的责任更加具体地落实在每个劳动力的身上。大约两个月后，杜润生便依据赵紫阳的这一方略，拟订新的规章，由中央办公厅签署下发，用以弥补半年以前党中央所发“75号文件”的缺陷。新的文件由杜润生来解释赵紫阳的思想，并且以杜个人的名义提出。这有悖共产党文件发送的常例，但是却并不违背事实，因为由当日留下的种种文字来看，这些思想与其说是出自赵紫阳，不如说确是由杜润生深思熟虑。

对于“包产到户”，新的方针基本上具有画地为牢的性质。党的领导人现在倾向于认为，人民公社内部已经不是“大同”，而是有差别的。这一认识显然比以往更加接近事实真相。自从共产党掌握了政权，中国广大的地域已经成为政治的和行政的一统江山，但是经济以及文化方面却仍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对于这种差别，政府以往的办法是削高就低，抽富济贫。这种政策在80年代初期遭到批评，并且被农民讥为“一刀切”。赵紫阳的为官历程，是由大陆沿海之广东至西南内地之四川，对于这种差别一定会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但是新方针的最重要的缘由，并不在于经济差别的事实，而在于行政决策的必要。毫无疑问，这时候无论赵紫阳还是杜润生，都希望能够以一种面面俱到的办法来解决乡下的争端。这种思路的潜在逻辑，也即中庸而不倚，在中国古老的哲学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由此也可以更清楚地解释我们国家行政的特质，乃是在各种力量和利益中间，维系一个可以折中平衡的支撑点。果然，新的办法一经颁布，那些茫然无措的政府官员们都认为得到了行政方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面的依据。有一个地方干脆就把这“三刀”切在不同的地形地貌之上，作出规定说：山区可以“包产到户”；丘陵地区可以联产到劳；平原地区只能联产到组。不过，就连赵紫阳对于这种办法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获得成功也没有把握，所以中央办公厅在这一文件上的批语，就只是要求地方政府将这些意见作为参考，而没有按照常例指示大家照章执行。看来他的担心不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农民们普遍流露出对新政策的怀疑，那些被划出“包产到户”区域之外的人就更加不满：“一刀切不行了，难道切三刀就行么？”他们对于共产党总是那样殚精竭虑地教给他们如何种田，真是难以理解。

经过两年相持不下的争论，“包产到户”作为恢复农民生产热情的办法，已在官方获得某种程度的承认。即令一些地方正在实行的“包产到户”尚未由政府正式认定，也取得了暂时维持现状的保证。治理我们庞大的国家，政府一向只是依靠行政手段以及文牍的传送，现在，执掌行政的官员已经分裂，指引方向的文件又是如此含糊不清，既说“可以‘包产到户’”，又说“不要‘包产到户’”；既说已经“包产到户”的地方“应当允许继续”，又说“运用各种过渡形式进一步组织起来”。舆论混乱不堪。报纸的编辑们撰写的文章，一会儿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一会儿又说，“‘包产到户’仅仅是一种低级的责任制”；一会儿说，“贫困落后的‘三靠’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一会儿又说，“稳住中间地带，不要滑向‘包产到户’”。这就可想见平衡的局面实难持久。

但是这样一来，就为实际的进程留下了巨大的富有弹性的空间。或者这就是赵紫阳当时的本意。但是，也有可能是他没有想到农民对于“包产到户”的热情如此之高，会超过他所规定的收入界线，或许是他过分地夸大了当时乡下的贫富差别。事实上他的下级提供给他资料表明，1980年中国有504万个村庄，其中人均从集体得到的收入在50元以下者为27.3%；50—100元的占47.1%；100元以上者则为25.6%。如此看来，赵紫阳据以区别贫富地域的标准，差距不过是在几十元间。这对于农民的心理倾向，显然不会有实质的影响。因之农民认为“切三刀”的主张依然是形格势禁，其难能真心服从也属必然。

既然行政和文牍都已不再具有足够的力量，人们自然要将希望转向土地上实实在在的收成。“包产到户”的那些地方大都具有足够的信心，他们说农民正在把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土地。他们估摸自己，一定有足够的力量用他们自己的办法让土地长出更多的粮食，也让叫他们吃了20多年苦头的人民公



社难堪。仍然坚持着人民公社既成制度的人们也不甘示弱，他们有着更加殷实的财产作为组织生产的基础。农村的分裂并没有因为赵紫阳提出的新方针得以弥补，相反每一个人都似乎更有理由自行其是。1981年年初，当赵紫阳在乡下奔波往来的时候，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大致为75.6万个。但是，到了1981年夏季那棵“奇特的西瓜”硕果累累的时候，就有161.28万个生产队加入了“包产到户”的队伍，已经超过规定比例，为总数之32%。贵州最多，80%；其次是甘肃，66%；安徽55%；河南53%；内蒙古50%。这些地方，“包产到户”的力量毫无疑问已经占了上风，但是，另外一些地方，比如东北的全部，华北、华东和华南的大部，仍然是人民公社力量占着压倒的优势。有342.72万个生产队则仍然坚持着“队为基础”的公社制度。大多数“包产到户”的村庄是散落在人民公社的庞大集体当中。这样，乡下就形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竞赛，竞赛的一方有3亿人，另外一方则多达5亿。当然两支队伍中都有很多人摇摆不定。《红旗》杂志的评论员写道：“基本上是三种情况：一是坚决拥护；二是怀疑动摇；三是不赞成，有抵触。”<sup>①</sup>表面的争论似乎安静下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其实全中国都在等着夏天的结束。按照当日时兴的逻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好吧，就让我们来看粮食的收成。在五花八门的想法当中，这倒是一个共同点。争论的双方都心照不宣，只要能够在夏季收成上压倒对方，也就可以维护自己政治上的威望。万里说过他是“秋后算账派”，谁又不是呢？

这就难怪“西瓜事件”会引起人们超越常规的关注。它长在山东省东明县李六屯大队第五生产队，为“包产到户”的农民苏兵建所有。

苏兵建一家7口，夫妻二人养育着5个孩子。这种多子女的家庭，在中国多为当地赤贫，更何况苏家又居住在黄河下游泛区的梁山脚下，土地以及灌溉的条件极差，唯山头忠义堂里供奉的108位绿林强盗之名，举国知晓。1981年，苏兵建已33岁，自然记得60年代初期他侥幸活过来的那场饥荒，对20年间没有从人民公社的集体中分得一分现金的事，也耿耿于怀。西瓜的事情虽然叫他兴奋异常，但看来这并不是令他的家境有所转机的天降神灵。根据他的陈述，他真正的翻身解放是在“包产到户”、他一家分得土地之后。“西瓜自己长在地里，只有一棵，”苏兵建说，“我发现了，就浇了几遍水，看

<sup>①</sup> 《红旗》杂志评论员：《认真补好真理标准这一课》，见《红旗》杂志1979年第9期。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管起来。”但是，在调查者的眼里，西瓜却与“包产到户”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试想这棵西瓜如若不幸降生在人民公社集体的土地上，谁又能够为它浇水并且精心看护？而且，由于众多调查者的介入，还使得许多更加重要的事实也随着这一事件和盘托出。这一年的夏天，苏兵建在他承包的24亩土地上面，收获了3500公斤小麦。收尽麦子，继之播下高粱、大豆，这样一来，这块土地的产出，就将超过以往五倍之多。“包产到户”的鼓吹者们抓住这个要点大做文章，实在是要进一步地保持一种进攻的姿态。

在我们国家的农时中，夏天是承前启后的时节。除了最北方的吉林和黑龙江这两个省，中国在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域上，农作物全部为一年两熟，华南甚至可以收获三季。所以到了夏天，已经可以看到收成，同时也能够大致看出秋季作物的丰歉。还在“西瓜事件”的两年前，即1979年，北京的一位专门琢磨农村的研究人员就开始选择夏天来评判“包产到户”的优劣。他叫陆学艺，选择安徽省肥西作为他的研究对象。麦子已经成熟，尚未开镰收获，但当地的干部早已在心里把每一块土地看了个遍，很有把握地对他描述道，“包产到户”的最棒，增产三倍；“包产到组”的增产两倍；最不济的是没有“包”的生产队，大约增产一倍。以一个专业研究人员的严谨和细心来衡量，陆学艺对这种预计并不放心。一个月后他再度调查，终于在自己的报告中写道：“结果证实了原来的估计。山南区‘包产到户’的队占77%，今年夏粮总产1005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265%，国家征购574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5.7倍。”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外人听上去总是不会相信，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包产到户”以后，便出现了农民视土地为己出的局面。这些贫困寒酸之家，都能找出钱来，或数十或数百，总计居然多达300万元。这中间包括不少婚丧嫁娶之资，现在都投进土地。结果，这一年里用掉的化肥就比过去三年里用的还要多。所以问题并不在于土地能不能长出那么多的粮食，而是在于，农民怎么肯把自己娶妻嫁女的钱拿来种地。这是1979年7月的事情。一定是诸如此类的事情传到了北京，在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中间引起震动，令人们不得不对“包产到户”刮目相看。所以，到了这一年的9月，党中央再一次召开全会的时候，中央委员们在最后表决通过的文件里，对“包产到户”的敌意大大缓和，甚至将原文中“不许‘包产到户’”的限令删去，改为一段煞费苦心的话：“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夏季转瞬即逝，白天渐短，黑夜渐长。秋风萧瑟，田野尽染金黄。这在乡下是一个叫人欢快的日子，可是这一次，大家不免有些紧张。嘴上的争论相持不下。夏季的收获虽已部分地说明问题，可是在乡下全部生产季节当中，夏粮一般只占有1/3的份额，所以，反对者们就会将他们的希望转向秋季。但是农民早就知道了他们的希望所在。“包”这个东西对于农民的鼓舞力量在当时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说得清楚。乡下怪事接连不断：萎靡不振20多年的农民，现在个个斗志昂扬。男人在口袋里揣上一块馍就能在地里干一整天。孩子们也会挖开地角埂头，种上几棵苗。女人只顾埋头看着地，没有工夫再叽叽喳喳。有个学者到陇西山区调查，他说他看到生产队上午分了地，下午社员们便扶老携幼，全家人一同下地。“男的在前边犁地，妇女孩子在后边捡石头。”另外一个记者说，他在河南看到，分开了土地的农民，在施肥的时候已经不再是一把一把地扔出去，而是在每一棵苗的下面挖坑点肥，说是“穴施”；选种子的时候，不是一片一穗地选，而是一粒一粒地挑，说是“粒选”。有个女人从人民公社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下过地，现在深更半夜点一盏油灯，趴在地里用双手抠出一棵一棵杂草，说是“累死也情愿”。过去这些年里，方地犁成了圆地。现在圆地又成了方地。这一年边边角角全部种得再无立锥之地。这还不算，农民又开垦出1.26万亩荒地。仅仅是这些还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凭力气还能做到。最叫人难以想象的是凤阳这个靠乞讨为生的地方，农民居然能够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202.9万元钱来，买回1671头牲畜、7014张犁、2791部平板车、32台拖拉机、321件农具、1.1万吨化肥和2470吨氨水。有了这一切，集合在“包”字大旗之下的人们显然信心十足。

尽管如此，最后的结果还是出乎意料。四川省常光南的金鱼公社，增产26%；云南省那个堡子四队的190亩薄地，在这一年里增产96%；甘肃王魁在他包下的60亩山头上，让粮食增加了120%；广西钦州承包鱼塘的6户农家，增产340%。在河南兰考县，有个雷新庄大队，过去20年中人民公社只是用国家的钱买了一台拖拉机，而包产到组这一年的积累，让他们买了15台拖拉机、8台收割机、8台播种机和1台联合收割机。这情景若是兰考十几年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能够知道，一定会嗟叹不已。他为了属下百姓能够吃饱肚子，呕心沥血，直至肝癌晚期痛苦至极仍矢志不渝。他于1964年死在任上，其所作所为令举国为之泣下，在今天仍然是中国人心中完美的道德化身。然而这里的老百姓却并没有改变乞讨为生的命运。这乞讨者的队伍中，也包括雷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雷中杰的母亲。他一直以前任县委书记为做人做事的榜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样，可是竟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拯救。现在，在经过了“包产到户”之后，雷中杰才终于发现：“看来最根本的还是政策呀！”个人的善恶得失固然可以成为道德的标尺，却终究难以弥补制度的弊端，勇于牺牲自我者如焦裕禄，也不能实现他的理想中的境界。

说来有些奇怪，过去两年中，诸如此类的丰收景象竟会被农民掩盖起来，或者只是在私下里传来传去。他们丰收了，却担心“犯法”。只有一个地方有点按捺不住地宣布了自己的战果。1979年10月12日，北京的一队人马来到安徽。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时，其中一个工作人员从窗户伸出头去，买了一份当日的《安徽日报》，他和他的同事一下子就看到第一版上的大字标题：《大包干，大增产》。文章说，凤阳县有一个前王庄生产队，搞了“包干到组”，粮食产量翻了两番，也就是增加了三倍，可以卖给国家5000公斤粮食。可是就在这年年初，这里还是一片荒凉，农民家无隔夜粮，群聚出门，行乞为生。这消息在这群城里人当中引来一阵惊叫。他们可还不知道，岂止是一个前王庄，整个凤阳县都在“大增产”。凤阳自春季以来备受攻击，没有一家报纸敢于公开支持它，所以可以说是背水一战。陈庭元夜夜提心吊胆。到这一年11月的某一天，他终于得到确凿无误的消息：在一片120万亩的耕地上，长出的粮食超过1978年49%，油料则超过1.6倍。“到底是多少？”那一天陈庭元把这句话问了好几次。“四亿四”，有人说了一句，然后又说了一遍，又说一遍，这引来一阵长时间的沉默。那时就连对“大包干”抱有最坚定的信心的人，像陈庭元，也没有料到他们会一下子拥有这么多粮食。他本来就等待着这个时刻，想象中自己一定会笑起来，或者轻松地舒出一口气。可是，没有。这和他心里成群结队衣衫褴褛的农民沿街行乞的景象反差太大，令他一下子猝不及防。后来他在《解放日报》上写到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说：“解放后，我在农村工作三十多年，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我饱尝过酸甜苦辣，也深知农民吃尽了苦头。谁能想到，凤阳农民奋斗了二十多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这就解决了。”这还不算，凤阳还卖给政府大约4450万公斤粮食。陈庭元在写给他的上级的报告中说，这个数字相当于过去26年凤阳卖给国家粮食的总和。这的确叫人难以置信。但是事实可能还要精彩得多，因为过去20多年，政府拉进凤阳赈济饥民的粮食，比从凤阳卖出去的粮食还要多。实际上凤阳48万公社社员生产的粮食还不足以养活自己。这就是陈庭元说的农民“吃不饱饭的问题”。自从他们大着胆子“包产到组”，凤阳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可以神气活现地说，他们不再要国家来养活，而且可以养活国家。

肥西县这一次给上级的报告不是要救济粮，而是要建粮食仓库。因为他们的仓库只能放1500万公斤粮食，另有500多万公斤只好在57个露天场院上堆着。“‘包产到户’让我丢了讨饭棍。”来安县姜泽和的女人说。她18岁嫁给姓姜的，21年间岁岁乞讨为生。也有人说女人就是会吹牛，证据是凤阳农家中仍有不少女人浪迹他乡要饭为生，一次即被遣送回来62人。可是后来一问，方知其中42人的出走乃是为了躲避“结扎”和“上环”。她们吃饱了饭，就耀武扬威地跑到外面去乱生孩子。

这是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故事。不过，它在当时还湮没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故事。小岗村的我行我素也已一年。陈庭元虽然当初默许此种行动，可是心里毕竟有一点虚，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他和他的县委把所有文件当中牵涉小岗的地方，都要小心翼翼地删去。这样小岗就在封闭的状态中“复辟”它的“资本主义”。到了1979年12月20日，陈庭元听到的消息令他再也无法装聋作哑。事情简直太离奇，但是一切都是真的：小岗这一年收获66185公斤粮食，这个数量相当于过去五年（1966—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还收获了17600公斤油料和135头猪。据老百姓说，自从他们一搬进人民公社，就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花生、芝麻和肥猪。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此话属实，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这一年，小岗终于有了足够的粮食，还卖给国家12497公斤。这数字超过政府计划的7倍；卖给国家12466公斤油料，为政府既定任务的80倍。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还有钱。县委研究室的一个调查报告说，小岗农副产品的收入至少有47000元，平均每人400多元。对这群“叫花子”来说，这无疑像一座光芒四射的金山。对专门研究农村应当实行什么方针的官员来说，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县委研究室向外界公布了小岗的消息，并且说，现在小岗农民唯一的希望就是不要阻拦他们的行动。此份报告题为《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表明了这些官员此时的倾向。

冬日的乡下，照往年的风尚，一切均该归于沉静。农事停下来，大地成了一片灰色。可是这一个冬天，凤阳就没有一天安静。农家忙着分钱分粮，最后的调查表明，平均每一个人分得350公斤粮食和91块钱。人人兴奋异常，然而还是有点美中不足。小岗的事情已经成了新的话题，已经“包干到组”的社员现在都把眼睛盯着“包干到户”。农民仗着他们特有的公平意识喊道：“同是一个政府下，为什么小岗能干，我们不能？”接着，一篇描写凤阳农民“大包干”的报告文学——《丹凤朝阳》，也获得了一等奖。这故事的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开头为人们描述了一段已经流传数百年的童话：有一天，一只凤凰从天而降，在凤阳境内亭亭玉立，金碧辉煌，云拥雾簇，它忽见一瞎眼老妇，遂展其光彩，老人即刻重见光明。作者说，现在“神话变成了现实”。县委公布了自己的“改革宣言”，只是原文的题目没有这样激烈，而是叫《大包干的办法好》。先在一家地方性的刊物《江淮论坛》上发表，1980年1月12日，曾经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光明日报》予以转载。编辑按语写道：“这是一篇具体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好文章。”肖谷依据凤阳的消息，也在《人民日报》上写道：“他们干得实在好啊”，又说“有些人不怕群众饿肚皮，就怕实践离开本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不是束缚群众手脚的绳索。毫无疑问，我们在工作中应当严格遵循中央文件规定的原则，但是也“应当结合具体情况，走自己的路子”。

到乡下访问过的人彼此之间都在议论，说他们见到的事情真是令人眼花缭乱。乡下一片混乱，事实上怎么干的都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文件中有一个意思倒是不折不扣地成了现实：“可以……可以……也可以……”不过，说到最后的收成，所有的人都在证明他们看到的事实是一致的：人民公社的集体不如“包产到组”，“包产到组”不如“包产到户”。比如天长县有个秦楠公社，有84个生产队不曾分开，另外29个则分组包产。结局是前者共计减产11.9万公斤，后者共计增产20.3万公斤。又比如来安县有个玉明公社，春天的时候，48个生产队“包产到组”、28个“包产到户”、两个队坚决不分。现在，分到户的增产34%，分到组的增产24%，没有分的两个减产18%。这份报告还详细地列举了“立新”和“尤岗”的故事，以增加不同制度之间的可比性质。作者说这两个生产队土地相连，厚薄贫富也大致相当，气象又同为大旱。区别只在于立新“不包”而尤岗“包”。结果“不包”者减产19.8%，“包”者增产22%。报告还说，像这两个生产队这样反差强烈的情况绝非少数。果然，没过几天，有人在苏皖交界的地方也看到一件事情。安徽刘郢村与江苏下胡村连接在一条街的两端。刘郢穷而下胡富，这是历史留下的局面。但在1979年，出现了奇异的插曲。刘郢“包产到户”，一举装满粮仓。小伙子们也趾高气扬起来，三个月里娶回五个江苏姑娘。坚守在公社堡垒里的下胡男人们不知所措地嘀咕：“瞧人家快活得腩沟沟都流油了。”

这样看来，土地上的变化虽然在1981年的夏天才大规模地显现出来。其实，它的前奏在过去的两年中始终没有间断。1979年，先是在安徽的滁县地区、六安地区、肥西、定远以及嘉山地区，接着是1980年，增产的范围就扩

大到内蒙古、贵州、云南以及四川的局部，甘肃渭源、豫东以及鲁西。到了这一年秋天，当更多的地方开始感觉到“包产到户”的震撼的时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陆学艺就根据他的调查结果宣布说，“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劳动的生产率一般都提高百分之五十以上”。实际上他说的可能是一个平均的计算。在某些地方，粮食的产量可以增长一倍甚至两倍。在最先遭受“包产到户”骚扰的淮河北岸两岸，农民们个个笑逐颜开。那是因为，20多年来他们家里的粮食缸第一次装满。灰黑色的泥草房组成的农家群落中，现在开始出现星星点点的砖房。有些房子的墙壁还是土制泥垒，可是屋顶上的草已经换成了瓦。屋檐下，也挂起了腌制的鸭子，这些东西他们过去是根本吃不到的。不过，这些人在我们庞大的农民群当中，毕竟还是少数。有一项统计估计他们只占1%。农业的进步是要讲究规模的。这样少的数量，也许并不能说明问题，如同实验田里的成果，不论如何辉煌也不能作为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但是，在1981年，更多的地方都卷进来，从东到西，161万个村庄、3亿农民、6亿亩耕地，全都摆开了“包产到户”的架势。这样庞大的规模，谁还能说它只是在实验田的阶段呢？

一位作家，贾梦雷，在谈到80年代初期乡下的“包产到户”时说：“我形象地感觉到，无数灌满春水的小溪，正在汇入壮阔的江河，而大江大河的波澜，又在带动着千万条小溪冲出峡谷……”许多人羡慕这些小溪中激荡的春水，怕被指责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恐惧心理已经消失殆尽，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开始欢迎这类称号。在那些雀跃不已的农民中，许多人甚至就是多年来饱受批判凌辱的“‘包产到户’分子”。但是现在，他们决心不再接受任何恐吓和压制了。在河南，每十个农民当中，这样的人就有五个，他们在418620个生产队里占了压倒的优势。贵州、安徽、内蒙古、云南、甘肃、福建、四川，叛逆者的人数还要更多一些。他们完全不懂这中间的政治意义，但又不顾一切地投入自己的热情，在80年代结束以前的几年里，他们的决心和行动将会改变中国整个乡村的命运，也包括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这一点，正是农村变革的要害所在。不过，那是以后的事。现在，要害是直观地表现在土地上。

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政府意识到，虽然他们想要农民做的事情，农民没有做好，但是，农民一旦自己想要做什么事，多半就会成功。1981年夏季种植业的丰收记录在历史上几乎无出其右。气候宜人，风调雨顺，对于作物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的丰收自然重要。不过，“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制度的大范围地推进，依然被看作制胜的原因。那些懂得土地和庄稼的干部们，仅仅从庄稼的长势，就可以很清楚地分清哪一块地是生产队种的，哪一块地是作业组种的，以及哪一块地是“包产到户”的农民种的。这情形就像陆学艺的描述：“三种形式，三样庄稼，如同三层楼。”按照他在甘肃省的计算，照旧由生产队来组织劳动的大约增产五成，“包产到组”的土地则可以增产七八成，“包产到户”的则增产一倍以上。

往日最穷的地方现在充满了人欢马叫。肥西的农民中开始流行一句新的俗谚：“睡觉不知有天亮。”因为农家小屋大都成为临时的粮库，床铺安置在粮囤间的空隙，农民就在粮食中安卧。可以想见，这对于几乎从来没有吃过饱饭的人来说，是一种怎样的快乐。定远、凤阳和嘉兴，为江淮地区十大穷县中的三个。农民的外出，一向是为了乞讨的需要。现在，在公路上的人流中，每人必是挑着满载粮食的担子，络绎不绝地流向城镇中心的粮食收购站。阜南的农民在几个月里就把5204万公斤粮食和750万公斤油料挑到政府的粮站，换回的钱比他们在人民公社20年所挣的还要多。山东一个拖拉机厂不失时机地把400台拖拉机开来，这些机器已经积压多年——是啊，每台3000多元，从前的农民哪里有钱来买呢？可是这年夏天，400台这样的机器15天就卖完了。等到一个叫马有道的农民把5000公斤麦子卖净，凑足钱赶来，拖拉机厂的推销员一边得意洋洋地点着钞票，一边说“早就没啦”。昔日的叫花子马有道现在为了没有买到拖拉机愁眉不展，回家就摆开宴席请来县委书记，席间扬着大把的钞票，对书记恳求道，下一批拖拉机到来的时候，不要把他丢下，“不然，我就是天下最倒霉的人了”。

其实，马有道是幸运的。还有些落在他后面的人就更加倒霉了。就在他与县委书记比肩而坐频频举杯的时候，有一大堆农民挤在县城西边一座大院里，他们已经等了三天。不是要买拖拉机，他们还没有到那时候，他们是想把手里的粮食卖出去拿回钱来。到了6月19日，有人忽然发现一下子是拿不回来钱了，因为粮站磅秤上的秤砣都已经挂了起来，于是大叫一声。焦躁的农民几乎要骚动起来，他们大骂政府的粮食收购官员不仁不义，过去在他们没有粮食的时候横征暴敛，现在他们把粮食送上门却又不要。一片情急火燎的混乱中，乡民抓住粮站主任徐秀文一阵殴打，这些人一点也不知道徐秀文的苦衷：有什么办法呢？过去人人找他要粮食，现在人人要把粮食给他。那个叫做吴凤歧的“叫花子”，年年提着个小破口袋来，空空荡荡，口朝着上面

要他往里面装粮食，这一次，带了一大堆口袋来，个个都是口朝下，倒出来7000公斤粮食。这一人的粮食就比过去他那个生产队的还要多。县政府原来只是计划收购925万公斤小麦，现在已经收了1541万公斤。所有的仓库都已经装得满满的，再也塞不进什么东西了。他跑进省城，要求他的上级来把粮食全部运走，“至少运走一千万公斤”，他说。可是他的上级却给他一个事不关己的微笑，回答说：“最多100万。”万般无奈的老徐只好带着20万条麻袋和一大车油布，回到他的粮站，把他的粮食统统堆在露天的院落。

不过，80年代初那几年里急着卖粮食的农民，至少在一点上是幸运的。在90年代初期的几年里，粮站倒是要你的粮食，可是没有钱给你，只立个欠据，那欠据一般是在一张白纸条子上面写上几个字，没有任何担保和公证，也没有兑现的期限，甚至连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图章也没有。所以农民说是“白条子”。他们推着一大车粮食，走上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送到县城，却还要自己带上午饭，不然就会因为得不到一分现金而挨饿。可是80年代初期，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这样热衷于工业，人们还不知道大手大脚地投资。银行里面不缺钱，也还没有想到自己应当独立于政府的行政，它多半安安静静地做着政府的“钱柜”，政府要支多少就可以拿到多少，所以农民只要有幸把粮食放到粮站的秤上，就可以拿到现金，然后就可以兴高采烈地去买东西。所以，新华社的记者张广友在乡下走了一圈之后，就兴奋地写道，他看见“买自行车的多，买缝纫机的多，买半导体收音机的多，戴手表的也不罕见”。他自己的这个结论简直有点着迷，以至于驱车上百公里，跑进那个曾经让省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为之落泪的穷村子——凤阳县梨园公社前王庄生产队，挨家挨户去数这些东西，结果发现，这个18户人家的村庄，在这一年里买了7台缝纫机、8辆自行车、16块手表和18台收音机。

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城里，被合称为“四大件”。城里人都以购买这些东西为天大的乐事，但那主要是因为东西太少以致供不应求，而不是人们的手里没有钱。乡下的情况就不同了。“四大件”对于农家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追求物质的欲望。它与一个家族的兴旺甚至传宗接代，都有着密切的关联。农民婚嫁的习俗由于地域或者种族的不同而有很大区别，但是大多数地方都在实行一种彩礼制度。男子向女子求婚的时候，一定要送上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者实物作为聘礼，倘若这桩婚事最终可以成功从而举行了订婚仪式，彩礼的数量还要大大增加。其实际数额，可以因为男子家庭的富裕程度或者女子父母的要求多寡而有不同。按照常例，彩礼的发送须有特定程序，完全不像西方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人那样含情脉脉地把一枚戒指戴在人家手上。大致上彩礼需敷以鲜红的棉布，由一队人挑在肩上，一路行至女家，同时鞭炮齐鸣，唢呐锣鼓齐奏。红布下面作为彩礼的实物，最重要的就是上面列举之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这全部习俗的要点在于显示男家的殷实。所以旧时一个富足的男人便可以有妻妾。如小说家陈忠实在他的《白鹿原》中所描述的主人公，一生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卖了家产娶女人，直至第七房女人。而大多数终身不能婚娶的乡下男子，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家境贫寒而无力支付彩礼。这种情形在另外一部小说《艳阳天》里有着生动描述。主人公一家三代为三个男性，他和他的父亲都是早年丧妻，无财再娶，作家浩然用一句饱含悲凉的幽默来形容这个家庭，是“两根筷子夹着一根骨头——三条光棍”。但是光棍的悲惨，主要的还不在个人生活的缺陷、情感的失落与疯狂的性压抑，按照中国农民的家庭信念，对于祖宗的最大不孝乃是不能生育男性后代，以使这个家族的人口、财产和忠义传统都不能世世繁衍。了解了这些事实，就可以知道，所谓“四大件”的增多，对于农民来说，为事关家族乃至种族延续的大事件。在河南省兰考县有一个叫余寨的村庄，之所以成为远近闻名的“光棍村”，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到了80年代初，这里406户人家中的“光棍”已经积累至100多条。所以他们刻薄地指责人民公社，“不仅让我们受穷，还要让我们绝后”。面对此种局面的农民，摒弃公社的制度而选择“包产到户”，实为当然的结果。一年后，即1981年，余寨居然就有80条光棍以他们的衣食之余付足彩礼，娶回妻子。周熙在北京的一家杂志上，用“千家万户喜洋洋”来描述这种情形<sup>①</sup>，看来并非矫饰之词。可以想象这一年里，这个“光棍村”的唢呐和锣鼓是如何从春到冬日日喧闹不已，这是人民公社20多年里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这样一来，乡下人就在这几年里进入了生育的高峰。不过，也有人认为，在开始的几年，领结婚登记证的男人中，许多人生育能力大为不足，因为他们已经人到中年，又是在营养不良的岁月里面长大成人的。

这些人的父辈要比他们幸运一点。他们可以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结婚生孩子。那时候是5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还没有出生，农村中上一轮结婚与生育的高潮，就是在那个年代。山东西部一个叫柳里的大队，村里的一个邮递员就是在那时娶回了妻子，然后一口气生出六个孩子。看来他是乡下幸运的一个，邻里乡亲都羡慕他，大家都知道一句半是心酸半是幽默的话：“多出力

<sup>①</sup> 周熙：《千家万户喜洋洋》，《新观察》1981年。



气种粮食，不如多出力气生孩子。”因为那时候粮食分配的主要部分是按照人口计算，一年当中，无论怎样出力气劳动，也不会比生下一个孩子获得的粮食更多。不过，乡村邮差的妻子赵三雨可就不一定幸运。自从为人妻母，主持家计生活以后，她就从来没有能够在自家的粮食缸里存过粮食。她讨厌丈夫只会生孩子，不会挣粮食，本以为是强壮的丈夫不争气，可真是没有想到毛病会出在人民公社。“嫁过来23年了，没有见过粮食囤，”她悲喜交集地说道，“现在，大囤尖，小囤满。”这是1981年的夏天，一年的“包产到户”，就改变了这个女人在23年中经历的一切艰难心酸。这段心酸给农民心理上造成的伤痕是深不可测的。

最大胆狂妄的人现在在村口的土墙上写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意味着与人民公社制度的决裂终于到了可以公开的时候，更加重要的是，那些总是设法弥隙补缺的人们，现在没有一个再出来说话。凤阳没有成为25年前的永嘉，陈庭元也没有成为李云河第二。凤阳现在取代了大寨的位置，成了记者、作家、演员、理论家的新偶像。报纸上整天都在讲述凤阳的新事。电视里把《说凤阳》的专题纪录片连续放了三遍。《解放军报》也加入舆论的潮流，用一个整版发表文章歌颂凤阳，题目是《凤凰，在阳光下高翔》。参观者纷纷来到这个偏僻的地方，小县的官员们无暇应接，赶忙求助于记者，发布消息吁请各地参观者暂缓行程。可是这股潮流依然势不可当地涌向凤阳，又从凤阳涌回到各地。说来也怪，政府从来没有号召“全国学凤阳”，也没有任何诸如此类的计划，可是凤阳却迅速地成了全中国仿效的榜样，这与十几年来强制推进学习大寨的情形成为鲜明对照。多少在人民公社里面成长起来的人，20多岁的、40多岁的、60多岁的，整整三代人，一想到要离开养育他们的人民公社，反而觉得兴奋异常。他们敲锣打鼓地把土地和财产分开，其情景有如30年前的“打土豪、分田地”。拿树枝插成地界画地为牢；卖掉华而不实的机械，换成牛和犁；把边边角角弃耕多年的土地全部开垦出来；人民公社里面越来越小的土地一下子就又扩大起来。他们天不亮就下地，日落西山仍不回家；再也不用生产队长吹哨敲钟三吆四喝；把一根铁丝放在场院上分开区域，令各家收获不至混淆；老太太跪在麦粒上面捡去缕缕麦芒，年轻人望着哈哈大笑；自从粮食收购站的仓库装满了以后，农家在自家的小院里面堆起粮囤；男女老少全都忙碌起来；懒汉没有了；蹲在墙角晒太阳的也没有了；偷青的没有了，过去派出多少民兵巡逻站岗也看不住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这些小偷；打架吵嘴的也少了，因为“没工夫，人们都在忙种地”，定远县的县长这样解释说。1981年这一年，在他领导的这个县里面，只有一次吵架，吵得不可开交，以至要公社的官员来判决是非，原因是两户农家争夺一块土地的承包权利……

毫无疑问，走在“独木桥”上的人们，精神世界正在发生着极为重大的变化。“‘包产到户’就是好，”新华社的一位记者写道，“和过去不同，农民觉得他们是在给自己种地，而不是给人家当官的种地了。”共产党虽以“精神变物质”为施政的原则，可是现在才终于看到了农民发自内心的精神力量。陇中黄土高原上，有一个农民叫马和贵，带领全家6口和一骡一驴在地里劳作。他的10岁的女儿也蹲在这里，一点点地将大块土壤敲碎。忽然狂风大作，黄沙席卷而来，令公路上的汽车也要减速，可是这一家人仍然埋头苦干，恍若不觉。在河北平原上，有一亩红薯地上少了6株苗，这意味着将在秋天少收获5公斤红薯，作出这种计算的是承包这块土地的一位老人，他居然为此走了几十公里路程找来秧苗补齐缺株；中原河南“包产到户”的土地上面，仅仅是精心地收打晾晒，每亩土地就多收回20公斤——收割10公斤、打场10公斤。相隔不远的地方住着另外一位老人，70岁，跑不动路了，可是她却有事在自己家里养50只母鸡，把鸡粪弄到地里去。当然农民家里已经不仅仅养鸡，他们还将原本属于公社集体的牛马也分归私家饲养。看来人民公社真是气数已尽，连牛也不喜欢它。“那时候的牛，”云南省思茅地区地委书记张文英说，“头低着，腰弓着，尾巴夹着，趴在地下，前拉后拽都不起来。现在，归了农户，头抬起来，腰伸着，尾巴甩着。”甘肃省有一个寺头生产队，拥有12头母牲口。它们生活在人民公社的饲养棚里的时候，不是性欲低下就是不会怀孕。现在“包产到户”，也就住进农舍，说来真是奇怪，这一年，12个家伙比着生孩子，结果生了13个（其中一头母牛生了一对双胞胎）。村里人就说，人民公社那会儿，是人比着生孩子，现在是牛比着生孩子。

这一年的夏天，杜润生再一次走进乡间，被这些事情深深地震撼。此人年纪虽高，却机敏过人，也具有尊重事实的基本品格。所以，他带着这种震撼回到京城，驱车跑到中央党校，对着一群迷惑不解的高级干部惊叹道：“过去能有这样的事吗？”

的确没有。可是，真正出乎他的意料的是，诸如此类过去没有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安徽、贵州、甘肃、内蒙古和四川，还发生在河北、河南、广东、湖南、山西、山东和福建。很显然，“包产到户”这个魔鬼正在走出贫困地

区。其势头不可阻挡，足以令杜润生得出结论说“波及中部地区”。而大多数公社的干部还在坚决地执行着他的“切三刀”。于是他赶紧发出新的告诫：“切记，一不要和群众顶牛；二不要放弃领导。”这样一来，他的那些下级不知所措，他们掰着手指头计算：这时候是5月22日，距离杜润生的上一次指示才60多天，怎么那么天衣无缝的“切三刀”的办法也不作数了呢？

看来这一段历史真是日新月异。北京一位兼有记者、官员和农业专家经历的人，吴象，后来指出这一变化的过程。他说：“由‘不准’变为‘不要’，再变为‘有条件的允许’，而终于完全放开。”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知道，1981年夏天至秋天的几个月里，正是吴象所说“终于完全放开”的前夜。

当然，只有那些还待在人民公社壁垒深处的农民才会有“前夜”的感受。麦子收过之后，他们大都哭丧着脸，还零星星地荡起哭声。其中有一片哭声飘在中原纸店公社一个最富裕的大队里。那里的社员却在这一个夏天觉得自己成了穷光蛋。除了这些人，这里全部的生产队都已“包干到户”。不是他们自己留恋人民公社，而是公社书记命令他们不得改变现状。书记的想法，是用这个拥有经济实力的村庄来同那些追求变革的村庄加以对照。结果这个过去的高产队虽然还是高产，可是每个社员却比人家少收了50多公斤麦子。这差别在这些农民看来已经至为明显，难以容忍。“几个社员伤心地埋怨，光掉泪”，《新观察》月刊说，支书则抱怨自己的村庄竟为“富裕”所累，被上级“一刀”切在变革的浪潮之外，他对社员说：“你们能哭出来，我哭也哭不出来呀！”另外一个地方则发生了一场真正的分裂，那是靠近渤海边的向阳公社，一条水沟划开两个生产队，一个是坚决分田分地“大包干”，一个坚持着集体的“方向田”。只有最坚定的两军对垒，才会出现这样的场面。最后的收获令人难以置信：亩产，150公斤：2.5公斤。居然能够相差60倍！看上去像是戏剧舞台上导演出来的一样。不是公社的威信扫地以及这个营垒的兵败如山倒，此种局面实难想象。同样具有戏剧效果的分裂，至少还发生在一个家庭中。妻子坚决要“包产到户”，但是，丈夫是共产党员和公社供销社的主任，所以自认为比妻子具有更高的觉悟。他不能阻止“包产到户”的办法，却“一听到‘包产到户’就恶心”，并且坚决地不肯走进妻子承包的土地。可是粮食打下来了，一家人收获4000公斤。如此多的粮食，为这个家庭前所未有。主任丈夫深有愧色，农民妻子则理直气壮起来，她尽情地嘲笑丈夫：“别吃这‘错误粮’，吃你的‘方向粮’去吧！”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秋天结束前的最后几天，中原、中南以及华东的乡下人，差不多都是在蒙蒙细雨中度过。冰凉的雨水连成一片，下在他们的身上、脸上，下在路上，下在地里，下在露天堆着的粮食上……到了12月初，雨总算停止，可是冬天骤然而至，气温降到零下，其阴冷难忍的程度，为几十年来所罕见。乡下人挤在一起，满嘴的脏话，但他们不是骂天气，而是骂那些主管粮食收购的官员。夏季粮食堆积似山难以卖出的情形再一次出现。满载粮食的小车，两人拉着一辆，挤在泥泞的公路上，堵塞着交通。农民聚集在供销社门前，等待开秤就把粮食统统卖出去，可是那大门总是关着。好不容易门打开了，出来几个耀武扬威的人，指着乡下人的粮食车挑三拣四。有人实在忍不住了，大喊：“看他那神气，挑挑拣拣，收收停停，还把我的一等粮划成二等，不就是粮食多了么？”另一个人接着说：“哼，没有粮食那阵，他们就跟叫花子似的，恨不得上我们家锅里捞。”在霍丘，一位仓库保管终于露出头，农民立即将他重重包围，他赶忙解释说：“没有办法，里面全装满了。”商丘地区的一个官员还出示一份清单向农民作证，上面写着，仓库中已存黄豆1845万公斤、绿豆75万公斤、花生40万公斤、花生仁152万公斤、芝麻527万公斤、小麦1200万公斤……六安地区的地委书记还报告说，他那里有500多万公斤花生正在发霉变质。官员们试图说服农民把粮食拉回去放在家里，但是人们还是不肯散去。他们已经在粮食缝里睡了半个夏天和一个秋天，哪里还有地方放粮食呢？

毛泽东在60年代初期就说过农民落后，不能只听农民的。时间并没有改变这种思路，经过了20年之后，党的领导人还在把“怎样引导农民”作为制定农村方针的潜在逻辑。可是，现在的局面，已经不是党如何引导农民，而是农民在拉着党向前走。不是“独木桥”和“阳关道”的分道扬镳，而是“阳关道”上的人们争相拥上“独木桥”。换句话说，在某些党的官员心中是“独木桥”的“包产到户”，在农民心中是真正的“阳关道”。傅上伦和胡国华在《瞭望》周刊上写道：“农民在‘独木桥’上找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后来者也就抢着走这‘独木桥’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向农民搬弄那种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说教，说这座‘独木桥’如何如何危险，万万走不得，农民会理睬么？”

农民的确不会理睬形形色色的戒律，麦子收过之后，“包产到户”的风潮就向着更加广大的地方席卷过去。到了这一年秋收结束、秋种开始的时候，

又有40.32万个生产队加入进来，这样就使得“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在总数中占了40%。现在只有25.2万个生产队还在坚守着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了，大约是5%。另外277.2万个生产队正在左顾右盼，大约占总数的55%。他们一边羞羞答答半推半就地拒绝着“包产到户”，一边尝试着他们认为并不违反公社原则，又能够刺激农民劳动热情的责任制。

这一个冬季，“切三刀”的设想成为泡影。“如果就这么继续走下去，”作家陈登科写道，“不仅为中国八亿农民带来莫大的幸福，而且必将承认它在历史上是一大贡献。”这是一次真正的“人民创造历史”的范例。那个时候，党的哲学教科书里有几章满篇都写着这句话，但是，在事到临头还能承认这句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意味承认真理在落后的农民一边。对于这种局面倘若继续熟视无睹，可能会酿成大乱。于是有人建议，再开一次像60年代初期那样的七千人大会，以决定对于“包产到户”究竟该怎么办。那是共产党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唯一一次现任领导公开自我批评的会议，由此也就决定了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方针。所以，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很明显地是要彻底地解决80年代初期党在农村问题上的被动局面。这项建议没有被采纳。不过，作为一个折中的步骤，在10月中旬，党的几百名高级官员聚集在北京西郊的一座宾馆里面，再一次研究农村的方针。有人指责“切三刀”的方针显然限制了农民的行动。所以杜润生就觉得有必要再一次出来说明。他不再宣传他的“三个三分之一”的理论，但是又委婉地解释说：“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一个文件下去能够百分之百地实现，没有参差不齐的情况，那是不可想象的。”他在嘴上这么打着圆场，实际上心里早在四个月前就打定主意：非把“包产到户”放出笼子来不可啦。那一次，他说：“‘包产到户’的发展是一个信号，代表社会生产力而行动起来的农民，已经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愿望。这是不可违背的社会潮流。”

农民不断地兴风作浪，党的官员步步后退，一次又一次地承认农民的自行其是为合法，而他们却好像永远不知满足，得寸进尺。这在我国历史上的确是前所未有的。1981年之局面大致若此。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在接下来的1982年，又留下了“包干到户”总进军的记录。

1982年第一天里发生的事情真是令人百感交集。党的中央委员会再一次颁布关于农村的新的文件。这是人民公社历史上很值得注意的一页，共计5600多字，11条，内容既广泛又现实，甚至还能列举出若干方法解决农民卖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农产品难的问题。然则在大多数人的眼里，这个文件的关键所在，是承认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句话必是出自党内一些高级农业专家之手，因为所谓“各种形式的责任制”表述得极为详尽。它们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记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包干到户；包干到组。这种表述在形式上是不偏不倚地容纳了当时乡下存在的所有意见，但是，毫无疑问，其真正的触目之处，却是在“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此中道理再明显不过，共产党治国30余年，还从来没有在哪个文件中承认这两个东西是“社会主义”的。现在有了这个文件，“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地位终于上升至历史的最高点，此起彼伏，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一落千丈。共产党作出这种认可是在1982年1月1日，上距浙江永嘉的第一次“包产到户”约为26年，距安徽小岗的第一次的“包干到户”为3年。

事实上，结论在一个月前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已经产生。这次会议的气氛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亦属空前。由拥戴和反对人民公社而导致的两个阵营，起落之势逆转。河南、甘肃、贵州、山东四个省曾经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现在居然英雄般地在会上介绍他们的“包产到户”如何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些最理直气壮地指斥过“包产到户”的人们，则冷冷清清坐在台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研究中国农村历史的专家们都倾向于认为，1982年是人民公社制度垮台的“转折点”，其主要的依据即是1月1日颁布的这个文件。

但是，党的领导人仍然没有忘记，要在新年的第一天里为天平的另外一侧加上砝码。文件的红色字头下面注有批语，用以作为文件精神之补充。这些话看上去像是警告，却使人感到像是人民公社垮台之前的一种徒劳无益的惋惜：

最近以来……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在滋长蔓延。这种情况应当引起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在总结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同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切实解决好。

看来，直到这时，党的领导仍然期望在人民公社大厦内部施以改良，而不要使大厦的本身发生动摇。或者说，是想将“包产到户”和人民公社这两种制度合而为一。但是事态发展到眼前这种地步，又想要生产责任制又想要

人民公社的计划，让那些身在乡村的人听来，是那样的不切实情。“屁话，这怎么可能”，一个乡下的官员听到收音机里面振振有词地讲解这个道理，不由拍案而起。当然，大多数乡村干部没有这么激烈的反应，他们只不过苦笑一下，在一种无所适从的精神状态中走进了1982年。

党中央发出的警告没有产生效果，公社基层组织的瘫痪并未“切实解决好”，甚至没有如惯例在新闻界产生反应。那个时候中国各地关于农业的新闻一再膨胀，以农村新闻为主和以农民为读者的报纸层出不穷，70年代末的时候，这些报纸有149家，可是，这才过了三年，就增加到275家。但是在1982年，这些新生的报纸上一再出现的农村新闻，已经不是“包产到户”，而是“包干到户”。小岗的幽灵终于在中国大多数地方蔓延开来。农民在报纸的怂恿下得寸进尺地采取新的行动，让公社基层组织的权力更进一步旁落。

在中国农村的改革史上，1982年应当被视为“包干到户”的一年。在这一年以及以后一段时间里面，8亿农民所做的事情，不过是重复了小岗村18户农民在1978年12月那个夜晚的所作所为。433.9万个已经“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中，有404.1万个在夏季以前转而实行“包干到户”的办法，包括了至少5亿农民。这个数字在农民总数当中占有67%的比重，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又有55.44万个生产队和至少1亿农民参加到“包干到户”行列里来。现在在全国农业书记会议上大谈“包干到户”的好处的人，已经不仅仅是那些贫困地区，甚至也不仅仅是中部地区，也包括了一向以富庶著称于世的江南水乡宜兴。

一种旧制度迅速地土崩瓦解，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但是在当代共产党人执政史中，这还是首开纪录。表面上的动因，是党中央在1982年1月1日承认自己把“包干到户”看作分田单干“完全是一种误解”，由此令整个乡下都有了天地大开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潜流至少在1978年12月即已积蕴在农民当中，党的文件揭开禁忌，仅仅是使人民公社大厦失去最后的屏障，终使潜流涌出表面。至于公社基层组织的种种混乱、涣散甚至瓦解，乃是一种必然的蜕变。对于任何一个已经坏死了的体系，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将专制的闸门抽起、改革的潮流涌出来的时候。此前人们能够在黑暗之中忍辱偷生，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光明。假如这个大厦稍稍动摇一下而令一缕光亮透射进来，人民就会看到其间的丑陋而难以容忍，也就没有人还能阻止他们要求拥有更多的光明。这道理我们即使在1978年12月“小岗事件”发生的时候还不能了然于胸，也不必等到1984年公社制度彻底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废除、其组织也最终瓦解的时候才能明白。在1982年夏季姚依林说“这是我们国家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的时候，即已明显地包含了这种意义。

对于当日农村的既成制度来说，1982年由“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的演变，之所以具有特别强大的冲击力量，是因为它让一个已经窒息而死的细胞重新获得了生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家庭曾经被公社埋葬，但是现在它却要来埋葬公社。乡土社会中间亲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一向与经济以及政治有着密切的牵涉，其间微妙虽为外人难以深悉，但是在我国历史却有其特别传神之处。

中国的家庭制度诞生在6000多年以前，并且伴随着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逐渐成熟，同时成熟起来的还有劳动资料、劳动成果和劳动本身为家庭所有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着眼点在于以财产的私有来否定原始的公社大同，进而推动农耕文明的发展。因之家庭就不仅仅成为人类生育繁衍的基本单位，更成为社会经济组织中的一个细胞。它肩负着由组织生产到传宗接代的不断循环往复的使命。一般来说，每家中必有一家长，为全家经济、生活、文化、教育之中枢。家长常由年高者或者成年长子担任，余者均须恭听家长的旨意。家长则需以仁爱之情对待其家庭成员，一同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与消费的单位。中国封建社会绵延数千载，其间大起大落，世事沧桑，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朝代试图否定家庭制度去重归世界大同，反而还会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道德训律，将家庭制度与国家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当然有些思想家曾经勾画了“世界大同”的蓝图，在中国有康有为，西方则有欧文，这些人视家庭为人类进步之障碍，崇尚社会之无家无国的局面，但是却没有一个能够在政治上找到一条切实而又可以操作的出路。创造一种冥冥之中的“乌托邦”毕竟比较容易，因为它是思想家个人头脑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产物，但是把想象化为一种政治制度，去治理我们庞大的国家，要亿万农民加以奉行，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件事情恰由共产党大张旗鼓地推行起来，时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办法则是建立人民公社。这时候我们国家的农村已经是由1亿农户聚合而成的庞大社会。用毛泽东的话说，那是一个汪洋大海。

共产党追求世界大同，有志于改革旧制度并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其理论认定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私有制度，乃是封建制度的源泉，而且甚至成为孕育资产阶级的温床。由这一点出发而拟定的计划，即以人民公社的制





度毁灭家庭的私有。但是，否定家庭的必要性似乎更加明显地体现在政治方面。我们的国家以中央集权的方式，依靠为数众多的官员由上而下地治理亿万农民，这就要求百姓安守本分，各就各位，令行禁止，不能鼓励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权利的家庭从中作祟。假如亿万农家全都我行我素，势必发生离心离德的倾向，甚而会累及政权的生存。这在历史上屡有地方豪门割据，以致中央大权旁落的事情发生，在共产党执掌全国的权力之后的1953年，也有农家屯粮居奇致使城里闹起粮荒的教训为证。

家庭与公社分别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泾渭分明。虽然公社乃是由若干家庭组成，但是在公社当中的家庭，全然不再具有原来的意义，其经济的和社会的职能已经消失殆尽，仅仅繁衍后代的功能仍然存在。对于家庭的经济方面的功能，公社在制度上的限制十分严格。比如人民公社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就曾有过一条奇特的禁令，详细列出农家有八件事情绝对不许染指：不准养鸡养鸭；不准养猪养羊；不准养牛养马；不准经营家庭副业；不准种自留地；不准私自出卖自己的产品；不准扩大按劳分配的比例；不准“包产到户”。合为“八大不准”。家庭参与经济的方式，只是为公社派出劳动力，这种劳动仅仅是体力的付出，而决不需要任何形式的智力。当一个家庭的成员在清晨肩扛农具走出门去的时候，他甚至很可能还不知道他将在这一天里做什么。公社则许诺将每一个家庭都领进天堂一般的幸福乐园。但实际上，公社对于家庭充其量仅仅负起了发放口粮，以维系劳动力之最低生存水平和生育能力的责任。毫无疑问，公社制度极大地遏制了家庭的权利、观念和传统，而以抽象的集体利益取代了以家庭为表现方式的个人利益。从大大小小的官员直到黎民百姓，其行为标准乃是“公”与“私”的界限，而不再具有经济的内容。

这一制度开创之初，流弊即生。农户被编入集体的行列，其劳作大部出于被动，即便有主动肯干者，也不会因此而有更多的报酬。所以人民公社刚刚成立，种种虚张声势的集体劳动以及农民的消极怠工已经层出不穷。毁灭家庭在经济与社会中的独立地位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很快即由事实证明。其中骤然而至的灾难，如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已有若干史家的记叙。但它在乡村中造成的绵绵无期的停滞，却从来没有留下一个确定的概念。这一事实更由于官方主持的舆论掩盖，令无数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也未能知晓。按照这一舆论在十多年间的宣传，我们的国家是自1966—1976年连续11年获得了大丰收的。但是，这一切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在人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民公社建立以后的20年间，农村的劳动生产率乃呈下降趋势。比如每个农业人口每年所生产的粮食减少了22公斤，棉花减少0.05公斤，食用油减少0.8公斤。

这些事实在80年代后期由官方所承认，已经令世人极为震惊，但是，实际的情况甚至比这些数字所显示的更加严重。在这漫长的20年中间，政府在土地上投入的物质已经大为增加，这包括基本建设的投资增长了7.7倍、大型机械的数量增长了464倍、化肥增长70倍、农药增长了7倍。考虑到这些综合的物质因素，则农业的实际生产效率就更加可怜。这一情况直到90年代初才由一批学者提出。他们将1952年的农业生产效率核定为“100”，列举逐年数字与之对照，以证明其中变化的趋势，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年份如下：

1952年：100

1955年：104

1958年：102

1978年：92

另外一种计算稍有不同：

1952年：100

1955年：103.8

1958年：104.7

1978年：77.6

1983年：104.5

第三种计算所表明的差别更大：

1952年：100

1955年：103

1958年：97

1978年：71.1

1983年：96.9



对于人民公社的制度来说，这些对比中无论哪一种都是致命的。在经过20年的努力之后，农业生产效率不仅较之1958年大为下降，甚至明显地低于1952年的水平。<sup>①</sup>其变化幅度虽有不同，但无论哪一种估计均能证明同一件事：1955年为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最高峰。此为农村集体化运动展开的前夕，亦是家庭拥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最后时刻。1955年的这一纪录，一直保持了28年。直到1983年，也即人民公社趋于瓦解、农家的权利得到大范围恢复那一年，历史方能回到它的起点。

但是，即便是在人民公社里面，农家的劳动潜力与创造精神并非完全没有表现出来。1959—1961年的灾难提供了这样的契机。党的领导人部分地意识到家庭的能力，所以对农户采取了某些宽容的方针，其中之一为“自留地”的设立。这一制度的内容，是在集体的土地上辟出部分交由农家自己耕种。其数量依公社官员的好恶，大致每位农民可得几厘至一分不等，总计约为全部耕地的5%。农家在这狭小的土地上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播种任何作物，并且可以拥有全部产品而无须上交集体。这一制度令人惊讶地持续下来，其间只有局部地区的官员。如大寨以及一些倾心以大寨为榜样的公社和大队，擅自决定将其收回，绝大部分则一直到80年代还保留在农民手中。农家以全然不同的心情在两种制度的土地上耕作，结果就令人惊讶地暴露出集体土地与“自留地”上农作物的巨大差异。根据官方的一项调查，农家“自留地”的收入，每亩大致为1000—1500元。倘若可以属实，则占全国耕地5%的“自留地”就提供了农家至少50%的收入。就局部地区来说，往往更加令公社尴尬。比如国务院农业部的一位副部长赵修，在内蒙古乡村里极为惊讶地发现，农家“自留地”上的粮食产量竟然十倍于公社的收获。“自留地上亩产过千斤，集体的一百来斤”，副部长说，因为农民在自留地里改造土壤，广施肥料。然而这件事情的戏剧性还在另外的地方。“第二年”，副部长接着说，在农家把“自留地”的土壤改造好之后，集体便将其收回，而将另外一些盐碱地分给社员用做“自留地”。结果是这些盐碱地再次被农家改造为良田，集体收回的良田则令人懊丧地再度沦为劣地，“自留地”上的产出仍然大大地超过了集体的土地。这样的事在世界农业生产史上实属罕有的奇观。难怪赵修在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不免对人民公社制度败坏生产力的程度连连感叹：“为什么社员‘自留地’的庄稼普遍地比集体地的庄稼长得好呢？”此中道理

<sup>①</sup>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6, December 1990, p. 1245.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其实再简单不过：农业劳动不仅仅是体力的付出，也是心灵和智慧的付出。

“地球上有两个磁场引力最大，”李云河写道，“第一个是地球磁场。家庭是人间第二大磁场。”如我们已经叙述过的，此人在中国开“包产到户”之先河，并且因之获罪，25年忍辱负重，如今沉冤得雪，却整日埋首家中，撰写一本《中国农村户学》。他称乡村的农家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呼吁共产党的官员及学者都来研究。他说，恩格斯对家庭有过高度的评价，说家庭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积极因素”。毛泽东亦多次提及家庭的功劳，比如在他的第五卷选集中，即有100多处谈到“户”。还有作家赵树理，他曾经设想写一部80万字的小说，题目即为《户》。如果此愿得以实现，足以和巴金的《家》媲美。因为仅仅是《户》这个书名，就抓住了农村的要害。人是生产力，工具是生产力，“户”是不是生产力呢？李云河自问自答：“户”里有人，“户”是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技术活动的实践者，因之“户”不仅是生产力，还是形成生产力的基础单元。国家国家，也即国中有家，所以成国。家之不存，国即不国。在叙述了这些一般的道理之后，他便转而对人民公社的制度发起攻击：“集体”并不一定都是先进的，而且一味地强调集体，“实际上可能让历史的车轮倒转”。他说道，如果看电视，是到电影院几千人坐在一起集体看电视先进呢，还是不出家门坐在电视机前一两个人看先进？在浴室里洗澡，是几十个人“集体”洗大池先进呢，还是一个人洗盆浴先进？种田，是几十个人都集中在一块地里“集体”劳动先进呢，还是一个人开拖拉机耕种数千亩土地先进？是一个农场几万人“集体”劳动先进呢，还是一个农场只有几个人劳动获得高产先进？再比如居住行走，是“集体宿舍”好呢，还是“私人别墅”好？是乘坐百人的大客车好呢，还是家用的小轿车好？如果集体一律先进，家庭与个人一律落后，则别墅应当拆毁，轿车应当停产，浴室全部改造成众人公用，单人套房也重新改装成集体宿舍。这些话说得真是精彩，对于那些着迷于高级轿车、单人套间住房、豪华浴室和私人影视厅的官员来说，更是切中要害。李云河反反复复地讲着这些道理，但是看来他还是忽略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故事。比如毛泽东曾经热烈地希望取消家庭，并且还曾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实施，他就完全忽视。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康有为之极力主张废除家庭，他也根本没有提到。不过，他所倚重的基本道理却有着传统和现实的根据，即使生活在公社制度的大厦中间，中国人家意识依然根深蒂固，看上去会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民族。这一点就连公社制度的推行者也下意识地予以承认，所以他们总是不断地把人民公社制度以及“大同”

观念披上家庭的色彩，并且归纳出一个又一个亲切动人的号召。诸如“爱社如家”、“爱厂如家”、“亲如一家”、“老人之家”、“民兵之家”、“社员之家”云云。直到90年代，年轻人把父母之命弃于一边、大模大样地与“摇滚乐”和“霹雳舞”为伴的日子里，他们还格外由衷地唱道，“我想有个家……”

家庭的意义当然不仅仅是在90年代的流行歌曲中，美国《纽约时报》在1982年的3月21日就把这一点揭示无遗，那一天它的版面上有一篇文章说，“由家人经营的农场，是最有效的农业生产单位”，并且认定“这是一条规律”。这显然在说美国人的家庭农场，对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人看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争论。可是，当这些人说到中国乡村社会中家庭的意义时，分歧就会油然而生。1993年6月，美国出版的《经济比较杂志》，就曾相当集中地论述了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歧，其激烈的程度和莫衷一是，表明西方人对于我们国家乡土社会中的家庭既热情洋溢又不懂得它的意义所在。

事情是由一位中国人发动的。1990年12月，他在美国《政治经济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把1959—1961年中国发生的灾难归咎于人民公社剥夺了家庭权利。此人名叫林毅夫，曾在美国就读经济学博士，又在中国研究农村问题，总是能够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穿梭往还，所以，他就能以西方人的治学方式证明他自己对中国的看法。他的文章以英文写就，题为《集体化和1959—1961年中国的农业危机》，见解严谨而又新颖，一反往日流行于世的种种结论。为什么中国5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在取得了最初的成功之后，会突然出现危机？“迄今为止有三种分析”，林毅夫概括道，“连续的自然灾害；政策的失误和管理的混乱；集体的规模过大因而缺少足够的激励机制。”他说的大致不错，事实上，直到今天，我国官方的学者就是这样来解释这一场悲剧的。其中天气的原因在60年代和70年代曾经是官方文过饰非的主要依据，那时候人人都知道有一个“三年自然灾害”。但是到了80年代，人们渐渐发现这不是事实。后来就连官方也摈弃了这块遮羞布，并且承认“三年灾害”主要是肇于人祸而非天灾。学者们都同意这一结论，他们大都以后面的两种分析来解释所谓“人祸”，也即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政策失误、管理混乱和缺乏激励机制。但是，林毅夫的想法是，这些分析虽有部分的根据，却并不能切中要害。他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说，如果这些结论可以成立，那么，在1959—1961年的危机之后，天气不再作祟，政策已经修正，公社的管理制度大致上建立起来，所谓“一大二公”已经加以遏制，“队为基础”的制度确立乃是一个关键，公社的规模实际上已经缩小至当初合作社的程度，为什么在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有了这一切之后，人民公社仍然未现振作之象，其生产效率还会每况愈下，甚而从来没有恢复到合作化时代的水平？

接着他就谈到家庭。他说，集体化运动的失败，原因在于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户自由退社的权利。他为他的结论解释道，集体化的成功需仰赖农民的自我强制。这种自我强制的制度，只有凭借一种可以自由进入或者退出的规则才有可能维持。当公社的生产效率过低以致农民对他们的报酬不能满意的时候，动摇者有权利退出集体，剩下来的人若要使得农业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不致为人为的低效率所吞食，就须改善管理使其经济效率超过自营的农户。这样，又可以吸引动摇者再度自愿进入集体的组织。中国集体化的初期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并且使农业生产的效率提高至少4%，乃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进退自由的制度。自从1958年秋天人民公社取合作社而代之，农家从集体组织当中自由退出的权利即被剥夺。林毅夫断定，这对集体内部的激励结构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冲击，农民自我强制的机制无以支撑，农业生产便随之崩溃。

林毅夫这一理论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人民公社的危机并不是发生在是否有集体化的运动，而是在于农家作为一个经济的细胞，是否具有独立地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林的观点遇到巨大的挑战。反对者主要是美国人，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关心程度之深，令人惊讶。平心而论，就算是在中国，在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间，对于人民公社的事情也会所知无几，其中很多人甚至根本不会知道30年前曾经发生过的那一场饥荒，或者不知道那一场饥荒造成了大约3000万人的死亡。这就使得发生在美国的这一场争论更加意味深长。

反对者的阵营当中主要包括董晓元、戈日戈利·道、伯特曼和斯克勒曼。他们不约而同地证明了恰恰相反的结论：只有当自由退出的权利被限制的时候，自我约束并且有效率的工作才是可能的。<sup>①</sup>以西方的经济逻辑或者法律衡量这一结论，绝然不会发生任何疑问。林毅夫则再一次撰文对这一观点加以反击。这样，“退出权”的意义就成为这一场争论的焦点。这种谈论问题的方式多少有些书斋里坐而论道的味道。我国农民是一个至为复杂而又庞大的群体，发生在他们中间的事情无一不由多种因素交织而成。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虽然为理论家的研究所必需，却常常不能完整地说明事实的真相。但是，林

<sup>①</sup> 这四位学者的英文名字是：Xiao - Yuan Dong, Gregoryk Dow, Louis Putterman, Gilbert L. Skillman, 其论文见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17, Number 2, June 1993。

毅夫将其理论的锋芒集中于农家的自主权利，表明他已洞悉中国农村的奥妙所在。事实上，家庭的确是我们传统的农耕文明的一个难以磨灭的特征，由经济再生产的过程来看，农作物成长不能等同于现代工业的流水作业，这是显而易见的。它是经济过程与自然过程的组合，土壤的品质，阳光的辐射，雨水的多寡，以及气温的冷暖，均对最后的收获有着巨大的影响，其间充满了不能预知的因素，因之便需要生产者的责任感和能动性。显然，家庭经营的制度可以更加容易地对生产的过程施以调整。人民公社集体劳动的弊病则在于缺乏弹性，只能追随预定的计划。即使队长可以依据刮风下雨而对劳务加以改变，也只会得到农户消极的反应。这与农家在自己的自留地上积极主动的创造性劳动不可同日而语。当日农村拥有农产多至 1.2 亿，分散无矩，各有因袭，而我们国家的制度历来追求财富均衡，即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一个人身处集体内部，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比他人有更多收获，无论怎样怠工都不会比他人少有所得，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面，想要退出集体的组织另觅他途则没有任何可能，他又如何能够坚持不懈地强制自我无私贡献于集体？而当一亿多农家都以这种立场对待集体，又有什么力量可以遏制其消极影响？这种种复杂因素集合而成的特征，使得家庭经营这样一种传统的农耕制度，得以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保存并且发展起来，即使最发达的社会也不肯一律地将之排斥。经济的组织不能随技术以及工具的进步而加以根本的改变，这肯定是一个唯一的例外。

现在我们仍需回到人民公社的大厦当中。

在毁灭了家庭的经济与政治的价值之后，人民公社开始缔造一个庞大的官员集团，来填补乡村社会中由于家庭的削弱而产生的空白。官员的任职程序由中央权力中枢到地方政府再到乡村社会，其数量在官方从未予以公布，人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只是凭直觉才意识到它的庞大和无所不在。直到 80 年代，在社会学者的零零星星的调查集中起来之后，人们方有可能作出大致的估计。依照当日人民公社的官制，则每个公社有干部 30 人以上，生产大队大致为 10 人，生产队则为 5 人。这样，在 5.2781 万个人民公社、69 万个生产大队和大约 500 万个生产队当中，大大小小的官员人数可以多至 6000 万以上，大体上占有农村全部人口的 7%。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在身份上仍然属于农民，但却具有地方行政官员的全部职能。他们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用以统一亿万农民的意志和行动。其具体操作则事无巨细，统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揽无遗。诸如百业兴废、田间种植、劳务派遣以及收入分配，自是不在话下，就是农家之教育、医疗、生儿育女、嫁娶丧葬、家务争端、邻里是非、衣着饮食之类，也一概在官员的管辖之列。一件典型的事实是，官员们常常率领乡村民兵，身负刀枪棍棒闯进农宅，将政府加以限制而农家偷偷饲养的鸡鸭鹅兔，一律擒获宰杀。所以那时候乡村中间无论老幼，人人都能描述鸡飞狗跳、血溅当堂的故事。

下层官员们一意使用行政权力，力追政治风潮，强调“集体精神”，甚至以武力胁迫农家就范。表面上看来，与旧时土豪劣绅的横行乡里并无区别。但是，我们国家全部政治的着眼点，也就是希望以一个统一的官员体系，来与亿万分散的家庭相抗衡，以使整个农村皈依“大同”理想，因之官员的专横在行政和组织方面来说，自有它合乎情理的地方。只是公社的策划者和推行者都不曾想到，政府不用健全的制度去激励农民的觉悟，而单纯地依靠少数人的为所欲为，向多数人施以政治压力和道德约束，结果必然是在这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造成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在80年代初期为人民公社制度提供了最坚固的堡垒，直到90年代依然可以成为农村中各种矛盾的焦点。

1982年中央政府终于承认“包干到户”为合法，其文件一经发表，乡下无数官员便不约而同地感到人民公社大势已去，他们为之奋斗了20多年的理想也就随之烟消云散。在一个充满了理想精神的社会中，这的确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下级官员们纷纷要求上级对这件事作出解释。他们虽然不能再将这件事情说成是“分田单干”和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却可以继续采取消极的办法以约束农民的行动。比如山西省地方政府做出决定说，“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不能超过总数的20%。接着他们就在这一年里派遣第一个干部工作队进驻乡下，按照这个比例将超过部分重新合为集体。安徽本为“包产到户”的一面旗帜，这时候也召开省委会议，决定已经“包产到户”的不再追究，而没有“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亦不再继续。当乡村的官员们发现“包产到户”的实际进程已如破竹之势，难以制止，便关起门来异常悲痛地哀叹毕生事业毁于一旦。这一年春天在他们的眼里真是一个悲惨的春天。某一个夜晚，山东省靠近黄海的平原上，有一间茅屋里的哭声彻夜未息。那是一个村庄正在召开党支部委员会，7名年老的委员为了人民公社的逝去悲痛欲绝。“难道社会主义的江山真的完啦？”这些人对着面前毛泽东的画像问道，脸上无不老泪纵横。在另外一个地方，湖南省的韶山，毛泽东的家乡，居然也出现这一场面，不过那是一个白天。分田到户的计划一经公布，一位干部便伏到公



社的土地上痛哭失声，她说这块土地曾由毛主席亲手耕种，现在竟然也要“包产到户”。举出这些小事就能够证明，人民公社制度所造成的干部与百姓之间的矛盾之深，足以令他们对同一事实抱以完全不同的爱憎。

共产党改变了既定方针之后，便号召各级官员把自己从僵化的意识形态当中解放出来，这也就是当时甚至到现在还很盛行的“清除‘左’的影响”的方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意识形态对于官员的约束力远较百姓为甚。官员们相信公社制度的尽善尽美，希望以道德的力量而不是利益的动机来维系这个社会的运转，这也不能说不是出于真诚。但是，他们已经在人民公社的大厦中生活了24年，很多变化在这漫长的时间中已经发生，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事，是整个官员集团的利益，都是维系在人民公社的既成制度。

除了少数人被列入政府正式干部的序列，乡村里面大多数具有行政职责的人，并不改变其农民的本来身份。他们的收入一律来自社员的直接供奉。这些人既然肩负着“管理”乡民的责任，其直接投入田间劳役的多寡便完全视其主观的贤愚。但是，所有这些都无例外地要从农民中收取钱粮，这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中可以找到类似法律依据。政府的行政需要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员集团，但是国库却没有足够的钱粮来支付这一笔费用，直接占有社员劳动成果的途径一经开辟，便成为一种解决难题的有效途径，为历届政府所认可，农民从此也就需要同时缴纳国库的税粮和当地官员的俸禄。在人民公社的成宪中，后者被归入“集体提留”的项目之下，即便遭遇灾年得免国税，此项负担也不能有丝毫减少。它在全部收获当中预先扣除，然后才将剩余部分分予农民。扣多扣少则全由干部的数量多寡以及欲望大小来决定。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特权，其给官员们带来的好处，可由陆学艺在定陶县陈集公社的调查来证明。据他说，这个公社在1980年拥有27169人，不分男女老幼，每人缴纳自己收入的10.83%，作为1766名官员的补助，其中一个大队75个干部获得的补助，竟能达到全部收入的19.1%。但是这肯定还不是最高的纪录。比如在甘肃渭源，1977年粮食产量当中有30%为官员“提留”，计19535913公斤。另外还有848069公斤在账目上计为“其他”一项，实则为官员们的吃喝所耗。

这些个案虽然不一定能够代表全部，但却能够证明大约占总人口7%的公社官员，实际占有着大约10%—30%的收入。如此少劳多得甚至不劳而获成为常例，也就诱使愈来愈多的人进入可获“补助”的行列。直到一个中等规模的公社里面，拥有干部身份的人可以多达2000多人，已超过旧时乡村保长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保丁数量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在人民公社社员中间会流传着一句尖刻的话：“过去几个村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一堆保长。”但是这仍然不是农民所要供养的全部，另有民兵干部、妇女干部、共青团干部、会计、计划生育员、小学教师、赤脚医生、兽医、广播员、护路员、护林员、代销员、电工、农机员、供销员等等。这样，乡下劳动力中需由农户“补贴”的人就占到十之三四。

农民居然能够接受这种明显不公的分配制度，实在只能将之归功于人民公社。集体的劳动以及集体的收获全部掌握在干部手中，这种方式多少有着浑水摸鱼的功效。农民一般来说并不能确切地了解他们的劳动所得有多少被干部拿去，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干部多吃多占所具有的直觉。一位姓胡的安徽老妇只字不识，却喃喃地认定了这一基本的事实：“干部什么不干，有得吃；我们一年干到头，没得吃。”然而事实常常还要颠倒过来，农民从干部的手里得到实际上是自己的劳动成果的时候，反而会觉得那是干部的恩赐。干部一旦掌握了农民的劳动成果，无异于掌握了一种最有效的武器。那时候，乡下大多数干部都懂得利用这个武器来管理属下村民。政治上的异己，以及行为不检或刁钻抗上的村民，常常首先在年终的分配时遭到克扣。如果此人冥顽不化且毫无悔改的表示，那就要取消其参与分配的权利。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种惩罚的威慑力量之大，甚至可以超过政治的压力和道德的宣传，足以迫使人人屈服。此中道理再简单不过，干部手里握有农家生存的命脉。当然，干部以此营私，招降纳叛，顺昌逆亡，亦属情理中事。我们国家治理农民的重点，乃是将分散无矩的农户结成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的集体，所以种种侵犯农民家庭权利的行为，往往并不被视为非法，甚至还是维护集体利益所必需。即使有官员敢于为非作歹，鱼肉乡里，也只是被看作个人品格的低劣所致，而非制度的积弊。这样看来，乡村干部的腐败成为风尚，甚而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几十年间共产党屡屡张起整肃旗帜，杀一儆百，倡导廉洁，然而腐败仍会日甚一日，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到了1982年冬季，粮食再度丰收，总产增长9%，达到35450万吨；棉花359万吨，增产更加惊人：21%。尽管“包干到户”已超过党的方针所限定的比例，占农民总数的70%，但是高层领导人中已没有人再来指斥。就个人利益而言，他们同人民公社的制度并无直接关联。一旦意识形态的屏障予以扫除，新制度又显示出对生产力的推动，他们也就没有任何理由居中作祟。但是，生活在人民公社当中的那些官员可就大不一样了。比如有一位生产队

长，表面上振振有词地捍卫着美好的理想，说“大包干”会把毛主席的集体经济“一脚踢光”，私下里却又说：“你们‘包干到户’，不让统一，我吃啥？”武都地区党委书记钟永棠评论道，“他说的倒是一句实话”。大多数乡村干部现在发现自己成了多余的人，只好卷起铺盖回家种地。河南省沈丘县28407个社队干部就这样走了23383人。他们只好像农民一样分得一块土地，早出晚归，自食其力。按照会宁县一个大队书记程建业的说法，他“以前十几年干的活，也没有这半年干的多”。临近这一年岁末也即1982年12月11日，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宣布，将在政府机构的整顿和改革中取得明显的进展，务使党的干部的作风有一个明显好转。在乡下，得意洋洋的农民眼见得干部一个个灰溜溜地和他们一起扛着锄头把子下地，当然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其中一人还在自家门框贴上一副对联，用词尖刻，却显得极为扬眉吐气，所以很快不胫而走：

上联：层层设防，节节败退，干部越搞越被动；

下联：队队增产，户户丰收，农民越干越起劲。

横批：大包干好。

1983年——

12702个人民公社在这一年里宣布解体。

“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有576万个，为总数的98%。

粮食总产38728万吨，增产9%；棉花463万吨，增产29%。

1984年——

39838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

粮食总产40731万吨，增产5%；棉花625万吨，增产34%。

1985年——

所余249个人民公社全部解体。

至此，在我们的国家中，人民公社和它下属的生产队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61766个乡镇政府和847894个村民委员会。

现在回到本书开头。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社员们背叛人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民公社的那个夜晚，仍有一个细节需要重提，因为它可能具有历史的价值。这就是他们所说，如果失败，坐牢杀头也甘心。经过六年的沉浮跌宕、恩怨是非，小岗村的“包干到户”终为全国所仿照，人民公社则消遁于无形，官员、农民、学者和记者们，也一致地认定农村的改革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未能深悉，前述人民公社所造成的种种意识形态分歧以及利益纠纷，依旧蕴藏在我们国家各种力量中间。其冲突直到80年代后期以至90年代，仍会余韵缭绕，令人不断地想起多年以前小岗村那十几个农民的不眠之夜。

1993年12月30日第一稿

1994年6月23日第二稿

1994年9月10日第三稿

1994年12月30日第四稿

## 后 记

我对中国农民的接触始于1969年，有意识地研究农民的问题，则是在1988年才开始的。最初的焦点是集中在80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可是很快就发现，这一改革的渊源也即人民公社的历史，较之改革过程本身更加惊心动魄，遂将主要精力转向研究人民公社制度的兴亡。

资料的来源比我最初的想象要多，困难在于寻找这些资料并加以鉴别和取舍。我寻找这些资料的途径，主要是当事人的回忆、已经出版的文献以及公开发行的报刊。访问查阅誊抄比较以及鉴别……所有方法都很原始，更由于内心里面时时想要做到“无一字无来历”的地步，所以工作进程很慢。好在经由官方发表的资料越来越多，其中有些虽然不能完全一致，但能够彼此兼容，反映了相同的趋向。在研究和写作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一直是被一种非常沉重的心境所笼罩。前后七年，增删四次，成稿40多万字，最后保留了其中大约2/3的篇幅，以成现在这个样子。

人民公社在中国始建于1958年，到1984年彻底终结，其全部的历史计为27年。它发生在世界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乃由一个最庞大的政党所领导，其目标是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变为现实，但是它却造成了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这是20世纪中国人死于饥荒以及战胜饥荒的最重要的史篇，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舞台上最为凝重的一幕。

饥荒是20世纪蔓延于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现象，但是大多数国家不能依照人们期待的那样充分记载。在我们国家，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描述现在看来也远远不够清晰。甚至在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中间，对于人民公社的故事也知之甚少，一些人甚至从未听说60年代初我们国家所发生的饥荒，以及这一饥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当然有很多人了解一些重要的事实，但是他们却不能理解这中间的来龙去脉，所以他们便常常会提出下面这些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那么多荒诞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充满智慧的国家里？中国农村的集体化运动，为什么在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取得了最初的成功之后即迅速地走向失败？一种在三年当中被证明是错误的制度，为什么竟会持续近30年之久？为什么农民能够忍受饥饿甚至死亡？为什么我们一向崇尚的意识形态的力量不足以遏制农民的怠工？一个充满了美好理想的制度——人民公社，为什么居然将我们的国家推向贫困？一个真正能够将农村引向繁荣的制度——“包产到户”，又为什么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被看作“魔鬼”？70年代末期开始的农村改革，为什么是由农民发动，因而充满了贫民革命的色彩？而一向以人民利益为宗旨的干部，为什么要重重阻拦？农民为什么能够在经历了三次惨痛的失败之后，还会对“包产到户”一往情深？“包产到户”又为什么能够死灰复燃？最后，贯穿在这一切问题当中的最关键的问题：以某种意识形态的或者道德的管理作为施政的基础，希望以此取代经济和法律，进而弥补制度的缺陷，其结果是否能够尽如初衷？

我是希望将这个故事当作历史来叙述的。同时我又希望能够回答这些似乎只有历史才能回答的问题。但是读者一望而知，本书的叙述并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也不是依照史家通常遵循的纪事体或者纪传体的惯例，所以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本史学专著。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涉足历史的领域已是过分之举，说到史学专著，还是请史家去作吧。

全部研究参阅了大量已经出版的文献，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的注释部分已尽可能地予以说明。现在还要特别地感谢这些在我之前涉足农村改革的研究者们，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薄一波、杜润生、王郁昭、吴象、张广友、陆学艺、林毅夫和李云河。没有他们的成果，我将不可能完成我的工作。

还应当感谢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李春林，他在那么长的时间里面一直给我以鼓励，使我能够几次将已经停止的工作重新进行下去，他给予我的许多建议以及对于稿子所做的许多处理，使得这本书可以问世。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他愿意做这一切完全是出于一种信念以及对于自己职业的忠诚。对此我深表敬佩。

作者

1995年1月14日于上海

## 主要参考书目

- 陆学艺：《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 王耕今、杨勋等：《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农村读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 王郁昭：《大包干与大趋势》，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7 年版。
-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
-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 中国社会调查所：《中国国情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 《浙江农业经济》，1991 年增刊。
- 瓯海县征集合作化史料办公室编：《燎原社史资料》。
- 邓子恢：《农业问题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编。
- 高光：《大梦谁先觉》，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年版。
-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 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国家统计局农村司：《中国农村四十年》，中原农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 张广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由来与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 1986 年版。
- 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政策法规选编》，法律出版社 1983 年版。
- 《新时期十年专题纪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版。

## 历史不再徘徊

——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

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花城出版社 1993 年版。

孙启泰、熊志勇：《大寨红旗的升起与坠落》，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李克林：《张浩事件的前前后后》，见《人民日报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

《大寨红旗飘》，农业出版社 1965 年版。

张广友：《阳关道上》，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陆子修主编：《农村改革哲学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陆学艺：《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陆学艺：《联产承包责任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李超贵：《中国农民大写意》，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杜润生：《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郭书田主编：《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十年》，农业出版社 1990 年版。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文锦、莎荫、梁骏、宇华编写：《大寨红旗》，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重要文献摘编》，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李云河：《中国农村户学》，农村读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廖盖隆主编：《新中国编年史》，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风云七十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 1949—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77 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王立新：《毛泽东以后的岁月》，见《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人民日报评论部编：《走向新时期》，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高原编：《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最后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

邱小龙编：《中国大悲剧的人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温铁军：《改革实践录》，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陈伯君、胡文忠：《乐兮·忧兮——中国农村潮》，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严瑞珍、周志祥、严厚锋：《我国的农业生产结构》，农业出版社 1986 年版。

薛暮桥：《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 1980 年版。

德·希·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 1368—1968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

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粮食之研究》，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 1989 年版。

农业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编：《中国农村：政策备忘录》，农业出版社 1989 年版。

农业部农业政策研究会主编：《中国农业问题研究》，农业出版社 1991 年版。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98, No. 6, December 1990.

Justin Yifu lin: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 - 1961.

## 再版后记

本书初版一万册于1996年1月付印，并于6月发行。最近，责任编辑李春林来电话，说要将此书再版。

较之第一版，现在的这本书作了一些修订。大部分是文字方面的错误，包括错别字以及用词的不严谨。也有些是事实细节及时间顺序方面的错误。现在有机会修正这些错误，在我是一种幸运。至于书中基本脉络、事实和观点，均一仍原议。

感谢读者的厚爱。我知道今天的读书人大都居住在城里，与乡下较少直接联系，所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读者倾心于这段出自农村和农民的历史。

也感谢所有对本书第一版提出意见的人，包括周瑞金、姚力文、吴长生、张广友、章世鸿和马立诚。尤其感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郑惠、韩钢。作为党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们给予本书以充分的肯定，打消了我对自己工作最后的疑虑，他们提出了十九条修正意见，使我有可能会将一些史实表述得更加准确。

作 者

1997年5月20日于上海

